

政坛巨头为何陨灭？怎样陨灭？

# 政坛 大地震

杨双 谭英洲 主编



## 内容提要

国家最高领导人被推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对社会形成为极强大的冲击。一些人昨日还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但一夜间乌纱落地，言轻身微，甚至银铛入狱，命归西天，或被放逐国外，埋骨他乡。这种魔术般的政坛大地震，原因何在？过程怎样？这是一切善良闭塞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本书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希特勒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人，乌干达总统阿明竟用活人的心肝下酒，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全家合伙鲸吞国家财产，而受人爱戴的瑞典首相帕尔梅却经常外出活动不带警卫。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暴尸广场，朴正熙总统被部下打死在宴会桌前，一代战神拿破仑困死在弹丸小岛，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却被献花女炸得血肉横飞，尸骨难收……本书各篇多为有关专家撰写，史料真实，文笔隽永，名言警句，离奇故事，读来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让您于无声处静听政坛风雷，令君在顺境中三思人生祸福。

政坛大地震

杨双 谭英洲

## 第一编 专制腐败天诛地灭

某些凶恶的品质造就  
了伟大的才能。  
——拉罗什福科

无法无天终失江山

## ——博卡萨皇帝变囚徒

我在一切地方，但在任何地方又都没有我；我什么都不着，但却看到了一切；我什么都不听，但却听到了一切。这就是国家元首的作用。

——博卡萨 1966 年 1 月 1 日，中非共和国的陆军参谋长让·贝德尔·博卡萨通过政变上台，当了总统。尔后，他又使自己当上了终身总统、大元帅，直至 1977 年 12 月 4 日，成为中非帝国的皇帝。然而，多行不义必将自毙，这个在中非不可一世的皇帝不久就被赶下台，流亡国外。七年之后，他又潜回国内，当即被中非政府抓获，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那么，这个“庞然大物”的皇帝是怎样从宝座上跌落时呢？为什么会跌落呢？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

### 穷奢极欲的生活

博卡萨疯狂地追逐个人的权势。过着穷奢极欲的主活。他把中非国家当作私人的财产，任意地挥霍浪费。仅 1977 年 12 月 4 日举行的登基大典就耗费了 3000 万美元，相当于中非全国年收入的一半。其排场、挥霍的程度，令人咋舌。合众社报道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举行了现代非洲历史上最浪费、最壮观的仪式。”

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博卡萨把首都班吉市内乌班吉河畔的总统府改为皇宫。宫内有动物园，饲养了一些猛兽。据传说，博卡萨曾在这里用活人喂狮子和鳄鱼。博卡萨的寝宫是在离城 60 公里的贝朗戈宫。这里有三道大门，每道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中间还有路障。这座宫殿由一群白色屋宇组成，外表虽不壮观，内部陈设却极其讲究。他的中非籍皇后住在班吉市纳赛尔大街的皇宫，陈设极其豪华，宫内卧室和浴室都是仿照巴黎的王宫建造的。

博卡萨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妻妾，据说正式的妻子就有 8 人，有子女 36 人。他们在班吉都有行宫。博卡萨曾经很爽快地告诉别人，他有 16 个妻子。可是他又十分不满有关他有众多妻妾的报道。1978 年夏，他紧急召见各国驻中非使节，为的是要当面驳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史密斯对他这方面的报道。他说：“他们说中非皇帝喜欢女人，玩弄女人……是的，我有十几个妻子，这有什么不应该？这是我私人的事情，我还感到很光荣哩！我是在为我们国家繁衍后代！”使节们听了，无不目瞪口呆。

博卡萨还酷爱照相，有各式各样的照相机 300 多架。

除了平时挥金如上，博卡萨还把大量钱财存入法国、瑞士的银行；在法国等地购置豪华的别墅。

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如此的挥霍，如此众多的妻妾，皇族的全部费用均从国库开支，不能不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激起社会的反抗。

### 巧取豪夺搜刮民财

博卡萨为了满足无穷无尽的私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携钱的方法很多。首先是经营工商业。中非经济落后，没有像样的工商业。商店和工厂大多由外国人经营。博卡萨以发展经济为名，鼓励官员们经商，而他自己则是最大的商人。在外国人办的企业里，他不但要抽取 10% 的佣金，而且还要有

20~40%的股份。为了垄断象牙出口，连他的长子乔治·博卡萨也被他驱逐出境。班吉市有一座手表装配厂就是由博卡萨和瑞士商人合办的。博卡萨仪出20%股份，瑞士人出80%股份，但所得利润却要两家对半分。为了使瑞士人不吃亏，博卡萨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这家工厂以“优惠”。他规定：手表零件的进口可享受优惠待遇，并不许进口其他国家的手表，以保证该厂手表在中非国内销售，攫取高额利润。博卡萨在中非钻石公司有50%的股份，还以皇家的名义开办了机器修造厂、家具厂、棉花公司、咖啡公司等许多企业。为了赚钱，博卡萨甚至连皇宫里种的蔬菜也叫人拿到市场上出售。至于依仗权势大搞走私、偷税漏税，更是司空见惯。

除了通过经营工商业赚钱之外，博卡萨还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财富。

中非的工人工资很低，但苛捐杂税倒很繁多。每人每年要交85法郎的“人头税”；按规定，所有的中非人都是中非唯一的“黑非洲社会进化运动”成员，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党费”。由5名士兵陪同一名财政部的官员，每天都要到一些企业走一圈——大部分企业在班吉附近——催税收账。有些人交不起税，竟被罚做1~6个月的苦役。而搜刮来的钱财，大部分都被博卡萨挥霍或侵吞了。这也不够他用的，怎么办呢？于是又巧立名目，多方搜刮。1977年，他借举行加冕典礼之机，向国内官员和普通百姓敲诈勒索，强迫工人拿出工资的10%来“献礼”。

在博卡萨敲骨吸髓般的盘剥下，中非人民生活极其贫困，老百姓常常吃香蕉、木薯度日，所谓“吃饭靠大树，身上披块布”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博卡萨不仅盘剥本国人，还在外国人身上打主意。一是不顾廉耻，死皮赖脸地向外国人讨要。1977年加冕典礼时，他就向各国驻中非的使节、外国商人敲诈勒索，要他们也“献礼”。有的国家在中非举行工业品展览，他不许人家在展览会上出售展品，而是由他自己“买”下来，然后转手高价出售。博卡萨公开声称：“给我钱的就是朋友。”甚至说“魔鬼的钱也要”。为了向一个国家要钱，他曾一度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并改信伊斯兰教；不久，为了取得另一个国家的“援助”，他又改信罗马天主教。而这些外国的“援助”，并未用于中非的建设，大部分都饱了他的私囊，甚至外国给中非的救灾款，也落入他私人的腰包。

### 暴戾统治

博卡萨当上皇帝之后，对内一直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禁止使用“民主”和“选举”等字眼，解散议会，政府首相由他亲自选择，副首相、国务大臣、国务秘书虽然由首相提名，但也得由皇帝“批准”。皇帝仍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和执政党政治局的首脑。内阁法令、法律、一切行政和军事官员、外交使节都由皇帝签署任命。总之，他尽量把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

博卡萨严格控制舆论工具，取缔了国内唯一的一份报纸，广播电台也只能播送他一个人的声音。他曾说过：“我在一切地方，但在任何地方又都没有我；我什么都不看，但却看到了一切；我什么都不听，但却听到了一切。这就是国家元首的作用。”电台每天重复播送他的“圣训”，以至许多人都能把它从头至尾背诵下来。中非还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任意以各种“理由”禁止外国报刊在中非发行。电台对外国政变的消息从不广播，因为怕“受影响”。

博卡萨登基后颁布了新的礼仪制度，废除了接吻、拥抱、握手。要求任何人遇见皇帝时都要“在相距极远的地方俯首致敬”。人们在回答皇帝的问题时，应该说“是，皇帝陛下”。即使情况需要，人们也不应以“粗暴的‘不’”来回答。政府的成员和外交官都要穿大礼服和戴白手套向博卡萨祝贺，没有这种礼服时，要求穿暗色的制服和打黑色的领带见皇帝。

博卡萨称帝后深居简出。平时居住在距首都班吉 60 公里的皇宫里。他签署的法令规定：“皇帝，中非民族的象征，住在班吉附近的贝朗戈皇宫内，这是宪法规定的祖先的住所。”“皇帝只有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和全国性的庆典活动时，如 12 月 1 日国庆日时，才出来。”今后一切活动和仪式，包括对别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迎送，都由政府首相负责，如果日程表允许的话，皇帝可在贝朗戈宫接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只在皇宫进行，如果皇帝不便，将由首相主持仪式。首相和大臣们也不能随便见皇帝，但有事还都得请示。博卡萨规定：除了他的妻子、儿女，其他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入宫。他建立了一支宫廷卫队和一整套严整的特务系统，保卫着他的“安全”。就是在他外出时，也是戒备极其森严。有一次他去参观外国的一个展览，到达前现场就布置了皇家便衣卫士，停止交通，盘查行人。皇帝出行后，前拥后簇，由摩托车开道，一路鸣警笛，后面由车队护送，车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卫兵，人们见了，无不退避三舍。博卡萨还经常乘坐一架由法国青年驾驶的“帆船式”小型飞机往返于贝朗戈和班吉之间，他的子女们则乘坐别的几架小型飞机到处游玩。

博卡萨嗜杀成性，经常借口“政变”残酷地消灭他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1976 年 2 月 3 日中非曾发生刺杀博卡萨事件。10 天后，博卡萨处死了 8 个人，其中有空军中队长、博卡萨的女婿菲德尔·奥布鲁少校。在中非，被搞掉的人，被秘密绑架、逮捕，直至公开拷打，数也数不清。谁也逃不掉博卡萨和他的忠实信徒和助手路易·阿拉祖拉搞的那一套制度。阿拉祖拉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使国家处于恐怖之中的警察的组织者，根据他制定的制度，不审判的拘留可以无限期拖下去，而且监狱中的条件又很糟，致使许多人死在监狱。

博卡萨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刑罚，滥施淫威。1972 年他下令对所有抓到的小偷一律处以酷刑：初犯者割掉一只耳朵；重犯者割掉另一只耳朵；第三次则剁掉右手；第四次当众凌迟处死。他还常带着卫队到监狱中察看，看着小偷的耳朵和胳膊是否被砍掉了。当外国记者问他“这是不是太残酷”时，他竟然回答说，砍掉一只手总比判处死刑好。当年 7 月 31 日，博卡萨闯入监狱，挥舞着权杖，大声吼叫，对犯人们乱砍乱打，一个人就打死 50 个正在服刑的犯人。接着，他又命令全体犯人每 46 个排成一行，光着身子、捆住手脚，然后叫士兵们对他们往死里打。犯人们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板地上，奄奄一息。博卡萨这才感到满足，脸上浮出微笑。

皇帝的专权，王公大臣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对皇帝百依百顺，可对人民却专横跋扈。博卡萨的大臣们分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些人没有多大的特权。另一类是宫廷大臣，他们和皇帝关系密切，平时住在皇宫，除侍候皇帝外无所事事，但他们对皇帝的人事安排和国家决策影响很大，外出时也很有特权。至于皇亲国戚，则有无上的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博卡萨因为一位外国的外交官不肯让他的女儿的汽车不排队就加油，便将这位外交官驱逐出境；因为一位记者得罪了他的亲属，他就下令将其驱逐出境，



还在记者的办公室贴上封条，将其“国有化”。有人因为不慎碰坏了首相府的围墙，就被枪毙了。

### 民不聊生反抗不断

在博卡萨统治下，中非帝国民穷财尽，陷入空前困境，经济濒临破产。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农民过着“吃饭靠大树，身上披块布”的苦难生活。工业必需品的80%靠进口；出口产品连年下降，钻石产量由1968年的54万克拉降至1978年的28.4万克拉。10年间下降了一半。咖啡由1.39万吨降为1万吨；棉花由5.8万吨降到1.6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预算赤字由1970年的10亿非洲法郎上升到1977年的60亿非洲法郎。内外债务达70亿非洲法郎。1978年就征收1979年和1980年的税收。银行停止兑现；从1978年下半年起，职工、教员有时数月领不到工资，士兵领不到军饷，学生拿不到助学金。

黑暗的统治、贫困的生活使中非人民受尽了苦难，人民纷纷逃离家园，离开这个恐怖之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博卡萨执政的10来年时间里，企图推翻他的统治的政变就发生了4次，谋刺博卡萨的活动也有3次。

人民的反抗时有发生，起初只是一些零星的抗捐抗税斗争。到1979年1月已发展到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并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声援。工人罢工，教员罢教，医护人员罢医，农民烧毁棉花，妇女也走上街头游行。斗争愈演愈烈，1月中下旬达到了高潮。

这场反抗斗争是由强迫学生买制服引起的。

博卡萨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变着法儿搜刮钱财。除了下令从1979年初开始征收1980年的税款外，还下令全国25万在校学生每人上交5000非洲法郎（相当于20美元），买一套皇后的工厂生产的制服。这种制服印有“中非帝国”字样和皇冠图案。哪个学生如敢不买，就将被开除学籍，其家长也将被革除公职。在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不用说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交不出这么多钱，就是国家职员也一筹莫展，因为这笔钱相当于他们一个多月的工资，何况国家已有4个月没有给他们发薪水了。

1979年1月18日，首都班吉市骚动了。起初是中小學生，后来迅速扩大到大学生，他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还有数百名工人和失业者也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1月20日游行示威达到高潮。博卡萨在皇宫中像一头恼怒的狮子，气急败坏地命令军事大臣路易·阿拉祖拉向游行的人群开枪，“绝不手软，立即执行”。15分钟后，帝国大道枪声骤起，血流成河，宪兵们开始逞凶了。他们开始到各家抓那些拒绝买制服的孩子。学生们在街上或家里被捕，然后被押上军用卡车，如果稍表示不满，宪兵们就在他们的头上打枪。几天之内，班吉监狱和郊区的兵营里就关押了近1000名8至16岁的少年儿童，他们几乎赤裸地挤在肮脏窄小的牢房里，不少人被活活地闷死。死了的人用袋子装起来被集体掩埋。几天工夫，有100多名学生丧生。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班吉惨案”，又叫“动摇的周末”。

后来，博卡萨还亲自参加了对孩子们的拷打和屠杀。他穿着军服来到恩加拉格巴监狱，手握从不离身的紫檀木象牙权杖，向那些被捕的学生们喊道：“你们说‘处死皇帝’，是你们该死了！”他下令开枪杀人。据伦敦大赦国

际估计，被折磨死的孩子不下 200 人，仅在 4 月中旬的一天就埋葬了 42 具童尸。

博卡萨虐杀儿童，一手制造的“班吉惨案”震动了非洲，震动了世界，各种国际组织和上百个国家紧急呼吁停止这种残暴行为。而国内的人民对博卡萨政权更恨之入骨，反对派也加紧了活动，博卡萨政权的末日很快来了。

## 博卡萨的末日

博卡萨能够上台并维持其统治，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法国的支持。而当他的暴行遭到国内外一致谴责，声名狼藉之时，法国也不愿再支持他了。于是他寻找新的靠山。1979 年 9 月他到利比亚参加利比亚国庆十周年庆典。

9 月 20 日夜，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国家宫灯火辉煌，欢快喜庆的阿拉伯乐曲在大厅中回荡。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前来参加利比亚国庆十周年的各国贵宾。博卡萨也在其中，他遇到了在那里避难的非洲另一位暴君乌干达前总统阿明。“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把多日的愁苦、担心，暂时抛到九霄云外，开杯畅饮，直到酩酊大醉，这才分手。博卡萨回到国宾馆，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上午，博卡萨还在昏睡。上午 10 时，守在电话机旁的女侍卫官卡杜卡得到了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被博卡萨政变赶下台的前总统达科夺取了政权，废除了帝制。她全身瘫软，倒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才跌跌撞撞地闯入博卡萨的卧室，将正在酣睡中的皇帝推醒，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他。

博卡萨听后不知所措，只是喃喃地说：“吉斯卡尔……吉斯卡尔……”再也说不出话来，几乎陷入麻木状态。这时，他的随从恩篷戈上校不得不与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会谈，要求允许博卡萨在利避难，但遭到婉言拒绝。于是，博卡萨决定到法国去，因为他有法国国籍。

21 日下午 7 时，离普洛旺斯不远的法国依斯特尔空中探测中心收到发自一架陌生的快帆式喷气飞机上的呼号：“我是博卡萨皇帝。我要立即在奥利利机场着陆。我要求儒尼亚克立即来见我。”可是，小型喷气式飞机已飞行了一个半小时，汽油耗尽，不得不降落在法国埃孚洛 105 海军基地。300 名宪兵团团围住了飞机。法国政府派了总统的非洲事务顾问儒尼亚克到基地去处理这件事。他告诉博卡萨，要为他另找一个住处，他不能住在法国。博卡萨听后大发雷霆，狂吼道：“我要炸掉飞机！”

为了给博卡萨安排住处，儒尼亚克多方联系，但到处碰壁，瑞士、加蓬、多哥、扎伊尔、比利时……都不欢迎这个被废黜的皇帝。最后，还是当时仍在中非的卡特琳皇后给科特迪瓦（当时称象牙海岸）总统打了电话，苦苦哀求之后，才算为他丈夫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据说，这中间法国人也施加了压力。

24 日凌晨 4 点 1 刻，博卡萨带着随从登上飞机离开了 105 基地。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博卡萨一直在酣睡。中间只醒过一次。那时，飞机正飞越撒哈拉大沙漠。他喃喃自语道：“我到厄尔巴岛去，不是到圣赫勒拿岛去。我会回来的。”厄尔巴岛是 1814~1815 年拿破仑退位后居住的地方，后来，他又从此地回到法国夺取了政权。圣赫勒拿岛则是 1815 年以后直至 1821 年拿破仑被囚禁至死的地方。博卡萨还梦想着卷土重来。

博卡萨在科特迪瓦隐居了3年，1982年又移居法国，住在巴黎郊区一所高级别墅里，由法国密探和警察“保护”着。1986年10月22日下午1点多钟，博卡萨和他的妻子阿赛玛、5个孩子分乘两辆小轿车，在其朋友带领下，趁法国警察麻痹之机，顺利地越过国境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然后乘飞机到罗马。再从罗马乘一架经班吉飞往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踏上回国的旅程。博卡萨一家都坐在经济舱里。他在飞机里一声不响，十分平静。但很快一些乘客就认出了他。一位机组人员悄悄走进驾驶舱，告诉了正副驾驶员；两位坐在一等舱里的刚果高级官员闻讯也吃惊地来向博卡萨打招呼。但没有人问他什么。

23日凌晨5时，浓雾笼罩着班吉机场。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候”了45分钟才降落。当博卡萨等人随着人流到出口处取行李时，人们认出了他，喊道：“博卡萨回来了！”机场负责人和一位法国军官把博卡萨带到办公室。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则被拒绝入境，后经布拉柴维尔返回巴黎。博卡萨则被用警车送进恩加拉贝监狱。

一个月以后的11月26日，博卡萨被押上了审判台。在此之前，1980年12月19日，中非法院曾缺席判处博卡萨死刑。这次从12月15日起由中非刑事法院对博卡萨进行公开审判，出庭作证的有60多人。审讯只涉及1974年至1979年之间的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博卡萨声称他愿意回答对他的指控，以洗刷他的耻辱，恢复中非的“名誉”。其实，在审讯过程中他却百般抵赖，企图把全部罪责推给他当时的下属。但当第三次审讯时，他就流露出失望情绪了。特别是前总统达科、前首相亨利·迈杜、前私人法律顾问以及受害者家属200多人先后到庭作证，揭露他在14年统治期间践踏法律和民主，犯下一桩桩杀人罪和侵吞国家财产罪时，这位在中非不可一世无法无天的暴君，不是说这也不知道，那也想不起来，就是支支吾吾，但最后不得不承认犯有同谋杀罪、迫害学生罪和侵吞国家财产等罪行。

1987年6月12日，中非刑事法院根据国家刑法，最后驳回了辩护律师的抗辩，宣判博卡萨死刑，并罚款600万非洲法郎（约合2万美元），没收其价值约30亿非洲法郎的财产，以赔偿国家和受害者家属的损失。1988年2月29日，中非共和国总统科林巴宣布法令，将博卡萨的死刑改为终身劳役。

这个横行一时的“末代皇帝”只好在铁窗之下度过余生了。

吴锡山

独裁内战覆灭

## ——索摩查王朝的三部曲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吴兢 1979年7月17日凌晨4点半，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从他的蒂斯卡巴地下掩体中消失，几小时后出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自己的落日别墅中。两天后，桑地诺人民军开进马那瓜，第3天以桑解阵（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为核心的民族复兴临时政府从全国第二大城市莱昂迁至首都，标志着尼加拉瓜人民60多年的反帝反独裁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1912年以来23年美国的占领和43年索摩查家族王朝的统治屈辱终于结束了，尼加拉瓜历史翻开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崭新一页。历史是一面镜子，13年后重温这段历史，对人们是会有所启迪的。

### 政治滑稽戏激化矛盾

美国的支持、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和保守党的合作是尼加拉瓜独裁政权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几十年来，索摩查父子正是依靠这三股力量，用小恩小惠收买警卫队官兵和保守党上层人士维护其家族统治的。1950年老索摩查曾用1/3议席和一些部长职位与流亡回国的保守党领袖埃米里亚诺·查莫罗作交易，达成所谓将军协议，才使王朝统治得以延续下去。1971年3月，索摩查继承其父衣钵，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如法炮制和从前的对手、新近从国外流亡回国的保守党领袖费尔南多·阿圭罗达成协议，签订了所谓库比亚库米条约，决定解散议会。1972年2月选出由60名自由党人和40名保守党人组成的立宪会议，在两年半内负责修改并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此期间任命一个由阿圭罗和两名自由党代表组成的三人执政委员会，从5月1日到1974年9月新总统选出前临时管理政府事务，索摩查名义上放弃总统职务，却被任命为军队首脑并宣布为执政的自由党1974年总统候选人。

同年（1971）4月初，索摩查以总统身份应邀访问华盛顿，受到尼克松总统夫妇的热烈欢迎，捞足了政治资本。尽管放弃了总统职位，但索摩查仍然经常以国家首脑身份出席各种国务活动，三人执政委员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什么实权。

阿圭罗和索摩查的合作引起保守党分裂。以《新闻报》社长佩德罗·华金·查莫罗和拉米罗·萨卡沙为曾伪保守党反协议派称他们的合作为“政治滑稽戏”，它延长了独裁政权的寿命。天主教会也一反30多年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常规，拒绝为1972年4月底三人执政委员会就职祝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朗化了。

### 发国难财遭报应

1972年圣诞节前夕，一场大地震使马那瓜一夜之间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索摩查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巨大震动。尼克松总统闻讯与独裁者紧急通话15分钟，保证尽一切可能援助尼加拉瓜，索摩查才重新打起精神，把三人执政委员会和天主教会撇在一边，亲任紧急救灾委员会主席，垄断了全部救济工

---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是老索摩查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儿子，路易所·索摩查·德瓦伊莱的弟弟。

作。

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索摩查的家族、亲信和警卫队官兵纷纷打着救济的旗号，混水摸鱼发国难财。他们利用手中的物资分配和房屋建筑修缮的审批权，破坏协议，首先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侵占地盘，打击排挤非家族势力；独裁者对一切商业活动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凡不在家族掌握中的企业必须向“政府”缴纳高额税金，即便是外国公司企业也不例外，一时间尼加拉瓜成为中美洲美国投资最少的国家。一些美国跨国公司指责独裁者不按“公平比赛规则”办事，强烈要求政府保护本国的利益，改变对尼加拉瓜的政策；索摩查甚至不顾人民死活，连鸡、猪都不许自由买卖，而自己却乘火打劫，建起了最新行业——血浆工业，低价购入尼加拉瓜穷人的血浆，转手到迈阿密出售牟取暴利，为美国制药工业提供原料，支持侵越战争；独裁者的情妇迪诺拉·桑普森更是有恃无恐，直接操纵全国非法走私网，从迈阿密和已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免税进口手表、家用电器、香料、香烟、白酒、打火机、高档服装和电子产品，充当黑市贸易的总后台。截至70年代中，索摩查家族贪得无厌，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了巨额财富，从一个破落的咖啡园主，发展成拥有340家企业，霸占着全国1/3耕地，总资产高达20亿美元的拉丁美洲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4年下半年尼克松辞去总统职位，独裁者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11月，索摩查虽耍弄权势以“不诚实竞争”的办法再度“当选”为总统，但天主教会拒绝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查莫罗联合5个反对党和两个工会成立民主解放联盟与独裁者分庭抗礼；年底桑解阵的一支小分队又成功地袭击了农业部长库万特的住宅，将一批政府要员扣作人质，迫使独裁者交出赎金，释放奥尔特加等政治犯并通过电台广播革命文件，沉默了7年的桑解阵武装斗争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 世界上最贪婪的暴君

“当选”连任后，索摩查搞“朕即国家”，他既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又是执政党领袖，还兼国民警卫队司令。从1974年底起，为了镇压民众反抗，他宣布戒严令，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和新闻管制法，逮捕了数千人，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资产阶级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企图以暴力手段使民众永远处于恐怖、涣散和无组织状态之中。独裁者的高压政策使桑解阵的主要领导人图尔希奥斯、莫拉莱斯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1975~1977年，桑解阵的组织联系被切断，虽然同用桑解阵的名称，却形成了持久人民战争派、无产阶级派和起义派，分别从农村、城市和邻国为基地开展斗争。他们非但没有被警卫队的反动气焰所吓倒，而且组织迅速发展，影响也不断扩大。国民警卫队官兵为了讨好主子升官发财，纷纷以残害无辜农民来表示自己的忠诚，造成数千农民失踪死亡。一些有良知的教会人士将3000多失踪者名单连同警卫队践踏人权的罪行印发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美国政府及国会重视。1975年华盛顿撤换了驻马那瓜大使，《纽约邮报》发表了安德森揭露索摩查黑暗统治的连载文章，指责他是“世界上最贪婪的暴君”。翌年白宫又进一步阻止泛美开发银行原定向尼加拉瓜提供的一笔重要贷款。美国态度的变化使独裁者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后，停止了对独裁政权的公开援助并增加了和以查

莫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来往，索摩查被迫作出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的姿态，9月恢复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取消了戒严令、紧急状态和新闻检查法，以制造国内政治形势稳定的假象，争取白宫继续给予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 野火烧不尽

1977年10月，为了粉碎美国和独裁者再度政治联手的阴谋，桑解阵起义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向南部要塞圣卡洛斯和北部迪皮尔多同时发动军事进攻，在首都袭击警卫队装甲营，并一度占领了距马那瓜不到50公里的马萨亚市。10月14日，塞尔西奥·梅尔卡多根据起义派领导人的指示和流亡国外的尼加拉瓜知名人士组成“12人集团”发表联合声明，号召社会各界支持起义派的斗争，公开要求索摩查下台，举行包括桑解阵在内的全国性对话，建立民主政府。

10月攻势彻底揭穿了独裁者的和平欺骗阴谋，然而他们的做法当时并没有被另外两派所理解。相反被认为是冒险举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实行统战的方针也遭到激烈反对。

与此同时，“12人集团”的声明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10月18日，奥万多·布拉沃大主教建议举行全国对话，民主解放联盟和私人企业最高理事会积极响应，“12人集团”和起义派为了保存实力，扩大影响，孤立独裁者，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也同意对话，条件是索摩查必须辞职。全国对话虽然最终由于独裁者的极力反对而未能实现，但在揭露索摩查反动面目、团结一切反索摩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独裁统一战线方面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全国对话陷入僵局，独裁者和反对派的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卡特政府邀请反对派领导人查莫罗年底访美。查莫罗作为反对尼加拉瓜独裁者的英雄在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国会请他作尼加拉瓜国内形势报告，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圣玛丽亚·穆尔斯·卡伯特奖。种种迹象表明，卡特政府企图以查莫罗和平取代索摩查。对此，独裁者也做好了应付准备，暗中指使他的长子步兵基础训练学校校长索摩查·波托卡雷罗少校建立“白手党”，以便从肉体上消灭危及独裁政权的敌人。

### 独裁者点燃导火索

1978年1月10日，波托卡雷罗用10万美金买通6名杀手，在查莫罗驱车前往报社的路上，杀害了这位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民主解放联盟主席、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此事震动国内外，点燃了社会各界联合反对索摩查斗争的导火线，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反独裁力量历史合力的形成，进一步加速了索摩查王朝总危机的到来。

首都群众冲上街头，学生罢课，教师罢教，3万余人参加查莫罗的葬礼。两周后企业界、商业界发动30万人总罢工、总罢市，使全国80%生产服务活动瘫痪，斗争持续近一个月。面对群众斗争，索摩查仍然拒绝辞职并再次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威胁要取消反对党。在此情况下，美国大使索拉温担心局势恶化被桑解阵利用，出面干预对反对派施加影响，斗争才暂时平息下去。

2月起义派再次发动军事攻势，攻克了里瓦斯和格拉纳达市，持久人民

战争派和无产阶级派也积极配合，分别攻打北部边界哨所，袭击警卫队营地。在全国总罢工和桑解阵武装斗争的鼓舞下，20~28日马萨亚省莫宁博印第安村社村民发动起义，用自制的炸弹、棍棒、砍刀甚至煮沸的开水奋起驱赶国民警卫队。索摩查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镇压，数百村民惨遭杀戮。

血的教训使人民清醒起来，开始认识到只有联合斗争才能最终推翻独裁统治。在大好形势面前，桑解阵各派矛盾渐趋缓和，斗争的实践使无产阶级派和持久人民战争派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接受第三派关于在城乡举行起义的总战略。7月，三派代表在巴拿马达成协议，决定统一战略协调行动。与此同时，私人企业最高理事会、民主解放联盟、以阿方索·罗维洛为首的尼加拉瓜民主运动和“12人集团”等16个反索摩查的政党和团体联合组成反对派广泛阵线，几乎包括了所有反对派组织。他们要求全国对话，索摩查下台，并且得到桑解阵的有力支持。7月26日，索摩查心脏病突发，被送往迈阿密治疗，国内由一个6人小组临时代管，独裁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 在斗争中联合起来

1978年8月22日起义派一支25人小分队化装成国民警卫队队员，闯入戒备森严的议会大厦国民宫，封锁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正在开会讨论预算问题的副议长、财政部长、数十名议员和国民宫工作人员共1000余人扣作人质，经大主教奥万多·布拉沃调解，索摩查被迫释放了博尔赫等60多名政治犯，支付1000万美元赎金并通过电台广播桑解阵革命文件，小分队才释放了扣押的人质。奇袭国民宫的胜利给独裁政权以致命一击，扩大了桑解阵在国内外的影响，加速并促成了反索力量的分化改组和全国起义的到来。

9月初，桑解阵三派协调行动向马萨亚、莱昂、埃斯特利和奇南德加等城市同时发起进攻，得到市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并一度占领了其中部分城市。9月中旬，索摩查警卫队在美国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反击，企图一举歼灭桑解阵游击队，为了追歼游击武装，警卫队多次越过边界甚至派出飞机闯入哥斯达黎加领空狂轰滥炸。哥总统卡拉索在安第斯集团的支持下，要求召开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讨论尼加拉瓜内战问题。在9月22日的会议上，美国代表附和大多数国家的意见，要求索摩查接受反对派广泛阵线关于国际调解的主张，企图将尼局势纳入其“和平解决”的轨道。

9月底，桑解阵在马那瓜、莱昂等8座城市发动起义，马塔加尔帕的群众在起义中创造出构筑街垒打击索摩查警卫队的办法。当时桑解阵仅有150名武装人员，他们要对抗一万多人的警卫队。桑解阵领导从实践斗争中开始认识到，分散的军事攻势、罢工和起义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实力对比，唯有待时机成熟，动员人民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因此从策略上考虑，接受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调解。10月初，索摩查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一方面接受由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三方代表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调解委员会，但拒不接受总统辞职、将政权交给反对派广泛阵线三人执委会直至1981年大选的方案，仍然坚持任职到1981年5月；另一方面宣布将军事管制法延长到1979年4月。10月中旬调解失败，26日“12人集团”因反对派广泛阵线企图排斥桑解阵单独同独裁者妥协，而宣布退出该阵线，一批左翼组织也随之退出。次日，桑解阵揭露国际调解的实质是推行“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发动建立起包括24个左翼政党团体的桑解阵外围群众



组织人民团结运动。1979年初，独裁者虽表面同意反对派广泛阵线提出的全民投票决定其命运，却断然拒绝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和平道路被彻底堵塞。在此情况下，桑解阵不失时机地将分散的游击武装改编为包括中、西、北、东北、东、新几内亚和南部7条战线的桑地诺人民军，并进一步扩大反索统一战线，成立了包括人民团结运动、独立自由党、12人集团、尼工人中央工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电台记者工会和工人阵线等组织在内的全国爱国阵线，实力和影响迅速扩大，逐步掌握了反索斗争的主导权，国际国内都明显地出现了有利于起义战略的形势。

## 武装起义

1978年尼加拉瓜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4月6日科多巴自30年代以来首次贬值，年初和8月份的两次总罢工和多处起义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出口30年来首次下降，最后几个月资金外流逾3亿美元，外债4年中增长一倍达15亿美元。银行存款和现金储备均告枯竭，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2%。70年代最后一年情况更糟，最初几个月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5%，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口剧增。桑解阵、12人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独裁斗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安第斯集团等拉美国家以及社会党国际和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对尼加拉瓜人民给予援助。3月初卡特政府采取“冷淡”政策，中断了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并指派驻乌拉圭大使劳伦斯·佩苏略与尼加拉瓜外长接触，力图说服索摩查辞职，以实现美国控制下的和平交权。但独裁者仍然坚持顽固立场拒不辞职。3月7日，桑解阵三派审时度势发表“团结声明”，成立了由九大司令组成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统一协调全国行动，实现了组织统一。紧接着桑地诺人民军3月攻占希卡罗，4月向埃斯特利和新几内亚发起进攻，双方争夺激烈，4月底，索摩查逮捕了反对派广泛阵线领导人罗维洛和里瓦斯，此二人被推到桑解阵一边。5月中人民军收复希诺特加，28日发起攻打北部边界城市纳兰霍的战斗。6月4日桑地诺电台号召全国民众举行总罢工和全国起义配合人民军的军事斗争，向索摩查独裁政权发动总攻击。反动王朝已空前孤立，彻底覆灭已指日可待。

## 彻底垮台

总罢工、全国起义和桑地诺人民军的军事攻势相配合很快使全国陷入瘫痪。6月4日当天，莱昂居民区筑起了街垒，一支桑解阵突击队占领了机场。次日起义扩展到希诺特加、迪里安巴和迪里奥莫，马塔加尔帕市民响应桑解阵的号召再次筑起了街垒，一支桑解阵武装攻占了警察局、警卫从哨所并控制了除警卫队总部以外的地区。6日塞拉亚省的博南萨和罗茜塔矿被解放，埃斯特利发动起义，首都陷入起义力量包围之中，索摩查封闭《新闻报》和《人民报》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在此情况下，天主教会也被迫站到了反独裁一边，奥万多主教宣布“面对长期不公正的状况，当一切和平手段归于无效时，为避免形势继续恶化，用暴力反对暴力是正确的”。

6月9~10日，马那瓜东区筑起了街垒，桑解阵的部队切断了北部通往机场的12号和15号公路。13日，桑地诺人民军和索摩查警卫队在莱昂、齐南德加、马塔加尔帕、埃斯特利和马那瓜展开激战。美国使馆开始撤回部分

工作人员和家属。14日，埃斯特利北部孔德加市经4天激战被解放。15日，南部战线向佩尼亚斯布兰卡斯和萨波阿发动冲击，警卫队伤亡惨重。零号司令埃登·帕斯托拉宣称要在48小时内占领里瓦斯，以便建立临时政府。索摩查派空军轰炸，企图阻止南部战线的力量向前推进，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禁止向尼加拉瓜当局运送武器并敦促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16日，以桑解阵为核心的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告成立，成员包括查莫罗的遗孀比奥莱培、反对派广泛阵线代表罗维洛、全国爱国阵线领导人莫伊塞斯·哈桑、12人集团代表塞尔希奥和桑解阵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从5月20日墨西哥率先同索摩查政权断交至6月18日已有15个国家先后承认新成立的执政委员会或同独裁者断交。

20日，12人集团成员德斯科托以巴拿马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外长紧急会议，代表桑解阵拒绝了美国向尼加拉瓜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干涉主义方案。同日，卡特谴责索摩查警卫队杀害美国ABC电视台驻马那瓜记者威廉·斯图尔特是一种“野蛮的行为”，50名美国记者撤离尼加拉瓜。23日，美洲国家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否决了美国的提案而以2/3多数通过了由13个国家提出的一项提案，要求严格尊重不干涉原则，敦促索摩查下台，并成立一个过渡的民主政府取代它。23日和24日，桑解阵占领了马那瓜南部的迪里安巴和马萨亚。24~26日，格林纳达、巴西和秘鲁先后与独裁政府断交。

27日，桑解阵发表了民族复兴政府纲领。同日，美国也加紧行动，新大使劳伦斯·佩苏略抵尼加拉瓜立即同索摩查会谈，但拒绝递交国书；与此同时政府特使威廉·鲍德勒与尼执委会成员在巴拿马举行首次会谈。桑解阵和索摩查都拒绝接受美国关于索摩查辞职的要求。

7月3日，人民军攻克南部重镇里瓦斯。6日，委内瑞拉停止向尼政府供油。7日，经过10天围攻解放了全国第二大城市莱昂，至此，人民武装已占领25个城镇，索摩查王朝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只有警卫队还在为之效命。独裁者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邮报》供认“我是一头被拴住，却要 and 老虎格斗的驴”。“即使我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也是没有前途的”。只得同意辞职，具体时间由美国安排。

此时美国一方面把索摩查隐匿在他的马那瓜蒂斯卡巴地下掩体中，另一方面由鲍德勒出面把索摩查辞职交权作为最后一个筹码，在圣何塞与尼执委会成员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将执委会由5人扩大到7人，还企图决定未来尼政府军司令人选。10日，警卫队向马那瓜街垒的反扑损失严重，12日，夺回莱昂的战斗又告失败。13日，执委会成员宣布华盛顿企图扮演“裁判者的诡诈是不可接受的”，双方谈判破裂。同日，桑解阵总部下达向马那瓜发动总攻的命令。14日索摩查与美国达成包括安排停火，在辞职赴美流亡72小时内将权力转交临时政府执委会的协议，并正式向美国递交了辞职书，同时却指使将10亿美元资产秘密提出存入美国银行。15日，桑解阵宣布民族复兴政府内阁名单，美特使鲍德勒为避免冲突扩大，立即承认该政府合法。

17日晨，独裁者率领家人亲信乘机逃离尼加拉瓜。18日，代理总统乌尔库约企图负隅顽抗，保持其总统权力和国民警卫队地位。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民主取代、“和平”解决、国际调解、双轨谈判均告失败、交权协议又被撕毁的情况下，24小时内与前独裁者通话4次，迫其向继任者施加压力否则就将他驱逐出境。下午，美国大凌佩苏略率领部分使馆人员离开梅

塞德斯机场前声明，“我们对未能实现业已达成的将政权移交给执委会的允诺感到十分失望”。几小时后，乌尔库约也搭乘最后一班去危地马拉的飞机离开尼加拉瓜，他只做了40小时43分钟总统，第二天接替索摩查上任警卫队司令的弗德里克·梅西亚·冈察雷斯下令无条件投降。警卫队官兵部分缴械，大多窜入北方邻国。桑地诺人民军几乎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开进首都，桑解阵经过近20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人心丧尽的索摩查家族王朝终于在国内外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彻底覆灭了。

## 更深层的原因

索摩查王朝于70年代末垮台恰如恩格斯所言是从桑解阵、资产阶级反对派、天主教会、白宫、西欧、拉美和索摩查本人等国内外“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独裁政权40多年的历史中还能找到更深层的原因：

其一，索摩查王朝是美国占领军一手扶持起来的。40多年它杀害了民族英雄桑地诺，赶走了合法总统萨卡沙，用三P哲学（银钱送给朋友，棍棒对付反对者，子弹留给敌人）实行血腥专制统治，人心早已丧尽，根基早已腐烂，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其二，尼加拉瓜人民具有光荣的反帝反独裁传统。从民族英雄塞莱东反对美国入侵者、自由人的将军桑地诺领导下坚持了7年的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游击战争，1956年9月青年爱国者里戈维托·浴佩斯·佩雷斯刺杀老独裁者，到60年代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渐趋成熟并最终领导人民推翻罪恶王朝，充分反映出尼加拉瓜人民不畏强暴，追求独立发展的顽强精神。英雄的人民是任何力量也压不垮的。其三，单一出口农产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索摩查家族卖国求荣，使整个国民经济用来为美国主子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二次大战期间，提供咖啡、木材和橡胶；侵朝战争时又大力发展蔗糖、棉花和天然橡胶。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合成纤维的发展使尼加拉瓜国际市场缩小，出口产品价格下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旧的经济模式面临穷途末路，只有采用革命的方法，打破旧统治、旧模式，才能确保民族的生存和统治的发展。经济模式陈旧是尼加拉瓜革命的经济基础。

其四，尼加拉瓜反动王朝是中美洲军人独裁统治的最后堡垒。越战失败后，美国将其势力从全球收缩并改变了对拉美的政策。70年代后半期，南美军政权纷纷被文人政权所替代，1977年新巴拿马运河条约签订后，索摩查独裁政权同安第斯集团成员国及南部邻国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矛盾加剧，在整个拉美和美洲国家组织中地位更加孤立。政治制度落后是其垮台的主要原因。

汤小棣

暴政惹起天怒人怨

## ——海地总统杜瓦利埃夜逃法国

暴政是一把无柄双刃剑，它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受到伤害。

——丁之

1986年元旦过后，位于西印度群岛的海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独裁政权的斗争。斗争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成为一场倾毁杜瓦利埃家族统治的熊熊烈火，愤怒的人们潮水般地涌上街头，面对着政府军，毫无惧色，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打倒杜瓦利埃”的口号。这次反暴政的斗争规模是海地182年独立史上前所未有的，被称为“海地的第二次独立”。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海地的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于1986年2月7日三更时分，带着家眷和20多名随从乘坐美国空军的一架运输机仓皇出逃。他的出走宣告了杜瓦利埃王朝对海地长达28年的暴虐统治的结束，使海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杜瓦利埃王朝的覆灭是海地多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 加勒比海上的“鞭子政府”

杜瓦利埃家族对海地的独裁统治已有28年之久。1957年9月，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父亲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美国的支持下当选为海地总统。

老杜瓦利埃为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政治警察部队，作为杜氏家族的打手和实行其独裁统治的工具。这些暴徒头戴锡盔（一种宽沿帽），眼罩墨镜，脖系红领带，腰挂手枪，形象凶狠，令人望而生畏。海地人用当地的克里奥尔语称这帮暴徒为“通顿马库特”，意即“吃人魔王”。通顿马库特渗透到海地各个阶层，监视全国人民思想和行动，肆无忌惮地逮捕、拷打和屠杀爱国人士和反对派，使人民生活于苦难和恐惧中。他还利用宗教迷信和巫术来愚弄和控制恐吓人民。他常常身着黑衣，装扮成海地民间宗教伏都教的神灵，假意施展伏都教法术，诡称他可以驱赶邪恶，对人民实行精神奴役。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是一个政治暴君、嗜血魔王，他曾经在伏都教的仪式上拿活人当祭品，活活剥皮，烹吃其内脏。他还曾亲手开枪打死了23名犯人。在杜瓦利埃的残暴统治下，海地进入了一个极为黑暗的时期。他不仅把整个海地当成自己的私产，把广大群众看作可以任意使唤的家奴，而海地总统的宝座，成了杜氏家族世袭的职位。当他用暴力铲除了所有异己之后，于1964年修改宪法，宣布自己为海地共和国的终身总统。1970年底，弗朗索瓦的心脏病复发，使他最为放心不下的是杜氏家族统治的延续。他在病重之际又一次逼迫议会修改宪法，把规定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为20岁，为其19岁的儿子鸣锣开道。事实上，在1964年他就指定12岁的儿子为其继承人。1971年2月他又亲自导演了一场没有任何竞争者的“公民选举”，让其子让—克洛德当上了海地总统，成为海地史上第一个“世袭总统”。

尽管小杜瓦利埃在执政的头几年里，实行了一些与其父不同的政策，使得海地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海地的问题积重难返，决非一蹴而就之事，更何况小杜瓦利埃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而并非是海地人民的疾苦。在这一点上，他与其父如出一辙。当外界试图让他放弃总统终身制时，他便原形毕露，绝不肯让步。他在多种场合一再为终身制辩护：“终身总统制度是

海地政治生活的基石，终身总统职务既不是一张玫瑰花床，也不是一个致富或休息的机会，我只是为了太爱海地才接受这一艰难的工作，因此我发誓不会在外界压力下放弃总统终身制。”果不其然，1983年他仿效其父，炮制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也把自己封为“终身总统”，成为海地历史上第9个自我宣布为终身统治者的人。1985年夏天，他又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迫使人民再次确认他的终身总统地位。

1979年10月，在以让-克洛德的母亲西蒙娜为首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下，政府颁布了十分严厉的《新闻检查法》，规定凡对武装部队挑衅、煽动、暴动，中伤总统及母亲西蒙娜或有损于悼念已故总统弗·杜瓦利埃者要监禁两年。随后，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1980年11月政府肆无忌惮逮捕了许多政界知名的反对派人士，曾一度有所收敛的通顿马库特又猖狂起来。事实上，既使是在小杜瓦利埃宣称自由化的年代里，通顿马库特名义上被取消了，实际上却没有停止活动，海地重新回到了黑暗的年代。

在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下，人民没有集会、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人身保障，除执政的民族团结党外，其他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成员常常遭暗杀、绑架、监禁或流放。海地各地遍设监狱和刑场。在首都太子港，阴森的总统府地窖和福尔迪芒什监狱就是残忍的刑场，经常有数以千计的人关押在狱中，在押犯中还有不满8岁的儿童。在这个人口仅有500万左右的国家里竟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枪杀或拷打致死。大赦国际组织7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海地的监狱同过去的纳粹集中营一样，老杜瓦利埃的镇压机器在小杜瓦利埃时期依然存在。……海地是世界上保持在押犯死亡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有5万人因莫须有罪名被迫害致死，加上遭残酷剥削贫病交加而死的，以及乘木船逃离本国时遇风浪而葬身鱼腹的。总之，死于暴政的海地人有几十万人之多，因而海地杜瓦利埃父子两代王朝在国际上被称为加勒比海上的“鞭子政府”。在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下，海地成为拉丁美洲政治上最黑暗，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杜氏家族暴虐统治激起海地人民强烈不满，人民渴望民主、要求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80年代到来之际，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相继倒台，海地在国际上处境越来越孤立，政治经济的危机已经把海地变成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 国际乞丐

杜瓦利埃家族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他们把赈济灾民的国际援助和国际贷款装进私囊，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为“盗窃集团”。由于海地的贫穷闻名于世，它成为世界上人均得到外援最多的国家。据1976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海地从新工业中征收的赋税的50%约4500多万美元，被列入国家银行133项不受检查的特殊帐目中。1980年11月，为解决海地外汇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海地提供了2200万美元。小杜瓦利埃取出2000万美元，其中400万拨给了通顿马库特，余下的1600万美元落入自己的私囊。为了赚取外汇，杜瓦利埃政府向国外出口供解剖用的尸体，甚至每月从数以万计的饥饿人群身上抽取血浆供出口。据统计，杜氏家族在海地这么一个贫穷的小国搜刮民脂民膏5亿美元以上，仅在瑞士银行一处存款就有3.7亿美元。以这个家族为中心的一小撮富豪权贵仅占海地人口5%，却占有全国90%以上的财富。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纵情挥霍民财，用

大量的钱财在国内外兴建豪华住宅和别墅。1975年，小杜瓦利埃花费300万美元，为老杜瓦利埃修建陵墓；1977年，他购买了一艘价值85万美元的豪华游艇，供自己消遣，1980年，他举行一个婚礼就花费700万美元，仅燃放花炮一项就耗资10万美元，而且全部由国库支出。小杜瓦利埃的妻子经常到美国和欧洲旅游，每次必购大批时装和其他奢侈品，仅去巴黎一次就花掉70万美元，海地气候常年炎热，可她竟为了赶时髦，买了不少珍贵的皮大衣供观赏。海地，这个昔日一度是加勒比最富庶的土地在杜氏家族的压榨下成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度，民穷财尽，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外汇储备几乎等于零。1984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90美元，60%以上的居民年收入不足68美元，农村人均收入仅35美元，城市工人日工资不到2美元，广大的劳动人民呻吟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工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50%左右，首都约50万居民中有25%沦为乞丐。农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由于政府长期不制订农业发展计划，不抓环境保护，1804年独立时森林面积占70%的海地，到1985年仅占7%，水土严重流失，土壤贫瘠，全国可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3，致使粮食生产日益下降，饥寒交迫的农民把生产木炭作为唯一生存的手段。森林砍伐殆尽，约有80万农民无地少地，80%的农民劳动所得仅能糊口。一遇天灾，农村凋敝，瘟疫横行，饿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1977年严重干旱，仅海地东北一个小岛上就有1500多人饿死。海地文盲率高达80%，11个学龄儿童仅一人能入学，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平均几万人才有一张病床，流行病严重，80%的儿童营养不良，随处可见腹部膨胀的患有因蛋白质不足而导致金核病的孩子，婴儿死亡率达25%以上，成人的平均寿命不足50岁。首都郊区的佩蒂翁维尔豪华的住宅成群，但市区70%的人居住在用纸板、铁皮盖成的闷热的棚子里，在棚户区内每1万居民中平均只有4个公用自来水龙头，而且每隔几天供一次水，一次仅几小时。海地政府每年都要乞求国际援助，以致有人把它称为“国际乞丐”。

## 官逼民反

杜瓦利埃时期，左翼政党被取消，中间派也难以公开活动，暴力斗争成了海地人民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尽管小杜瓦利埃把海地称之为“没有罢工的国度”来粉饰太平，实际上具有斗争精神的海地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暴政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反暴政被流放国外，海地的国外流亡者达50万之多。他们从所居住的每一个城市，不论是美洲还是欧洲，组织了20多个组织，几乎年年都要进行打回海地的武装斗争。但是流亡者的力量较为分散，又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统一起来，例如其中的一个组织叫“5月18日组织”，自1973年以来就力图组建一个所有反对杜瓦利埃的海地人的统一战线，可始终没有成功。

海地国内的反对派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中发展很困难。只是因为70年代小杜瓦利埃在外界压力下实施了一些政治自由化措施，国内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反对派政党组织活跃起来，相继召开了党的大会，制定了行动纲领。1978年9月，海地共产主义者统一党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979年4月，海地民主工人联合会宣告成立；1979年6月，海地基督教民主党从地下转入公开；同月，海地基督教社会党（又称“海地6月27日基督教民主党”）也宣告成立。

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丁美洲民主化的春风也吹进了海地这个禁锢严密的岛国。特别是1979年杜瓦利埃的老朋友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独裁政权被推翻，使海地人民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希望，鼓舞了他们要求结束独裁统治的斗争。80年代以来，各反对被组织积极从事反政府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促进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基督教民主党主席西尔维奥·克洛德在本党主办的刊物上把小杜瓦利埃的照片与被人民推翻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照片刊登在一起，照片的说明写着：“下一个该轮到谁？”言简意赅，很能唤起民众。1981年10月，流亡美国的反政府武装派出一架轻型飞机在首都上空撒下了政治传单；1982年1月，约40名反政府武装在海地北部沿海的龟岛登陆，试图开展游击战；1983年上半年，反政府的地下武装就组织了6次爆炸事件，包括元旦在总统府的两个街口安放炸弹；1984年斗争进入成熟期。5月，戈纳伊夫市的市民群众因警察无故打死一名妇女举行集会，强烈抗议警察暴行。在反对派力量的积极参与下，这次抗议活动不断发展壮大，从举行集会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成为小杜瓦利埃上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斗争，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反暴政斗争奠定了基础。

1985年11月28日，政府警察在戈纳伊夫市开枪打死了3名示威的学生，由此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反政府学生运动。后来被称之为“二月风暴”的导火线。当时因政府压制该市学生举行“国际青年节”的庆祝活动，11月27日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学生游行的声势迅速扩大，许多市民也加入进去，高呼“打倒宪法”等口号，整座城市沸腾起来，群情激昂。杜瓦利埃政府下令军警开枪镇压，结果死亡3人，重伤数十人。紧接着警察开始全市大搜捕。戈纳伊夫市的流血惨案震动了全国，海地的反独裁群众运动很快达到高潮，从戈纳伊夫市扩展到其他城市，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学生发展到社会各阶层人民。各地群众连日罢工罢课，举行各种方式的示威活动，首次高呼“打倒杜瓦利埃”的口号，明确提出“要民主，反饥饿，反贫困”的要求。海地的第二大城市海地角是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的地方，被称为“独立城”，此次活动它又成为反对杜瓦利埃家族统治斗争的中心，示威者喊道：“如果杜瓦利埃不下台，我们准备重演1804年的事件。”在一些城市愤怒的人们烧毁政府建筑，设置路障，袭击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包围军营，直接与政府武装部队发生对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自1985年12月起的两个月内，被军警枪杀的群众约1000多人，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1986年1月底，反对派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废除总统终身制；立即举行大选；恢复立法机构；总统辞职。让·克洛德·杜瓦利埃为挽救局势，一方面仍采取高压手段，于1月31日实行全国戒严30天，停止宪法保障，封闭播送人展示威消息的3家电台；另一方面在1月26日对政府内阁进行紧急改组，撤换军队高级指挥官，答应解散政治警察，尽快执行新的经济计划，实施社会改革，以图平息人民抗议斗争。但人民的抗暴运动尤如火山爆发。2月3日，首都太子港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各地纷纷响应，全国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反独裁风暴致命性地打击了杜瓦利埃家族王朝的统治基础。

海地人民斗争的强大洪流冲击着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迫使海地的各种政治力量作出新的抉择。

### 教会与政府的冲突日趋加剧



天主教不仅在海地拥有大批信徒，其 7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教会在海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海地的天主教会特别是它的上层神职人员，历来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他们的势力有时甚至超过政界和军界，很大程度上还控制着国家政权。

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当上海地总统后，借口说天主教是欧洲人的宗教，会使海地分裂，煽起种族与宗教仇恨，打击天主教派，限制天主教会的活动和发展。1959~1964年间，政府对天主教进行一系列攻击，先后驱逐了许多外籍的主教，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国籍大主教普瓦里耶，罗马教廷对此大为不满，1962年将杜瓦利埃逐出教门（因弗·杜瓦利埃同时也信奉天主教）。此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弗·杜瓦利埃并没有放松对天主教的压制，1966年杜瓦利埃任命了第一个海地人辞任首都太子港的红衣大主教，企图将海地天主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中，逐渐形成一种拉丁美洲特有的“解放神学”，它把宗教信仰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把社会现实而不是宗教教义作为基本点，把传播福音的使命与变革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对于拉丁美洲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反传统教义的“仁爱、和谐”等观点，认为不能回避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为，既然反动政府用暴力镇压人民，人民就有权用暴力行动进行自卫。在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影响下，海地教会成为反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落后的海地，人们被贫困所困扰，寻求精神寄托的愿望便加强了。每当经济恶化，社会笼罩着恐怖不安之际，憧憬自由平等、和平安宁就成为海地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唯一寄托。为此，海地教会利用与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保持和扩展教会的势力和影响。

1983年3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海地。他在布道时谴责海地社会的不公正，拷打、饥饿、贫困和恐怖，要求海地政府尊重人权，改善穷人生活。教皇的访问使教会在海地民众的影响更加深入。到杜瓦利埃政府垮台前，教会已成为海地反独裁斗争中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力量，它拥有组织完善的基层组织，有计划进行各项活动。教会还与国内的反对派组织相互配合，开展反政府的斗争。1985年11月戈纳伊夫政府军警枪杀学生，教会出面组织反政府示威游行，提出“维护人的尊严”，“所有的人都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等口号。在1986年新年伊始的反独裁风暴中，大教堂成了示威群众的集合地和庇护所，示威者高举十字架，从白色的大教堂石阶前出发。1月31日开始实行戒严后，人民群众无法公开集会，就利用2月2日星期日做弥撒的机会到各教堂集会。在那段日子里，教会的电台不断播放教皇访问海地时的演讲，以此鼓舞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因而在那些反暴政斗争的日日夜夜，常常可以听到居民们将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教皇的声音在天空中回响着：“你们要有勇气、要虔诚，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可以信赖我。”教会成员也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在12月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教会基层组织成员就有100多人被军警逮捕。在教会的支持、宣传和组织下，海地人民反对暴政的斗争不断发展，从而促使了杜瓦利埃政权的垮台。

军队站到了人民一边

海地军队是在美国占领时期（1914~1934年）由美国人一手建立和训练起来的，受美国的影响很大。1934年美国军队撤走之后，军队成为海地国内最有组织的一支政治力量。尽管后来颁布了宪法，建立过文人政权，但有权势的军人集团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方面享有仲裁权。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是依靠军队的支持登上总统宝座的。他上台后，为了把军队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不让军人无约束地干涉国家的政治生活，他对军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在他看来，军队是反对黑人政府的一个潜在危险，为防患于未然，遏制军人发动政变，他还在制度上采取了极其有力的预防性措施：例如，随着内阁改组，更换军队高级军官；定期轮换地区的军队指挥官；缩小军队司令部的职权，把它变成协商咨询机构；把军队的武器弹药储备放置总统府内，由总统直接控制；合理布局军事基地，竭力缩小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与此同时，老杜瓦利埃还亲自组建了绝对效忠于他个人的准军事组织“通顿马库特”，作为箝制抵御军队的一支武装力量。通顿马库特不仅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军队，而且在人数上也大大超过了军队，前者人数达4万，而军队人数仅7000人。这样做的结果，使军队的职业性加强了，防止了军人干预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因此杜瓦利埃家族执政近30年，虽然有小规模而未遂反叛，但海地军队整体上一一直保持沉默。

地位下降引起军队高层军官对杜瓦利埃政权普遍不满。许多海地军人由于政治迫害、生活待遇差逃到国外。此外，军队内部成份的变化，也加剧了军队与政府的矛盾。弗朗索瓦·杜瓦利埃起用了大批年轻的黑人军官，使中下阶层出身的军官不断增多，这些阶层出身的军官，传统观念少，接受新事物快，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杜瓦利埃家族的不信任态度使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十分不稳定。他们对于使海地获得西半球最野蛮最腐败形象的政府已日益不满，对人民群众的反独裁斗争逐渐持同情的态度，这就为军队重新干预海地的政治提供了阶级的基础。美国政策的变化对海地军队有直接影响。在拉丁美洲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担心其后院控制不稳，美国开始调整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以继续维护它在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一再呼吁拉美国家的军队与政府一道，顺应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愿望，保证在“有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改革”，这为海地军人干预杜瓦利埃政权提供了思想基础。80年代以来，海地反独裁斗争风起云涌，杜瓦利埃政权在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常常动用军队镇压人民群众运动，从而使军队与人民增加了接触，军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军官们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使之触发了再次干预政权的企图，想借用群众力量以恢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这就为海地军人干预政权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1985年11月的反独裁斗争中，军队的态度与政府产生分歧。上层军官企图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他们虽然与杜瓦利埃家族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多数人没有直接参与对群众的镇压。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1986年1月，14名士兵因为不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被关禁闭。1月29日，人们在大教堂前当着士兵的面高呼“打倒杜瓦利埃”的口号，而士兵们大部分只朝天开枪。军队的这种态度无疑给了杜瓦利埃政权致命的一击。1986年1月底，海地人民的抗暴斗争进入最高潮，军队乘机私下向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施加压力，迫使其交出政权。并秘密协商好以军人为主体

的过渡政府班子。在美国的授意下，军队将小杜瓦利埃送上了逃往外国的飞机。军队在杜瓦利埃王朝的垮台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 内部倾轧

1971年，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继承”总统职位后。杜氏家族内部的派别斗争就公开化了。以小杜瓦利埃的母亲西蒙娜为首的保守派，又称为“恐龙派”，主要由老杜瓦利埃生前的支持者（又被称为“老卫队”）组成，他们极力维护旧的秩序，不准许对老杜瓦利埃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丝毫的修改。另一派是以小杜瓦利埃的长姊玛丽·德尼兹为首的“现代派”，主要是由在老杜瓦利埃时期受排斥的亲友组成，他们主张对原有的政策进行改革，实施较为开放的政治经济自由化。

玛丽·德尼兹自幼聪明过人，深受父亲宠爱。她很早便参与海地的政治生活，而且有着相当的能力，在弗·杜瓦利埃的4个子女中曾被认为是最具备条件继承父业的人。但由于她的丈夫马克斯·多米尼克上校60年代曾涉嫌卷入了反对老杜瓦利埃的叛乱，玛丽因此而失宠。小杜瓦利埃上台初期，玛丽运用自己的能力，竭力影响弟弟，并直接与恐龙派的主干将、当时的内政和国防部长吕克内尔·康布罗纳公开发生争执，要求弟弟在她与前者之间立即作出选择。吕克内尔·康布罗纳曾是老杜瓦利埃生前最忠实的支持者，为杜氏家族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所担任的内政和国防部长历来是海地最有影响、权力最大的部门，它不仅掌握国内的秘密警察，也掌管着军队。由于他与西蒙娜的关系密切，更是有恃无恐，成为当时海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以致于有人说，在海地没有吕克内尔的同意就可能一事无成。小杜瓦利埃在姐姐与吕克内尔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听从了母亲的旨意。执政8个月后，他派其姐夫马克斯·多米尼克就任驻法国大使，玛丽亦陪同前往。1973年7月玛丽跟随丈夫刚一回国，7月23日总统府着了一场大火，引着了总统府国民宫左侧的一个弹药库。小杜瓦利埃怀疑这场大火与玛丽有关，便又再次真正地驱逐了这位精明的姐姐，玛丽流亡美国。从表面上看来，恐龙派的势力似乎占了上风，但实际上，杜瓦利埃家族内部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西蒙娜在儿子上任之初，几乎是每项决策的幕后指挥者，她依仗着在老卫队中的威望参与和限制儿子的种种决策权。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小杜瓦利埃在政治上日渐成熟。他把自己所喜爱的大马力摩托车和赛车置于一边，试图全面认真地管理政府，不愿给人留下其母在垂帘听政的印象，并且一直暗暗地把权力集中于手。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在海地复杂神秘的棋盘上熟练地移动着每一个棋子，但他的手法显然更为隐蔽。首先，他力图用不流血的办法排斥恐龙派在内阁中的地位。由于他日益感受到恐龙派对他的威胁，他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几乎一年两次的经常性改组内阁，撵走了他职位的觊觎者，限制了恐龙派的权力。执政之初，小杜瓦利埃就感到吕克内尔·康布罗纳作为恐龙派的代表人物，其势力之强，权力之大，对自己构成一个威胁，但苦于吕克内尔与其母的关系不同一般，没有轻举妄动。1972年11月即他上任仅一年半时间，乘其母西蒙娜在美国迈阿密度假之际，罢黜了吕克内尔的职务，并流放出国。自1971年4月到1982年底10多年的时间里，小杜瓦利埃改组内阁22次。其次，他巧妙地玩弄平衡术。通过“政治自由化”方式，小杜瓦利埃先后起用了一些有技术的年轻专家担任内阁的重要职员，在1977年5月的一

次内阁改组中，他任命大法官米歇尔·菲埃夫尔、工程师皮埃尔·圣、经济学家阿尔贝·夏洛、农学家爱德华·贝鲁分别担任司法部、公共工程部、工商部和农业部部长。在政权机构中，他在老卫队与年轻的技术官员中玩弄平衡术，使两种力量相互牵制，而自己犹如坐山观虎斗。

小杜瓦利埃与恐龙派夺权斗争的第一个较大胜利体现在他婚姻的成功上。西蒙娜为保住自己第一夫人的地位，对儿子的婚事也大加干涉。1977年小杜瓦利埃已将至26岁，有外国记者当面询问起他的婚事，他面有难色回答：“我怎么能够结婚呢，我的母亲是海地的第一夫人，如果我结婚的话。那就会发生冲突。”据说这位西蒙娜妈妈曾经迫害过小杜瓦利埃所有的女朋友，并逼迫她们离开了海地。结果到1980年，事情发展到这位28岁的执政者产生了狂热的爱情，威胁母亲，发誓要演出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闹剧时，西蒙娜才作出妥协。小杜瓦利埃声言如再不允许他结婚的话，他就辞去总统职位，远走异国他乡。他的妻子米歇尔·贝内特出身于海地最著名的黑白混血家族之一，她的父亲欧内特·贝内特是海地的商业巨头。因此婚姻的成功增强了小杜瓦利埃的权力基础。恐龙派对这个婚姻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们认为，与混血种人联姻是对老杜瓦利埃的一种背叛行为，它预示着老杜瓦利埃进行的政治革命的结束，为混血种人重新控制政权的开始。恐龙派对小杜瓦利埃的态度由不服到不满，最后变为近似仇视。由于恐龙派的势力仍然很强，他们有意实施一种“没有杜瓦利埃的杜瓦利埃主义”。1981年3月，西蒙娜的大约20多名亲朋好友在公开抨击新夫人后被驱逐出国，预示着杜瓦利埃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这无疑从内部严重削弱了杜瓦利埃政权。

## 美国要换马

海地地处加勒比海中心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离美国的佛罗里达海岸仅有600英里，南面是南美洲，东面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两地都有美国大量的投资，西面与古巴仅隔一条80公里宽的向风海峡。美国人认为古巴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是一个永久的威胁，美国政府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认为需要在自身的后门和自由海道上有一个朋友，特别是离古巴这样近的朋友。1914年至1934年美国军事占领海地近20年。此后为了控制这块战略要地，美国不断地对海地施加政治、军事、经济等影响。在杜瓦利埃家族执政近30年里，美国历任的六届政府一直从各方面支持海地。美国深知，“没有杜瓦利埃，海地的整个建筑就会垮掉”，而无美国的支持，杜瓦利埃就保不住权力。但是，杜瓦利埃家族在海地的独裁统治，曾一再引起美国的担心，害怕其政权不稳，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在拉丁美洲民主运动高涨，独裁政权纷纷倒台的形势下，美国政府为维护它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并从全球战略需要出发，被迫局部调整它的拉美政治战略，开始采取顺应拉丁美洲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愿望，支持民主化进程的策略。并迫使某些独裁政权适当改变统治方式，以求稳定其战略后方——拉丁美洲的局势。美国卡特政府打出“人权”旗帜，对小杜瓦利埃施加压力，迫使他在国内实行“自由化政策”。1977年8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亲赴海地，直接警告海地，以考虑减少经济援助数额相威胁。另一方面，对海地增加了军事上的支持以及食品和财政援助。1980年里根上台后，对拉丁美洲发起了“促进民主运动”，要求拉

美国家举行选举，实现“政治民主化”，让军人或独裁政权“还政于民”，以此来遏制革命在古巴、尼加拉瓜之后的第3国发生。美国对海地的状况尤为关注，曾多次派人前往海地调查情况，得到的材料使美国对小杜瓦利埃深感失望。美国记者安迪·罗森布拉特有充分的材料证明，1980年8月海地遭受飓风袭击后，外国援助的几百万美元的赈灾

物资，大都被政府官员侵吞。1980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海地的2000万美元贷款，在两天内不知去向，有人怀疑被转到政府头头在国外的银行帐户中去了。小杜瓦利埃的岳父欧内特·贝内特为首的一个贸易集团，把墨西哥以优惠价格给海地的石油，高价转售给南非，从中牟取暴利。1979年11月，海地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竟然殴打出席海地人权会议的美国外交官，使美国驻海地大使“大吃一惊”。美国国会和舆论一再谴责海地政府侵犯人权、贪污公款。80年代初小杜瓦利埃结束自由化进程，加强镇压措施，这与里根政府“促进民主运动”策略背道而驰。美国众议院为此决定从政府提出给海地720万美元经援数额中取消200万美元，因为“这个政府漠视该国人民的福利和漠视在国内发生暴行和贪污腐化”。此时，里根政府就有意更换杜瓦利埃政权，研究以在纽约流亡的老杜瓦利埃分子克莱马德·约瑟夫·夏尔为首的一个更为反共的政府取而代之。但美国同时也担心，海地没有杜瓦利埃的统治有可能发生混乱，所以并没有轻易做出决定。1985年7月，小杜瓦利埃搞了所谓的“公民投票”，以确认自己为“终身总统”，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强烈不满，美国对此十分恼火，公开表示对小杜瓦利埃感到失望。可以说，此时美国政府已下决心寻机抛弃杜瓦利埃，另换一个更为适合自己需要的人选。

美国对海地小杜瓦利埃态度的转换，对海地政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985年11月底海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美国害怕苏联和古巴利用海地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插手加勒比地区事务，使海地的反独裁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成为一场人民革命。于是，美国一方面私下紧急催促小杜瓦利埃提前下台。1986年2月3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公开表示：解决海地问题的办法是选举产生政府，也就是建立由“民主进程”产生的政府，美国支持这样的政府。但同一天，小杜瓦利埃就对记者说，他不准备举行选举，因为他是终身总统。同时美国向小杜瓦利埃施加压力，冻结了6700万美元援助中的第一笔2600万美元，并以保护美国侨民为理由发出武力干涉的威胁。另一方面，里根政府与海地反对党和可能接管小杜瓦利埃的一些人士进行频繁接触，找寻可能的代理人。美国驻海地大使麦克马纳韦多次会晤小杜瓦利埃，用极力劝说、威逼等软硬兼施的手法逼迫他离开海地，并为其出走作了精心的安排。1986年2月6日下午麦克马纳韦与小杜瓦利埃进行一小时会晤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播发了一条消息，海地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将在24小时内下台。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见山穷水尽，大势已去，于1986年2月7日凌晨3时46分携其眷属和亲信20多人以及1亿多美元现款，乘坐美国安排的一架空军C-141运输机，辗转到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滨海省格拉斯镇避难。当他在哪里安顿好时，正值海地一年一度的狂欢节（2月8日）开始，载歌载舞的人们胜利欢庆独裁政权的垮台，为节日增添了更为热烈的气氛。

马小平钱去非

骄奢淫逸“王中之王”被迫流亡

## ——巴列维国王在一片抗议声中垮台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元以致远。

——诸葛亮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一位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君主，他自称“王中之王”，自尊为伊朗人种的“光辉”。在他统治期间曾推行一些改良主义措施，在维护国家独立、加强防务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巴列维国王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他是站在伊朗人民的对立面，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国王。因而，他不可能解决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社会阶级矛盾；相反地，只能激化这些矛盾。尤其在他统治的晚年，伊朗政局持续动荡，掀起了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狂涛，甚至连一贯效忠于国王的40多万军队在关键的时刻也公然宣布“中立”，这些都是巴列维王朝长期的腐败统治而丧失民心的结果。

### 出售皇家私地的失败

1941年巴列维继承王位后，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他封建王朝的统治。巴列维本人也曾看到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外国列强的侵略，使得伊朗农业凋敝，广大农民食不果腹的悲惨境遇。由于伊朗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果，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地主、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宗教上层人士等各式封建主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为无地或少地而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巴列维决心把伊朗封建的农业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他想通过自己带头出售私有的地产，以便带动地主们也主动出售自己的地产，使广大农民能够得到土地。1950年，巴列维颁布法令，将其所拥有的2000多个村庄的土地分块卖给农民。到1958年，大约有20万公顷属于皇家的耕地以降低20%的价格出售给2.5万户农民。购买土地的农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5年内付清地价。经过10年的试验，巴列维出售皇家私地的做法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到1960年皇家的土地只出售了1/3，而且巴列维的示范作用也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响应他的地主也寥若辰星。事后，巴列维不无感慨地说：“我明确感到，靠个人的示范、劝告、指引或采取议会的正常方式都得不到任何预想的结果。”

### “白色革命”

伊朗自古以来以农立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农民。1956年，1900万伊朗人口中2/3以上住在农村，610万劳动力中，310万从事农业劳动。伊朗的土地制度在巴列维改革之前完全是封建性质的，占全国农户总数1%的大地主拥有全国耕地的56%，另有27%的耕地由清真寺和政府官员所占有，而占有农户总数99%的绝大多数农民只占有耕地的17%，因而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伊朗的租佃制度是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分成制”，也就是将收获物按劳力、土地、水源、种子和耕畜分为5份，而农民除了劳动力以外，其他的一无所有，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之后，只能得到收成的1/5，其余部分（即土地、水源、种子和耕畜）都掌握在地主手里，

地主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地得到 4/5。在如此残酷的盘剥下，农民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因而使得伊朗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

巴列维国王的示范作用失败后，他又想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达到改变土地所有制的目的，这正如巴列维所说的：“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深刻而根本的革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的原则和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于是，巴列维于 1962 年 1 月 9 日颁布了《土改法》；于 1963 年 1 月 26 日经“公民投票”又制定出一项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白色革命”，即“不流血和不损害个人及民族”的革命。“白色革命”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1. 根据 1962 年颁布的《土改法》规定：地主只能占有一个或相当于一个村庄的土地，其余超额部分由政府征购，然后再出售给无地的农民。政府向地主付款和农民向政府交付地价均以 15 年为限，年息为 6%。按照原定计划，土改的第一阶段应在 1963 年 9 月以前完成，但一直拖延到 1967 年初才告结束。到 1969 年 3 月底，有 64.66 万农户买到了土地，约占农户总数的 20%。

2. 1963 年 1 月，伊朗内阁会议又通过了《土改法案补充规定》，按照补充规定：每户地主占有耕地的最高限额为 20~150 公顷，外加机耕地 500 公顷。这么一来，土地改革的对象就扩大到中小地主，因为中小地主所占的土地数量在全部地主所有土地数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不触动中小地主的土地，土改就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政府还规定：清真寺的土地同样要按照《土改法》的规定处理。

3. 1968 年，伊朗议会通过《分配和出售出租土地法》，规定那些出租给农民的土地要进一步分配或出售给农民，使农民不但对土地有耕作权，而且有所有权。1971 年，政府又颁布了《关于所有的公共瓦库夫（即寺庙）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法律》，该法律规定所有寺院的土地必须分配或出售给农民。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历时十多年的土改，伊朗大概有 70% 的农户成为小土地占有者，还有 30% 的无地农民仍要继续租种地主的土地。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巴列维的土改基本上是失败的，这是因为巴列维的土改方案是改良主义的，它不是依靠农民，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又无偿地分配给农民，而是以宽容的态度收购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又以恩赐者的姿态把土地卖给农民。

## 收回石油开采权

伊朗是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素有“石油王国”之称，从 1908 年建立第一口油井开始，至今已发展到 50 多个油田，现已探明石油储藏量为 137 亿吨。1977 年伊朗的石油总产量为 2.85 亿吨，仅次于苏联、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伊朗石油将近 90% 用于出口，1977 年出口石油 2.55 亿吨，在石油输出国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1977 年的石油收入达 230 多亿美元。此外，伊朗还有丰富的天然气，其储量为 14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储量 20.2%，相当于 140 亿吨原油。

众所周知，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70%，占外汇收入的 90%。1977 年伊朗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 2200 美元，其中 1500 美元来自石油出口收入。但是，长期以来，伊朗石油资源却控制在外国手里，巴列维为了收回石油资源的开采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44 年，苏联曾企图取得北伊油田的租让权。1951 年前，英国控制伊朗石油的开采权。摩萨台于 1951 年出任伊朗首相，他组成一个“民族阵线”，推行“石油国有



化运动”，结果损害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于是西方列强便联合起来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最后，摩萨台于 1953 年 8 月被推翻；“石油国有化运动”终于失败了，美、英、法、荷等石油财团又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伊朗石油的开采大权，直至 1973 年 7 月 31 日，伊朗正式废除各种石油条约后，才收回石油的开采和管理权，这是伊朗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进入 70 年代后，由于石油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的徒涨，伊朗的石油资金每年以 200 亿美元的数额剧增。巴列维国王被这笔从地下源源不断冒出的财富冲昏了头脑，他曾扬言“伊朗将成为这个地区的工业强国，一个能拿得起巨款向不发达的邻国购买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工业国家”。巴列维期望把伊朗建成世界的第五工业强国，妄图用石油美元为伊朗买进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巴列维国王用这笔巨额石油美元，从西方进口大量技术设备，聘请数万名外国专家和技工，高速发展工业，希望在石油资源枯竭之前，把伊朗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几年来，伊朗经济的确发展很快，1975~1977 年，每年平均增长 20%，到 1978 年 1 月，外汇储备已达 135 亿美元。在这种重工轻农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国家每年要动用 20 亿美元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其他食品，这就必然要冲垮伊朗本国的农业。农民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丧失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纷纷弃农从工。由于国家轻视农业，致使农业进一步萎缩，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3 年的 18.1%，降至 1977 年的 8%。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流失，一方面致使田地荒芜，广大农村呈现出一片“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败落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队伍扩大，粮食匮乏，物价飞涨，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 骄奢淫逸

巴列维国王搞的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利于广大人民，因而造成贫富日益悬殊，两极分化加剧，这就埋下了社会动乱的深刻根源。从 1975 年~1977 年，伊朗的国民经济每年平均增长 20%，而且石油的收入每年也超过 200 亿美元。然而，如此巨大的经济收入和国家财富并没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却是中饱了王室贵族、政府官员等统治阶级的私囊。统治阶级过的是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据伊朗《消息报》报道，巴列维国王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波音 707“猎鹰式”座机，机上有一个坚固的厕所，甚至连贮水器和抽水设备也是金子做的，浴室里的水龙头和水池也是金的。据说巴列维国王的这架座机全部价值为 80 亿里亚尔（合 1.15 亿美元）。巴列维国王还为自己修建一座造价为 14 亿美元的陵墓，这座陵墓坐落在伊朗南部帕萨尔加迪，在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陵的旁边。这个三层的墓碑将用进口的花岗石造成，装有电子控制的门，可以通向展览厅、考古博物馆、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电影院。陵墓占地面积达 5.5 万平方米，规模宏伟，造价昂贵，举世罕见。据说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妹妹、伊朗王室的公主所居住的宫室，犹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境界。她的侍从不仅有伊朗本国的妇女，还有泰国的婢女、埃塞俄比亚的听差、法国的女秘书，还有一位美国退休将军的夫人专门为她诵读小说。这位伊朗王室的大公主虽已年逾六旬，但她还希冀青春常驻，经常要美容师为她美容整型。伊朗的经济原是比较落后的，进入 70 年代以后，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但得利最多的是皇亲国戚，王室成员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一

些亲王和公主大量从事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王室成员生活穷奢极欲，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巴列维国王虽然几次发动反贪污运动，但收效甚微，达官显宦依然大量聚敛财富，挥霍无度，这就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公愤。

## 独裁统治

1957年，伊朗已经建立了政党，但直至1975年，巴列维国王只准许执政的“伊朗诺文党”及反对派的“马尔丹姆党”活动。巴列维国王还曾为此而自我标榜说：“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多于一个立宪君王，我就会建议实行像希特勒或今日共产党国家那样的一个统治政党制。”但事实上，这些政党的组织形同虚设，完全被国王所掌握和控制。尽管如此，到1975年3月，巴列维改多党制为一党制，并突然宣布建立一个新党——“民族复兴党”。很多伊朗人都被迫加入了该党，到1977年，该党宣称拥有500万党员，党员遍布全国各地，使它成为所谓的群众党。

巴列维国王严密控制新闻事业，并于1975年封闭了伊朗全国95%的刊物。至于书籍的出版也遇到了麻烦，检查当局只准许出版社印刷曾经印过的书。当时全国虽有两家由私人企业经营的报纸，但实际上报纸为国王所控制，而且这两家报纸都是献媚拍马之能手，只发表一些沉闷而死板的官方言论，只不过是国王的御用喉舌。巴列维国王曾经信誓旦旦地声称要维持1906年凯加王朝颁布的宪法，但实际上他已长期取消了该宪法所规定的自由。

巴列维还建立庞大的“萨瓦克”机构（即秘密警察），“萨瓦克”的根本任务是专门打击和摧毁以任何形式反对伊朗国王的人。“萨瓦克”不仅在国内外有其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且还延伸到伊朗国外从事间谍、海外隐密行动、联络外国情报组织、监视流亡国外的伊朗异端分子等活动。“萨瓦克”经常监视、逮捕和拷问不同政见者，甚至加以公开的或秘密的杀戮，从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在这种局势下，以霍梅尼为领袖的宗教人士率领广大伊斯兰教徒和社会各界群众，掀起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尽管巴列维进行了镇压，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但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1978年1月间，由于伊朗报纸刊登了一篇抨击当时寓居伊拉克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文章，又一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工人、学生、教员、机关职员、商店业主和员工纷纷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并且很快地蔓延到全国四十多个城镇，首都德黑兰的示威群众多达一百多方人。示威群众还焚烧影剧院、酒店、夜总会、银行及其他公共建筑物。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仓皇出走。1979年2月11日，国王出走之前任命的巴赫蒂亚尔政府垮台了，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政府接管了伊朗政权。从此，在伊朗统治了53年的巴列维王朝宣告结束。

林明扬

昏庸独裁且残忍“终身总统”难善终

## ——马西埃总统被判死刑

人不可以为恶。一失其身，纵有善不  
足以自赎。  
——朱熹

### 罪该万死

1979年9月24日，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在首都马拉博的一座电影院里公开审判前总统马西埃。这座有600个座位的“象牙”电影院里挤满了观众，熙熙攘攘，座无虚席。上午9时30分，当军事法庭主席埃乌劳赫上尉宣布开庭后，马西埃被武装士兵押进会场，坐在审判台下的一张椅子上听取审判。审判官首先宣读了军事法庭关于审判马西埃的一项命令，接着就马西埃犯下的罪行提出控诉。对一个前国家元首进行公开审判，这在赤道几内亚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审判情况，电台还作了实况广播。开庭后，马西埃被指控犯有叛国、屠杀、破坏财产、贪污资金和种族灭绝等罪行。检察官根据这些罪行提议判决马西埃死刑。马西埃利用辩护权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军事法庭认为他的罪行确凿，驳回他的答辩，最后判处他死刑，并于1979年9月29日被处决了。

### 终身总统

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原名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1924年1月生于木尼河区蒙戈莫县，芳族人，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虔诚的天主教徒。1944年进入西班牙殖民行政部门工作，是一名文职官员，同时他还经营咖啡种植园，也是一位种植园主。1962年，马西埃任蒙戈莫县长。1963年当选为巴塔市和木尼河区议员。1964年1月，赤道几内亚开始“内部自治”，马西埃任副总理兼公共工程部长。1967年11月至1968年6月，马西埃出席马德里会议，同西班牙谈判赤道几内亚的独立问题。1968年10月赤道几内亚独立，马西埃出任总统兼国防部长。1969年3月挫败前外长阿塔纳西奥·恩东发动的政变后还兼任外交部长。早在1963年赤道几内亚人民思想党成立，马西埃任该党司库，他于1970年将4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合并为全国统一党。1971年1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1972年7月该党改名为全国统一劳动党，同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西埃被宣布为党的终身主席、共和国的终身总统，并授予武装部队的将军称号。

### 血腥清洗

马西埃总统自1968年上台执政以来，他一人独揽大权，甚至连副总统恩圭马·埃索诺都承认：“马西埃不听别人意见，独断专行，1976年以来没有举行过内阁会议。”马西埃不仅是党的终身主席，也是共和国的终身总统。1975年他还兼任人民武装力量部、国家全部和人民建设部部长；1978年又兼任土地种植、新闻、旅游和国家宣传部部长。马西埃实行独裁统治，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消灭所有的反对派，其中就有这位“终身”总统的几位亲密的合作者，如财政部长恩科·伊瓦萨、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赤道几内亚驻马德里代办等几位高级官员。大约有数千人被秘密处决，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

离故土，流落到异国他邦，大约有 6 万名赤道几内亚人越过边界进入加蓬，另有 3 万名难民逃到喀麦隆去，逃到尼日利亚去的有 5000 人，还有 6000 人逃到了西班牙。据统计有十多万赤道几内亚人逃往别国。这些逃往国外的人大多是为了逃避马西埃的清洗运动。

从 1969 年以来，赤道几内亚的部族矛盾加剧起来，居住在木尼河省大陆上的芳部族和马西埃·恩圭马省岛（原名费尔南多波）上的布比部族之间爆发了冲突纠纷。早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这两个不同血统的部族被殖民者煽动而互相敌对，布比人并不希望让一个芳族人充任总统，因而布比人从一开始就是马西埃总统镇压的目标。布比族酋长帕斯托尔·托拉奥·西卡拉死在巴塔狱中，布比联盟党的创建人恩里克·戈里·莫卢贝拉是彼挖掉眼睛后患坏疽病死去的。布比人祖祖辈辈都是渔民，而赤道几内亚当局又担心布比人把武器运进国内，因此禁止布比人出海捕鱼，这就断了布比人的生路。马西埃总统还规定：凡不是芳部族血统的士兵，未复员者均被解除武装，从而引起布比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但是马西埃总统心中最大的怀疑对象还是那些被他轻蔑地称之为所谓“知识分子”的人，马西埃曾经说过：“那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是今天非洲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用外国文化来污染我们的气候。”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既有外国人也有当地人，原来设在马拉博（原名圣伊萨贝尔）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办事处的主任、海地人米歇尔·路易斯及其下属官员被总统手下的“暗杀团”，毒打一顿之后，连办事处的大门也被贴上封条，勒令停止办公。至于本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前驻联合国大使萨图米诺·伊冯戈、前驻喀麦隆大使古斯塔沃·瓦特松、外交官阿尔曼多·巴尔沃亚等，他们都是被人从家里拖出来开枪打死的。自从马西埃掌权以来，几乎所有的高级文职官员和议会中 2/3 的成员不是遭到暗示，就是被投入囚笼，或者逃亡国外，首都马拉博的情形已达到今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以致非洲统一组织不得不采取空前未有的投票步骤，以关闭它在那里的地区总部。

1976 年初，有 11 名尼日利亚的侨民劳工被嗜杀成性的赤道几内亚军队打死了，尼日利亚政府指责赤道几内亚当局的野蛮行径，并撤出了 2.5 万名合同工。这些劳工撤走后致使赤道几内亚业已严重紧张的经济更加困难了，大片大片的可可和咖啡种植园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零售商业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从 1977 年 1 月开始，马西埃总统一方面命令所有的尼日利亚工人离开赤道几内亚，另一方面又派秘密警察把所有 14 岁以上的男子都赶到可可种植园里去抢救这些经济作物，有许多人还被送到费尔南多波岛上去为总统的私人农场劳动。甚至马西埃总统还颁布一道法令，规定赤道几内亚所有 7~14 岁的男孩必须进行军事训练，该命令规定：“任何拒绝交出其子的家长或其他人将被监禁或枪决”。

### 经济贫困

自 1968 年马西埃上台后，在国内实行国有化等过激政策，生产下降，经济严重困难，可有的生产量从独立时的 3.4 万吨，到了 1977 年下降到一万吨左右。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粮食供不应求，牛奶、糖、黄油、面包等食品都成了奇缺的商品。赤道几内亚不仅经济落后，而且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它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不准许外国人去赤道几内亚旅游，所有的护照都被收回了，新的护照只有得到总统府特殊批准才能颁发。对从国内发出的或国外发来的通讯往来实行严格的检查。一封信件往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寄

到。西班牙的一支卫戍部队是于 1969 年被赤道几内亚当局赶走的，联合国办事处是于 1973 年被驱逐的，美国大使馆也在 1976 年被撵走，在首都马拉博看不到一个西方记者，至于能获准来访问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更是寥寥无几。

### 个人迷信 + 种族灭绝

马西埃·恩圭马总统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强制人们对他个人进行顶礼膜拜，这种现象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并不是少见的，但后来竟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凡是所有的祷告结束时都要说：“凭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救主和救星恩圭马之名，阿们。”但另一方面，马西埃却实行恐怖统治，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许多人都被指控为阴谋发动政变而遭逮捕，并被送交颠覆法庭，依国法惩办或被处决。到了后来，马西埃已不满足于对“罪犯”的个人坐牢或杀害，而是把“罪犯”所居住的村庄放火烧掉，使它化为灰烬，如米森-埃布村和莱亚村均遭到火焚的厄运。马西埃已经把一个好端端的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变为“非洲的恐怖密室”和“非洲的集中营”。1979 年 8 月 3 日，以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中校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赤道几内亚达 11 年之久的马西埃政权。8 月 18 日，马西埃在他的家乡蒙戈莫县的一个村子附近被捕，经过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后于 9 月 29 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 6 名同犯，他们是前共和国副总统米格尔·埃耶格·恩图图穆，前总统卫队长、马西埃的侄子梅迪发·恩苏埃，总统侍从官爱德华多·埃杜，马拉博监狱典狱长萨尔瓦多·翁多·埃拉，巴塔监狱典狱长福尔图纳托·勒福戈·博科伊，以及前思曾阿永监狱典狱长帕斯托·埃勒韦斯特·梅莱纳等。人们普遍认为，马西埃·恩圭马之死使受到 11 年独裁创伤并且与世隔绝的赤道几内亚人民重新获得了新生。

郑耀群

权力带给他覆亡

## ——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下场

为了完成一个目标，权力的运用是必要的，但是，权力的世界却使许多目标注定要遭受挫折。

——小阿瑟·M·施莱辛格

### 塞拉西南面称孤

海尔·塞拉西于 1892 年 7 月 23 日出生于埃塞俄比亚东部城市哈拉尔的一个贵族家庭。原名叫里·塔法里·马康南。他生来个子矮小，仅 1.60 米，但刚强机智，聪慧过人，善于骑射。在少年时代便表现出充满自信和压倒一切的个性。

1909 年，他被任命为哈拉尔省总督。同年，塔法里娶著名的孟伦夫人为妻。她生于拥有极大权势的沃洛省米海尔王之家，这种联姻关系极大提高了塔法里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19 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对外面临着西方殖民列强的威胁，对内，封建诸侯割据的形势日趋严重，庞大的官僚队伍依靠巧取豪夺获取给养。主张革新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加强改革，才是埃塞俄比亚的振兴之路。塔法里热心改革，积极迎合这一主张。在任总督期间，广泛进行土地登记，便于征税，实行官员薪金制，不准自行筹款等。由于他的努力，哈拉尔省被誉为“模范省”。

1916 年，皇族会议立前皇帝孟尼立克二世的女儿佐迪图为皇帝，并推举塔法里为摄政王，封公爵称号。这是塔法里后来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关键性一步。

这之后，塔法里利用自己的特权更积极地推行革新活动。同时以女皇为代表的保守派和塔法里为代表的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女皇为了自身的利益打算尽早消灭青年埃塞俄比亚派。但由于塔法里握有军队的指挥权，使女皇的努力最终没有结果。考虑到塔法里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民心所向，佐迪图只好违心把皇位移交给塔法里。1930 年 11 月 2 日，37 岁的塔法里正式加冕称帝，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陛下。

### 皇帝要建立民主国家

海尔·塞拉西称帝后，大力推行改革措施。首先于 1931 年颁布了埃塞俄比亚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这就是著名的“1931 年宪法”。该宪法确立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规定建立议会制度，加强司法部门的工作，以及解放奴隶，保护人权等方面的条文。

在国家建设方面，塞拉西皇帝着力效法西方的科学文化模式；在财政金融方面，推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强商品经济发展，设立国家银行。塞拉西皇帝还十分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在派遣青年军官去欧洲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聘请外国军官来训练本国军队。此外还修建了飞机场，建立了一支小型空军。

从 1930 年起的 4 年时间里，塞拉西的改革取得很大进展。它缓和了国内



阶级矛盾，发展了生产，使统一的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后来由于抵抗意大利发动的侵略战争，改革被迫中止。

在抗意战争中，塞拉西不仅亲自指挥作战，而且每当战斗激烈时，他都身先士卒，把子弹射向敌军。为此，他受到了群众的拥戴和赞颂，称他为“战士皇帝”。但由于经济、军事力量明显弱于意大利，战斗以失败告终。1930年5月2日清晨，塞拉西乘火车前往吉布提，转乘英国军舰开始了他4年的流亡生活。5月5日，意军攻占亚的斯亚贝巴。4天后，意大利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国宣战。这是英国长期以来对意大利实行绥靖妥协政策的彻底破产。英帝国主义出自利己主义的目的，为牵制法西斯势力，开始注意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反法西斯力量，并且开始有计划地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武器装备。1941年1月，塞拉西返回埃塞俄比亚。同年5月5日，在英军帮助下，光复了亚的斯亚贝巴，这标志着神圣的抗意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塞拉西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要埃塞俄比亚接受其“保护”的主张。英国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在1941年1月同埃塞俄比亚签订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抗意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独立的恢复，使塞拉西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宣布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将开始“新的纪元”，即要建立一个博爱、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独立后的埃塞俄比亚在塞拉西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过去的改革措施。具体有：改革税制；固定薪金制度；废止奴隶制度；发展文教卫生等等。这些措施对于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经济起着积极作用。

### 皇权导致专制腐败

但是，随着争取社会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时代潮流日益高涨，海尔·塞拉西逐渐失去了往日那种勇于革新和进取的精神。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塞拉西对内进一步加强皇权统治。1955年，又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几乎绝大多数条款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的。如再次确认皇帝的世袭制度；规定将全国最大的金矿变为皇帝的私人财产，甚至明文写上皇室开支占全国预算开支的比例数，这种作法实属罕见。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农业国，然而每年的农业投资还不足皇室开支的1/4。为了加强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控制，政府停止了以往改革中的土地登记和税收制度。广泛地实行土地分封制度。此外，皇室削弱了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权力和经济特权，同时建立了一套世俗的教育制度取代了那些古老而又缺少的教会学校，这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恐怕是最为矛盾的事情。

对外，塞拉西积极投靠美国。1953年，埃塞俄比亚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和一系列军事协定。美国平均每年输进的“军援”价值达1500万美元以上，相当美国每年向非洲提供军事援助总量的一半。塞拉西还极力鼓励外国资本向埃塞俄比亚投资办企业，货物进口免除关税，自由办理一切事务，甚至所得利润也任意汇往国外。其目的是为了笼络和拉拢国际垄断资本为自己作政治靠山，事实上，除美国之外，埃塞俄比亚在与所有的贸易伙伴打交道时，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

海尔·塞拉西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社会动乱时有发生。1962年2月16日，皇后孟伦夫人患病去世后，塞拉西的性格更加孤僻寡欢。

60年代，由于埃塞俄比亚经济严重恶化，使得民怨沸腾，群众性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塞拉西一意孤行，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的运动均施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7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形势更趋恶化。从1972年起，全国又遭受了特大旱灾，致使死亡人数高达30多万。由于400万城市人口严重缺粮，使得物价飞涨，一年间竟上涨50%。塞拉西非但不采取措施，相反却终日沉浸于纸醉金迷般的生活之中。西方记者在报道埃塞俄比亚的状况时说，那里是少数达官富人的世界，他们用金银盘子盛着的肉喂养自己的爱犬，而成群结队骨瘦如柴的饥民云集街头，颠沛流离，到处是要饭的乞丐。有的记者报道说，埃塞俄比亚已成了“乞丐之国”。一场反对君主专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已不可避免。

### 军队的阶下囚

1974年1月，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一支卫戍部队因缺水缺粮而发生兵变。不久，各地驻军纷纷响应，士兵要求提高军饷、改善伙食和服役条件。2月，斗争浪潮波及到城市群众，知识分子和工人率先上街示威游行；学生罢课，要求保证最低生活水平和毕业后就业的机会；教师罢教，要求提高工资；出租汽车司机要求提高收费。塞拉西企图压服“骚乱”但结果适得其反，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农民也自发夺取地主财产，城乡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在非洲许多国家中，军队常常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出现，埃塞俄比亚就是如此。当塞拉西皇帝与广大国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之时，军队中的一些军官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由正规军、警察和地方军三支力量成立了“协调委员会”。1974年5月，在违背皇帝愿望的情况下，军队陆续逮捕了至少200名大臣、达官和将军。“协调委员会”事实上执掌了国家政权。同年9月12日，由“协调委员会”组成的临时军政府发布第一号文告，宣布永远废黜皇帝，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海尔·塞拉西一直被军队所控制。1975年8月27日，海尔·塞拉西作为非洲最后一个封建主因病去世，是年83岁。

刘汗青

失道寡助

## ——门格斯图总统被埃塞俄比亚人民赶出国门

聪明的蠢才就是这样的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名满天下，恍然大悟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名声仅仅限于蚁冢的范围而已。

——克雷洛夫

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政局动荡不安，反政府武装力量活动频繁。自1991年5月中旬起，各反对派武装力量向政府军发动了强大攻势，随即直逼首都。前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被迫于21日凌晨宣布辞职，尔后乘一架无任何标志的喷气式飞机逃亡国外。

门格斯图下台，主要是由于其政权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又在与反对派的谈判中为美国所抛弃；它本身政策也有种种失误，以致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长期内战、连年饥荒及经济形势恶化，是诱发这次突变的直接原因，而解决厄立特里亚独立问题的不力则是门格斯图下台的导火线。

### 国际社会的一只孤雁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引起大国的觊觎，成了他们争夺的目标。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势力，终于把英国从埃塞俄比亚挤走，并且从各方面向埃渗透。1977年，塞拉西封建统治的垮台，美国的势力也顿时瓦解。门格斯图掌权之后，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加紧向埃塞俄比亚渗入。门格斯图政府也企图借助苏联和古巴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使埃塞俄比亚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

自70年代末期，苏联向门格斯图政府派去了几千名军事顾问；门格斯图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合作协定》和《领事协定》等，还提供了数百架军用飞机、枪支等军事装备。古巴也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几万名军人。在苏联和古巴军队的支持下，门格斯图不仅在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遏止了厄立特里亚和反政府的游击队发动的攻势。但到了1979年，反对派的游击队发动强大攻势，政府军连连受挫，厄立特里亚的全面独立也似乎指日可待了。厄立特里亚扼守红海通道，是战略要地，所以苏联决不同意让此地区独立，更何况厄立特里亚在经济上对埃塞俄比亚也十分重要。苏联立即从红海沿岸的大港口给埃塞俄比亚运去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供政府军作战所用，很快平息了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

近年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东欧形势的剧变，苏联和古巴开始从非洲脱身。苏联不再续签同门格斯图政府的军事协定，同时也中止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援助。西欧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纷纷施加压力，要求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国内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从外交上看，也是忧多于喜，东欧局势骤变，昔日门格斯图的两个坚决支持者、前民主德国总统昂纳克和保加利亚主席日夫科夫相继从政坛上消失，使门格斯图失去了两个得力益友，愈益孤立。过去古巴军队驻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对国内外的敌手多少起些威慑作用。如今，这种作用随着古巴军队的撤离而不复存在了。

接着，苏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对门格斯图更是十分反感。戈尔巴乔夫对埃塞俄比亚访问代表团说：“‘苏联卷入埃塞俄比亚内战’，是勃列日涅夫萧条年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那个时期及某些政策。所以，我们无条件的军事和经济承诺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戈尔巴乔夫要求门格斯图寻求一项平息厄立特里亚问题和提格雷战争的非军事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以结束内战。苏联拒绝了门格斯图提出的扩大供应军事装备的要求。埃塞俄比亚外长访苏时，提出门格斯图准备访苏亦遭拒绝。戈尔巴乔夫建议埃塞俄比亚调整内外政策。很明显，苏联已把大门关上，把门格斯图抛弃了。门格斯图大为不满，不仅声称与苏联划清界限，而且排斥苏联的“改革”思想。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书，也被门格斯图宣布为禁书。

万般无奈，门格斯图向美国频频伸出橄榄枝，以期得到支持。但对方反应冷淡。美国的考虑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地位已不如先前那么重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门格斯图政府都不抱多大希望，认为它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不愿与它过多地打交道。门格斯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了。

### 清洗异己安插亲信

为了保住政权，门格斯图只好着眼于国内，笼络各方力量，并把自己的一批亲信安插在安全部门，以加强控制。美国则转而加紧幕后活动，积极物色新的代理人。门格斯图随时都有“一脚被踢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门格斯图越来越多地依靠少数亲信军官，进而导致军政府内部纷争更加严重。

塞拉西皇帝的封建统治被门格斯图推翻的初期，国内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对门格斯图的新领导抱有很大希望。门格斯图则以“左”的面目出现，力图得到国内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以便他领导下的“革命火焰”组织成为埃塞俄比亚唯一执政党。可是这与受到军政府支持的全埃塞俄比亚工会、全埃塞俄比亚农民协会产生了严重分歧。同时，暴露了门格斯图想独揽大权的野心。例如：门格斯图未能接受“全埃”推荐的人选，自行任命一批部长，引起“全埃”的不满。他以镇压杀人犯为借口，处决一名“全埃”人员，这完全出乎“全埃”意料之外。渗入民兵组织的“全埃”人员，也受到清洗。“革命火焰”组织受到门格斯图器重，“全埃”势力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境内有许多反政府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活动，过去曾一度支持过门格斯图的人也加入了反叛组织。在厄立特里亚问题上，“全埃”历来主张用谈判的方法加以解决，而门格斯图则主张坚决镇压。“全埃”因此认定门格斯图的行为已经“背离”原来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于是“全埃”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并在群众中对门格斯图进行攻讦。门格斯图在厄立特里亚战争的战前动员会上，曾声称，有人“脱离革命队伍”、“反对统一”。这话便是针对“全埃”从事反抗活动，进行“危言耸听的宣传”而言的。门格斯图下令屠杀了塞拉西统治时期的60名高级官员，并逼迫200多万人逃亡国外。许多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1978~1979年期间，门格斯图又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有许多青年惨遭屠杀。

不久，“劳动人民党筹委会”建立了。门格斯图在政府机构和军队中进行了重大调整。四名军委会常委调往政府部门。20名高级军官擢升为准将，原总参谋长和后勤部长提升为国防部长。门格斯图通过这次调整进一步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门格斯图的亲信军官，一跃成为政府的高级部长，其职位相当于政府总理。门格斯图的另一个亲信被调任国防部长。忠于门格斯图的原军委会国防委员会指挥官还控制了咖啡、茶叶部，掌握了全国80%以上的

商品出口和外汇收入。

门格斯图上台以来，多次宣布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工人党”、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借以装璜门面，缓和国内矛盾，稳定和巩固其军人政权。经过多方谋划，最后他自兼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国务会议主席和工人党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而确立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

门格斯图还把许多亲信安插到一些新成立的省政府中充当“耳目”。门格斯图本人沾沾自喜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政治政策，以及强制党内的干部穿着统一的制服，保守的作风，强权统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

### 蛮干腐败导致赤贫

在经济上，门格斯图盲目发展大农业集体和国营农场。1985年，他下令农民拆毁自己的房子，迁移到集中起来的新村庄，强行集体化。门格斯图又命令受干旱和战乱影响的北部高原地区60万人迁移到埃塞俄比亚南部和西部的低洼地区，迁移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烈日暴晒、饥饿和疾病。

门格斯图政权实行变相剥削农民的农业政策，低价收购农产品，再高价卖出，百姓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政治局委员公开要求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门格斯图为改善自身形象和促进经济发展，也采取了某些措施。宣布允许私人在小工业和旅游业投资，外交上更积极寻求西方支持。1990年春，门格斯图决心“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但因政局动荡、内战频繁未能奏效。美国专家亨齐说，门格斯图幻想能够在这个国家建立起共产党体制，幻想他可以依靠苏联提供大批的武器装备来战败反叛分子。甚至在苏联人开始疏远他之后，还幻想通过经济上的让步和挑动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来维护他日益被削弱的政权。

在北方问题上，门格斯图进退两难；继续战争力不从心，要与游击队谈判，又不甘心。在国内外各方压力之下，门格斯图一方面同意开始同游击队进行预备性会谈：一方面又宣布全国总动员，大肆征兵扩军，增加军费，准备向北方发动反攻，引起军政府内部分歧。恰巧，天公不作美，北方发生旱灾，有4000万人靠救济度日，又给门格斯图添了个包袱，无异于雪上加霜。

这时，旧制度的神话不可避免地破灭了。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权者的无能、虚伪和自私的嘴脸，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在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同时，门格斯图却用20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了1400公顷私人农场和一套私人住宅。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全国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抗议运动。

为了同游击队战争，门格斯图又提出“一切为前线”的口号，下令每年老百姓捐献“年收入的1/12”用于战争，更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政府军队中叛逃、投降和通敌事件不断发生。军队不愿为门格斯图打仗。因为在1989年5月的一起未遂政变中，有14名将军被捕，受牵连者数以百计。翌年，北方形势吃紧时，又有12名将军因此被处决，有1/5将军因受怀疑而被开除军籍。门格斯图的这些作法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军队更是群龙无首，当反政府武装攻占一些军事基地时，政府军不战而降，有的开着坦克和装甲车越过国境至邻国，20余架军用飞机和十几架客机也逃到吉布提降落，10余艘海军船只驶抵也门港口停泊。

长期内乱，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埃塞俄比亚每年军费开

支十几亿美元，占政府收入的 54%和支出的 50%。困于战争，门格斯图无力抓经济建设，工业发展停滞，农业衰退，很多日用品无法满足国内需求。由于外汇短缺，国家限制多种消费品的进口，致使近年来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后，由于缺乏管理人员、资金、原料和生产设备，加之管理体制上尚有不少缺点，所以成绩不显著。门格斯图在工人党九中全会上承认：自 1974 年他上台执政以来，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1.9%，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生产，1975~1984 年平均每年下降 0.4%，而人口年增长率为 3%。如今，物价上涨，粮食奇缺，只有 2%的农民使用优良种子，只有 5%农民使用化肥。每 100 公斤小麦的价格由 30 比尔，猛涨到 80 比尔。而一个文职人员的月薪最低的仅有 50 比尔，而农村平均收入仅为城镇的 10~15%。门格斯图也认为：失业是“尖锐问题”，由于生产缓慢，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失业人口猛增。群众的住房紧张，城镇土地和多余房屋的国有化政策，挫伤了私人建房的积极性。西方一些专家认为，在灾害与干旱中，有 15 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门格斯图的教条主义和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的。

1988~1989 年财政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95 亿比尔，人均不到 100 美元。低于 15 年前革命时的水平。政府为了度日大量举债。到 1989 年还本付息的外债总额已从 1974 年的 4 亿美元，猛增到 30 亿美元。这对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30 亿美元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在经济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数以万计的人在饥饿和战乱的逼迫下背井离乡。门格斯图政府已经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了。

### 战火烧毁总统交椅

厄立特里亚濒临红海，是地中海通向印度洋的战略要地。该地区在历史上是埃塞俄比亚领土的一部分，二次大战后，按联合国规定交由英国托管，1950 年 12 月始与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1962 年 11 月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但厄立特里亚的反政府派则一直要求独立，并组成了厄人民解放阵线，30 年来一直在为争取厄立特里亚省的自治而进行武装斗争。在此影响下，与该省毗邻的提格雷省，也要求实现自决，并组成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大力从事推翻门格斯图政府的武装活动。由于共同目标的驱使，两个组织很快就协调了他们的军事战略，采取一致行动，对政府的攻势一步步加强。

1974 年，门格斯图通过政变上台后，多次重申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对新政府的“左倾”一度抱乐观估计，认为厄立特里亚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为和平谈判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而做出努力，相反倾国家全力镇压厄立特里亚抵抗力量。为此，门格斯图建立了一支拥有 30 万人的庞大军队对厄立特里亚的反政府力量实行灭绝政策，先后对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发动了六次大规模攻势。第六次攻势是在门格斯图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原计划只用 8 天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据报道，经过 4 个月战斗，政府军伤亡 5000 至 2 万人，军人士气一落千丈，实际上像前 5 次攻势一样，第 6 次也以失败告终。

由于厄立特里亚省是红海沿岸唯一受基督教影响的地区，居民中有一半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故而也是导致厄立特里亚独立斗争的原因之一。它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色列军队也一直从各个方面向厄立特里亚反对派提供援助，既派军事代表帮助训练部队，又供应大量武器。苏联在厄

厄立特里亚问题上出尔反尔，由于它不满埃塞俄比亚前政府塞拉西的亲美政策，所以也通过阿拉伯国家向厄立特里亚游击队提供大量武器，积极支持厄立特里亚独立。使得厄立特里亚游击队“力量雄厚”。门格斯图军政府建立后，为了消灭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立即宣布“不要西方，只要东方”。苏联控制了埃塞俄比亚，反过来又支持门格斯图对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的镇压，向它提供大量武器和军事贷款 25 亿美元。门格斯图此举实属“引狼入室”。显然，厄立特里亚的内部争端，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和人力，使它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苏联。厄立特里亚问题是埃塞俄比亚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门格斯图利用外国势力的干预只能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由于外部势力的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反政府军不仅没有在政府军的攻势中被吃掉，反而迅速扩展，到 1991 年已拥有 15 万人的兵力。自 1991 年 2 月下旬起，反对派又向政府军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攻。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便夺取了 5 个省。反对派的军队则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以切断亚的斯亚贝巴的供应线，使得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急剧恶化。

门格斯图在内外交困中下台，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一方面，它反映了埃塞俄比亚在门格斯图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另一方面，它揭示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永恒真理。

赵儒林



鸡犬升天敛巨财 古刹风烛熬晚年

## ——全斗焕总统贪污腐败下场可悲

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  
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奥斯特洛夫斯基

全斗焕的下台，就其本身而言，仍属正常的政权更替。问题就在于，人走茶凉，权落身轻，过去的许多肮脏勾当，在失去了保护伞之后，大量被抖搂出来，弄得个身败名裂，无地自容。昔日威风凛凛的大总统，顷刻间成了可怜巴巴的罪人，遁入百潭寺修身拜佛，反省解脱，以求世人宽恕。

## 人去灯灭

全斗焕靠镇压民主运动上台后，南朝鲜以全斗焕为首的执政的民正党同共和党总裁金钟泌、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民主人士金大中和爱国青年学生之间的斗争，即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当时斗争的焦点是总统选举问题。全斗焕 1980 年发动军事政变后制订的宪法，实际上确保了军方势力得以继续掌权，即选举军方人员当总统。针对这一点，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首的反对派，针锋相对地提出，总统应由普选产生。他们的这一主张，从民意测验来看，是得人心的。但执政党始终不同意总统普选的作法，并在“如何修改宪法”的争论过程中，基于现行国会选举制度有利于军方，至少同军方息息相关的人物继续掌权的考虑，而寸步不让地力主实施议会内阁制。按照金泳三和金大中的设想，普选总统可以选出和军方毫无关系的政治人物来当总统。因此，几年来两金所代表的反对派同全斗焕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围绕着修改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后来全斗焕竟然把修改宪法计划束之高阁，导致政府与两金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从而招致宗教界、学术界、学生界和人权运动者的抗议。这就造成了南朝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后来汉城大批青年学生和 3500 名宗教界人士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并进行绝食斗争，他们高呼“打倒军事独裁”、“全斗焕下台”等口号，要求“修改宪法”和“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1987 年 6 月 10 日，民正党在 10 万警察的保护下举行“全党大会”，全斗焕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在会上推举自己的亲信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准备强行实施其和平移交政权的计划。这样一来，在南朝鲜各地发生了自全斗焕上台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游行示威，反对全斗焕推举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同年 8 月民正党和最大的反对党——统一民主党就较为民主的宪法草案达成协议，宪法草案规定通过普选直接选举总统。

1987 年 12 月 16 日，南朝鲜选民在各地参加投票选举下届总统。选举结果卢泰愚获得 36.4% 的选票，在野党候选人金泳三获票率为 27.1%，金大中为 26.3%。卢泰愚当选为南朝鲜第 13 届总统。这是南朝鲜 16 年来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总统。

1988 年 2 月 25 日，全斗焕正式将总统职位移交卢泰愚。这是南朝鲜宪法问世 40 年来第一次和平移交政权。全斗焕在离任记者招待会上自我表白地说，本人是“守信用的总统”。他还说，用一句话来说，“感到十分轻松，就我能够实现总统一任制，向各位表示感谢”。“和平移交政权，总统一任制是我的政治信仰”。按规定的任期，和平移交政权后退下去是极其“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南朝鲜 40 年政治史上没有一位总统做过这一“理所当然的

事”。

全斗焕卸任离开了青瓦台总统府。这时他仍然保持着对南朝鲜政治的影响力：继任总统卢泰愚是他的军校同窗好友、亲信，又是他亲自指定为执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新内阁中有7人出自他的旧班底，全斗焕又作为“元老咨询会”主席和执政的民正党名誉总裁，仍能在幕后起特殊作用。难怪他牵着两岁孙女的手走出青瓦台大门时，会踌躇满志地对随从说：“过去的总统，最后下场不是被部下暗杀，就是亡命海外。与他们相比，我感到幸运，也感到满意。”但，全斗焕完全没有料到，后来南朝鲜民主化运动发展得那样迅猛，更没有想到对他过去罪孽的报应会来得这么快。

## 胞弟在“新村”大发横财

全斗焕下台不到一个月，南朝鲜新闻机构大量报道了他的胞弟全敬焕营私舞弊的丑闻，全敬焕落入法网。

全敬焕生于 1942 年。1964 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以少尉军衔入“首都警备司令部”服役，后调青瓦台警护室。1968 年退役，在一家大企业当保镖。1972 年去美国一所大学做柔道教练。回汉城后又在青瓦台警护室作副官。随着全斗焕 1980 年登上总统宝座，全敬焕也于 1981 年至 1987 年先后出任“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事务总长和会长，成了声势赫赫的一个“大人物”。

“新村运动”是朴正熙当政时期为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的科学文化，于 70 年代初成立的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团体。其宗旨是：培养民众勤勉、自立和合作精神，促进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净化社会，摒弃愚昧、落后，走向现代化。

南朝鲜当局每年都要拨出一笔专款支援“新村运动”，并允许其无偿使用“国有设施”。全敬焕在“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任职期间，靠其哥哥全斗焕的权势，到处伸手，无所不为，几年之内“新村运动”成了一股无所不包的强大势力，称为“政府中的政府”。全敬焕是能够随意出入青瓦台的特殊人物，各部官员争相笼络，致使国库中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新村运动”的金库；一些大的财团也有巨额捐献。全敬焕不仅巧立名目集资，强买强卖、贪污受贿，甚至逼迫银行向面临倒闭的企业贷款。他则乘机中饱私囊，购买房屋、汽车、股票，成了大暴发户。

全斗焕下台前夕，南朝鲜新闻界就陆续报道了全敬焕在任职期间利用全斗焕的地位和影响，胡作非为、侵吞公款的舞弊行为，但当时全斗焕还在台上，对此案没有进行认真查处，有意掩盖过去。后来，全敬焕夫妇用假名订机票，准备飞往日本大阪，在汉城金浦机场登机时被人认出，暴露了行踪。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全敬焕大阪之行的消息，纷纷猜测他是为逃避审查而出走的。南朝鲜 3 个主要在野党发表声明，要求当局立即召回全敬焕，并对他的犯罪事实进行彻底追查。全敬焕夫妇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从日本回到南朝鲜。3 个主要在野党再次呼吁当局立即拘捕全敬焕。在这样的形势下，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新村运动”领导人舞弊案进行调查，并禁止全敬焕再次出国。由南朝鲜“总检察厅”传讯了 200 多名政府官员和“新村运动”职员，初步调查掌握了全敬焕贪污巨额公款的重要线索，其中包括他在汉城各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用假名或亲友名义开的 10 多个存款户头。1988 年 3 月 29 日，汉城“总检察厅”正式传讯了全敬焕。

据亲自参与审讯全敬焕的检察长康一元说，全敬焕起初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后来，检察官出示了他的秘密帐簿和一些证人的口供后，他才承认了部分罪行。3 月 31 日南朝鲜警方以“特殊经济犯罪”的罪名逮捕了全敬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村运动”中央本部的前任经理郑章熙、宣传部长文清、南朝鲜“社会体育振兴会”前任经理课长善柱允和全敬焕的两个亲戚、“新村运动”新闻社前任总务部长黄兴植和名叫“青检院”的一家福利机构理事金胜雄等 5 人。

南朝鲜司法当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说，全敬焕在“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任职期间，共挪用公款 173 次，贪污受贿金额达 78 亿南朝鲜元（约合 1040 多

万美元)。

参与全敬焕犯罪的有 63 人，与这些案件有关而被调查的共有 218 人，包括全敬焕的亲友、财经界的知名人士和前政府官员。报告列举的重大违法舞弊案件有：

骗取国有土地，进行违法开发。位于仁川湾的永宗岛上约有 250 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全敬焕以“新村运动”名义向当局申请到无偿使用这块土地的许可，转手就交由他自己任会长的、与“新村运动”毫无关系的“青少年综合训练所”，并借口兴办该所向各大企业募捐 24 亿南朝鲜元，这笔巨额款项全部塞入他的私人腰包。

勾结政府官员，以公款资助私人企业，偷税漏税。全敬焕一上任就强买原属私有的“新村新闻社”，成了拥有 51% 股份的控股老板。然后，串通内务部的人用公款包销他的《新村周报》，用于赠送“新村运动”各级干部。6 年间，共耗费国库资金 88 亿南朝鲜元。此外，他还借“政府宣传物”的名义，胁迫“文化部”出资 32 亿南朝鲜元出版其《新村月刊》1005 万份，让“国防部”用军款买下他的《社会体育》杂志作为军队的政训材料，采取虚报销售数的办法逃税 10 亿南朝鲜元。

侵吞“新村运动”海外研修费用。1981 年至 1987 年，“新村运动”中央本部共选拔 6000 名基层活动分子到国外考察进修，这项专款余额约有 4.7 亿南朝鲜元，绝大部分被全敬焕挪作私用。1986 年他举办“新村运动干部培训班”，被迫受训的 2400 多人每人出资 30 万南朝鲜元，这笔收入就是一笔无头帐。最后南朝鲜当局宣布全敬焕贪污金额总共 78 亿南朝鲜元。但人们推测，他实际贪污金额可能超过 100 亿南朝鲜元。

南朝鲜司法当局于 1988 年 4 月 2 日正式对全敬焕等人提出起诉，经过 4 个多月的传讯、调查和审理，至 8 月 22 日，南朝鲜大检察厅和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对全敬焕作出了判决，判处他 15 年徒刑，罚款 21.4 亿南朝鲜元，并追加征收税金 13.4 亿南朝鲜元。

南朝鲜大检察厅在介绍对全敬焕的初判理由时说，全敬焕违反了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律。他利用自己是“国家元首”胞弟的特殊身份，担任了本来应该由专门人员担任的“新村运动本部”的领导职务，并以工作为借口，挪用国库的巨额资金和企业捐款，造成了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全敬焕及其同案犯还犯下了其他大量的营私舞弊罪，引起了国民的公愤。但是，在司法当局审理此案期间，他们毫无悔改之意，对其罪行矢口否认。根据其恶劣态度和国民的要求，不得不对他们判以重刑。

事后，全敬焕提出上诉，汉城高等法院受理此案时，改判为 7 年徒刑，罚款 32 亿南朝鲜元。

全敬焕营私舞弊案被法院判决后，人们的注意力便转向追查全斗焕家族其他成员的舞弊行为，新闻媒介和在野党人士更是穷追不舍。到 1988 年底为止，除全斗焕夫妇外，被点名的还有全斗焕的哥哥、弟弟、堂弟、外甥、岳父、妻舅等 10 多人，其中 9 人相继锒铛入狱。其鲸吞公款数额之大，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 妻子在“育英会”捞够捞足

有关李顺子利用特权犯罪的问题，也是在全斗焕下台后才陆续揭露出来

的。全斗焕当上总统的第二年，即 1981 年李顺子就建立了一个名叫“新一代育英会”的妇女团体，自任会长，以振兴幼儿教育为名招收会员，募集资金。“育英会”很快就在各市、郡、区建立了组织网，会员达 1.5 万名。一般会员入会后每年要交会费 1 万南朝鲜元，终身会员则要一次性交纳 20 万南朝鲜元。名誉会员多是各财团、企业的会长、社长等，共有 900 多名名誉会员。他们要交比会费多得多的“赞助金”，会费帐目由李顺子本人亲自掌管。“育英会”究竟有多少“赞助金”，谁也搞不清楚。该组织自称到 1987 年底拥有总财产 215 亿南朝鲜元，但据人们推算，这个数目与实际金额至少相差几百亿南朝鲜元。

以帮助治疗幼儿先天性心脏病为名建立的“新一代心脏财团”，也是李顺子的聚财机构，她自任理事长，其组织形式与筹资方式与“育英会”大同小异。

在担任上述两个团体的会长期间，李顺子共接受了 160 多次捐款，款额达 223 亿南朝鲜元。1988 年 10 月 14 日，李顺子因涉嫌贪污“育英会”捐款，宣布辞去该会会长职务。第二天，李顺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敢向天发誓，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用过育英会一分钱”，“有关贪污的报道，都是根据谣言写的”，并声明自己是清白的。

### 全氏家族都得好处

全斗焕的胞兄全基焕，50 年代当过兵，60 年代当过交通警察，70 年代种过田。在其弟当上总统职位后，他从农村迁入城市，不知何时当上了一家航空旅行社的会长。从 1983 年至 1988 年 5 月，他先后强夺鹭梁津渔业市场经营权从中捞取大量回扣、利用公款购买小汽车和贪污公款达 27 亿南朝鲜元。1989 年 5 月 9 日，全基焕被汉城法院判处 4 年徒刑和罚款 10 亿南朝鲜元。

全斗焕的堂兄全淳焕，1986 年，倚仗全斗焕的权势，给三德综合建筑公司代表朴海成签发一张建造 26 万坪（约合 1282 亩）高尔夫球场的许可证，全淳焕收取贿金 3700 多万南朝鲜元。此外，他还以帮助别人到大法院打赢官司为名收取 2 亿南朝鲜元股票。1988 年 11 月 7 日法院以初犯、高龄、患病为由判处全淳焕 1 年零 6 个月徒刑，缓期 3 年执行，退赔 1000 万南朝鲜元。全斗焕的堂弟全禹焕，曾以帮助获得 3 处高速公路休息室的设置权为由，收取交际费 2500 万南朝鲜元。1988 年 11 月 12 日全禹焕以诈骗罪和违反律师法罪被拘捕。经审讯后，法院判处他 10 个月徒刑，退赔 550 万南朝鲜元。

全斗焕的内弟李昌锡，贪污东一公司公款 29.07 亿南朝鲜元，偷税 17.7 亿南朝鲜元，于 1988 年 11 月 15 日被捕，1989 年初法院一审时判处李昌锡 3 年徒刑，缓期 5 年执行，罚款 35 亿南朝鲜元。

全斗焕的妻叔李圭升，以为三湖财团说情延长银行贷款偿还期为由收取 5 亿南朝鲜元贿赂，后退还 4.5 亿南朝鲜元，法院判处他 2 年徒刑，退赃款 5000 万南朝鲜元。

全斗焕的连襟洪淳斗，曾以说情不调查纳税情况为由，收取航空货物协会企业代表的好处费 3.16 亿南朝鲜元。1989 年洪淳斗被法院判处 1 年零 6 个月徒刑，退赔 3.16 亿南朝鲜元。

全斗焕的外甥金永道，于 1988 年 1 月至 4 月，先后以说情打通关节释放

6名刑事犯人为诱饵，共诈骗罪犯家属2850万南朝鲜元，于1988年10月26日被逮捕、判刑。

### 总统胃口更大

在全氏家族舞弊案件调查中，涉及全斗焕本人的有日海财团捐款案。日海财团是全斗焕执政时组织的一个智囊机构，专门为全斗焕的内外政策出谋献策，全斗焕自任财团董事会会长。在该组织成立之初，南朝鲜各大财团都捐款赞助。据披露，这些捐助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全斗焕私下强迫捐助的。全斗焕本人捐款35亿南朝鲜元，而当时全斗焕的月薪仅180万南朝鲜元。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曾追查过全斗焕这笔钱的来源，调查结果未公布。

其次，全斗焕在执政7年期间所获得的政治资金达5000亿南朝鲜元，而有的在野党认为全斗焕的政治资金有上万亿南朝鲜元之多。全斗焕在下台以后，矢口否认他有贪污行为，并声称所有政治资金全都用在选举和管理民正党方面，拒不说清这些政治资金的具体用途。舆论认为，这些政治资金中有相当部分与全斗焕个人非法蓄财有关。全斗焕不敢公开这些钱的用途，就说明他心中有鬼。据说全斗焕在澳大利亚有个人的投资。

还有，全斗焕执政期间，南朝鲜5个道、市在他的授意下，为全斗焕建造15处豪华行宫，耗资达109亿南朝鲜元。位于汉城市西部的延禧洞，全斗焕占有1.1万平方米的宅地，建有4栋楼房。据统计，7年中仅青瓦台总统府的装饰费就达76亿南朝鲜元。南朝鲜有关方面为了博得全斗焕的欢心，曾动用公款28亿南朝鲜元为其住宅建造风景区，并禁止外人通行。全斗焕为了给自己的列祖列宗“增光添彩”，甚至动用公款3亿多南朝鲜元在全氏墓茔造山林，并将林权收归个人所有。

以上列举的是全斗焕经济上的主要问题，至于政治方面，他在执政期间滥用权力、镇压民主、扼杀舆论、枉害无辜、践踏人权等劣迹，则更是数不胜数。

### 百潭寺拜佛洗罪

在调查全斗焕案件的过程中，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全斗焕的处理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执政的民正党极力主张对全斗焕的问题必须政治解决，让全斗焕向国民公开道歉，对执政时期的一些失误向人民讲清楚，以取得人民的宽恕。为此，民正党代表委员尹吉重同全斗焕秘密会谈，全本人表示接受民正党的意见，愿向人民道歉。这是全斗焕求之不得的处理方案。但是政治解决在民正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全斗焕向国民道歉后就不再追究其他问题了。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没收全斗焕非法所得的全部财产。

与民正党主张相反的是许多在野党人士和青年学生。他们主张把全斗焕交司法机关处理。为此，最后作了一次民意测验，在被调查的3000人中，要求全斗焕在国会作证的占81.5%，要求逮捕全斗焕的占45.8%，主张政治解决的占11.5%。1988年11月23日全斗焕向全国人民作了公开道歉，并放弃了他的财产，在汉城的住房、一处别墅、两个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300万美元现金和他所有的个人财产交给了政府。还有他执政期间收集到的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活动基金也交给了政府。然后立即到位于汉城东北121公里处的江原道麟蹄郡的深山寺庙百潭寺过隐居生活，以便“静静地反省过去的错误”。

## 隐居生活和重返汉城

全斗焕在百潭寺度过两年多的隐居生活后,于1990年12月30日从隐居地回到汉城,住进了他原在汉城的延禧洞私宅。在隐居的两年多时间里,全斗焕只回过两次汉城,一次是1988年底到国会作证;另一次是1990年夏天其兄全基焕被释放后,全斗焕深夜悄悄地回了一次汉城。此外,全斗焕夫妇一直住在百潭寺,生活清苦,度日如年。全斗焕在两年期间只吃过一次肉,那是在1989年5月做完“百日佛事”后,他的身边人员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了点肉,没有想到全斗焕吃了以后闹肚子,折腾了一夜,把他的妻子李顺子吓坏了,从此以后他就戒肉了。

全斗焕在这期间并不是不想下山,尤其是在国会作证后,执政党即宣布“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清算已结束”,全斗焕就想结束隐居生活。但是,由于南朝鲜当时处于“朝小野大”的政治局面,各界对清算第五共和国仍有许多不满。南朝鲜当局直至1990年7月才第一次正式表示全斗焕可以下山,但希望他不返回汉城,另找一处暂时安身。全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自己在此期间是“政府和执政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却“被利用了”,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侮辱”。现在让下山却不许回汉城自己的家,这是卢泰愚在作表面文章,在自己脸上贴金。因此,全斗焕从政治情况等多种因素考虑,认为不适宜马上下山,所以拒绝了。他甚至声称,“只要卢泰愚总统不来接我”,“我就不离开百潭寺”。

卢泰愚在1990年12月24日举行的辞旧迎新记者恳谈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全斗焕结束隐居生活,“从宪政史的传统和发展民主政治来看”,全斗焕也不能再继续过隐居生活,而应过正常人的生活。他还表示,全斗焕可以回到在汉城的私宅。据南朝鲜新闻媒介分析,卢泰愚此举的真实目的是,卢泰愚既是全斗焕的军校同窗,又是全斗焕一手栽培起来的人,长期不让全斗焕下山,对卢泰愚来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自己不利。全斗焕及其心腹都了解第六共和国(卢泰愚政权)成立的内幕和弱点。如果这些第五共和国的势力不满现政权,揭露某些内幕,对现政权来说会造成被动,难以收拾。因此,卢泰愚不能同他们对立,想尽办法防止这个“炸药包爆炸”。1991年3月将举行地方议员选举,1992年初将举行第14届国会议员选举,两者相比较,自然是国会议员选举更为重要。因此,与其推迟全斗焕下山使执政党在大选中受损,不如现在让他下山对执政党在地方议员选举中受些影响更值得。南朝鲜在野势力对全斗焕下山普遍持否定态度。执政的民正党自然欢迎全斗焕下山,不过也有人担心全斗焕返回汉城会“刺激国民感情”。全斗焕下山对今后政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历史自会作出解答。

杨春城



恶有恶报

## ——马科斯腐败独裁终被推翻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是能征服利剑。

——拿破仑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是菲律宾的第六任总统。在 1965 年当选总统后的头几年，马科斯曾为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努力，所以，1969 年再次当选。进入 70 年代以后，马科斯日益热衷于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也滋生开来。随着马科斯政权在菲律宾的继续存在，经济衰退、人民贫困、滥用职权、行贿受贿、镇压反对派等现象也日渐严重，百姓怨声载道，政局开始动荡，菲律宾社会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碰到火星，就会燃烧起来。杀害阿基诺的枪声，终于使菲律宾烈火燎原，马科斯王朝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 经济萧条

菲律宾农业人口占 70%，是个农业国。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50 年代，菲律宾被誉为亚洲的“小美国”，其经济繁荣程度超过新加坡和南朝鲜，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从 70 年代起，菲律宾开始落伍，经济发展裹足不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 年菲律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550 美元，退居世界第 97 位。

菲律宾经济倒退的原因，与总统马科斯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和政府贪污腐败有关系。据菲律宾廉政委员会统计，马科斯夫妇一家在执政 20 年中聚敛的秘密财富，多达 50 亿美元。这笔巨款目前大多数存在国外银行。1983 年 8 月 21 日，从国外返回的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在戒备森严的马尼拉国际机场被枪杀。从此，菲律宾政局进入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外资纷纷撤走，国内资金大量外流，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状态。1984 年和 1985 年，菲律宾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经济问题成了马科斯政府最大的难题。贫富差距的扩大，贫穷人口的增加，激起菲律宾社会各阶层的极大不满，使马科斯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成为马科斯垮台的最基本原因。

### 一步步建立独裁统治

马科斯苦心经营，以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自信，经过历次的较量，终于跻身总统宝座。可以说，他的奋斗，从他 22 岁因受到暗杀父亲的政敌的指控而站在法庭上时就已经开始了。他一次次经受住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的冲击，这些都使他考虑，怎样才能使自己苦苦追求到手的权力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他所采取的振兴国内经济、“改良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等，都是为了达到他长期执政的目的服务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按照菲律宾宪法的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马科斯 1969 年当选菲律宾连任总统，成为有史以来达到这一目标的第一位菲律宾总统。如果说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苦苦追求多年，只为了连任两届总统，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此时的马科斯来说，权力就是生存，是对付一切反对势力的盾牌，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住它。因此，从担任菲律宾总统搬进马拉卡南宫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为如何使自己长期执政作准备了。

到 1969 年，他已准备了四种不同方案，以便在他第二任期结束时继续执政。这些方案是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虽然这是菲律宾宪法不允许的；让夫

人伊梅尔达作为总统候选人；将政府机构从共和制改为议会制，自封总理，宣布军法管制，实行独裁。

马科斯上台后，十分注意掌握军队，曾多次扩充和整顿军队。他挑选忠于他的军官担任海、陆、空军司令以及总统府警备司令、国家安全与情报局长等要职。军队中百分之九十的将级军官都是依罗戈省人。

马科斯对军队既广施恩泽又严加管制。军人待遇较高，提职加薪较快。在整顿军警纪律方面，马科斯让全部将级军官和 65 名上校军官参加政治集训班，向他们灌输忠于马科斯的思想和进行考察。

与此同时，马科斯为树立政府新形象，克服经济困难，清洗了一些劣迹昭著的官员和异己分子，重用提拔一批亲信和经济专家担任国家领导工作。

1972 年 9 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座车在马尼拉市郊遭到袭击，司机被当场打死，恩里莱因当时不在车上幸免于难。这一事件成了马科斯大权独揽的借口。

9 月 21 日，马科斯发出第 1081 号公告，宣布把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他强调他需要宪法赋予的巨大权力和全部权威来粉碎国内的叛乱，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没有法制的混乱状态中拯救出来。马科斯认为，他的敌人阴谋发动政变或进行暗杀，企图逼他下台。他指出：共和国目前面临着 7 个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菲律宾共产党、穆斯林分离主义者、右翼分子、寡头政治支持者、私人军队、犯罪分子及外国势力的干涉。

随后，马科斯提出了实施军管的具体措施。他宣布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新闻机构，接管所有公共事业，下令所有学校至少停课一周，宣布可能对非法携带武器的人处以死刑；暂时中止菲律宾人的出国活动；禁止党派活动；禁止集会、游行和罢工。与此同时，马科斯下令逮捕和监禁所有的反对政府阴谋的人。转眼之间，菲律宾国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许多不满马科斯统治的国会议员、修宪会议的代表、地方政客、出版商、教授、记者、学生积极分子、农会和工会领袖，被抓起来关在军营。自由党秘书长、马科斯的头号政敌贝尼尼奥·阿基诺被列入第一批逮捕关押者名单。1981 年，马科斯结束军法管制，但颁布了《反颠覆法》及维持社会治安的《安全法》，使总统有权下令逮捕任何企图颠覆政府的嫌疑犯。

菲律宾多数人认为，马科斯实施军管的最初几年，国内的变化较大。例如在社会治安方面，解散了地方土豪的私人军队，没收枪支弹药，各种犯罪活动明显下降；帮助农村兴建水利，促使银行向农民开放贷款，使农村出现繁荣景象。由于社会发展安定，外商大量投资设厂，观光旅游者蜂涌而至，外贸出口额和外汇储备与年俱增。但是后来，马科斯政权贪污腐败，大肆掠夺国库财产，不关心百姓疾苦，政治上加紧迫害不满政府的人士，经济上大举借债，损公肥私，把国家越搞越糟，人民敢怒而不敢言。

马科斯为使自己这一举动合法化，于 1973 年 1 月，举行全国 15 岁以上居民参加的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菲律宾由美国式总统制改为英国式总理制。现任总统在过渡时期（即军管时期）兼任总理，直到临时国民议会选出新政府为止。1977 年 12 月再次举行公民投票，重新肯定在临时国民议会组成后，由马科斯任总统兼总理。

1978 年 6 月，临时国民议会开幕，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理，正式行使总统兼总理权。由于国内政界人士及学生多次游行示威抗议军管，马科斯于 1981 年 1 月 17 日宣布取消军管。为确保权利不被削减，同年 4 月又通过公民投票

再次修改宪法，把政体改为法国式总统制。新宪法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拥有绝对权力，总统任期为6年，不受连任限制。总统及其官员采取的任何官方行动，在任期内及退休后皆免受法律诉讼。这些规定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的权益。1981年6月进行总统选举时，他再次当选。马科斯苦心孤诣，一再修改宪法，改变政体，就是为了使自己能长期执政。但结果适得其反。

### 镇压反对派

70年代初，菲律宾已出现较强烈的民主改革要求，同时，马科斯开始更多地为自己的权力着想。他为自己制订的政治战略目标是：一方面将自己标榜为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政治对手与美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马科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支持，但是由于他成功地标榜自己是民族主义者，附和了菲律宾人民迸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愿望，最初，菲律宾人民的抗议矛头并未直接指向马科斯。

抗议行动日益扩大到街头、教堂和学校，而马科斯充分利用了菲律宾人民的民族主义愿望，把群众抗议的视线，吸引到那些激烈地指责马科斯政府腐败不堪的政治对手们身上。

真正引起菲律宾人民对马科斯强烈不满的是“买房事件”。

伦敦出版的《每日快报》报道的一则消息说：“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在美国肯辛顿居民区购买了一套价值32万5千美元的高级住房。这一消息在马尼拉一下子引起了轰动。马科斯否认英国的报道，并借此以攻击菲律宾反对党领导人试图追查马科斯夫妇的“隐藏财富”。据推测，马科斯夫妇的腰包里已有数千万美元。后来因为查无实据，这桩买房公案便不了了之。事实上，这笔房产是以劳雷尔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的，转租给伊梅尔达的弟弟本哈明·特立尼达，而真正出钱的是菲律宾糖业委员会。这是马科斯夫妇用以在世界各地购买财产的一贯做法。

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揭露出了马科斯身为总统，却贪国家之财在外国购买房产。

尤其使菲律宾人民对马科斯不满的，是他并没有能真正解决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人民对马科斯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认为，马科斯与他在施政演说中的许诺相去甚远，他背叛了这个国家。马科斯不惜使用武力对付他在宣誓时发誓要为之服务的人民，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继续执政，他甚至不惜拿国家的尊严作交易。他开始玩弄两面派的手段，一面宣布同美国的关系必须“重新估价”和予以改变，同时又为重申这个前殖民国的“特权”打基础。马科斯夫妇的腐败与奢侈也日益走向极端。

马科斯执政后期，开始越来越多地投向美国，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维持着艰难的日子。在华盛顿的对外政策的支持下，世界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贷款计划。世界银行对菲律宾的贷款从1974年的165.1万美元激增至1983年的136亿美元。军法管制前，菲律宾在世界银行借债国中排列13位，到1980年，在113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竟上升到8个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家在菲律宾投资。因为在菲律宾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由于有马科斯的军管保证，工人不准罢工，他们对马科斯的治国之道很少抱怨。而据说，马科斯宣布军法管制，首先得到的是美国的支持。

不久之后在首都马尼拉发生的“米兰达血案”，暂时将人民群众对马科

斯政权的不满压了下去。

1971年8月21日，自由党在首都马尼拉的米兰达广场举行国会选举前的最后一次群众集会，宣布竞选参议员的8名候选人。这时，有两枚手榴弹扔到主席台上，当场炸死9人，95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人阴谋全部炸死自由党的领导人。

谁是“米兰达血案”的罪魁祸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气候。

1971年，马科斯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不是当年8名参议员的选举，而是1973年的总统大选。根据宪法规定，已经连任两届总统的马科斯不能再参加总统竞选了。而当时，在野的自由党有几个竞选总统的强有力的人物，其中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呼声最高。

参议员选举前夕，首都马尼拉的学潮风起云涌。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涂写的标语，围墙上和建筑物上贴满了传单，商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时有爆炸事件发生。当则，代表们在为起草新宪法的修宪大会上，围绕马科斯再次连任下届总统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斗。马科斯则一再扬言，要运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最高权力，保护政府和人民。

8月21日午夜，马科斯总统因“米兰达血案”，宣布中止人身保护令，逮捕了20名嫌疑分子，把他们拘禁在克拉米军营，直到1972年1月11日，马科斯才恢复了人身保护令。

对于这次血案，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马科斯在血案发生的第二天便把爆炸事件归罪于菲律宾共产党。后来又有人说是阿基诺策划的。但是，更多的菲律宾人却相信，“米兰达血案”可能是马科斯本人策划的，其目的是消灭自己的政敌，为自己清除障碍。

马科斯为自己的统治清除障碍的另一举动，就是在总统第二任期内实行军管。根据军事管制法，马科斯夫妇可以控制报界、监禁政敌。军管还为马科斯提供了独断专行的特权，并为其夫人伊梅尔达提供了魔术般的特权。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伊梅尔达进行了50多次国际公费旅游。每一次，她都是“同国家首脑们讨论紧迫的世界问题”，在全球舞台上挥金如土。这种举动引起了菲律宾民众对她的强烈不满。

马科斯在宣布军管的同时，实施了所谓“弓箭手计划”。当时，除了马科斯的一位好友办的一家报纸外，所有的报纸均被查封，置于军管之下。马尼拉市6家主要电视台及9家电台均被关闭，唯独与马科斯有关系的一家电台和一家电视台可以自由经营。成百名反对党领袖被逮捕，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马科斯政敌的贝尼尼奥·阿基诺。阿基诺在被关押1年后，才被军事审判团指控犯有谋杀、非法拥有枪支和颠覆三项罪名，直到1980年5月8日，马科斯才允许释放阿基诺，让他到美国治疗心脏病。

为了使宣布军管这一行动带有正义与合法的色彩，马科斯辩护说，此举是为了阻止菲律宾共产党及新人民军进行颠覆的唯一办法。据说，在军管期间，马科斯政权逮捕关押了数万名政治犯。

有镇压就有反抗，镇压愈甚，反抗愈烈。马科斯的高压政策，是他日后覆灭的直接原因。

## 一对硕鼠

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管开始，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大权，一方面大摆

阔气，任意挥霍，另一方面巧取豪夺，中饱私囊。

1982年，在前往参加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伊梅尔达的随行人员之多，以致造成一架菲律宾727班机中断定期飞行，数百名掏钱买了票的乘客被轰走。陪同第一夫人前往莫斯科、伦敦、罗马以及纽约的一大帮人，一路游山玩水，访亲拜友，挥霍国家钱财无数。在菲律宾国内，政府一手控制的报纸却只报导伊梅尔达如何做出表率，紧缩开支，为国家赢得外交成就，没有人对第一夫人的外交随访人员的规模提出疑问，也没有人敢于过问去莫斯科参加国葬的官方旅行为什么包括到伦敦、罗马以及纽约去逛商店、聚会这样的安排。

有美国的支持，马科斯夫妇可以在国际银行中筹集到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来搞“发展计划”。这笔贷款不仅可以用来资助伊梅尔达实现其阔气的得意计划，而且也要流入她的私人银行帐号。

这些旅行为伊梅尔达提供了一个全球性舞台。她不遗余力地周游列国，挥金如土。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后，马科斯夫妇立即制订了访美计划。这一奢侈的访问预算竟高达3000万美元。

据菲律宾廉政委员会估计，马科斯夫妇在执政20年中聚敛的秘密财富，多达50亿美元。这些巨款大多存在外国银行。

宣布军管后仅一年，伊梅尔达的个人财产便达到了2亿5千万美元，到1975年激增至3亿5千万美元。1975年12月，《世界主义者》月刊上刊登一篇文章，提名伊梅尔达为“世界上十位最富的女人”之一。而在这十位最富的女人中，唯有伊梅尔达来自人均收入每年只有200美元的贫困国家。当时30%的菲律宾人只能勉强维持衣食住行和就医，650万菲律宾人住房破旧不堪，农村600万失学青年找不到工作。

马科斯夫妇逃离马拉卡南宫后，马拉卡南宫20年来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它的名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伊梅尔达已经将一度是非律宾国家元首的庄严宫邸变成了一间怪诞的闺房，里面铺着波斯地毯，镶着法国大镜子，摆着中国花瓶和英国古式家具，挂着歇布桑花毯。

伊梅尔达的卧室是官中最奢华的，铺着红地毯，放着华丽的特大双人床和法国巴罗克头靠，头靠上端有一个巨大的木刻王冠，90码精致的尼龙薄纱从王冠上像瀑布般垂直落下。卧室上写着“王后内室”，内室下有个地下室，里面放着一个真正阿拉廷的神盒，神盒里装着伊梅尔达做第一夫人时的财宝。

马科斯夫妇奢侈豪华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还包括伊梅尔达出逃时丢下的3000双鞋。这些鞋各式各样，都是世界上最名贵的牌子，五颜六色，整齐排列在鞋桌上。此外还有伊梅尔达2千件晚礼服、5百个胸罩、一满箱腰带和腹带，一大瓶一大瓶世界上最名贵的香水，几加仑防皱霜和几箱未启用的手提包。

据菲律宾调查马科斯夫妇财产委员会的调查，马科斯夫妇在国内外拥有4500亩房地产，10亿美元现金，13艘游艇，价值10亿美元的珠宝，31架飞机，268家公司，10家椰子油厂，5000亩土地，23处农场，81辆汽车，143份财产保证书，还有数家电台和电视台。马科斯夫妇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有4幢办公楼，拥有现金和珠宝达7亿美元，在美国其他地方还有多处公寓，价值数亿美元。瑞士当局发现马科斯夫妇在瑞士的大量存款，有许多假户头，存款额高达150亿美元，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马科斯下台时运往

国外的黄金、珠宝价值 200 亿美元，分散在瑞士、奥地利、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么多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据马科斯夫妇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犯山下奉令将其在东南亚掠夺的大量财宝，埋在菲律宾地下。马科斯下令在全国 172 处挖室，后来挖到一尊一米多高肚里填满宝石的如来佛像，重 1 吨，价值 600 亿美元。这事是真是假，只有马科斯夫妇最清楚。

###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马科斯政权的岌岌可危同国内反对派的活动也直接相关。

马科斯对菲南部穆斯林问题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他在执政初期，逮捕了其主要领导人，但其活动一直未停止，力量在不断壮大。1972 年马科斯宣布军管后，他们曾进行武装斗争。穆斯林提出争取独立的口号，并成立了“摩洛”解放阵线。

马科斯政权的失去民心是他对待曾给予他大力支持的洛佩斯的处理上。洛佩斯对马科斯的军法管制不满，并在他主办的《马尼拉新闻》上公开阐述他的见解。虽然他曾经是马科斯 1965、1969 年两次大选中的忠实的伙伴，他的言论仍然惹恼了马科斯。马科斯封闭了洛佩斯的喉舌《马尼拉新闻》，1973 年又以洛佩斯的长子“多次图谋暗杀马科斯”为由将其逮捕，并没收了洛佩斯家族的大量财产。洛佩斯的哥哥埃吉里奥·洛佩斯不得不携眷逃亡美国。

政治是残酷的。而民众的同情心往往倾向于正义一方。这充分体现在他对阿基诺的处理上。这使得他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心，并终于在以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领导的人民抗议中倒

阿基诺是美国颇为赏识的人物，长期被马科斯监禁。作为马科斯的头号政治对手，阿基诺曾在狱中进行了 40 天的绝食斗争，并为此患上了心脏病，后去美国治疗。

阿基诺在美国活动频繁，他在各地发表的政治演说使马科斯夫妇极为恐慌。在“谈判”的掩蔽下，伊梅尔达接受马科斯的派遣，前往美国会见阿基诺。在会谈中，伊梅尔达向阿基诺许愿：“总统已经决定下月解除军法管制。”

马科斯果然在 1981 年 1 月 17 日取消了军法管制。不过，这仅是表面文章而已。作为总统，马科斯仍然保留着不必办理司法手续的逮捕权和发布命令否决国民议会法令的权力。

在马科斯政权出现危机的紧要关头，关于马科斯的健康情况的谣言四起。而就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阿基诺宣布要回到菲律宾，这使马科斯惊恐不安，如临大敌，马科斯又一次派伊梅尔达到纽约会见阿基诺。

伊梅尔达在与阿基诺会见时拿走了阿基诺的护照，因为阿基诺的护照期满了，需要续期。然而，阿基诺却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取回护照。

不久，马科斯恢复了对阿基诺的死刑判决。

1983 年 8 月 5 日，政府官员宣布马科斯因事隐退三周。霎时，马尼拉谣言四起，传说马科斯在这三周期间要动肾脏移植手术，所谓隐退不过是一个幌子。

阿基诺 8 月 13 日从纽约出发回国。当飞机在菲律宾的土地上着陆，阿基诺走出飞机舱门 9 秒钟，人们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阿基诺倒在血泊里。此刻，阿基诺的家人和 2 万名欢迎的人群感到万分悲愤和伤心，到处一片哭泣声。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川流不息来到时代大街阿基诺家中，向死难者致哀，

300 万菲律宾人参加了阿基诺的葬礼。马科斯在电视上否认暗杀与伊梅尔达有关。在 1984 年的议会选举中，马科斯成功地使反对党发生分裂，有一半人支持参加选举，而另一半人则要求抵制选举。然而，日益恶化的经济，更加剧了民众的抗议。1985 年，反对党不断对马拉卡南宫发动攻击。更使马科斯不安的是：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于 1985 年 12 月 3 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马科斯决心在竞选中取胜。所以，当国民自由选举运动这个选举组织的非正式统计显示科拉松领先时，官方的正式统计便很快显示出马科斯在计票中领先。当人们指责马科斯捣鬼、计票的计算机操作人员举行罢工后，四面楚歌的马科斯竟下令停止计票工作，票箱搬到国民议会统计结果。这种结果不用说，当然是马科斯获胜。这一举动使更多的人投身到以科拉松为首的反马科斯的抗议活动中。而在马拉卡南宫内部，马科斯下令逮捕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总参谋长拉莫斯，指控他们共同策划谋杀他和伊梅尔达的阴谋。恩里莱与拉莫斯出逃成功，有 500 名追随者加入了他们的哗变。他们在马尼拉郊外的一个陆军基地阿吉纳尔多兵营设置了路障，号召官兵们加入。在马科斯命令飞行员向倒戈的由安东尼·索特洛上校率领的空军第 15 攻击联队进攻时，飞行员们却迅速掉转机头，挥舞表示和平的白旗，降落在拉莫斯——恩里莱的兵营。1986 年 2 月 25 日上午，科拉松·阿基诺举行仪式，宣誓就任菲律宾共和国第七任总统。几小时后，马科斯在马拉卡南宫也举行了就职典礼。在愤怒的群众想推开马拉卡南宫大门的怒吼声中，伊梅尔达将与她呆到最后一刻的雇员召集起来，递给每人一个装着 10 万比索的工资袋。马尼拉的局势越来越紧迫。马科斯调动军队向兵变部队营地开进。这位濒临绝境的总统在危难关头，要求他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到总统府去保护他，并宣布菲律宾处于紧急状态。群众在通往保安部队司令部的路上组成人墙，以防止政府军的坦克开往那里。反对党宣布了阿基诺夫人为总统，劳雷尔为副总统的新政府成立。2 月 25 日晚，马科斯及其家属和他的一些支持者乘坐美国提供的直升飞机离开总统府，到达美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2 月 26 日早晨，他们乘坐美国飞机离开克拉克空军基地，飞抵美国关岛。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此之前宣布，美国政府欢迎马科斯前往美国，愿意为他及其家属提供“安全庇护”。就这样，统治菲律宾 21 年之久的马科斯被愤怒的菲律宾人民所推翻，最后落得个逃亡国外，命断异邦的可悲下场。

唐桂荣



## 第二编 在权力斗争中马失前蹄

赢得胜利的秘密就是欺骗。

——庇脱·波

镇压遭反抗 偏心惹祸灾

## ——南朝鲜总统朴正熙被部下杀死

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戈兵。

——管子

朴正熙从 1963 年 12 月 17 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到 1979 年，一直坐在“总统”的宝座上。这一阶段，南朝鲜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上，却是万马齐喑的局面。朴正熙用高压手段维持其统治，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反抗的怒火在慢慢燃烧，最后终于爆发，并导致朴正熙统治的垮台。

### 山雨欲来风满楼

朴正熙当上南朝鲜的大总统并不满足，还要当终身大总统。1972 年 10 月 17 日朴正熙发布《紧急戒严令》，解散国会，停止所有政党、社会团体的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对新闻、广播、电视实行军事管制，坦克和装甲车隆隆开进汉城和各大城市，军队占领了公共场所，恐怖气氛笼罩着南朝鲜大地。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修改了宪法，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重新选举朴正熙为总统，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这就是朴正熙宣称的“十月维新”。但人们却叫它“维新政变”。

“维新政变”之后，在野党没有活动余地，再加上朴正熙集团的打击、分化，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无所作为。然而，也有弄潮儿敢于逆风而上，其中最突出的是金大中。不管朴正熙派人利用绑架、威胁、关监狱、软禁，甚至暗杀等手段企图制服他，但他始终不屈服。1979 年 3 月，金大中同尹潽善、咸锡宪等人在汉城和其他地方成立了“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积极开展反朴活动。

与此同时，在野的新民党于 1979 年 5 月选举年富力强的金泳三为总裁，聘请反朴知名人士金大中、尹潽善为党的顾问，整顿领导核心，提出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的政策主张。新民党复苏了，声势大振，向朴正熙进行挑战。

这时，美国的卡特政府出于战略考虑，想改善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调整了某些政策。对此，朴正熙不仅不予配合，反而极力阻挠，顽固地推行其“增强实力”，实现“胜共统一”的既定方针，甚至还要闹点“独立”性。因此，美国感到朴正熙不好驾驭，考虑“换马”，于是美国也卷进了漩涡。1979 年 6 月，卡特趁参加东京七国首脑会议之际访问了汉城，同朴正熙举行一次“摊牌”会谈，要他进行“改革”。但他却寸步不让。会谈只进行了十多分钟，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卡特讲话时，朴正熙左顾右盼；朴正熙讲话时，卡特不理不睬。第二天，卡特到汉城明洞教堂去做礼拜，会见著名的反朴宗教人士，给他们打气。接着，卡特又同金泳三举行了长达 1 小时 20 分钟的密谈。随后，美国报纸进行大肆宣传，卡特会晤金泳三的照片比会见朴正熙的照片大得多。美朴矛盾空前激化。

在野的新民党因此受到鼓舞。金泳三在 7 月 23 日的定期国会上发表长篇演说，要求朴正熙“准备交权”，还在新民党的机关报《民主战线》上将这篇讲话全文刊出。朴正熙大为恼火，以其违反“总统紧急措施”为由，派大批军警袭击新民党总部大楼，没收了《民主战线》印刷原版，逮捕了该报编辑部负责人。第二天，新民党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停止镇压措施”，“立即释放《民主战线》负责人”等，并准备掀起更大的斗争浪潮。两者针

锋相对，短兵相接。南朝鲜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 烈火燃烧起来了

新民党利用人民的反抗，向朴正熙不断发动进攻。

1979年由于受第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南朝鲜各企业纷纷倒闭破产。其中曾名列南朝鲜企业第15位的“YH贸易公司”于4月30日宣布破产，大批工人被抛到街头。该公司的200多名女工开始了反对解雇，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8月9日，示威女工应新民党之邀搬到了该党总部大厦，金咏三几次带领该党的国会议员和党的干部到现场进行鼓动。有了新民党和在野人士的大力支持，女工们斗争得更坚决了，她们采取哀兵政策，打起“肚子饿得实在忍不下去了，给我们饭吃”的横幅标语，头上扎着系有“不复工我们就死”的布带，高呼口号，大唱歌曲，日以继夜进行斗争。8月10日，女工们听到“警察要来抓人”的消息后，立即组成“切腹组”和“跳楼组”，誓死与当局抗争。新民党除向示威女工提供饮食外，还派出100多名青壮年党员在门口守护。

8月11日凌晨两点钟，朴正熙通过他的侍卫长车智澈派遣了1000多名武装警察冲进女工斗争现场。守卫在那里的新民党党员和女工们同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打伤30多名警察。30多名新民党党员和12名闻讯赶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被打伤，一名女工跳楼自杀，其余的女工被绑架到21个警察派出所。金咏三等国会议员被扭送回家。接着，朴正熙发表谈话，表示要“严惩煽动闹事的后台势力”，逮捕了一些人。

然而，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南朝鲜人民，斗争的烈火反而越烧越旺。工人、学生、记者协会、宗教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愤怒谴责朴正熙的法西斯暴行。新民党更是趁机活动，由国会议员和党的最高委员会委员们带头，从8月11日起在总部大厦举行为期18天的静坐示威。当然，朴正熙也寸步不让，加紧了对新民党的迫害。又是让法院无理地停止该党的正副总裁的职务，指定别人“代理”，又是让国会在军警包围下强行通过“惩戒动议”，剥夺该党领导人的国会议员资格。至于对平民百姓，就更肆无忌惮。

朴正熙的倒行逆施和疯狂迫害，并没有把人们吓倒。首先在釜山、马山等地掀起了群众反抗的风暴。

10月16日上午，釜山大学500名学生举行抗议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朴正熙下台。下午，3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了英勇搏斗，受到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当晚，工人、职员、市民们也纷纷加入斗争的行列，游行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用石头、棍棒、燃烧瓶抵抗军警的镇压，袭击了庆尚南道政府大厦、市政厅和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总部，捣毁了市中心的11个警察所、朴正熙政权的御用宣传机构。

消息传到汉城，朴正熙惊慌失措，暴跳如雷，赶忙发布戒严令，调兵遣将前去镇压。然而，群众斗争却越来越高涨，迅速波及到马山、大丘、汉城、清州、晋州、蔚山等大城市。

### 众叛亲离后院失火

朴正熙政权有四大支柱：中央情报部、陆军参谋部、青瓦台（总统府）

秘书室和总统警卫室。这四大支柱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可是，随着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加剧，这四大支柱开始倾斜了。1974年朴正熙曾被人刺杀过，但却幸免于难，只是他的夫人作了替死鬼。自此以后，朴正熙越来越把自己的生命与警卫室连在一起，极力提高它的地位。本来警卫室的任务只是保卫总统的安全，不能干预国家大事，更不能凌驾于其他三根支柱之上。警卫室的头目车智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大老粗，只是因为能使出浑身解数为朴正熙效犬马之劳，因此博得朴正熙的青睐。而他也凭借朴正熙的宠信，要插手政治，搬掉朴正熙委以重任的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青瓦台秘书室秘书长金正濂、陆军参谋长郑升和等“三大金刚”，使自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1978年冬，他向朴正熙进言，把当了8年总统府秘书长的金正濂赶出了青瓦台，换上了有“学者风度”的金桂元。1979年春，经朴正熙同意，车智澈又把空降特种部队从陆军本部夺到自己麾下，并拨出巨款购买最先进的武器。接着又把首都警备部队的指挥权夺到手。这样，郑升和虽为陆军参谋长，但汉城所有的部队却都归车智澈指挥。郑升和倒在车智澈的控制之下。

车智澈最后又向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发起进攻。金载圭是朴正熙的同乡同学，在朴正熙上台和巩固其政权的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朴正熙也委之以重任，实为南朝鲜的第二号人物。金载圭就任中央情报部长后，鉴于中央情报部名声很臭，曾致力于“改革”，博得美国政府和朴正熙集团内“稳健派”的赏识。在卡特访问汉城同朴正熙举行“摊牌性会谈”之后，金载圭知道美国对朴正熙不满，便有恃无恐，开始逐渐抵制朴正熙的内外政策，还向朴正熙直接陈言，引起朴正熙的猜忌和不满。其地位逐渐被车智澈所取代。

釜山、马山风暴发生后，金载圭曾亲自去现场了解情况，回来后向朴正熙报告，并建议改变高压政策，缓和矛盾。朴正熙听后大发雷霆，车智澈在一旁也进行指责。金载圭自然不买账，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离开总统府。

金载圭走后，朴正熙感到金载圭越来越不可靠，得赶快撤换，还得改组内阁。可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交给谁办呢？他把原先的四大金刚掂量了一下：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同金载圭要好，不可靠；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按道理说应该办理此事，可他对自己也不那么忠心，也得排除……掂量来掂量去，感到只有自己的随身保镖车智澈才和自己一条心，所以就授权给他起草改组内阁的计划。车智澈对主子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在拟定的方案里，金载圭、金桂元都“名落孙山”，国防部长卢载铉也被排除，郑升和被调往他职……

朴正熙要改组内阁的消息和方案被金桂元知道了。他感到形势危急，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金载圭，希望这个尚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能够发挥作用，扭转局势。金载圭知道这件事之后，感到自己同车智澈、朴正熙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金载圭深知朴正熙、车智澈的为人，他明白，除了置对方于死地而外，没有其他选择。他又想到美国“换马”的暗示，认为自己肯定会得到支持，于是更坚定了干掉朴正熙、车智澈的决心。

决心既下，金载圭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首先，他利用车智澈处处与中央情报部作对、排挤他们的事实，煽动他们的不满，把他们鼓动起来与车智澈作对。然后又用重金收买了陆军参谋长、前线司令、空降特种兵作战司令等人，通过他们制造反对朴正熙的舆论，以便到时候顺利调兵遣将。

刺杀朴正熙的计划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 宫井洞火并

1979年10月26日这一天，朴正熙很忙，但过得很不顺利。上午，他到忠清南道唐津郡出席插桥湖建成典礼，为插桥湖纪念塔揭幕。朴正熙面带笑容走上前去揭幕，可不知为什么，纪念塔上的罩布仅仅揭了一半，再也揭不开了。朴正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匆匆和众人告别，登上直升机飞往道高温泉观光宾馆，打算在那里吃午饭。可是，当朴正熙乘坐的直升机在宾馆的前院降落时，宾馆里养的一只獐子听到机器声，被吓得奔跑起来，一下子撞到树上，死了。朴正熙又感到不快。朴正熙吃完饭要离开的时候，直升机又出了故障，耽误了时间，但终于在十三点三十分回到总统府。

朴正熙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到中央情报部的秘密地点宫井洞去吃喝玩乐，以消除疲劳。这次也不例外。16点30分，车智澈打电话给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告诉他朴正熙晚上要在宫井洞餐厅与他“共进晚餐”，让他准备。金载圭放下电话听筒，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好，我准备！”他先是邀请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到宫井洞办公室“共进晚餐”；然后又打电话给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金正燮说：“今晚我原约定和郑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共进晚餐，可是由于总统阁下光临，我不能相陪。劳驾你代我相陪，待总统阁下离去后，我立即前去相陪。”16时30分金载圭来到宫井洞，到二楼办公室取出手枪，压上子弹，然后把它藏到书架后面。

下午6点刚过，朴正熙和车智澈以及5个警卫分乘两辆汽车来到宫井洞。金载圭和先前来到的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出门迎接。

朴正熙、车智澈和金载圭、金桂元入座后，美酒佳肴陆续摆上桌，还有两个美貌的艺伎相陪。餐厅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酒过数巡，气氛“热烈”起来。他们边吃边谈，话题自然转到最近的国内局势，谈到釜山、马山等地的学生运动。此时，车智澈以尖刻的语言数落金载圭的一连串“过失”，指责他办事不力，还说由于金载圭的过失导致了政治危机。金载圭强压怒火，忍着性子听着，以为朴正熙会出面制止。但朴正熙一言不发，反而不时点头称是。金载圭见此情形，再也不愿忍耐了，便出言反驳，朴正熙也不制止。两人便吵起来，愈吵愈厉害。这时，一直板着脸的朴正熙突然质问金载圭：“釜山局势的发展，难道不是因为中央情报部的情报不灵吗？”过去朴正熙也责备过他，但并不像今天这样直接，何况还当着两个女人的面，更使他觉得屈辱。金载圭只好阴沉着脸听着，极力克制自己。过一会儿，金载圭离开座席，来到厕所观察动静，5分钟后回到餐厅。金载圭刚一坐下，车智澈又说：“釜山地区颁布戒严令，不也是因为你们情报部无能吗？”车智澈在军中本是晚辈，却一再追究、质问其长辈金载圭。金载圭哪里受得了？怒火在胸中燃烧，但此时，只好强行压下。金载圭借故第二次离开餐厅。他先到办公室见到正在那里吃饭的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和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金正燮，表示歉意，让他们等他。然后召见了他的两个助手：中央情报部礼宾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行秘书朴兴柱。在僻静地方向他们布置任务，挑选三名精明强干的人支援他。要把朴正熙、车智澈一起干掉。二人领命找人准备去了。金载圭返回餐厅。席上气氛虽已缓和，但他心中的怒火并未熄灭。过了半个小时，餐厅厨房长南寿同端着盛满酒肴的盘子走出厨房。这时，朴善浩走近他说要见金载圭，请他给转达一下。南寿同进餐厅放好酒肴后，对金载圭说：

“朴处长要见您。”于是，金载圭第三次离开餐厅，来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朴善浩跟了进来，看了看四周，低声说：“都准备好了。”金载圭满意地点头，说：“听我的第一声枪响，就干！”说完，二人分头走了。金载圭快步走到二楼他的办公室，从书架后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插进右腰，用外衣盖好。然后下楼走向餐厅。

金载圭坐稳后，忽然向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呀！”接着又指着车智澈以不屑的口吻说：“您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好吗？”说着，立即掏出手枪向车智澈打了一枪。

由于金载圭是坐着打的这一枪，没来得及瞄准，子弹只穿透了车智澈的右手腕。车智澈翻身一滚，趁金载圭向朴正熙开枪之机，逃到室内厕所里躲起来。坐在首席的朴正熙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金载圭就向他开了一枪。子弹贯胸而出。他向左倾斜，倒在艺伎的膝上。鲜血向外流淌。两个艺伎赶忙去扶他，问：“阁下，怎么样？”朴正熙闭着眼，忍痛说：“没关系。”说完身子瘫软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了。这个在南朝鲜曾不可一世的“大总统”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车智澈和5个警卫最后也被打死了。但是，由于情况的变化，金载圭夺取政权的计划没能实现。政权落到了另一股势力全斗焕的手中。金载圭等人反而因此被处死了。

吴锡山

政坛菩萨梦难圆



## ——苏加诺被一步步赶出总统府

运气就像一个球那样圆圆的，所以很自然地，它并非总是滚落在最善良、最高贵的人的头上。

——贝多芬苏加诺总统是印尼共和国独立宣言的宣告者，印尼的建国元勋，印尼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1963年5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一致决定苏加诺为印尼“终身总统”。但他喜欢自称为“印尼人民的喉舌”。青年时代他关心国内外政治，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积极献身于印尼独立的民族运动。1929年以来，他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逮捕、入狱、流放十几年之久。苏加诺在同荷兰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军的斗争中，表现了伟大的民族英雄应有的气质。他无私的献身精神使印尼民族最终成为独立的民族。但这位智慧过人、魅力超群的总统在1965年“九·三”事件后，为了坚持自己“纳沙贡”体制的政治理想，却日渐失去手中的权力，最终离开了总统宝座。

### 苏加诺总统卷入“九·三”事件了吗？

1965年9月30日在印尼发生的“九·三”运动事件迄今已过1/4世纪了。印尼国内外关心“九·三”运动的有关人士在这20多年来，不断地试图调查、分析、研究和评论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1978年印尼官方出版的《白皮书》的结论指出，印尼共产党是“九·三”事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彼德·戴尔·斯科特教授的结论称“九·三”运动是苏哈托发动的政变。安多尼·达克博士在其《红色雄牛的精神》一书中，认为苏加诺总统是“九·三”运动的幕后操纵者。其理由是当时苏加诺对一些陆军高级军官反对他的革命纲领的作法使他很不耐烦，后来他暗示翁东中校收拾他们。印尼共主席艾地刚从中国回国，是在1965年8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后知道这一计划的。这就导致印尼共的卷入。对印尼共来说，当时没有其他选择了。因此，翁东中校的行动事前得到苏加诺总统的同意。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纯属猜测，毫无根据。因为“九·三”事件发生后，苏加诺总统毫无准备。10月1日，总统到处奔波寻找安身之地。他以为这是“陆军内部闹事”。事后，他才知道是他的卫队翁东中校搞的。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件会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什么影响，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事件会使他垮台。

翁东中校发动“九·三”运动的标志是绑架并杀害了以陆军司令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并占领了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宣告他已粉碎企图推翻苏加诺总统的陆军“将领委员会”的阴谋，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此证明“九·三”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安全。

苏哈托将军矢口否认所谓的“将领委员会”的存在。他说，根本没有什么“将领委员会”，因此更谈不上存在“将领委员会”推翻苏加诺总统的阴谋问题。但苏加诺总统的日本妻子黛维在谈到有关“将领委员会”的问题时，她却肯定“将领委员会”的存在。1965年8月初，苏加诺总统在一次工作会

---

“纳沙贡”（NASAKOM），是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和共产主义者的缩写。

议上身子曾摇晃一下。这可能是由于他过度劳累，但也可能是他的高血压、肾结石等毛病引起的。但大家暗地里认为，总统“身子摇晃一下”这一现象反映总统健康的不祥之兆。因此，总统的健康问题一时便在高层军政人士中传开，并引起各种猜测。对总统可能出现的万一，各方都在采取应急的准备措施。当时陆军和印尼共的对立虽还没有公开化，但双方心里都有数，且已剑拔弩张。因此，陆军“将领委员会”的将军便商定在10月5日建军节之前发动军事政变。当时印尼共也在赶建“第五军”，即准备把其下属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并正在积极训练。因此，如不先动手，怕会坐失良机。因为建军节那天，首都会聚集庞大的军队和武器，政变的计划不易被察觉，可以万无一失。但万万没想到，将领们的这一政变计划会被翁东所识破，他便来了个先发制人的“九·三运动”。

9月30日晚，正当翁东等人准备发动“九·三运动”时，苏加诺总统正在塞纳延体育场向印尼技术人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苏加诺总统去印尼饭店接黛维夫人回到黛维的住家——八曾男宫。第二天一早，苏加诺总统在赶回独立宫途中，发现独立宫周围已集结来历不明的军队，他便改道去他的另一个妻子哈尔雅蒂家避一避。后经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的劝告才决定前往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当时是“九·三运动”的指挥部。苏加诺总统抵达基地时，印尼共主席艾地也已在那里。这一巧合对苏加诺的处境极为不利。因为这给人们的印象是总统同印尼共和“九·三运动”有关系，要不为什么事件发生后，他不回独立宫或去别的地方，而却偏要跑到“九·三运动”的指挥部去呢？这个问题，当时苏加诺总统是难以向人民说清楚的。

10月6日，总统召集内阁会议。当时印尼共的第二、三把手鲁克曼和约多在场。会议听取苏哈托将军汇报有关平息“九·三”事件的情况和他对“九·三运动”的看法。印尼共约多当时否认印尼共同这一流产的政变有关。当时，总统指着约多的鼻子说，“约多，你真愚蠢，发动受人谴责的事件。这个事件败坏了印尼共的名声。这是非常幼稚的行动”。

“九·三”事件时隔9个月后，1966年6月在召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大会上，苏哈托将军在谈到有关指控苏加诺总统涉嫌“九·三”事件时，指责总统对“九·三”事件采取错误的态度。苏哈托将军抨击总统不仅不惩办“九·三”的主谋——印尼共产党，反而间接帮助“九·三运动”和印尼共，并保护“九·三运动”和印尼共的头头。苏加诺总统也在会上谈了他对“九·三”事件的认识，但大会对他的发言不满意。因此，大会责成他就有关“九·三”事件发生的原因作补充交待。1967年1月，总统向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了书面的补充交待。总统说，“九·三”事件的发生出乎他的意料。他谴责“九·三运动”分子屠杀将领们的罪行。他认为，企图进行政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印尼共领导人内部的思想混乱造成的。印尼军方经过一年多来对有关人士的反复审讯，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加诺同“九·三”事件有牵连。

### 骑虎难下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一向头脑机灵，对任何事情反应敏捷的苏加诺总统，这次对“九·三”事件的反应怎么如此迟钝呢？现在看来，不是苏加

诺头脑变得麻木或迟钝，而是他心中有难言之苦。因为人们当时想要听到的是，苏加诺总统对“九·三 运动”和印尼共的谴责。但从他的亲身经历中，认为印尼共并不像陆军和一些反共群众组织所说的那么坏。印尼共支持他，支持他所倡导的“纳沙贡”体制。印尼共从没有要推翻他的企图。而且他同印尼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九·三 ”事件前，印尼共和陆军是左右两大势力。它们一边宣称效忠于总统，彼此之间一边不断发生摩擦，争夺主导权。苏加诺总统同印尼共及其领导人的关系是不错的。1959年，他在印尼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曾说过：“是亲戚是朋友，如果你们牺牲，我自己将受到损失。”苏加诺总统仍然坚持“印尼共是印尼独立的支柱”的观点。他利用印尼共的力量来抗衡陆军的力量。印尼共也借助苏加诺总统之力扩大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因此，苏加诺总统坚持这一原则，即只要他获得印尼共的拥护和支持，他是不会干扰印尼共的。苏加诺总统对印尼共是比较放心的。相反，他却怀疑陆军的忠诚，他对陆军确实不怎么信任。他曾说过，“在陆军中，我可以信任的只有25%，其余75%我不信任。”

苏加诺总统认为，印尼共发动“九·三 运动”是应受谴责的行动，对他们杀害将领们的行动应依法惩办。但他不同意陆军和一些政党和反共群众组织对“九·三 ”事件的那种带有情绪的反应，即要对印尼共进行报复。总统说，“在印尼共产党人中确实存在没有本事的人，可空军和陆军同样不也有没有本事而干蠢事的人吗？为什么几名将领被杀害，就吵个不停，可当有人要暗杀我，向我扔手榴弹我却没有任何采取什么报复的措施”。总统认为，发生这种“九·三 ”事件在革命道路上是常有的事，它只不过像“大海中的一个小浪花”。苏加诺总统不同意解散印尼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解散了印尼共就意味着否定他自己倡导的“纳沙贡”体制。否定“纳沙贡”也就意味着否定他的政治理想和否定自己。因为早在1926年，苏加诺就已主张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义和共产主义这三者作为立国之本。1956年他曾向苏哈托表示，要把共产主义纳入印尼的“潘查希拉”。苏加诺在1926年就自称自己不仅是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而且还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当时要总统作出解散印尼共的决定，这真是太难为他了。因为这犹如要他的生命一样。虽然在形势的压力下，他曾言不由衷地谴责印尼共，但他心里压根儿是反对苏哈托以总统名义解散印尼共的决定的。

苏哈托将军在镇压“九·三 运动”和印尼共的同时，也要把印尼共搞臭。当时要求解散印尼共，取缔印尼共的呼声很高，到处都在追捕和屠杀印尼共人员。至于牺牲者究竟有多少，是几万或上百万人至今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苏加诺总统没有及时强烈谴责“九·三 运动”，又不同意解散印尼共，而且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他又阻止支持他的军队向苏哈托的部队进行反击，仍然幻想通过政治协商的途径解决问题，这就使他越来越陷入困难的处境，最后导致他不得不被迫放弃手中的大权。

## 苏加诺的权威受到挑战

---

潘查希拉（PANCASILA），是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即信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权利、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

陆军6名将领被“九·三运动”分子杀害的消息传开后，进一步激化了社会政治矛盾，各种反共组织也纷纷成立，并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共游行，捣毁印尼共在雅加达的总部。反共活动很快蔓延到其他省市。一些疯狂的反共分子同军人一起大肆追捕、屠杀印尼共成员及其同情者。整个印尼笼罩着白色恐怖。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苏加诺总统。他们高喊“苏加诺辞职！”“审判苏加诺！”等口号，并提出所谓“人民的三项要求”，即解散印尼共，改组内阁和降低物价。

在群众运动的强烈要求下，1966年2月苏加诺总统改组内阁。一些人希望通过改组内阁把印尼共及其同情者从内阁中清除出去。但苏加诺在任命苏哈托将军为内阁部长、陆军司令和最高参谋长的同时，却免去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纳苏蒂安将军的国防部长职务，而且不少旧面孔仍占据内阁职务。苏加诺总统本想通过改组内阁，提拔苏哈托（苏加诺当时认为苏哈托还忠于他），稳住大部分内阁成员，清除经常同他对着干的纳苏蒂安将军，以有利于加强他对内阁的控制。但没有想到，他是在引火烧身。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便冲进独立宫。当时值勤的警卫人员被迫开枪，打死了一名学生，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事件把反共反苏加诺的狂热进一步推向高潮。

苏加诺总统指责反共集会和游行示威，说这些行动已经无法无天了，“没有规矩”，“太过分”，“野蛮”。总统曾下令负责恢复社会治安和秩序的苏哈托将军对青年学生的过头行动采取措施。但苏哈托却无动于衷，稳坐钓鱼台，仍持观望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怂恿群众反对苏加诺的行动。苏加诺总统当时还是印尼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但却已开始指挥不动他手下的这位将军了。

苏哈托将军在全国镇压印尼共产党人，得到社会上和军队中一些人的支持，势力进一步扩大，而苏加诺总统的威望和权力则被大大削弱。当时总统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他指挥不动周围的人，因为他们尽是苏哈托将军的亲信。但总统还过于相信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相信广大人民还支持他。因此，不论在国庆节或在其他的纪念日，只要有机会他便要像过去一样，以领袖身份发号施令，并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说。希图利用他的威望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在庆祝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会上，苏加诺竟说要学习穆罕默德的忍耐和反抗精神。说穆罕默德虽曾被责骂，被诽谤，可他能忍耐。但最后穆罕默德却采取行动，进行反击。他的这一讲话实际上在鼓动他的支持者继续同反苏加诺对着干。但同时，为了防止流血，为了防止军队之间相互残杀，他又劝说和阻止军队中仍忠于他和支持他的官兵对苏哈托的部队和反苏加诺的群众组织进行反击。但是，苏哈托认为，苏加诺这种煽风点火，充满火药味的讲话会使当时尖锐的政治冲突更加白热化。它激发支持苏加诺的群众组织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激起反苏加诺群众的不满和愤慨。他的这一行动，加速了苏哈托将军等陆军高级军官的夺权计划。

## 劝退

随着支持和反对苏加诺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的日益加剧，使印尼出现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这就迫使苏哈托将军加速其夺权计划。因为军、政界的高层人物认为，只有苏加诺总统将权力移交给当时的陆军司令苏哈托将军才能恢复和整顿混乱的政局，使局势能趋向稳定。

在夺权的问题上，苏哈托将军不同意他的战友们所提出的采取军事政变或武力夺权的激烈手段。苏哈托认为，通过军事政变夺权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会留下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在印尼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他主张采取软硬兼施，以软为主的协商办法迫使苏加诺总统“主动”交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哈托动员了苏加诺的家属、亲信做苏加诺的工作；同时利用反共和反苏加诺的群众运动和派遣一些苏哈托的得力干将对苏加诺施加压力，促他交权。

1966年底的一天，苏哈托将军的亲信穆罕默德·尤素福准将约请苏加诺的日本妻子黛维单独见面。尤素福是秉承苏哈托之命找黛维夫人，请她做苏加诺总统的工作的。尤素福见到黛维夫人时，首先表明自己是因忧国之情和为了维护苏加诺总统的声誉才找她谈的。然后便直截了当提出请黛维做总统的工作，让总统交权，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苏加诺总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二是苏加诺作为终身总统和国父的地位永远受到尊重；三是保障总统和总统家属的安全。当时黛维夫人答应协助苏哈托做总统的工作。此后，黛维夫人每当见到苏加诺总统就苦口婆心地做总统的工作。黛维夫人谈了她对当时不利于总统的政治形势的看法。她劝总统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伟大的英雄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紧要关头能果敢善断。由于总统的自信，没有轻易听信黛维夫人的话。但他领会了黛维夫人的心意。

1966年3月初，苏哈托将军委任苏加诺的好友哈希姆·宁为苏加诺总统同苏哈托将军之间的联系人，任务非常明确，即做总统的工作，让他交权。第二天，宁便同另一位苏加诺的好友达沙德起程前往茂物宫。当时未经苏哈托许可任何人已不得随意会见苏加诺。一到茂物宫大门，警卫人员便问他们是否持苏哈托将军签署的通行证。

宁和达沙德走进茂物宫大院后，便直奔苏加诺的住处。当时苏加诺看到他们深感意外，并询问他们如何进来的。达沙德骗总统说，“门岗的警卫是我的侄子，他知道我同总统是好朋友，所以就放我们进来”。他们不告诉总统有关他们持有苏哈托的通行证一事。总统问起雅加达的形势。他们把青年学生仍继续在游行示威的情况告诉总统。但没有透露他们的来意。他们这次会见总统特别谨慎。谈话中见机行事。当总统请他们喝咖啡之后，他们就开始打开话匣子了。宁说，总统还很幸运仍有一个忠诚的将军，他还可以使国家从印尼共的威胁中脱险。

苏加诺总统听了这番话之后默不作声，不回答也不评论。他们向总统深入地谈了当时的形势之后，就向总统提出建议，希望总统能把权力暂时移交给苏哈托将军。他们解释说如果不给苏哈托权力，他就难于采取措施。他们还向总统撒谎说，他们曾会见苏哈托将军，说苏哈托将军非常爱戴总统。苏加诺总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来意。谈话气氛变得有些紧张，但仍未看出总统想交权的迹象。因此，宁使用较激烈的口气劝说总统，说希望总统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并告诉总统他当时的处境已非常危险。但如果总统能听劝的话，苏哈托将军还可以说服人民群众，这样总统也可以脱险。宁说，“您还不愿面对事实，您所热爱的将军们都已被印尼共杀害。难道您还能保持沉默吗？”苏加诺听了这些话后，极为恼火。这时，真没想到总统突然把桌上的烟灰缸朝宁的脸上扔去，亏得宁反应快，他接过那烟灰缸，使他的脸上才免遭灾难。此时，大家都静下来，鸦雀无声。不一会儿，他们又继续同总统的对话。经过反复地协商、讨论，考虑利弊后，那天

晚 11 时，总统才松口，表示原则接受宁的建议。当晚，宁和达沙德连夜赶回雅加达向苏哈托将军报告他们同总统的谈话结果。

## 被迫交权

3 月 11 日上午，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召开内阁会议。苏哈托将军称病缺席。会议正进行中，总统得知独立宫被来历不明的军队包围后，他便同苏班德里约和盖鲁·萨勒两位副总理借故匆匆离开会场，乘直升飞机飞往茂物宫。这些包围独立宫“来历不明”的部队是否是苏哈托将军所派，用以对总统施加压力，这个问题至今仍是谜。会后，当时参加会议的退伍军人部长巴斯基·拉赫马德少将、轻工业部长尤素福准将和雅加达军区司令阿米尔·马赫姆德将军即向苏哈托汇报。苏哈托将军便乘热打铁，决定派他们三人马上去茂物会见总统，施加压力，促使总统交权。他们在会见总统时建议，希望总统能以书面的形式把部分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以便有助于苏哈托将军实现稳定政局的努力。当时在场的苏班德里约和盖鲁·萨勒副总理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在进一步讨论、协商中，苏加诺总统最终妥协，同意给苏哈托《命令书》。因为在前一天，总统在其好友的劝说下，实际上已原则同意交权。这一《命令书》又称《3 月 11 日命令书》，其内容主要是准许苏哈托将军以总统的名义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措施，以维持社会治安和稳定政局；保证政府的正常工作，以及确保苏加诺总统的安全和威望等内容。

苏加诺总统自 3 月 11 日签署这份《命令书》之后，他所戴着的各种头衔虽一个不动，但实际上已成了有名无实的桂冠而已。自那以后，苏加诺总统实际上已失去手中的权力。“九·三”事件发生后不久，苏加诺总统在人民心目中仍享有不容怀疑的极高威望，空军、海军和大部分陆军官兵仍听他的指挥。当时只要他采取适当的措施，不阻止支持他的军队向苏哈托的部队抵抗和反击，并对反对苏加诺的群众组织采取行动，苏哈托将军不致于会那样得寸进尺地要他交权。苏加诺总统当时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避免两军对战造成流血。而且他过于自信，认为其威望还在，一切矛盾和冲突通过政治协商可以解决。但他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还幻想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以及他的影响可以重新控制局势，挽回动乱的局面。从而他对苏哈托将军失去应有的警惕，结果失去了手中的一切权力。

这位具有菩萨心肠的总统，心地善良，他对别人总往好的方面想。总统在面对家属、亲友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尤其是苏哈托等陆军高级将领的压力，他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只好让权。当时由于日夜工作，使他的身体日益虚弱，高血压、肾脏病经常发作，他有点儿顶不住了。这可能也是他被迫交权的因素之一。他确实对出现的问题招架不住了。他在同苏哈托将军单独谈话中，曾发出无可奈何的乞求声：“你打算把我怎样？”苏加诺总统过去那种气壮山河充满活力的英雄气概，以及魅力超群的领袖风度却已无影无踪了。

苏哈托将军获得苏加诺总统的《命令书》后的第二天，他便迫不及待作出“解散印尼共”的决定。同年 6 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撤销赋予苏加诺的“终身总统”和“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头衔，并责成苏加诺总统进一步交待他在“九·三”事件前后的行动，作出书面检查。在这期间，反共的群众组织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苏加诺辞职。

1967年3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一致推选苏哈托将军为印尼代总统。这样很自然地免去苏加诺的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苏加诺是在茂物宫接到解除他的一切职务的消息的。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坐着发愣，久久地一言不发。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我已尽力将我的一切献身给祖国和印尼民族了”。苏加诺感到遗憾的是，他所领导的国家经济上还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生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他就被迫下台了。

苏加诺总统下台后，有关当局立即对他实行“政治隔离”，并将依法对他作进一步的审查。

苏加诺是印尼的建国英雄和国父，印尼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但他毕竟不是军人，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但他没有打过仗。缺乏对枪杆子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苏哈托将军获得陆军司令这一武装部队中的实权后，便不断地对苏加诺总统施压，迫使交出政权，从终身总统、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和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地位，一下就成了可怜的阶下囚。

苏加诺总统的下台，苏哈托的上台，标志着苏加诺时代的结束，苏哈托时代的开始。

苏加诺度过了三年被隔离的寂寞和孤独的生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同病魔作了极其痛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在1970年6月21日与世长辞！数十万人民以悲痛的心情参加他的葬礼。这反映人民对苏加诺深厚的感情。这充分表明印尼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苏加诺，不会忘记这位“印尼人民的喉舌”的丰功伟绩，不会忘记他对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克之

宦海巨浪打翻了总理宝座



## ——差猜在军政冲突中失去权杖

政权是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均势中保持稳定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政局的动荡甚至政权的更迭就成为不可避免。

——丁之

泰国是世界上发生政变最多的国家之一。自从 1932 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的 59 年时间里，泰国一共发生了 22 次政变，其中 11 次政变成功。成功率为 50%。平均每二年半发生一次政变。政变对于泰国人来说则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泰国政变大多数不流血，人称“温和的政变”。倘若政变失败，一般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政变首领多数逃往国外，待人们“淡忘”后再重返家园。政变失败的首领有的甚至还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泰国多次政变的时间都选择在周末，据说这是因为周末人们往往麻痹大意，政变的把握较大。同时在时间上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便让国民在新星期的第一天一早起来便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开始“新的生活”。

泰国军方这次在 1991 年 2 月 23 日发动的政变也不例外，也发生在星期六，同样不流一滴血，不费一枪一弹，就推翻了差猜政府。差猜·春哈旺是泰国 1932 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第 17 位总理。1988 年 7 月经大选上台以来，他励精图治，奋力开拓，泰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居世界前列，被喻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匹“黑马”。

正当差猜策马扬鞭，使泰国经济更上一层楼时，却在军方与政府矛盾和官场腐败面前“英雄气短”，沦为军方的“阶下囚”。获释后被迫出走异国他乡，差猜政府的沉沦，为世人所瞩目。

### 协调各方关系保持政权稳定

差猜上台后，泰国舆论界不少人预言，差猜政府的寿命短财 3 个月，长则半年，其理由很充分：第一，泰国自 1932 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军人实行独裁统治。虽然近年来，随着泰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军人逐渐放弃独裁统治，但仍可间接地控制政权。政党居从属地位，人称“半截子民主制度”。深受西方民主影响的差猜经大选上台后，他的政府无疑将反对军人介入政治，把泰国推向“完全民主”的道路上去。而军队不少军官则认为，像泰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情同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尚未具备“完全民主”的条件。军人与文官的结合，才是泰国政权的最佳形式。这样，军政矛盾不可避免。一旦军政矛盾激化，那就意味着差猜政府的危机。根据泰国历史经验，1932 年以来，任何一届政府如失去军队的支持就无法生存下去。第二，1973 年，泰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10·14”民主运动，推翻了他依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此后，泰国出现了许多政党，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在议会中占有压倒多数席位的大党。因此，哪个政党都不能单独组阁。所以差猜政府只能是多党联合政府。6 个执政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将导致政府的危机。

总而言之，差猜面临着来自军方的外部威胁和各执政党之间难于协调的利害冲突。

但事实出乎预料。差猜执政二年六个月，并未垮台。他所领导的文官政府是泰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文官政府之一。

是什么灵丹妙药能使差猜执政那么久？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差猜统治方法得当和外部有利因素使然。

差猜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其一，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让参政党包干政府各部。如泰国党掌管内政、国防和财政部；社会行动党负责外交、交通、商业部；民主党掌管农业、卫生、科技能源等部。使各党都有利可图。此外，差猜特别注意协调好政府同军方的关系。如他身兼国防部长，但他不干预军队内部事务，并将总理秘书长这一重要职务委任陆军副参谋长班那担任，以沟通军政之间的渠道。当陆军司令差瓦立辞去军职时，差猜力排众议，甚至在他姐夫、内政部长巴曼的反对下，接纳未经选举的差瓦立入阁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差猜这种做法一定程度地缓和了政府同军方的矛盾。其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一改前届政府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大刀阔斧地吸引外资，如把全国划分为三类投资地区，凡到曼谷以外地区投资的项目给予更多的奖励；采取灵活政策，允许私商更多地参与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将一批国营企业“私有化”；允许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主权等等。这些措施的执行大大地刺激了泰国经济的增长。从1988年差猜上台以来到1990年，泰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1.5%，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有了赢余，给公务员普调工资，这是多年来未有的事情。此外，泰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是差猜政府得以维持的外部因素。近年来，泰国民主运动大势所趋，政变越来越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军队中不少高级军官也受民主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政变的成功率下降，如1981年4月和1985年9月两次政变都以失败而告终，两次政变的首领讪·集巴滴玛和马努·路卡宗分别逃亡缅甸和西德。此后，军队持谨慎态度，不敢贸然行事，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忍耐力。

尽管差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做了一些取悦于军方的事，但军政之间的裂痕并没有因此而弥合，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地扩大，这里面有着深刻的背景。

泰国在1980年炳政府执政以后，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对军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早已不满，但炳总理本人是前陆军司令，炳当总理使军队得益较多，而差猜则不同，他离开军界已30多年，与军队关系不深，他又是反对军人介入政治的泰国党主席，不可能事事按军方的意志行事。另外，差猜上台后，正是泰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泰国政党也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政党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参政的愿望很高，他们大多反对军人干预政治。因此，军政矛盾不断加深。

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自诩是“乐天派”的差猜总理显得十分自信。“没有问题”是他一句口头禅。他每次答记者问时，似乎什么事都“没有问题”。如记者问他的政府能否维持四年届满，差猜还是那句话：“没有问题。”所以人们嘲讽差猜政府是“没有问题的政府”。但人们心里明白，开口闭口“没有问题”的差猜总理是在给他的政府官员吃定心丸。其实，政府问题成堆。一系列的问题使差猜一步步陷入困境。

### 腐败和军政矛盾使差猜危若朝露

差猜上台后，一直注意尽力避免军政矛盾和政治腐败问题，但要解决长期危害泰国社会的沉痾宿疾，谈何容易。随着时间的延续，旧病复发，腐败

和军政矛盾开始危及差猜，并很快使他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有几件事对差猜政权至关重要。

“素坤攀事件”。1989年8月，当时军方首领差瓦立攻击政府腐败。差猜总理的顾问素坤攀反唇相讥，让差瓦立“先自扫门前雪”。后因1000多名军官联合支持差瓦立，差猜被迫接受素的“辞职”。这一事件标志着军政矛盾公开化。

“西提事件”。差猜上台后提出“变印支战场为市场”的口号。差猜认为：“国际形势已经缓和，外交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合作上来。”不久，他又提出建立以泰铢为中心的中南半岛经济圈的宏大计划。这个圈包含印支三国、缅甸和东盟六国。差猜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在内阁中引起争论，以外交部长西提为首的一些阁员认为差猜提出的“变战场为市场”政策为时过早，越南对泰国仍构成危险。因此，外交部对差猜的这一政策常“变通”执行。外交部的这一做法得到军方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差猜为此甚为不满，他决定：凡在外交上与西提外长主张不合的重要决策由他的顾问班子组织实施。这样，外交部被架空，使泰国外交史上出现“二架马车”的局面。

1990年8月27日，差猜改组内阁，将外长西提及他的助手巴帕副外长一起排除掉，以“听话”的素宾外长取而代之。差猜这些做法未同军方首脑协调，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西提等人被排除后，陆军司令素金达公开为他们设宴“压惊”，并发表讲话说，他已收到成千上万封对政府不信任的人民来信，军队将随时按人民的要求行事。暗示军队随时可能发动政变。“西提”事件使差猜与军方首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马努事件”。马努是泰国军队中少壮派的领袖，在军队中很有影响，他曾参与和策划1981年4月和1985年9月两次未遂政变。在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后，得到差猜的重用。差猜让他在国防部任职，并把他从上校衔提升为少将衔。差猜这一做法使与马努不合的军方首领十分恼火。军方提出重新审理马努等人企图谋害当时的炳总理等高层领导人案件。在审理案件中，传出差猜的独生子盖萨与上述阴谋有牵连。差猜认为，这是用诋毁他家族名誉的手段来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差猜决定向全国直播审判情况，但遭到军方的抵制未能实现。这一事件使差猜与军方矛盾严重恶化。

“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差猜政府执政时间日长，政府内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如原内务部副部长讷滴被警方查出接受两家石油公司100万铢（约合4万美元）的贿赂。商业部副部长批准进口电子赌马机作赌具被警方查获。差猜经济顾问、参议员吉滴开办的一家公司在森林保护区砍伐林木，非法侵占林地，警方拘捕了该公司100多名工人，差猜被迫撤去他的顾问职。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在发放伐木许可证、管理国家开发项目、土地管理、选举议员等问题上有不同程度的营私舞弊现象。引起各方面的不满。舆论界称差猜政府是“自助餐”政府。为此，差猜四次调整内阁，但仍无法杜绝腐败现象。

“差林事件”。差猜政府总理府部长、群众党主席差林对陆军司令差瓦立提前辞去军职，未经大选入阁当副总理表示不满，差瓦立反过来攻击差林所管辖的部门有贪污问题。差林针锋相对，说差瓦立夫人利用丈夫的地位大做生意，是个“会走动的珠宝箱”。差猜对这两个人之间的攻击战保持“中立”。差瓦立一怒之下辞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军方指责差猜“偏袒差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0年6月22日，军队在最高统帅部前扣压差

林控制的无线电通讯车，军方声称这部车在窃听军方的情报。为此，差林发表电视讲话，指名道姓地指责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顺通上将。为此，军方强烈要求差猜把差林逐出内阁。

差猜对军方的要求感到左右为难。如按军方的要求去做，将严重损害他“民主政府”和“民选总理”的形象。如不按军方的要求做，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面临垮台的危险。

差猜为了缓和矛盾，口头答应调整内阁，把差林排挤出内阁。但在1990年11月22日调整内阁时，他铤而走险，采取折中办法，只把差林降职为教育部副部长。并未按军方的要求把差林赶出内阁。然后静观军方的反应。

差猜担心的事终于出现：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顺通公开指责差猜说话不算数，并采取行动。军队高级将领集体拒绝出席差猜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为解决矛盾，差猜去找陆军司令素金达，准备解释他不开除差林的原因，但却吃“闭门羹”，使差猜处境极为尴尬。

此时，差猜答记者问时，他在记者面前第一次承认他的政府“有了问题”。

为解决问题，他只好去找国王调解，平常超脱政治的国王破例在一天内分别接见差猜和军队首领，调解了差猜与军方的冲突。差猜于1990年12月8日辞去总理职，并在第二天由国王重新任命为总理，组建新一届内阁。新内阁不包含差林及其所领导的群众党。

舆论界对差猜敢于同军队较量和周旋感到意外，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位总理变得如此强硬。对此，差猜说：“这如同练习拳击，不打沙袋，就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差猜新政府的成立，使军政矛盾有所缓和，谁知二个月后，“阿铁事件”又使军政矛盾激化起来，成为这次政变的导火线。

阿铁是前炳总理执政时期的陆军司令，在军队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他与现军方两巨头顺通和素金达不和。差猜为了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1990年8月邀请阿铁入阁担任副总理。1991年2月20日，差猜未同军方领导人协商，就任命阿铁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助理。这意味着差猜在政治上进一步削弱军队的影响，使阿铁有权直接干预军队的事务。

差猜如此做法无疑是在捅马蜂窝，人们替他捏了一把汗。

军方得到消息后，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连忙召集三军将领商讨对策。“总理当得不耐烦了！”一位将军把握紧的拳头往桌上一砸，忍不住骂了起来。当天，顺通上将急电命令正在南朝鲜访问、原定于26日回国的空军司令甲社火速回国。

2月23日凌晨1时，曼谷郊外，夜黑风高，万籁俱寂。空军司令甲社乘坐的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降落在某空军机场。他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即驱车赶到碰头地点，在一间戒备森严、烟雾缭绕的屋子里，与来自陆军、海军的几位高级将领一道，在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顺通·空颂蓬上将的主持下，如此这般地密谋推翻差猜政府……

### 劫机政变差猜被军队推翻

1991年2月23日上午，在泰国廊曼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空军机场上，一架C130型飞机静静地停在离贵宾室几十米远的停机坪上，作为泰国总理的专机。它今天上午要担负着运送差猜总理和阿铁副总理前往泰国北部清迈市

晋见国王，举行阿铁副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的就职宣誓仪式的使命。

两辆载有一支特别行动队的 30 名队员的装甲车不知何时从何处驶向机场一端，静静地隐蔽在灌木丛中。车内的队员没有一人说话，他们谁也不知道将执行什么任务，怎样行动。他们接到的只是“原地待命”的简短命令。

“总理通知推迟一小时起飞。”机场贵宾室内一位执勤人员对着话筒不知向谁报告。这时，墙上挂钟指向 10 点正。

大约 16 时 25 分，即差猜总理到达机场前 35 分钟，18 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驱车到达机场，他们迅速跳下车，分头把机场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10 时 30 分，差猜总理乘坐的那辆深蓝色的“奔驰”车从家里出发，在前呼后拥的轿车车队护送下，风驰电掣地驶向军用机场。大约 11 时，车队在机场大楼贵宾室前戛然而止，身穿烟灰色西服的差猜总理从车上缓慢地跨下来，看上去他神情疲惫，布满血丝的眼睛表明他昨晚未睡好。他第一眼就看到一排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迎接他。头一个是空军司令甲社，洛乍那上将军，接着是空军副司令甘·披曼贴上将、空军助理司令素贴·贴帕功上将、海军司令巴帕·吉力沙那占上将等。

“你刚从国外回来？”差猜向空军司令甲社问道。“是的。”甲社上将点头弯腰，微笑着答道。

这位 2 月 21 日赴南朝鲜访问，原定于 26 日回国的空军司令为什么在今天—23 日上午突然出现在这里为他送行？差猜脑子里突地闪出一个问号。但他不露声色地步入贵宾室。

室内。空军司令甲社、海军司令巴帕等几位将军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紧张，若无其事地同总理寒暄着。

与此同时，在与贵宾室只有一墙之隔的一间房间里，一双眼睛正通过与贵宾室相通的窗口帘缝，注视着差猜一行的一举一动。原来房间内潜伏着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这次政变的首领顺通·空颂蓬上将和几位陆军军官。按原定行动方案，由顺通上将亲自指挥劫持差猜总理的行动，在差猜一行登机前，在贵宾室内将他们一网打尽。

就在昨天夜里，顺通上将和陆、海、空三军司令就如何挟持差猜总理，如何避免流血提出许多方案，最后筛选出 5 个可行的方案以供选择。

第一方案：由陆军执行任务。在 2 月 24 日清晨 7 时正，当差猜到陆军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球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其挟持。但这一方案不能排除差猜保安队负隅抵抗的可能性。

第二方案：由空军执行任务。在 2 月 23 日傍晚，当差猜和阿铁从清迈飞抵军用机场时再劫持。但此计怕夜长梦多，易走漏风声。

第三方案：同样在 2 月 23 日上午，当差猜乘坐 C130 飞机起飞后，让飞行员把飞机紧急降落在某府军用机场，由陆军地面武装包围挟持，但此计的不利因素是距离太远，下达命令不太方便，且可能引起反抗，危及差猜安全。

第四方案，也是在 23 日上午，当差猜一行进入贵宾室等候登机时，由装扮成机场工作人员的特别行动队员冲进去将差猜挟持。但此计同样要冒差猜保安人员负隅顽抗，发生流血的危险。

第五方案：让特别行动队的五名队员装扮成记者混在记者群中，待差猜登机后下手。但五名队员一旦被差猜保安队员识破真面目，政变将成为泡影。

将军们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比这 5 个更好的万无一失的良策。成功与失败具有同等的份量。经过反复比较，将军们认为第四、第五个方案把握较

大，最后，他们当机立断：双管齐下，同时布置第四、第五个行动方案所需要的力量，先执行第四方案，如有不测，当即执行第五个方案。

不出将军们所料，事情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

差猜总理的保安队今天似乎嗅到了什么异常的气味。几个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寸步不离差猜总理的左右。每人手里挎着冲锋枪，身上还佩带二支口径不同的手枪，十分警惕地戒备着。如果贸然下手，很可能遭到抵抗，造成人员伤亡，危及差猜的安全。巴帕上将等人也很可能成为对方的人质，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顺通上将决定取消这个行动方案，改为执行在专机上行动的第五方案。

就在差猜总理的车队从他家里出来的路上，差猜的保安队长威奈·汶宗少将仔细地对专机进行安全检查，他突然发现 C130 飞机上有人们不易觉察的异常现象。

飞行员、地勤人员、空中小姐还是原班人马，但奇怪的是有二位同这次总理出行并不相干的空军军官在机舱内走来走去，好像是在检查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空军补给厅厅长威拉蓬·信哈社尼少将同总理此次行程有何相干？威奈顿时心生疑结，他立即命令几位保安队员把检查过的地方再检查一遍，就连冰箱内的饮料也一个个地仔细查看，但仍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威奈少将为了慎重起见，他马上同刚离开私邸的总理车队联系，叫他们推迟到达机场的时间。

但已经来不及了！总理已经进入机场贵宾室。此时是 11 时整，威奈赶紧跑到贵宾室，同总理侍卫官那隆·宾西少将耳语片刻。那隆听完直奔到副总理面前，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阿铁脸色骤变，二话不说，立刻站起来迈开大步走到正同差猜交谈的空军司令甲社面前厉声命令：“我们要换飞机！”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使空军司令愣了一下。他刚刚接到顺通上将“改在专机上行动”的密令，假如换飞机，一切都完了。今天早晨，他与陆军司令素金达立下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誓言岂不成了泡影？只见他频频地抽着香烟，极力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此时此刻，他脑海中正千回万转地寻找对策，以充足的理由来拒绝。这时，坐在一旁的差猜总理突然站起来，语气坚决地说：“不必换机，就这一架好了！”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出贵宾室，直奔那架 C130 型飞机。空军司令甲社见状，如释重负，一溜烟地跟着出去。

众人愕然。

这位平时凡事都愿意听取别人意见，就连街头公用电话使用的硬币大小不同，给人们带来不便等事都要一一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的总理今天怎么一反常态？

其实，此时的差猜总理并不糊涂，他对军方早已有所提防。昨天，政府情报部门向他报告，近日发现军方有异常调动，应严加防范。昨天晚上，他下令增派几十名保安警察在他私邸的四周围加强警戒，虽然一夜平安无事，但害得他一家老小人心惶惶，夜不能寐。今早出发前，他嘱咐保安人员要加倍警惕。特别是发现空军司令甲社突然提前从南朝鲜回国，更增加了他的疑虑。不详的预感笼罩着他的心头，使他意识到，在这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假如政变首领顺通上将不改变行动方案，差猜总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他正在带领总共 39 位随同人员逃出一个可能枪声大发、血肉横飞的危险境地。但这位聪明的总理哪里知道，危险像幽灵般地随他上了专机。

差猜像往常一样，走到机舱门口时，转过身来向欢送他的人群挥手告别。机下，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但记者们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拍下的这张照片是差猜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张活动照片。

总理走进机舱，刚刚坐稳，保安队长威奈大声地向众乘客宣布：“下面检查乘客，无关人员请马上下飞机！”

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提高嗓子重复了一遍。四位记者模样、身着浅棕色猎装的男子身体动了动，但没有起身。威奈眼睛向众乘客挨个扫了一遍，目光最后停在空军补给厅厅长威拉蓬少将身上，然后命令道：“威拉蓬少将不必去，请下飞机！”虽然两人军衔相同，但职责不同，保安队长的命令就是总理的命令，这位厅长瞪了他一眼，快快地走下飞机。

专机上没有军人。总理微笑地向保安队长投去赞许的目光。他系好安全带，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机下还站着空军司令甲社，他见补给厅长被赶下飞机，顿时觉得不妙，忙向身边的助理空军司令耳语：“厅长被赶下来，谁在机上指挥？”“机首还有机组人员、空军上校阿玛叻·乍拉雅潘接替他指挥。”接着，他又命令补给厅厅长：“火速赶到跑道尽头待命！”

11时20分，专机开始发动，机身随着轰隆隆的发动机声慢慢地驶向跑道。

在跑道斜对面的指挥塔上，空军参谋长亚南·甲林塔空军上将一大早就登上指挥塔的遥控室里待命。刚才他接到顺通上将命令后，通过无线电把作战计划传给机舱中的阿玛叻上校。

机上。阿玛叻上校在飞机发动时，转身用手势向后面那四位特别行动队员发出“按计划行动”的暗号。

谁也没有在意，这四位“记者”竟无一人系安全带。

“去时没有事，但回来还须提防！”副总理阿铁上将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为他刚才在贵宾室内向空军司令提出要换飞机的要求辩解。

没有谁回答。舱内寂静得出奇，只有舱外飞机发动机在轰轰作响。飞机正在开足马力，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以每小时150公里的升空速度在跑道上呼呼地向前方冲去，8百米、6百米、4百米……，飞机离跑道尽头只有2百米了，飞机轮仍没有离开地面，还飞不起来，眼看就要冲出跑道，突然“咔嚓”一声巨响，飞机终于在离跑道尽头不到1百米处骤然停住。巨大的惯性，把机内所有的乘客摔向前排的椅子背上，又反弹回来。人们认为飞机出事，个个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惊叫声、金属碰撞声响成一片。就在这时，机后舱四名记者模样的汉子忽然倏地一齐站起来，两脚撑开，猫着腰，双手紧握黑黝黝的美式11厘米手枪，对着众乘客大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谁动就打死谁！”与此同时，在机首的阿玛叻空军上校把手枪在差猜总理面前晃了晃，最后停在原陆军司令、副总理阿铁面前不动。差猜惊呆地看着这个场面，像是在做恶梦，直到他听见身边的阿铁嘀咕了一句“我们栽了”才完全清醒过来，眼光投向他的保安队，但18名保安队员全部被安全带系住，他们各人所携带的手枪都被安全带紧束在腰下，枪拔不出来！只好乖乖地把手举起来。“真是作茧自缚”差猜总理心里暗暗叫苦。一保安队员举起一只手，另一只手偷偷伸下去拔那支缚在右小腿部的枪时，还未触到枪柄，就被对方一声“住手”的喝吆声镇住。

这一过程仅仅花了一分钟。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分钟，是关系到这次政变成败的关键一分钟。

阿玛叻上校见局面已被控制，他一边把手枪左右来回晃动，一边一步一步地退至机首的安全门旁，腾出一只手打开安全门，机外，两辆满载荷枪实弹的空军陆战队队员的装甲车已停在飞机旁，距机身约一米，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猛地从装甲车跳进机舱，后面紧跟两名手端轻机枪的陆战队员。这三个人好像不认识舱内的动机者。内务部次长阿南误认为是自己的救兵，向他们大声呼救：“我们被劫持了，快来帮忙！”但大汉转过脸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说：“你弄错了！”原来此人是空军陆战厅厅长差雷空军中将。他对差猜总理客气地命令道：“请阁下先下飞机！”这位70岁高龄的总理用微微颤抖的双手解下安全带，慢慢地站起来，步履沉重地离开座位，一步步地向机舱门走过去。

离飞机约10米远的地方，两辆深绿色的装甲车和一辆蓝色“奔驰”牌轿车东横西竖地摆放在宽阔的跑道上，显得极不协调。差猜走下专机后，径直地向为他敞开着的车门走过去。走到车门前，他忽然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他那架中途被劫持，飞不上蓝天中去的专机，然后一头钻进车内。轿车在两辆装甲车的押送下，驶出跑道，向离机场不远的一所空军宾馆驶去，转眼便消失在远处的道路上。

专机上，差雷中将继续发出命令：“请阿铁副总理下去！”这位5年前在军队中最有实权的陆军司令，在黑洞洞的枪口下，板着铁青的脸，大步走下飞机。他后悔刚才在贵宾室中未能坚持换飞机，阻拦差猜总理登机。但一切都晚矣！

飞机上，差雷中将下达第三道命令：“其余的人都放下武器，从后舱门下飞机，谁乱动就打死谁！”差猜的18名训练有素、身怀绝技的保安队员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把身上所携带的总共37件武器小山似地堆放在机舱那血色的地毯上，举起双手，鱼贯而下。13时，陆军各路武装力量迅速占领总理府、国防部、国家电台和各电视台等要害部门。整个政变仅用2个多小时就控制了全国局势。15时，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顺通上将通过电视台宣布由陆、海、空三军及警察部队首领组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接管国家政权。

15时30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阐释军方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政变。其理由是：一、差猜政府有严重贪污舞弊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及其集团谋取暴利。二、差猜政府结党营私，严重破坏常务官制度。三、差猜及他的顾问团与执政党相互勾结，打着民主的幌子实行议会独裁。四、破坏军队的团结和统一。五、庇护曾在1982年发动试图推翻王室的未遂政变的首脑人物马努·路卡宗，并委以重任。

声明最后写道：“差猜政府上述表现，使军方忍无可忍。因此，陆、海、空三军及警察部队进行磋商后决定接管国家政权。”

接着，“维安会”宣布解散政府和议会；实行全国戒严，中止使用1973年颁布的宪法；许诺将制定新宪法，尽快举行大选。

2月25日，政变当局成立“核查财产委员会”，负责调查差猜政府官员的非法收入。宣布包括差猜在内的25名前内阁成员为重点审查对象。冻结本人及其子女的所有财产。

3月2日，政变当局任命泰国工业协会主席、原驻美国大使阿南·班雅拉春担任临时政府总理。



政变后，人们对泰国政权更迭褒贬不一。英文《民族报》3月1日发表题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评论，认为军方接管政权无可指责，政变为铲除腐败和重建廉洁议会制度创造了机会。中文《新中原报》评论说，“泰国五十多年来，经历无数政变，从未见过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上下一心一德，百姓同声颂扬的政变”。前总理、政界元老克立·巴莫也撰文认为军队搞这次政变有正当理由，政府垮台，咎由自取。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政变使民主倒退。

泰国舆论界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军政矛盾外，政府的腐败也是导致差猜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虽在经济上成绩斐然，但人们不能容忍执政党的腐败。军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这场政变。

### 暮年悲歌

差猜被劫持后，被单独羁押在环境优美，但与世隔绝的一所空军宾馆内。

3月11日，政变当局释放被幽禁半个月之久的差猜，条件是获释后须立即到国外暂居一个时期，以防他的势力乘机反扑，卷土重来。当天早上，维安会主席顺通上将和陆、海、空三军将领在空军宾馆设早宴为这位前总理压惊、饯行。宴会上，将军们双手合十向差猜谢罪，对他说，军队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这样做，请给予宽恕。差猜伸手拍着站在最前面的陆军司令素金达的肩膀说：“我谅解，泰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旧是朋友，不是吗？素！”这些亲热的举动，俨然像一群亲密的战友在久别重逢后述说友情。但又有谁知道这位前总理内心的辛酸。

差猜选择的出国第一站是伦敦。他打算在伦敦逗留一个时期后，再到瑞士居住。3月12日早晨，差猜的私邸叻差库苍里里外外挤满了自动前往送行的人们，一些人手持鲜花，准备献给他们所尊敬的前总理。

当差猜从家门口出现时，人们发现他在这些日子里消瘦了许多，满头的白发在晨风的吹拂下显得有些零乱。眼睛深处似乎隐藏着许多难言的苦衷。他蹬上车后，探出身子，微笑着向人们挥手告别，轿车慢慢向前移动。这时，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不知哪位女士高声地喊道：“我们热爱您！”话刚落音，人们立刻随声呼应，有节奏地重复着这句话，差猜面对这一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掏出手帕，不时地擦着泪水。坐在他身边的夫人汶仁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只见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者们争相拍下这个悲戚的历史镜头。

在廊曼国际机场的候机室里，一位记者问差猜，将来返回祖国后是否重返政坛，重振雄风。差猜摇着头回答说：“我已老，该退出政治舞台了。”人们对这位从不服老的前总理的这番话半信半疑。

究竟这位前总理是否能重返政坛，众说纷纭，人们拭目以待。

上午11时，差猜和夫人登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告别了他熟悉的人民，告别了他曾经叱咤风云的美丽的国土。

差猜一家三口住进伦敦海德公园旁边的一座旅馆里。每天早晨，差猜身穿运动服，在花香鸟语的海德公园里散步、做操。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地呼吸着这里新鲜和自由的空气，享受着 he 任总理后从未有过的安谧。

宁静的生活持续了4个多月。

1990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差猜正在居室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泰晤士

报》，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急忙拿起话筒，听着听着，他的脸一沉，“叭”的一声挂上话筒，转过身朝里屋的儿子盖萨说道：“准备明天返回曼谷，我要向他们澄清事实！”语气中掺杂着一股怒气。

原来，差猜的一位亲戚从泰国打来电话向他报告，泰国当局财产稽查委员会在7月26日宣布：差猜拥有价值7000万铢（约合280万美元）的支票、股份和土地来路不明，本人必须在15天内到该委员会阐释清楚。

8月3日，差猜一家人乘机返回曼谷，开始着手搜集能说明上述财产来源的各种证件，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他要把这笔巨额资产一一阐释清楚，并非易事。看来，双方要打一场“马拉松官司”。

“我感到很累，体重已下降六公斤，但我还要继续为此事奔波，以维护春哈旺家族的声誉。”差猜对记者说。

差猜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在泰国逗留了二个多月，但案子还未了结，财产仍未“解冻”。只好委托泰国大理院（最高法院）院长针叻作为他的代理人，继续向财产稽查委员会阐释，证明他的财产来源。

差猜与当局这场“官司”如何了结，那是后事。但不管结果如何，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前总理在任期间对泰国经济的腾飞和推动泰国民主进程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0月15日凌晨，差猜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当天傍晚在伦敦机场徐徐降落。差猜从机舱窗口俯瞰大地，只见夕阳西照，大地一片光辉。不一会，橙色的太阳在骤起的晚风追赶下，匆匆地钻入云中，倏地不见踪影。他遥望东方，见那逶迤起伏的山影，像天幕泼下的水墨，由近及远渐渐地淡化而去。

差猜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回来了！”他自言自语。这时，从伦敦市内教堂传来浑厚、深沉的钟声，久久地回荡在广袤的天空中。这钟声，如泣如歌，悲壮而凄切。

哦！苍茫的黄昏。

文标

政变中大权旁落 绞架下命归黄泉

## ——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死刑前后

政治是门学问，实际上是门科学，是一种数学，始终是加减乘除。

——佐·阿·布托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政坛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1928年1月5日，他出生在信德省拉卡纳地区塔尔扎公馆，其父亲是巴基斯坦信德省有名的政治家、开明地主。1950年，佐·阿·布托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1952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伦敦林肯法学院通过考试。取得高级律师资格，曾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任为国际法学讲师。回国后，在卡拉奇穆斯林法学院任宪法讲师，并从事律师业。1957年，他年方28岁，就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大会。1953年，他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率领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海洋法会议。同年10月至1960年任阿尤布·汗政府的商业部长，为当时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部长，1958年1月至1962年3月任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国家建设和新闻部长。1960年4月至1962年3月兼任燃料、电力和天然资源部长、克什米尔事务部长。1963年1月至1966年7月任外交部长。1967年11月创建人民党，并自任主席。1971年11月至12月，在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危难之际，叶海亚·汗把政权移交给布托，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总统和军法首席执行官。1973年8月，布托制订的巴基斯坦第三部宪法生效，巴实行议会两院制，布托由总统改任总理。1977年3月大选，人民党再度取胜，布托再次出任巴总理。然而，就在这时，厄运也开始向他袭来。

### 风云突变

1977年1月7日，佐·阿·布托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宣布，3月7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3月10日举行省议会选举，竞选国民议会216个席位和460个省议席。在3月7日的国民议会的竞选角逐中，同人民党决一雌雄的有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团结运动党。巴基斯坦民主党、民族民主党、贱民运动党和查谟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等9个反对党于1月中旬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并以“犁头”作为竞选标记，采用饰有9颗星的绿色旗帜作为其共同旗帜。绿色代表伊斯兰，9颗星代表联盟的9个组织，每一颗星代表一个成员组织。联盟选举了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的大毛拉穆夫蒂·马哈茂德为主席，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的拉菲克·艾哈迈德·巴杰瓦为总书记，巴基斯坦民主党的纳瓦布扎达·纳斯鲁拉·汗为副主席。然后，两大竞选集团各自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开展了激烈的竞争。3月7日如期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3月8日，选举委员会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在直接选举的国民议会200个席位中。人民党得了155席，反对党全国联盟一共得了36席。人民党再加上部落地区独立人士的8席，间接选举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即非穆期林教徒）16席，在国民议会的216席中占有179席，比例由上届议会的60%上升为80%。随后，全国联盟指责人民党在选举中舞弊，并宣布抵制3月10日的省议会选举。全国联盟号召3月11日在全国举行总罢工。3月12日，布托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国民议会选举问题已经解决，他同反对党只能讨论其他问题。全国联盟随即又号召，于3月14日在全国开展抗议运动。从此动乱开始，并日渐扩大。

4月9日，旁遮普省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全国联盟在拉合尔组织了向省议会大厦的抗议示威，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出现了伤亡。此次流血事件，使抗议运动迅速波及旁遮普省的一些城市，并在卡拉奇、海德拉巴等城市引起呼应。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出现了大规模动乱。4月20日，全国联盟在全国举行总抗议运动。为了缓和矛盾，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布托总理通过当时的总检察长叶海亚·巴赫蒂亚尔提出先重新举行省议会选举。如果反对党在40个省议会获得多数就重新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反对党坚持首先要求布托辞职，而后重新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而且应由军队监督选举，并拒绝同布托进行任何谈判。

4月21日，布托以总理身份，下令对动乱最剧烈的卡拉奇、海德拉巴和拉合尔3市实行军事管制。

4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政府。

在4月的最后一周，布托政府把被拘留的全国联盟领导人集中在距拉瓦尔品第不远的西哈拉招待所，允许反对党在外面的其他领导人也到那里一起讨论同政府进行谈判的条件。为了打破僵局，促进问题解决，布托亲自会见了全国联盟主席穆夫蒂·马哈茂德。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派特使来巴进行斡旋。由此，暂时的紧张气氛逐渐得到缓和。5月3日，反对党全国联盟提出5项33条要求，不再把布托辞职放在首要地位。5月5日，布托对记者谈话只是谈反对党提出的条件太多，把问题弄复杂了，并没有断然拒绝它的要求，双方条件逐步接近，非正式对话也业已进行。

人民党同反对党全国联盟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斡旋，于6月3日开始举行谈判。6月4日布托向反对党提出两个方案，举行新的选举，执政党和巴盟提出的候选人仍然同3月7日的选举一样，但不搞竞选；举行新的选举，符合条件的新候选人参加竞选。

在6月3日至15日，为解决巴基斯坦的政治危机，巴基斯坦人民党和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举行了9次会议，就巴基斯坦举行重新选举问题，两个政党集团初步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政府原则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巴盟放弃了要布托总理辞职的要求。之后，政府释放了在押的巴盟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取消了拉合尔、卡拉奇和海德拉巴军事管制，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巴盟则呼吁其支持者停止举行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后来又放弃了成立临时政府或看守政府的要求。在国内局势缓和以后，布托总理于6月18日开始出访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等5个穆斯林国家。访问回国后，布托总理继续同巴盟领导人磋商，两大党派集团先后举行了13次会谈。7月4日晚上，布托总理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重新举行选举、选举日期和成立选举机构等11点内容，人民党同巴盟已于7月2日达成了协议。以后又在签字问题上发生了龃龉，但双方并没有关门，仍在设法打破僵局。7月5日，巴基斯坦的形势出现了变化。

## 身陷囹圄

1977年7月5日晚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在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巴基斯坦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并解散国民议会和省议会，不废除1973年布托总理制订的宪法，但停止执行某些条款；还说在全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是他的唯一目的，并宣布于同年10月举行大选，选

举结束后，将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的代表。哈克将军还宣布，由他本人担任军法首席执行官的由三军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首脑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协助同意留任的乔德里总统行使国家元首职权，并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代替布托政府。将洛守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和承担的义务。还宣布，7月5日夜开始的变革已于清晨和平地完成，整个活动都是在他的命令下进行的。

据报道，1977年7月5日，布托总理刚主持完内阁会议，1点45分钟，突然，军人进入总理官邸，并宣布接管布托总理的权力。清晨两点，布托总理一家人在亲戚和同事们的陪伴下，走出房子，在门前的草坪上待命至天明。上午10点，布托总理同亲属分手，下午4点，他坐着自己的汽车被人护送着走出总理府，车子开向首都北面约60公里的避暑胜地穆里山。暂被拘留在穆里山的总统别墅里（属于政府财产）。同时，布托总理的眷属亦被带到了伊斯兰堡机场，然后乘飞机回到了卡拉奇。

7月5日至7月28日，布托总理被拘押在穆里山，前后23天。在此期间，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从西北边境省阿博巴德市拘留所转移到了穆里山。《巴基斯坦时报》报道，在穆里山拘留期间，布托总理仍在从事着繁忙的会见人民党领导人和党务工作者等一系列工作，为参加10月重新大选做准备。7月18日，布托总理在穆里山拘留所还会见了从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拉瓦尔品第和其他城市来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和党务工作者。布托在这里对政治作了精辟的论断。他说，政治是门学问，实际上是门科学，是一种数学，始终是加减乘除。他说，他获释出去以后，将要做这些计算。他要他的党务工作人员告诉巴基斯坦劳动人民，他不久将参加竞选，他还向党务工作者强调，“我们是革命的先驱，我们要走革命的道路”。他还说，获释后，还要会见人民党全体141中央委员和各省负责人。还要到全国去征求人民的意见。

7月18日，布托还对从各地到穆里山的人民党干部发表讲话，说：“不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决定，都是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历来是以为群众服务的理想为指针的，他并不希图权势。他曾当过8年外长，后来成为军法首席执行官，后来又成为总统。他再次当选为总理，他搞政治活动向来是从原则出发的，从来不是为争职位的。

7月18日，布托获释后，对路透社记者伍德说，“解决民族危机的钥匙仍然在我的手里”。他说，他是1973年提出的巴基斯坦宪法的起草人，他代表巴基斯坦的真正声音。“只有巴基斯坦合法选出的政府的声音是公正的正当的”。他还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名誉和尊严比当选和落选更重要”。布托再三强调，“解决巴基斯坦危机要依靠巴基斯坦的千百万劳苦大众”。

获释后，布托还到全国各地会见群众、人民党干部和人民党党员，沿途受到数以万计人的热烈欢迎。

8月19日，布托报名参加竞选，分别在他的老家拉卡纳、塔达、纳瓦布沙阿和卡拉奇竞选4个国民议会议席。

9月4日，以谋杀案的罪名，布托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在拉合尔郊区科特克帕特监狱。9月5日，布托的辩护律师代表布托向拉合尔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9月13日，拉合尔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申请，布托交了保释金出狱。保释出狱后，布托对记者说，他现在比以往有了更大决心，要在一切情况下参加竞选。他说，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他的党。他还说，他既要调查又要参加

竞选，肯定会有困难，这是不利的条件，但是他认为对他来说总是可以对付的。

布托在9月13日保释出狱后，时隔4天，9月17日，他第三次被捕。同时人民党的机关报《平等报》也被勒令停刊。

关于9月17日再次逮捕布托的原因，当晚军法首席执行官哈克将军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前总理布托和另外10名人民党领导人将在10月大选前交军事法庭审理。他说：“可以让这些领导人在面对选民之前，先弄清是有罪还是清白的人。以期毫不拖延地进行审讯，在选举举行以前对他们的案予作出判决。”

在布托身陷囹圄的逆境中，人民党选出新的领导机构，1977年9月21日，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当选为人民党代理主席。

1977年10月22日，布托在最高法院说，逮捕他是不守信义的行为。

1978年1月3日，人民党执行委员会宣布佐·阿·布托为该党终身主席。

1978年3月，布托被拉合尔高等法院以谋杀案的罪名判处死刑。随后，布托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于1978年5月开始受理，于同年12月23日结束审讯。1979年2月6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拉瓦尔品第宣布驳回布托的申诉，维持拉合尔高等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由首席法官安瓦尔·哈克宣读的。最高法院同一天宣布，关于这项判决在7天内可以提出复审的请求。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于1979年2月14日宣布，最高法院确定于2月14日听取代表前总理布托提出的对他判决死刑的判决进行复审的申诉。

这项申诉是由布托的首席律师叶海亚·巴赫蒂亚尔于2月13日提出的。

最高法院下令，在复审布托案件期间，停止执行对他的判决。

3月14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拉瓦尔品第宣布，驳回前总理布托提出的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的申诉。维持拉合尔高等法院以谋杀案罪名对布托的死刑判决。

关于布托案件的复审申诉，在1979年2月24日开始听审，3月17日结束，当时没有立即判决。

根据法律，布托在收到判决书后还可在7天内向总统提出宽恕要求。

## 死 刑

贝·布托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昨天（指1979年4月3日）。这次见面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人告诉过他第二天凌晨他就会被处死。也没有人告诉过那些曾正式要求军事当局对我父亲宽大为怀的世界领导人。”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说：“我不是个乞丐，我不打算乞求什么施舍；我也不打算像狗一样蹲着，举起两只前爪，合十求乞。”布托又说：“假如我活的日子不长了，人们是没有能力留住我的。我不怕死。我所痛恨的是，我在牢房中直到现在所受到的待遇。使我痛苦的是，从我被搞下台和打入樊笼之后，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属下和我的家庭成员所遭受到的苛刻待遇。”1979年4月4日凌晨，佐·阿·布托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绞死，享年51岁。

此时，布托妻子努斯拉特·布托和女儿贝娜齐尔·布托被关押在离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几英里远的西哈拉一座废弃的警察训练所里。4月2日凌晨，

佐·阿·布托的妻子努斯拉特突然走进屋里，来到已在军用床上睡觉的大女儿贝娜齐尔床边，呼喊着她的小名说：“外面的许多军官都说，今天我们两个都应该去看你父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此时，贝娜齐尔意识到父亲将被杀。当时，她急中生智，对看守她父亲的人说，她有病。由此，她为父亲佐·阿·布托赢得了一天的生命。4月3日晚上，警察急忙用吉普车把努斯拉特·布托母女从拉瓦尔品第西哈拉送到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同布托见最后一面。当吉普车抵达牢狱时，监狱的大门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努斯拉特·布托母女经过女看守搜身后被带进牢房。贝·布托在《东方女儿》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她和母亲同父亲佐·阿·布托在狱中的一段对话：“你们俩怎么都来了？”父亲从他地狱般的牢房里问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他问。我母亲不忍心回答。

“我想是。”我说。

他把站在旁边的监狱长叫过来。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吗？”父亲问她。

“是的。”监狱长回答。

“日子定了吗？”

“明天早上。”狱长说。

“几点？”

“按照监狱的规矩是5点。”

“你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

“昨天晚上。”他迟疑地说。我父亲看着他。

“我可以跟家属在一起多长时间？”

“半小时。”

“按照监狱里的规定，我们可以有一小时的。”父亲说。

“半小时。”狱长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我的命令。”

“安排一下，要让我有时间洗个澡，刮刮胡子。”父亲告诉他，“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他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这席子是牢房里唯一的陈设。牢房里的桌子、椅子、床都被搬走了。

“把这些都拿去吧。”“我的书不想让他们来沾手。”父亲说。

死牢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他。过去每次见面。他们都是让我们到他的牢里面去。一起坐着，今天却不让了。母亲和我一起挤在牢门的栏杆上悄悄地跟他说话。

“把我的爱带给其他几个孩子吧。”他对妈妈说。“告诉米尔、胜尼和沙阿，我曾努力要做一个好爸爸。并且希望能够向他们说一声再见。”母亲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地点头。“你们俩都受了很多苦。”他说，“今晚他们就要把我杀了。我想让你们也得到自由。如果你们愿意，在宪法终止和军法管制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得到思想上的安宁，你们也许会要到欧洲去的。我允许你们，可以去”

我们的心碎了，“不，不！”

妈妈说：“我们不能走，永远也不走。……”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狱长喊道。

我紧紧地抓住栏杆，我要求他，“请把牢门打开，我要跟爸爸告别！”狱长拒绝了我的要求。“行行好”，我说，“我父亲是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



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了，我要拥抱他。”狱长还是拒绝我的要求。我把手伸到栏杆里去够我父亲。他瘦极了，疟疾、痢疾和饥饿耗尽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抓住栏杆站了起来。抚摸着我的头。

“今晚我就自由了。”父亲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就要跟父亲、母亲在一起了。我就要回到我的先辈在拉卡纳的那个地方去，变成它的泥土、芳香和空气的一部分。我的周围将有歌声。我将成为它的传奇的一部分。”父亲哭了，并说，“只是在拉卡纳很热。”我抑

制自己说，“我会给你搭个凉棚的。”

“再见了，爸爸！”我对着爸爸喊着，妈妈又抓着栏杆去够爸爸。我们走了，走到满地尘土的院子里。我真想再回头来看一眼，但是不能了，因为我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4月3日晚上，人悲哀，地悲哀，天悲哀，布托的家乡拉卡纳突然降了冰雹。在加尔希·胡达·巴赫什·布托村附近布托祖先的墓地周围，军车的轮子碾地声和军车喇叭嘶叫声惊动着人们，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当时，被关在西哈拉警察训练营地的努斯拉托和贝娜齐尔母女心情焦的不安。而布托的遗体秘密地被空运到加尔希埋葬了。据布托家土地看管人纳齐尔·穆罕默德回忆，1979年4月4日清晨3点，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走出房子，向四周眺望，见到村子周围都是军车，足有五、六十辆，都开着绿灯。以为军队像往常一样要在加尔希村搞例行军事演习。当时人们害怕极了，尤其发现军人们到布托墓地察看的情景。当时，警察把布托家的土地看管人纳齐尔从房子里叫出来。此时，加尔希村的男女老少也都从各自的房子里走出来，人们猜想，布托先生已被绞死，即使未死，可能也快了。于是人们哭着喊着，十分绝望。

军警要纳齐尔告诉他们布托家的墓地的位置，他们要埋布托。纳齐尔对军警说，布托是他们的，由他们自己埋。经过交涉，军警允许布托家族8个人同纳齐尔一道给布托挖墓穴，用砖坯砌墓穴。砍来树枝铺在地上，举行诵经。在布托墓地仅他们9个人，而加尔希村却被军警包围了，村子的每条街道也被封锁了。任何人不得进出村子。挖墓穴的人也被包围着，但加尔希村的人们的心同挖墓穴的9人的心连在一起，他们为布托祷告。

4月4日上午8时，突然两架直升飞机在村口降落，那里停着一辆救护车，棺材从直升飞机上被搬上救护车，然后开到墓地。军人还命令将看墓地的阿訇和他的妻儿们居住的房子腾出。20个武装的士兵站在这间屋顶上，监视墓地。

按照伊斯兰教的习惯，近亲是必须最后看一眼死者的。布托的侄子们就住在加尔希村，离墓地很近，布托的第一个妻子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经纳齐尔交涉，最后允许布托大妻子看布托最后一眼。

布托家族的人们按捺不住心头的悲痛，突然有1400至1500人冲破阻拦来到布托棺材旁边瞻仰布托遗容，人们的哭声撕心裂肺。

纳齐尔和村民们匆匆忙忙为死者做了最后祷告，然后为死者进行了安魂仪式，就把遗体放进墓室。布托的第一个妻子看了布托的遗体后，墓地上人们背诵《古兰经》的声音和妇女们的哭声震撼了加尔希村，震撼了信德原野……。

据当时报道，关于布托临终前的情形非常可怕。有的说，他惨遭毒打，

只剩下脉搏还在跳动，是用担架把他抬上绞刑架的，另一则报道说，布托是在牢房里搏斗致死的，有人企图强迫布托在一份自首书上签字，承认是他自己发动了政变并邀请军队接管政权，布托拒绝签字。根据这个说法，一名军官用力狠推布托，头撞在墙上，他倒了，从此失去知觉，于是叫来一位医生进行抢救，施行心脏按摩和气管切开术。

根据伊斯兰教丧葬礼仪，要为死者沐浴，并为死者放上未经缝制的裹尸布。据纳齐尔回忆，当时军人告诉他已为布托遗体沐浴。他看到了裹尸布，并看到布托遗容，脸色犹如珍珠，发出光辉，其样子同他16岁时一样。眼球没有鼓出，舌头也没有吐出。按照宗教礼仪，把布托的脸转向西方朝着麦加，他的头没有倒向一边，脖子也没有事，而只有他的喉咙上有红黑色的斑点，像官印似的。

### 举世震惊

据说，布托死亡的噩耗传出，执行绞死布托的人也疯了，那个把布托的遗体运到加尔希去的驾驶员，当他知道放进直升飞机的棺材里的是布托的遗体，生气极了，决定不干，后来只好换了一个驾驶员。人们按捺不住心头的悲痛，手捧白花，走上街头，为布托祷告，在拉瓦尔品第的里雅卡特广场上，1万多人聚集在那里，为布托祷告，并对杀死布托者表示抗议。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痛不欲生的悼念者聚集在布托家满椰子树、芒果树和红花绿叶掩映的花园里。更多的人们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着向他们的领袖家属表示哀悼。

布托遇难后，许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对其被害表示震惊、遗憾和痛惜。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布托总理遇难发表谈话指出，“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巴友谊做出过贡献，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呼吁赦免布托先生，我们对布托先生被处死深表遗憾。”

张式川

水门中落马 弹劾前辞职

## ——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

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空隙之烟焚。

——韩非

在美国 200 多年历史上的 40 任总统中（不包括现任总统布什），只有一位总统任期末满却被迫辞职。这就是第 37 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 1972 年的水门事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事件背后复杂的党派斗争。

### 水门事件

1972 年 6 月 12 日，一位名叫富兰克林·威尔斯的安全员在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发现一个门把上有段磁带。他叫来了警察，他们当场抓获了 5 名在尼克松总统竞选委员会工作的雇员，5 人中 1 人自称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有 3 人原籍古巴，他们正在民主党总部搞窃听活动。这就是美国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在美国被有些人称为一件“奇闻”。其实事件本身并不足为奇，在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政治斗争中，什么手段都使用过，窃听算不了什么大事。当时，美国新闻界也未大肆宣扬，只是做了一般报道。窃听专家们向《华盛顿邮报》说，这种事在过去历届选举中并不少见，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互相窃听更是常事。

政治党派的权力角逐对水门事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水门事件发生时，正值两党竞选总统进入高潮，民主党必然要以此大做文章。6 月 20 日《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说：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连。文章说，根据“与调查此案关系密切的联邦官员”提供的消息，在民主党总部内逮住的人有两个人的通讯录上发现有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人员，1972 年 3 月以前一直在白宫工作，充当查克·科尔森的顾问。这使尼克松吃惊不小，他认为：像亨特这样的前白宫低级职员受到牵连无足轻重，问题是科尔森是他的助手和顾问，一旦被卷入后果就严重了。

民主党人据此开始发动攻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其盗窃他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 100 万美元。这一讼案可以传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的几乎全部人员出庭，对此，《时代》周刊评论道，民主党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挡的共和党竞选活动”。

为了避免因水门事件而陷入无休止的法院调查而导致白宫中高级官员卷入，尼克松多次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利用亨特与被逮捕人中的古巴人的关系，向公众宣布，古巴人与水门事件有关，这样可以不暴露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与水门事件的瓜葛，避免在政治上蒙受影响，同时使人相信那是美国的古巴侨民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古巴政策不满而搞的诡计，一箭双雕，削弱民主党的力量。于是，尼克松令其好友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的反麦戈文的古巴人动员起来，公开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界大肆宣传一下。这样一来可以攻击麦戈文的外交政策，二来可使水门事件朝着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发展。此时，尼克松最为担心的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可能被拳连，事实上，米切尔是预先

---

该地居住着很多古巴难民。

知道窃听事件的。绰号为“狡猾的迪克”的尼克松与白宫助理埃利希曼策划让另一知情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顾问利迪主动坦白，承认自己是水门窃听活动的负责人，这样就可以避免米切尔的卷入。尼克松表示，只要能在这次大选中获胜，他愿意对利迪进行资助，甚至在大选后对他采取假释或赦免。1972年6月23日，在尼克松与霍尔德曼谈话中，霍尔德曼提出可求助于中央情报局。该谈话的录音带后被人们称为“冒烟的枪”、“狐狸的尾巴”，最终迫使尼克松做出辞职选择。

米切尔还是被牵扯进去了。事情是由他夫人马撒引起的。马撒是一个好激动的人，她不喜欢丈夫从事政治活动。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两周年，马撒曾对新闻界说，她已经向丈夫提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摆脱政治活动。她说：“我非常爱我丈夫，但我决不容忍所有那些正在进行的肮脏行径。”这就引起了人们对米切尔的猜疑。这以后，被水门事件搞得精神疲惫的马撒，竟说她有一本手册，其中详细记载着水门事件的预定步骤，以及她本人了解的全部细节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别无选择，只能让米切尔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1972年9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司法部长丁斯特报告尼克松，对水门事件的起诉书将宣布，说其中没有提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任何高级官员或白宫的任何人员。三天后，起诉书披宣布，只提到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捕的5个人。尼克松对这个调查结果是满意的，大选前，水门事件就这样被暂时搪塞过去了。

水门事件犹如一场大火，在它开始蔓延的时候，被成功地控制住了。但是，政坛风云变幻无常。正当再次当选为总统的尼克松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大火重新燃烧起来，而且愈燃愈烈，素以善于驾驭政治危机而著称的尼克松终未能从中逃脱掉。

### 激怒东部豪门财阀

白宫政治有一个微妙之处，即每届总统上台执政后，都尽可能地在东西两大财团之间搞政治平衡。不仅在组织政府的时候“兼收并蓄”，而且在各项政策方面也尽可能“统筹兼顾”。如：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是著名的保守派，深得西南部权势集团的青睐。里根执政后，当然首先要考虑西南部势力的利益。但他也不能不适当照顾东部势力的利益，他任命黑格为国务卿。美国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罗斯福以来，民主党执政时间长达20余年，所以国会和政府各部门文官骨干大部分是东部财团培养出来的民主党人。雄心勃勃的尼克松决心利用他所拥有的大权，打破东部权势集团控制国会和政府的政治体系，建立以西部财团为主的新体系。

尼克松是从加利福尼亚州起步进入政坛的。1946年，尼克松从海军退役后，收到大学同窗、美洲银行一家分行经理的来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美洲银行是美国西部财团的堡垒，尼克松与西部财团挂上了钩，决定竞选。他在加州金融界、工商界的支持下，于当年12月当选为众议员，步入政界，以后逐步迎合西南部的政治潮流，接受保守派观点。从1953年至1960年他当了8年的美国副总统。正当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做白宫主人的时候，却在1960年竞选总统中失败，尼克松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光靠西南部的势力，根基不够雄厚，还必须在东部找到靠山，才能使事业获得成功。

他搬出加利福尼亚州，到纽约市的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的顾主包括一些有全国性影响的东部财团组织的跨国公司。他还同许多企业、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赏识。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当尼克松 1968 年再次出来竞选总统时，已是今非昔比，声威大振了。党内外权势集团和富豪纷纷解囊相助，终于使他如愿以偿。

广结善缘的尼克松毕竟代表西南部财团的利益。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尼克松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外战略、策略方面，而在国内没有采取大的举动。尼克松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在第二次大选前不久，尼克松接见一位记者时说，在今后的四年中，他的政府将以主张进行 1932 年罗斯福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又说，他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迥然不同，“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我们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大选后的第二天，他对白宫全体人员谈话，说得更明确，“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要把禁区打破”。所谓“禁区”，尼克松是指维护传统的东部自由派权势集团自新政以来一直到 1973 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尼克松要实现“新多数”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他认为：美国人中“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以西南部为基础，从来没有人鼓励他们在控制国家机构方面，同东部势力作一番有力的竞争。尼克松要使自己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要使那个权势集团大吃一惊。”

尼克松踌躇满志，他在连任总统后不久，立即进行了三项“改革”，它不仅使东部财团及代表人物震惊，而且把他们激怒了。

改革预算。美国一位专栏作家称这项改革是“70 年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试图做过的事”。尼克松在大选前曾与管理与预算局长温伯格和希曼审查了联邦赠与计划，结果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 1000 多项计划中，至少有 115 项浪费很大。例如：联邦农业补助计划把 42% 的资金给占 7% 的最富裕的农民，另一个联邦计划在教师已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情况下仍在鼓励学生报考师范专业。于是尼克松在送交国会第二届任期的第一个联邦预算中建议削减预算，1973 年削减 65 亿美元，1974 年 163 亿美元。尼克松还提出要改组、缩减或取消不起作用的拨款。他认为：在经济局的 25 亿元经费中，有 85% 的钱未到穷人手里便作为薪金和一般管理费用花光了。这些计划拨款并不能为穷人服务。1973 年 1 月，尼克松又向国会要求把 1973 年的开支限在 2500 亿美元，同时要求在 1975 年给预算开支规定一个极限。

尼克松的预算改革对美国政界震动很大。首先，这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预算，这将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职位和政府合同的失效，也就是说对政府机构中的许多雇员构成了威胁；第二，限制预算影响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政治前途，因为能否再次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力本选区争取到多少联邦拨款；第三，以东部财团为后盾的民主党长期控制着国会、政府，其联邦预算项目是多年来逐渐增加的，一旦被大幅度的削减，必然会使东部财团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改革税收，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是靠税收，联邦政府需将其中部分拨给州和地方政府，同时进行监督控制。在这种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单纯的赠与计划。赠与项目从 1960 到 1970 年由 44 项增加到 500 项。尼克松上台后，多次提出税收分享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地方政府从联邦得到拨款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轻重缓急来使用，使用范围可以包括城市发展、执行法律、教育、职业训练、运输、农村发展等等。尼克松 1973 年进一

步提出了税收分享计划，并希望得到国会的批准。

尼克松想通过税收分享代替联邦赠与，打破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改变地方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财政上依附地位，自主地利用联邦政府拨下的资金，发展经济，特别是可使西南部经济在较少控制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尼克松把税收分享代替单纯赠与视为 40 年来联邦政府发展方向的第一次大转变，是一场新的美国革命。税收分享的直接后果是联邦权力的削弱，进一步说是部分政府机构的被撤销，官僚特权的丧失，这对于长期控制国会、政府机构的民主党及其背后的东部财团是一个沉重打击。

改组政府。1971 年尼克松曾向国会提出了精简政府的报告。遭到了否决。1973 年，尼克松再次提出了改组政府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将政府内阁 11 个部中的 6 个部和政府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组织起来置于四个管理口之下：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经济事务口。四个总管理口的总负责人为总统顾问，直接对总统负责。

尼克松为进行上述改革，还采取了根本性的举动，就是大量削减行政部門的人员。尼克松的目的在于在各部和各机构的所有关键岗位都要安插忠实总统和他的改革纲领的人。由于民主党执政时间长，政府机构的人员多是民主党人，其中，各部、司、局长以上的高级官员中，民主党占 3/4。美国的一家刊物曾发表一个调查报告表明：1970 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 17% 是共和党人，47% 是民主党人，36% 是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在另外一个研究报告中也表明：只有 5% 的外交官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这样的构成比例有悖于尼克松的“新多数”的精神，尼克松要重振共和党，他决心从西南部寻找新人进入政府的各级岗位，特别是进入关键岗位。

尼克松重新当选总统后，立即要求政府部门每一个非职业雇员提出辞职，并授权其内阁成员有挑选其下属的自由。根据尼克松的内阁改组方案，原来的部长只有 4 人留任原职，新内阁中西南部的代表人物大大增多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企业家克劳克德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南方的“纺织大王”登特被任命为商业部长；加州的利顿公司的总经理阿什被任命为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

尼克松的三项“改革”真可谓大刀阔斧。他手持利剑——总统权力，欲夺民主党手中的王牌——国会、政府机构，直至舆论工具。然而，他犯了美国政界的大忌。为了建立西南部财团的统治权，他头脑过热，走得过急过快。他激起了占国会中大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们的愤怒。那些在选举期间竭尽全力的内阁成员正希望有机会尽享大获全胜的喜悦，突然之间要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操心，心中自然也愤愤不平，连尼克松自己不久也意识到让部下辞职这步棋走错了。结果，以压倒优势重新当选总统的尼克松在不长的时间里失宠了。水门事件被再次提出。1973 年 1 月，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要求对 1972 年的竞选进行全面调查，特别是水门事件。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参议院议员欧文领导这次调查，之后建立了欧文委员会。

#### 四面楚歌 挥泪辞职

尼克松经常让其部下阅读他的著作《六次危机》。该书详细叙述了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如何克服严重局面。一位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高级官员曾这

样评价尼克松：“他太喜爱挑战，一旦挑战发展为危机，尼克松将全力以赴对付危机。”尼克松向东部财团的挑战，由于水门事件的重提，很快发展为一场危机，尼克松称之为第七次危机。

最初，当水门事件被提出并面临复查时，尼克松为了缩小事件的影响，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先是授权白宫律师约翰·迪安来处理这方面的日常事务。为了争取主动，尼克松又不惜忍痛割爱将跟随他多年却可能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人调离白宫。为了保证调查中不出问题，尼克松任命当时的司法部长助理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忠实于总统，在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时，处处力尼克松打掩护，从而博得信任，尼克松任命他为局长。

正当尼克松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国内问题顾问埃利希曼和迪安、米切尔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欧文委员会听证时，《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潜入民主党总部被抓获的5个人中名字叫麦科德的人秘密会见了欧文委员会的律师塞缪尔达升，向他交代白宫律师迪安事先知道闯入水门的计划。欧文委员会继续向报界披露：麦科德甚至坦白米切尔事先批准过水门窃听计划。这就让人感到白宫与水门事件是有牵连的。尼克松的防线崩溃了。

在事态发展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商量，现在只有把责任全部推到米切尔身上，这样才能保证总统不成为被追究的对象。然而，又是一件尼克松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被告知：白宫律师迪安已经向欧文委员会承认在阻挠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松只好解除了他的职务。

由于迪安的指控，尼克松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终于也被拖进水门事件。新闻界天天都在报道水门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诸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事先知道水门窃听计划，又如何用巨款收买知情人要他们保持沉默，如何指示下属销毁隐藏与水门事件有关材料，等等。面对强大的新闻舆论，霍尔德曼、埃利希曼感到心慌意乱，焦躁不安，尼克松感到他们难以渡过这场政治关。他再次使用丢车保帅的手法，劝说二人辞职，虽说有些于心不忍，但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尼克松的决定，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两人极为不满，认为他做得太过份了，他们暗示尼克松：没有他们在前挡驾，他将被推到直接遭受打击的位置上，但最终他们还是辞职了。尼克松感到犹如失去了左右臂膀，但为了能保住权位，他认为截肢也是必要的。1973年4月30日，尼克松第一次就水门事件向美国人民正式讲话。他表白自己与“水门事件无牵连”，并让人们相信：由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辞职，政府将积极吸收一些新人，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水门事件应该结束。

一切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尼克松的无罪表白和呼吁丝毫未起作用。此时，以欧文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也因被迪安指控而辞职）为代表的对水门事件调查的机构多达十几个。其中欧文委员会有92名工作人员，司法部专门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查官考克斯的办公室有80名雇员，而尼克松方面应付调查的助手和律师不到10人。尼克松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感到势孤力单。调查听证会的持续进行，尤其是前白宫律师迪安的不断交代，公众对“不诚实总统”的道义谴责等等，把尼克松逼到墙角，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霍尔德曼、埃利希曼、格雷等人的辞职，尼克松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崩溃了，丑闻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尼克松总统本人。调查问题已不再是他是否事先知道水门窃听之事，而是掩盖事实，阻挠司法的进行。尼克松已深深地陷入错综复杂的法网中无以自拔。他企图通过在国内外交务上做出新的成绩，争取国



民对他的支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1973年9月，他打破常规，宣布了第二次国情咨文（一般应在年初）。尼克松在该咨文中提出了全国关心的3个重大问题：通货膨胀、国防和能源。然而，一切努力收效甚微。他无法摆脱笼罩在他头上的水门事件的阴影。

在整个水门事件调查过程中给尼克松致命打击的是录音带问题。原来，白宫内装有一套录音系统。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人谈话都被录了音。这本是绝密的事，却被霍尔德曼的前助手透露给欧文委员会。欧文委员会不断索要录音带，最初，尼克松为防意外，主张销毁录音带。后听取了已经辞职的霍尔德曼的意见，既不交出录音带，也不销毁。他写信给欧文委员会，说他将不提供任何录音带供调查之用。欧文委员会等决心调查到底。独立处理水门事件的司法部特别检查官考克斯更是穷追不舍地索取录音带。1973年10月，联邦地方法院又作出特别检查官有权索要录音带的裁决，这对尼克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只能希望考克斯作出一定让步，即只交出录音带摘要，不交出全文，并由他任命一人负责核实录音带，否则就免去考克斯的职务。考克斯不仅没有答应这个要求，而且坚持日后可任意调阅一件文件和录音带。尼克松一怒之下，于10月20日星期六解除了他的职务。考克斯与民主党支柱之一肯尼迪家族交往甚密，是东部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一解职被看成是对东部势力的挑战。一时间，舆论大哗，抨击这个解职是“星期六大屠杀”，“是在发动一场政变压制反对派”。抗议电报纷纷飞向白宫。没过多久，又有消息说，考克斯未撤职前要求白宫交出的九盘录音带，缺少两盘应录的谈话内容，再度引起公愤。《纽约时报》自水门事件以来首次发表社论力主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时代》周刊50年来第一次发表社论要求一位总统下台，过去曾坚决拥护政府的6家报纸也要求尼克松辞职。此时，美国众议院开始讨论弹劾总统的程序问题。1973年11月上旬，众议院投票决定拨款100万美元进行弹劾调查。

尼克松已是四面楚歌。他把这种局势称为第七次危机，他决心要坚决渡过这场危机，就像前6次一样。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决不让人千刀万剐而死。”他首先向越来越多的要求他辞职的人表明他“完全无意离开”他当选的职务，并“将尽力消除人们对一个身居最高职位的人的正直所抱的怀疑”。为了争取党内的广泛支持，他决定会见国会中各个不同集团，与国会每位共和党和民主党方面所有支持他的人亲自谈话，阐明对水门事件的看法，重建联系，恢复被水门事件所搅乱了的共同目标。在一个星期内，他一共会见241名共和党人和46名民主党人。尼克松对他们说，他将针对有关水门事件的指控发表白皮书。他坚持如果对他的指控继续抱有党派偏见，他就要下台，但是不辞职。就在这时，录音带的新问题再次把尼克松的努力化为泡影，可以说这是水门事件最后一幕的关键。1973年11月15日，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告诉尼克松：被传票索取的录音带中包括他和霍尔德曼的谈话，谈话出现了18分钟半的空白，这段空白曾经用电子设备加以恢复未成。此事被报界披露后，人们自然怀疑到，白宫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故意抹去录音带上的重要内容。后来这个录音带由联邦大陪审团和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得出结论是，录音带上的嗡嗡声是“洗去和重录至少在5个分开和相连的部分时留下的。这个录音机的每一部分一开一关都与手按按钮有关。”这对尼克松来讲，没有比这更坏更可怕的事情了。尽管他可能没有下令去洗掉录音带，但他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自此以后，尼克松的处境更加艰难。1974年3月1日，联邦法院大陪审团对尼克松手下的一大批干将起诉，如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科尔森、迪安等。同时，参议院欧文委员会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越来越紧，要求尼克松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他们发出一系列新的传票，索取更多的录音带，搜集更多的罪证。尼克松已不能拒绝这些要求，否则会落下个蔑视国会的罪名。与此同时，众议院对弹劾总统的工作按照宪法规定的弹劾程序加紧进行。1974年7月17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案的第一款进行投票，结果27：11通过赞成弹劾。7月29日通过第二款，控告尼克松滥用总统职权，犯下可以遭致弹劾的罪行。7月30日通过第三款，罪名是滥用职权，抗拒委员会传调录音带和文件。三项有关弹劾案的条款将于1974年8月19日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一旦通过，送交参议院。

面对眼前的政治局势，尼克松已是无力挽救了。要么辞职，要么被弹劾，二者必择其一。如果被弹劾，他将在参议院接受6个月的审讯，且最后必将遭到失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并犯有刑事罪的总统。尼克松必须赶在众议院进行表决之前做出决定，他坐卧不安，痛苦不堪，连续数日反复在辞职和被弹劾之间权衡利弊。这时，白宫律师齐格勒、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先后听了已经上交的录音带的复制带，其中一盘是1972年6月23日尼克松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谈话，得出同样结论：录音带一旦公布，参议院肯定要要进行审讯，并且很可能定罪。局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遭到弹劾成为不可避免。黑格向尼克松建议：应在录音带公布出去之前就辞职，离开白宫，那时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新总统身上，不利影响会减少一些，尼克松也认为：对6月23日的录音带无法解释和辩护。他终于决定辞职，尽管这使他十分痛苦。

1974年8月8日晚9时，尼克松通过电视对美国 and 全世界发表辞职演说。在辞职前，他含泪向家人说明了6月23日录音带的问题，并让他们看了记录文本。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谈了水门事件问题，表示，6月23日的录音带是个重大的打击。那么，这个后被称为“冒烟的枪”、“狐狸的尾巴”的录音带究竟是什么内容呢？原来，1972年6月23日，霍尔德曼与尼克松谈话时，告诉他，迪安和米切尔提出一个计划，就是要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赫尔姆斯出来制止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讨论了这项计划。这个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戏剧性地成了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的罪证。

尼克松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俞景华

### 第三编 穷兵黩武 玩火自焚

我们谴责不义，不是我们对它的厌恶，而是因为它给我们造成了损失。  
——拉罗什福科

法兰西人困马乏 滑铁卢英雄末路

## ——拿破仑巨星陨落

我曾经和全世界争战，我所以被制服是因为吸引我的胜利流星过于遥远……

——拜伦：《拿破仑的告别》

1821年5月5日，在远离英国4000英里的大西洋南部火山小岛圣赫勒拿的一隅住所里，一代伟人拿破仑静静地死去了。英国海军鸣放礼炮，向这位昔日的皇帝致以最后的军礼，大西洋上卷起的狂风巨浪，也似乎是为这个曾让全世界发抖的英雄送灵。

“……我是士兵出身的暴发户。一旦我不再强大并且不再受人敬畏，我的统治也就完了。”深知自己的身世和社会处境的拿破仑，凭借自己的军事天才和卓著战功，登上法国皇位，横扫欧洲“奥吉亚斯牛圈”，使法国强大到似乎可以左右欧洲乃至世界的程度。然而，这位“马背上的世界灵魂”，终因长年穷兵黩武，马失前蹄，兵败滑铁卢，命断孤岛，饮恨九泉。

拿破仑退出社会舞台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长期咆哮，空前猛烈的台风突然停息了”。对这样一个雄才大略，叱咤风云，弥留之际还在呼喊着“法兰西……军队……冲锋……”的人物，后人最关心的不是他是病死的还是被人毒死的，而是这样一颗璀璨的巨星，为什么在其最辉煌的时刻陨落在圣赫勒拿？

### 大陆封锁：锁不住约翰牛却困住了法兰西

反法联盟同法国的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早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便已开始。反法联盟主要是由英国组织和提供援助的。拿破仑明确认识到，法国的主要敌人是英国。为战胜英国，拿破仑曾通过远征埃及，切断英国对东方贸易通道的办法去堵死其财源；以后又建立布伦军营，企图入侵英国本土，以上两个办法均未实现。在打败欧洲反法联盟的第三次进犯，法国在欧洲已取得巩固霸主地位的情况下，拿破仑于1806年和1807年先后两次颁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大陆封锁贯穿于拿破仑统治的始终，也构成拿破仑帝国全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大陆封锁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消除英国与大陆的联系，完全窒息英国，使英国俯首称臣，由法国取代英国占领欧洲市场。它符合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实现对整个欧洲的治疗，首先是占领全部欧洲。

大陆封锁迫使英国面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挑战，事关重大，英国必然针锋相对，倾国以争。1807年1月，英国颁布了“英王诏令”，对法国进行反封锁。大陆封锁最初给英国造成很大打击，但由于英国在经济上远比法国强大，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法国虽然暂时和部分地控制了大陆资源，但英国却可以通过美洲大陆和南亚次大陆的丰富资源获得补偿。封锁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不断增长，经济力量反而更加强大了。

与此相反，大陆封锁却给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大陆封锁切断了大陆与美洲和英国的密切的经济联系，法国不能替代英国生产大量的廉价工业品以满足大陆的需要，也不能代替英国成为大陆农产品的消费者。大陆封锁阻碍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法国国内经济危机的爆发。拿破仑不顾客观现实和经济法则，只靠行政命令和强权政治来实行大陆封锁的作法，只

能是事与愿违。

另外，大陆封锁也是大陆和海洋包围与反包围、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由于英国拥有比法国远为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制海权，这就使英国在这场斗争中一开始便处于有利地位。法国既然不能控制海洋，单靠庞大的军警缉私网又怎么能实行有效的封锁呢？相反，英国则可以凭借强大的海军去支持大陆的反法势力，去进行经济走私。为对付反封锁，拿破仑还必须依靠不断的军事征服去控制欧洲大陆，这些军事征服也就驱使拿破仑去进行一次次冒险，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大陆封锁，是拿破仑失败的最深层、最基本的原因。

### 西班牙脓疮侵蚀了帝国肌体

大陆封锁的一纸命令是不可能锁住漫长的欧洲海岸线的。不同的利益，也使大陆各国对于拿破仑的依附和驯服程度不一样。特别是紧邻英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迫于无奈加入“大陆封锁”，但却没有认真执行拿破仑的要求，政府默许与英国贸易的走私活动。更使拿破仑恼怒的是，英国还严密地控制着葡萄牙，利用它在西南欧洲与法国对抗。

为确保大陆封锁政策的有效执行，消除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势力和使葡、西两国驯服，拿破仑于1807年11月贸然发动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

战争第一步，是由朱诺将军率2.5万军队，假道西班牙，侵占葡萄牙。战争第二步，借口增援葡萄牙，拿破仑又派十万大军侵占西班牙，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由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任西班牙国王。

法军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西班牙人民规模空前和持续不断的反抗。马德里的爱国者首先揭竿而起，拿起武器与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起义虽遭镇压，但却唤起了更多的人民奋起斗争，原忠于西班牙王室的军队和各省议会，也卷入反法斗争的洪流。各地武装斗争配合行动，更加有效地打击法军。

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完全出乎拿破仑的意料。他原以为，属于波旁王朝世系的西班牙王室，早已腐朽不堪，国家也因此而混乱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他凭自己的威名，只要略施小计，加以兵戎，便可以震服西班牙。结果算盘打错了。侵略政策使所向无敌的拿破仑大军开始迭遭失败。

1808年7月19日，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拜伦地区的一次战役中，英勇善战的法军名将杜邦将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2万军队向西班牙游击队投降。这一事实有力地粉碎了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显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威力。此后，西班牙反法斗争更加活跃和主动，游击队曾一度收复马德里，赶走了约瑟夫国王。

为挽回颓势，拿破仑只好亲自出马。同年11月，他率领16万法军开赴西班牙。在他指挥下，法军曾再度攻占马德里，并多次击败西班牙游击队。但西班牙人民遇挫更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的土地“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游击战争使法军各部之间无法进行正常联系，拿破仑因此而哀叹道：“敌人游击队的活动实在难以捉摸”，“他们突袭我的军事岗哨、辎重和信使的事件日益频繁”。西班牙这种游击战打得法军坐卧不安，拿破仑也开始束手无策。由于准备对奥地利作战，他不得不返回巴黎，直到下台，他再也没机会重返西班牙。

伊比利亚半岛的这场战争延续了多年，最后以西班牙胜利而告终。

西班牙人民的反法斗争，给法军带来了空前的劫难。它像法兰西帝国躯体上的一个“脓疮”一样，不断扩大和腐烂，严重地侵蚀了帝国的肌体，它长期消耗和牵制了法军 30 万最精锐的军队，使拿破仑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处在西线作战的困境中，并最终成为摧垮拿破仑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 法奥联姻 一着败棋

1809 年 7 月格拉姆战役后，拿破仑帝国似乎正处于光辉、强大和富足的顶峰。但拿破仑知道，他只是用武力征服了欧洲，只是靠恐怖来实现对欧洲的统治。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力量依然存在，并有增无减。今后还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许多次战争，战争的胜败、帝国的存亡都系于他一人之身。奥地利爱国青年对他的行刺和他在战场上的多次负伤，使他愈发强烈地感觉到，他所创建的一切都是系在非常细小的一根线上，因此，他需要传宗接代。

拿破仑初登统治者宝座，还不甚介意帝王的出身和称号，现在随着他的欧洲统治者地位的确立，他却开始背离革命原则，向封建正统原则屈服。他原来厌恶世袭，现在他却要使他王朝代代世袭下去。他需要先和约瑟芬离婚。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约瑟芬皇后是拿破仑最痴情的女人。然而，既然约瑟芬皇后不能生育，那么，为了帝国的利益，他决定和约瑟芬离婚。他虽然还爱着约瑟芬，却不得不对她解释道：“在政治上没有良心而只有头脑。”

1809 年 12 月 15 日，在帝国全部大臣和皇帝全家的面前，离婚证书签字了，拿破仑和约瑟芬分手了。慑于拿破仑的威势，离婚证明很快获得了罗马教皇的破例认可。

尔后，召开了大臣会议。拿破仑的新贵们为保存自己的利益，希望新婚使拿破仑的统治后继有人，并希望拿破仑能同欧洲最大的古老皇朝结亲。拿破仑先向俄国沙皇的妹妹求婚未成，而后应他之求，经梅特涅安排，奥皇将他 18 岁的长女玛丽亚·路易丝嫁给了他。婚约只是拿破仑的前辈法国路易十六皇帝与另一位奥国公主（她是拿破仑现在的未婚妻玛丽亚·路易莎的亲姑妈）的婚约的抄本。婚礼是在维也纳的一座教堂里举行，盛况空前。在这之前，新郎新娘彼此都没见过面，甚至在举行婚礼这一天也没见过。婚礼中，新郎的角色是由拿破仑的贝尔蒂埃元帅和查理大公共同担当和完成的。维也纳容忍了这种现象，并愉快地表示欢迎。因为，在 1809 年第四次反法战争失败后，“奥地利把一头美丽的牝牛作为祭品献给弥诺陶洛斯”，在奥国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拯救。婚礼后，新法国皇后前往法国，拿破仑在巴黎附近的路上迎接她。这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拿破仑的儿子却注定不能继承他的帝位，他的新婚妻子和儿子也因拿破仑战败而回到岳父——奥国皇帝家，并且一去不复还。拿破仑的新婚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相信，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由于失去了大陆的支柱奥国，必定要与法国和解。几年后，拿破仑一定会向没有给他新娘的那个大国开战。这句话不幸言中了。彼得堡笼罩在一片慌乱不安的气氛中。然而，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

---

弥诺陶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系牛首人身的妖怪。——编者。

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 莫斯科战役 拿破仑元气大伤

对欧洲大陆的征服，强制推行大陆封锁政策，对西班牙的残酷镇压，使整个欧洲都极端仇恨拿破仑，他本人也开始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困境。反格拉姆的胜利和与奥联姻虽然加强了法奥联盟，给帝国的强盛平添了一层威势，但这一切都是脆弱和暂时的。法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危机。被大陆封锁弄得精疲力尽的法国资产阶级要求拿破仑放弃大陆封锁政策，暂停发动战争。皇帝的农民开始厌战，他的老近卫军也提出了“我们究竟为什么去进行战争”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却坚决认为，只有发动新的征服战争和继续贯彻大陆封锁政策，才可能克服上述危机和困难。战胜奥地利使他受到鼓舞。他兼并了罗马教皇国，软禁了罗马教皇，扩大了西班牙战争，还兼并了荷兰、汉撒同盟及奥耳登堡。更有甚者，拿破仑决定发动一场对俄战争。

俄国是与法国在大陆上争霸的最主要对手。在土耳其、奥地利和波兰等问题上法俄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推动拿破仑对俄宣战的最主要动机，是拿破仑不能容忍俄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破坏他的大陆封锁。俄国自从提尔西特和约后，已恢复了军力，又强占了许多新的领土。国力的增强使俄国开始决意要摆脱大陆封锁对它的束缚。沙皇提高了法国工业品的进口税额，却允许美洲等殖民地的货物按优惠条件进口，还默许英国货物经由波罗的海进入俄国，再流入欧洲各地，从而使大陆封锁近乎失去效力。

对此，拿破仑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他决心惩罚俄国，他自认为有把握战胜俄国，因为他以前曾多次打败过俄国。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欧洲大陆名副其实的

主人。为战胜俄国，拿破仑于1812年2月和3月分别同普奥两国签订盟约。5月他前往设置在德累斯顿的大本营。他集中了空前强大的军队，共计51万多人，在维斯杜拉河一线展开。按军队的数量、装备和战斗力，法军远远优于俄军，但等待他的却是毁灭性的失败。

对于拿破仑的进攻，俄国已有准备。俄军共调集了40万人的兵力，分成3个集团军。巴克莱任俄军代总司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自督战。

拿破仑入侵俄国，原想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俄军主力，进军莫斯科，迫使亚历山大求和。所以，他急于寻求和俄军主力决战。

面对拿破仑的大举进攻，巴克莱改变原定作战计划，边战斗边撤向内地，迫于朝野对法作战的舆论和压力，亚历山大一世只好撤销巴克莱总司令一职，由著名老将库图佐夫代之。库图佐夫抵达前线后，分析了形势和条件，认定巴克莱撤退的战略是对的，但他改变了巴克莱准备与法军决战的地点，继续撤退至距莫斯科只有120公里的波罗季诺村，在那里迎击法军。这样，就迫使拿破仑继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至9月7日进行会战时，俄军集中了优势于法军的炮火，而兵力则大致相等。

波罗季诺会战法俄各自都付出了大约5万人的惨重代价。俄军在深受信赖的总司令库图佐夫指挥下，表现了高昂的战斗士气，极大地消耗了法军实



力。当然，法军也表现的极为出色。战斗接近尾声时，双方都已精疲力尽，损失惨重。9月15日，拿破仑进入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美丽的景致很快被大火所淹没。面对熊熊的冲天大火，皇帝面色苍白，沉默良久才说道：“多么可怕的景象！这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多么大的决心！怎样的人呵！这是野蛮人！”莫斯科大火给拿破仑带来了可怕的忧虑：下一步怎么办？侵占莫斯科没能迫使俄皇求和，却激起了俄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强烈反抗，俄国正规军和人民采取各种形式，消灭和消耗着法军。不得已，拿破仑在困守莫斯科一个多月后，终因无法坚守，只好于10月19日实行战略撤退。此时，俄军由于获得了补充，已大大优势于法军。俄军不停地追击和消灭撤退的法军。俄罗斯的严冬也给法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只是凭借了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法军才得以生还了2万余人。除此而外，50余万的帝国大军除了被俘者，大都战死、饿死、冻死了。进攻莫斯科的失败，对拿破仑的帝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在评及莫斯科战役时写道：“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在莫斯科的失败。”

### 巴黎投降 厄尔巴岛战神垂泪

莫斯科之战失败后，拿破仑清醒地估计到敌军很快就会乘机反扑。于是，只用了3个月时间。拿破仑就又重新组建了一支40多万人的军队。作为军人政治家，他首先考虑的是用枪杆子解决问题。从1813年5月至10月，法军与俄普反法联军先后进行了吕岑、包岑之战和莱比锡战役。在战争期间奥地利曾出面调停未成，奥国转而加入反法联军的行列。经过激战，联军获胜，法军退出莱比锡，退回法国本土作战。

1814年1月始，联军进攻法国，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联军占有绝对优势，三路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巴黎。法军节节败退。形势险恶万分。但拿破仑并不企望和谈来解决问题，而是仍然诉诸武力和敌人一决雌雄。1月25日，拿破仑来到马恩河畔的夏龙，开始指挥战斗。这时，他只有47000可供作战的兵力，而正面却有23万联军，敌人后面还有大批的援军不断开到。面对强敌的进攻，拿破仑并未消极应战，他要在防御中主动进攻，从被动中争取主动，通过主动攻击各个歼灭敌人，用局部胜利来扭转战局。他确实导演了一出堪称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多次局部胜利，但寡不敌众，将帅也不像以往那样听命于他。法国上下，不堪连年战争重压，经济衰退，百姓厌战，拿破仑大势已去，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扭转乾坤。联军避开难于战胜的拿破仑直接指挥的军队、集中优势兵力，直取巴黎。3月30日，马尔蒙元帅所率部队投降，巴黎陷落。在联军扶植下，普罗旺斯伯爵登上王位，称为路易十八。4月2日困在巴黎之外的拿破仑皇帝被元老院宣布废黜，次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皇帝退位。4月6日，精力充沛，45岁，曾使敌人望而生畏的战神拿破仑万般无奈，表示屈从。悲伤、愤怒的拿破仑服毒自杀，企图以死雪恨。但上帝似乎还不想让他在世界军事舞台上最后谢幕，拿破仑自杀未遂。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很快镇定下来，他要屈求伸，按兵待时，4月11日，拿破仑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条约规定拿破仑皇帝及其家族放弃对法兰西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主权和统治，拿破仑终身保留皇帝的称号，其家族成员保留亲王的称号；拿破仑皇帝拥有厄尔巴岛的完全的主权和所有权，并享

有 200 万法郎的年金。

## 兵不血刃 卷土重来

厄尔巴岛位于科西嘉岛以东 50 公里的海上，与意大利半岛为邻。面积只有 220 平方公里，有 3 个小城和几千居民，以前属于意大利领地。现在归拿破仑掌管。根据枫丹白露条约，拿破仑保留皇帝尊号和 400 人的武装卫队。此外，还有大约 700 名老近卫军自愿到厄尔巴岛保卫拿破仑。

路易十八所代表的波旁王朝在革命后的 25 年来“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会”。他们掌权后，在短期内免去 1 万多名军官的职务，把无能的旧贵族安置在所有的重要位置上，领取厚薪，恢复教会的相当大的权力，为被镇压的王党分子平反。尽管如此，波旁王朝仍无力完全恢复旧制度，取消由革命和拿破仑制定的民法，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使人们更加把拿破仑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来怀念，军队首先提出：皇帝在哪里呢？他什么时候再出现呢？

拿破仑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的君主们正在为强盗分赃而争吵不休，现在尚无心它顾。过去，拿破仑的这种惊人的洞察力，曾使他作出过两次非凡之举。一次是他在埃及作战，当他得知法国国内的危险局势后，便弃军而归，冒着被英国海军俘获和被本国政府指控的危险回到法国。第二次是他侵俄失败后尚未撤回法国时，他不顾舆论指责而突然离开军队，先期返回巴黎。第一次使他获取法国第一执政的地位，第二次使他及时组建新军，取得一系列对反法联军战斗的局部胜利。此时，这种洞察力注定还要赋予他以新的惊人之举。

拿破仑知道重返祖国的时机已经来到，全国上下必将会拥护他的统治。而他又是最懂得行动的巨人。

1815 年 2 月 26 日傍晚，风狂夜黑。经过周密准备后，拿破仑突然带领 1100 余名士兵登船向法国海岸驶去，去书写他英雄史篇的最后一页。

2 月 28 日，拿破仑在海上向部下说：“我将到达巴黎，而不必放一枪。”

3 月 1 日，拿破仑到达儒昂港，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军队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向巴黎进军，同时，他下令自己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开枪。

3 月 3 日，拿破仑登陆的消息震惊全国，震惊了欧洲。马塞纳派军队去解除拿破仑的武装。但军队有意避免与皇帝战斗。

拿破仑有意避免武装冲突，但他在格勒诺布尔与马尔尚的大部队遭遇了，回避是不可能了。拿破仑带头走向扼守拉弗雷隘口的王室军队，命令自己的部队左手持枪，枪口朝下，跟他前进。当部队快迈入射击距离时，拿破仑让部队停止前进，自己一人继续向前，解开上衣，露出胸脯，对王家士兵说：“士兵们，你们认出我吗？你们当中谁想打死自己的皇帝？我领受你们的子弹。”士兵发出“皇帝万岁”的雷鸣般的欢呼声，拥向拿破仑。不断有军队和各行各业的人民加入拿破仑的行列，拿破仑的队伍以滚雪球的规模和速度向北挺进。

3 月 10 日，拿破仑到达里昂城，被王室派来阻击拿破仑的狂妄的阿图瓦伯爵逃跑了，负责该城防务的麦克唐纳元帅也出逃了。

这时，波旁王朝派内伊元帅对付拿破仑。内伊似乎信心百倍。以军力而

言，内伊显然要比拿破仑的兵力强大得多。但内伊本人原是拿破仑“铁的隊伍”中“勇士中的勇士”，他压根也不想反对拿破仑。拿破仑很了解自己的老部下，他派了一个骑兵给内伊带去一张条子：“内伊！到夏龙迎接我。我将像在莫斯科近郊之战后的第二天那样接见你：拿破仑。”内伊服从了。他拔出军刀高喊：“官兵们！波旁王朝的事业已经彻底完蛋了！”他率部投向拿破仑。拿破仑继续向巴黎进发。现在，整个法国军队都已转到拿破仑的麾下，法国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了。

3月19、20日夜間，路易十八惊慌地同家人逃向里尔。拿破仑还没到枫丹白露，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已撤下了白旗，升起三色旗；王宫地毯也将波旁王朝的百合花图案换上了帝国的金蜜蜂图案。在拿破仑进军途中，巴黎报纸的报道调子也在逐渐变化：“科西嘉岛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吃人魔王向格腊斯前进”，“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波拿巴占领里昂”，“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3月19日晚，拿破仑进入枫丹白露。

3月20日晚，拿破仑在随从和骑兵的前呼后拥下进入巴黎。

杜伊勒里宫前，欢呼拿破仑的声音像狂涛一样接连不断，震耳欲聋。当拿破仑的马车到达时，人们在叫喊、哭泣，直接向马扑去，向马车扑去，像发了疯似地冲向皇帝，他们把随从人员挤走，把马车打开，在经久不息的叫喊声中把皇帝抬进宫去，沿着宫里最大的楼梯，抬进二层楼的房间。

奇迹就这样实现了。波旁王朝再次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整个世界惊骇万分，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这件天下奇闻。

### 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日薄西山

在杜伊勒里宫里，拿破仑私下对他的爱将达武元帅说：“……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单独面向整个欧洲。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就国际格局而言，的确如此。

1815年3月7日晚，维也纳。奥地利皇帝为欧洲各国君主和代表举行舞会。突然，一个晴空霹雳打来：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直奔巴黎。各同盟国领袖慌乱不已。他们马上暂停争吵，发表联合声明，把拿破仑置于公民和社会关系之外，把他作为世界和平的敌人加以制裁，并宣布各同盟国将动员它们的全部力量同拿破仑作战。5天之后，英、奥、普、俄一致同意各出兵15万进攻法国。同盟国出于对法国革命的恐惧和仇视，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一切和平建议。法国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对这一危险，拿破仑早有足够的估计，他入主巴黎后，立即着手加强政权和军队的建设。

应该承认，拿破仑的确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了许多教训。他多次声明，与过去不同，新建的帝国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平和自由。为此，他做了许多工作。他还许诺进行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拿破仑还多次郑重宣布，法国不再谋求对欧洲的任何统治权，也坚决反对外国对法国的任何干涉。

拿破仑新的政权机构中，除了他信任的旧官吏外，还增添了著名的共和派革命家，这反映了拿破仑有意同民主派合作。拿破仑在内政方面还致力于宪法的修改工作，以实现把公众自由、个人安全同能够使外国人尊重法国人

民的独立和帝国威望的那种力量和仲裁作用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但拿破仑的改革是有限的。

拿破仑的东山再起，燃起了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恢复了大革命的传统。以雅各宾为首的广大人民纷纷组织起来，他们高唱《马赛曲》，准备与反法联军决一死战。但是拿破仑依然和他过去当权时那样，他只要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他只是凭着他的正规军与整个欧洲作战，这样，他就难免再次失败。

面对强敌压境，拿破仑用他新建的军队向敌人主动进攻。战场在比利时境内。拿破仑以其神速的行动，利用自己的局部优势，击溃联军部分主力部队，获得相当规模的胜利。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进攻圣让山，圣让山争夺战就是著名的滑铁卢之战。滑铁卢之役的拿破仑丝毫不逊色于奥斯特里茨的拿破仑。他的作战计划，众所公认，是一种杰作。直赴联军阵线的中心，洞穿敌阵，把它截为两半，把不列颠的一半驱逐到阿尔，普鲁士一半驱逐到潼格尔，使威灵顿和布留海尔不能首尾相应，夺取圣约翰山，占领比京，把德国人抛到莱茵河里，英国人投入海中。那一切，在拿破仑看来，都是能够在那次战争中实现的。然而，拿破仑却未能如愿以偿。

是日上午，通宵大雨过后，地面泥湿松软，不便于部队行动，拿破仑迟迟于11点半才发起攻击。拿破仑的兵力优势于威灵顿的军队。但经过巧妙的布置后的威灵顿的阵地，在开战后，却使拿破仑的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威灵顿在他长达四千码的阵地的几处重要地方实施要塞化防守，形成几个拳头。针对拿破仑的战术，他把部队在高地的反斜坡上展开。他以冷静的指挥和严肃部队纪律及有效的阻击火力来对付拿破仑的猛攻。

进攻开始后，拿破仑先佯攻左翼，主攻右翼未成。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猛轰后，再次进攻左翼，仍未能突破防线。下午三时半，拿破仑命令内伊向威灵顿的中央防线进攻，密集的步兵纵队在进攻遭到英军猛烈的扫射后被迫后撤，冲入英军的方形阵地的骑兵也被击退。下午5时，法军再度发起攻击，终于占领了英军防线的关键阵地。英军处境危险万分，正当双方损失惨重，拿破仑略胜一筹之时，威灵顿盼望布吕歇尔的普军增援部队赶到了。而拿破仑所苦苦期待的格鲁希元帅的3万援军却直到整个战役结束也没有赶来。布吕歇尔的参战，很快扭转了英军不利的局面。此时，拿破仑却仍然相信格鲁希会赶来增援自己，他希望能尽快通过继续进攻结束眼前的战斗。他派出一部分兵力阻挡增援的普军，同时，又派内伊率部多次向英军的方阵发起猛攻。战斗空前惨烈。法军有一半以上战死在英军的方阵内，英军十几个方阵中有一半以上被歼灭，内伊的三匹战马被击毙，威灵顿也吓得脸色苍白。战斗持续了好长时间。最后，威灵顿在布吕歇尔的配合下，全线反攻。列成方阵的拿破仑的近卫军边撤边拼命的抵抗，死不投降。在敌军的猛攻下，法军开始溃退，拿破仑在近卫军掷弹兵营的保卫下，步行退出战场。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滑铁卢战役以拿破仑失败告终。

军事史上，一些偶然的因素往往会对战局发生重要影响，滑铁卢战役也是如此。如果追击敌军的格鲁希能在6月17日抓住并击败普军，或者能在18日及时赶到滑铁卢参加战斗；如果不是大雨淋湿了地面，拿破仑一大早就展开进攻，那么在布吕歇尔赶来之前，拿破仑就可能已经赢得滑铁卢的胜利。但是，即使如此，战争也并不可能结束。因为联军还要倾其全力与拿破仑继续作战。拿破仑即使获得了一个滑铁卢的胜利，那么他还要面对第二个、第

三个滑铁卢式的会战。正如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认为战争还可以打下去并且能打赢，但这时议会背叛了他，富歇也背叛了他。拿破仑屈服于两院的决议，于 1815 年 6 月 22 日第二次宣布退位，“百日统治”结束。7 月 3 日，法军总司令达武签署巴黎投降书，7 月 8 日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王位。

拿破仑不愿向国内的敌人投降，宁愿向英国投降，就像古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失败后到波斯国王那里找栖身地一样。英国把拿破仑作为俘虏，于 10 月 16 日将他囚禁在圣赫勒拿岛。6 年后，52 岁的拿破仑在该岛去世。1840 年 12 月 15 日，根据拿破仑的遗愿，其遗骨运回巴黎。1861 年 4 月 2 日。拿破仑的大理石灵柩被安置在塞纳河畔的老残军人退休院的圆顶大堂里，供世人瞻仰。

徐小苗于新南

人类煞星战火焦尸

## ——希特勒和他的帝国成为历史陈迹探秘

对于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我的计划要么全部实现，要么全部失败。如果实现了，我将成为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如果失败了，我将被制裁，被唾弃，被诅咒。

——希特勒

1933年1月30日，随着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第三帝国开始在欧洲崛起。短短几年，日尔曼帝国就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变为欧洲的主宰，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很快就又土崩瓦解了。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奥秘何在？除了有其历史必然性外，无疑还与希特勒个性有关。希特勒以其个人天赋的魔力使果实成熟了，却又因把握不住这种魔力无法为德国收获。他犯了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在他那被奉若神明的个人意志驱使下，又无可挽回地将其送入历史的垃圾坑。

### “极乐岛”上的滑稽祷告

1939年9月1日，150万德国大军越过波兰边境，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在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中宣称：“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这是他那天讲到的唯一实话。

纳粹德国的征服达到高潮时，曾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则几乎打到尼罗河。然而到1942年底，纳粹曾一度不可遏制的大规模闪电攻势，终于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在酷热如焚的北非沙漠破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法西斯胜利的伟大转折点。1944年6月6日，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突破了“大西洋壁垒”，苏军推进速度也大大加快，到1945年4月，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希特勒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为期不远在盟军空袭下，德国总理府成为废墟。希特勒不得不钻入地下防弹办公室。正是在这个与世隔绝被戏称为“极乐岛”的狭小空间里，希特勒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损害了希特勒的健康，加上整日不见阳光，希特勒变成了一个憔悴麻木的老人。

4月初的一个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为希特勒朗读元首喜爱的《腓德烈大王史》。当希特勒听到2月12日俄国女皇之死，使那位已感日暮途穷准备在2月15日自杀的大王时来运转时，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显然盼望着最后一分钟能出现奇迹。戈培尔研究了张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后告诉元首一个惊人的结论：“4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但从1948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对此，希特勒是愿意相信的。

正好过去一周，希特勒盼望的奇迹似乎真的出现了。“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宣传部长激动地报告说。“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元首精神顿觉开朗，他拿起即刻送到的剪报对一位前来参见的纳粹大员喊道：“这儿，念吧！这儿！您是从来也不愿相信的。就在这儿！我一向预言奇迹就在这儿。是谁正确？”

战争没有输掉。您念吧！罗斯福死了！”是啊，他没有理由不这样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天之所赐。他相信，美国总统的死亡无疑是上苍在最后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迹象！这就是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在“极乐岛”上演的一幕滑稽剧。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没有仪仗队举枪致敬，虽然所有纳粹元老都在座，但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打破人们脸上的凄楚冷清。

生日还没过完，元首的左膀右臂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就匆匆告辞，逃离了柏林。面对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惨景，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又一次发作：“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着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希特勒决定不去萨尔斯堡，到他那神话般的巴巴罗河山间大本营去指挥第三帝国的抵抗，而是留在柏林。他告诉劝他为了德国活下去的崇拜者说：“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他发誓，“我决定留在柏林……以身殉国。……我将含笑与世长辞。”其实希特勒很清楚，既然身子已掉到井里，耳朵怎么能挂得住呢？

## 死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希特勒在他临死前一天立下的“政治遗嘱”中辩解道。“需要战争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他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残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身上，并咬牙切齿地表示：“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的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并且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除了“政治遗嘱”，希特勒还留下一份“私人遗嘱”，主要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还处理了他的财产问题。

爱娃·勃劳恩是4月15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的。她做他的情妇已有12年之久。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脾气随和，希特勒非常喜欢她，但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萨尔斯堡没完没了的打扮，为远离的情人憔悴。爱娃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偶尔逗乐时自称“国母”外，她几乎从来不去，也不想去影响希特勒，她无心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那种恃宠专擅的女人，她知道这种女人是最为希特勒痛恨的。希特勒曾当着她的面在大庭广众下谈他对女人的态度：“非常聪明的男人应当取幼稚、愚蠢的女人。要是我娶了一个女人，老是在我的工作上插嘴，诸位想想，会怎么样！在我空闲时，我要的是安宁……结婚，我永远不能。要是我有了孩子，问题就多了！末了，他们还会企图让我的儿子做我的继承人。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别指望会有一个能干的儿子。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不结婚，在斗争年代尤为重要。”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不同了，“斗争年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因此，“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婚礼是在4月29日凌晨，由一位惊诧不已的市议员主持举行的，新郎新娘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当爱娃·勃劳恩在登记表上签了“爱娃·希特勒”名字后，她成了元首的正式妻子，尽管这只有一天半时间。对于这对新人首要的或唯一的事情不是享受新婚之乐，而是考虑如何死去。希特勒在遗嘱中写道：“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4月29日下午，“极乐岛”收到外面的最后一批消息。希特勒的侵略伙伴、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已命丧黄泉，并被暴尸米兰广场，任人践踏。这消息促使希特勒加快进行他最后的准备。

4月30日用毕最后一顿午餐，希特勒和爱娃一道同戈培尔等人诀别。然后带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卧室。一声枪响过后，戈培尔等人走了进去。对嘴开了一枪的希特勒趴在沙发上，尸体还在流血。服毒身亡的新娘子躺在他的身边。

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这是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10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后的12年零3个月。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7天，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德国无条件投降了。

### “我的本钱就是我的意志”

“对于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我的计划要么全部实现，要么全部失败。如果实现了，我将成为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如果失败了，我将被制裁，被唾弃，被诅咒。”这就是希特勒的意志——赌徒的意志。它确曾使他成为短命的第三帝国的“伟人”；它更使他被诅咒，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诅咒。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他继承了父亲的偏执性格，11岁的小希特勒已经敢违抗父命，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自作主张。中学时代的希特勒则“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缺乏自制力。

到维也纳谋生时，希特勒性情变得更为古怪。然而尽管他劳动懒散，却无其他潦倒青年酗酒主事的恶习，工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从黑格尔、尼采的哲学、政治学，到激烈的反犹报刊都是这个不修边幅青年人喜欢的读物。当他1913年离开维也纳，1914年作为德国巴伐利亚步兵团一名下士参加战争时，他魔鬼般的性格已经形成了。他不仅具有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慧、驰骋的奇想和对局势的惊人判断力，他把这些特性固化在他的罪恶的目标上，这一目标是统治日尔曼人，镇压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废除议会和结束民主“胡闹”。

抱着坚定的目标，怀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希特勒爬上了别人爬不上去的山，渡过了别人渡不过去的河。他改造纳粹党，使“领袖原则”成为党的第一原则。他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却不失当独裁者的决心，竟然在法庭上公开宣布“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一千倍”，表示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治理一国人民”的义务。这一被所有正常人都看作痴心妄想的事，希特勒却做到了。他收买了陆军、笼住了资本家、骗取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当上了第三帝国总理；他实行党禁，消灭了反对派；他通过授权法，剥夺了国会的权力；他把总统、总理职权合二为一，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

高总司令。

征服德国，希特勒一路过关斩将；征服欧洲，他起码在最初阶段也总能马到成功。1938年3月，他几乎兵不血刃就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他又通过慕尼黑阴谋先后肢解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发狂。不受限制的独裁权力彻底腐蚀了这位醉心权势暴君的心灵，一个显赫的“功绩”使希特勒难以驾驭的性格更加放荡不羁，他动辄搬出他的老本，卖弄他的意志，训斥他的部下：“我当初是赤手空拳起家的，当初我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在所有看来比我更加命该当领导的人都失败以后，我才开始我的事业。我的本钱就是我的意志，我已经奋斗过来了。我的全部生活历程证明我是从来不曾投降过……我重复说一遍，‘不可能’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他办事越来越不客观，越来越专横跋扈，面对他的独断专行，德国人越来越无可奈何。因看到战争危险而被解职的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当时就发出哀叹：“这个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统统拉着与他同归于尽。我们是无可奈何的。”

在进攻波兰前，各方面情报说明英法将对此加以干涉，连一向十分激进的戈培尔都认为风险太大，建议走一条和平路线，因为德国的力量远远没有强大到打一场世界大战。然而希特勒另有想法。既然奥地利、捷克他能轻松拿下，为什么不会再出现一次慕尼黑呢？他忘记了“赌兴正浓，即行停止，最最上策”的赌博要旨，决心用他的意志再创奇迹。英法劝阻，希特勒拒绝；英法下最后通牒，希特勒不予理睬；英法对德宣战，希特勒认为这只是表面文章。他说：“诸位可不了解这些民主国家……他们会背信弃义地抛弃波兰的！”但是，英国空袭威廉港、邱吉尔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和“雅典娜号”邮船被击沉，使他美梦破灭，开始走向失败。

## 业余行家

希特勒的唯意志论给他带来十分糟糕的后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这种意志贯穿在他的“业余行家”作风中。

希特勒从来没有学通过任何一门专业知识。他曾立志当个画家，对建筑师的工作似乎也有过兴趣，但最后却又去吃政治饭。

希特勒好大喜功，什么事总爱露一手。有时候，作为门外汉，希特勒的异想天开会使有关专家大吃一惊。例如，战争初期在战略上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可以归为希特勒对战争规则的不学无术，和他的蛮干、顽固。但是，他的这一套一旦为人知晓，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像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拳击手在训练有素的高手面前一样，很快就一败涂地了。这时他对战争规则知之甚少的缺点也就不再是他的优点了。

1942年，德军设计出重达50吨的虎式坦克，但由于希特勒坚持认为装甲是最重要的，重量不得不增加到75吨，大大降低了它的机动性。然而他不顾参谋人员的劝告，亲自命令第一批造出的6辆虎式坦克投入沼泽地作战。结果由于坦克不可能作战术展开，全部被苏联反坦克炮击中薄弱的侧面装甲而报销。

希特勒经常粗暴地训斥他的专家和部下，特别是那些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他常常怒吼道：“所谓的专家们和那些已被任命为领导的人总是对我说：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种话我不爱听！”由于他事无巨细都要插手，也由于他喜欢那些没有头脑的人，使他身边聚起了一帮不提反对意见、不拿主意的庸碌之徒。

希特勒从不去前线视察，他的决定大多是看着地图拍拍脑袋作出的，既缺乏对局势的分析和对作战思想的逻辑推敲，又不考虑敌人可能采取什么反措施，加上他对士兵的艰苦和士气的低落往往一无所知，有时竟把一些战斗力早已丧失的部队在地图上拨来拨去，不是命令他们立即投入战斗，就是命令他们不许后撤，造成大量无谓的伤亡。

### 纳粹党：多事的婆婆

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初，迫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希特勒接受了党和国家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的原则。希特勒知道，虽然他能运用纳粹冲锋队的街头功能摧毁左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但对帮他上台的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则必须采取哪怕是暂时的合作态度，否则德国就会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中破产，从而危及自身。因此他向仍在街头斗殴，希望通过“第二次革命”为自己在政府或企业中谋取优厚差使的冲锋队发出警告，他将无情镇压破坏现有秩序的“第二次革命”。他还召集党的各邦邦长，给他们讲党不得干预政府和企业工作的“道理”：“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接着他又进一步讲到：“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后来当他发现激进的冲锋队头头们并不想理睬他这番“道理”时，就干脆血洗了他们。

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备战开战的需要，希特勒渐渐采取了让纳粹党全面插手国家事务的作法。1936年他任命对经济十分无知的戈林为使德国转入战争经济的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取代公认的经济金融奇才沙赫特博士。戈林立刻取消了企业的自由经营权，把一切都纳入战争计划，强行规定企业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并没完没了地要求企业家对党作巨额“特别捐献”，使企业界大失所望，甚至一向对党忠心耿耿的大企业家和捐助人蒂森也发出“纳粹政权毁了德国工业”的抱怨。

1941年初，希特勒信赖的建筑师施佩尔接过经济主管权。但他一上任就极力改变党直接干预经济的状况，使军备生产颇有起色，然而强大的党内势力最后还是使他被迫就范。握有大权的党的邦长常常指责企业家“都是反动的，为片面的经济主张所束缚，同党离心离德”，并指使秘密警察惩治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党的激进领导人绍克尔甚至说，枪毙几个企业家，其他人才能做出较好成绩来。有时他们干脆直接下令，要某某企业负责人离职，由他们的亲朋好友接任。这一切大大损伤了企业界人士埋头苦干的热情和责任感。

纳粹党对军事工作的干预在希特勒1938年亲任国防部长、1941年执掌陆军总司令权力后也大大加强了。希特勒认为，“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

必不可少。有一次他向墨索里尼传授经验说：“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为此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和“人民军官团”，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军官时，用“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由于希特勒纳粹党对各方面的专业人员采取极不信任的态度，似乎每一个人都是骗子，因而设置了一道又一道关卡来限制他们的工作。例如企业家每做一笔出口交易就要填写 40 多种不同的表格，而其中主要是为了给官方看的。在这种制度下，官方机构变得十分庞大繁复，连纳粹大员都抱怨说，“仅把不信任态度改为信任态度。管理部门内就有 60 万到 80 万人成为多余”。典型的德国官僚主义由于极权主义制度而变本加厉，由此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对工作热情的打击形成巨大的内耗，其对战争的损害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 种族理论毁灭了原子弹

1942 年，战争进入你死我活的自热化状态，希特勒纳粹分子逐渐把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一种具有全新效力的武器上。令伦敦和华盛顿惶惶不可终日的德国原子弹计划似乎已开始实施。直到 1944 年底英美两国政府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探悉到德国人在这一次战争中不再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了。实际上，英美的焦虑可以说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从纳粹在 1933 年把爱因斯坦的著作扔进火堆那一刻起，德国就注定要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中败北。

根据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德国大批犹太科学家被解职，物理学泰斗爱因斯坦也因他的犹太血统遭到纳粹教授们的非难和政府的驱逐。亚琛技术学院的纓勒教授就在一本叫《犹太人和科学》的书里，揭露了一个所谓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世界文明的犹太人阴谋，而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被斥为其中的头号恶棍。他指责相对论“从头到尾都是旨在改变由大地产生的、鲜血结合的生命体的现实世界——就是非犹太世界，把它变成为光谱式的抽象东西，一切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一切种族的内在限制，都在非现实中丧失了。”而全世界对相对论的赞扬实际上只是对“犹太人统治世界局面的来临、迫使德国人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沦为无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海德堡大学教授莱纳德是很早就追随希特勒的少数科学家之一。他曾亲口告诫这位纳粹独裁者，说犹太人研究核物理和相对论是企图以此腐蚀人心。他宣称：“物理学中的糟粕已被清除，根据现已流行的种族学研究成果，证明这些糟粕统统是犹太精神的产物，而德国人民应避免接触不合自己种族特性的犹太精神。”希特勒十分赏识这位忠诚的教授。他常在别人面前引用莱纳德的名言，把核物理学称为“犹太人物理学”。既然元首有这样的谕旨，谁还敢认真支持核研究呢？

1942 年，纳粹德国确实讨论过发展核武器问题，并有过一些动作。1942 年 6 月初，陆海空军备生产代表米尔希元帅、弗罗姆和维策尔上将会同战时生产部部长施佩尔，在柏林听取了关于德国原子研究现状的介绍。在会上，

诺贝尔奖金得主海森贝格作了关于“原子裂变以及铀机器和回旋加速器的发展”的报告。他抱怨教育部忽视核研究和缺乏经费，并指出由于科研辅助人员被抽调到三军中，至使德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落后于美国。他断定，如果立即得到最大支持，原子弹的生产技术条件也至少用两年时间才可以完成。几个星期后，科学家们拿到了用于德国第一座回旋加速器建造工程的200万马克经费。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希特勒耳边吹风，希望他能对这种能够一举摧毁整座城市的新武器感兴趣。

希特勒“业余行家”的作风使他喜欢异想天开，但他在技术问题上的眼界，正像他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生活方式一样，都超不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他对技术问题的兴趣局限在常规武器上，对于原子弹制造这样的新科技发展，他的智力显然是不够的。他既无法想象核裂变的情景，又对核裂变连锁反应能否控制表示怀疑。他不无嘲弄地开玩笑说，天真的渴望揭露天下一切秘密的科学家们，可能有一天会把地球变成一个炽热的星球。这显然不是决心统治世界的他所期望的，因而他对制造原子弹理所当然地采取了“不值得花大力气去认真对待”的态度。

到1943年夏，制造原子弹的念头已从纳粹要人的头脑中消失了。撇开希特勒的疑虑不说，党卫队长官希姆莱以对党国不忠为由把许多原子科学家投入监狱，剩下一些人则被他派去从事他认为更重要的、以活人为豚鼠的无聊“科学”试验。而存在铀库中的仅有的1200吨铀被用来充当其他原料的替代品。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造出，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独裁政权扫地出门的人：来自希特勒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来自墨索里尼意大利的菲尔米。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在否决了原子弹的同时，希特勒把对新武器的注意力转到由青年火箭专家布劳恩研制出来的远程重型火箭上。当他在—部彩色影片中看到这种飞弹从发射台升起又在同温层消失的壮丽景色时，兴奋不已地断定：生产这种武器“是一项决定战争胜负的措施”。1944年9月，第一批火箭袭击了英国。荒唐可笑的是，盟军每天出动4100架轰炸机对德国领土扔下3000吨炸弹，希特勒则只能指望每天用30枚火箭把24吨炸药打到英国报复。捡了芝麻，扔了西瓜，这就是希特勒在决定制造新式武器方面的“英明”所在。

### 姗姗来迟的战时总动员

1942年夏季，希特勒武装部队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这片辽阔土地总数非常巨大的潜在资源——法国和南斯拉夫的铜矿、瑞典的铁矿、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石油都落到德国人掌握之中。如果有位统计学家来估计一下德国所控制的资源可能使它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什么结果，他将会合乎情理地提出报告说：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大国是任何敌对的联盟都无法打倒的。

然而在以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第三帝国就出人预料地被推翻了。要是资源状况是唯一应加以考虑的因素，统计学家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但无法用统计数字估计的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第三帝国的灭亡，既是政治历史因素决定的，也是希特勒冥顽不化地阻挠资源组织工作和拒不对德国人民实行总动员的结果。

在英美民主国家，邱吉尔和罗斯福实行总动员，毫无顾忌地使他们国家

的人民增加了种种负担，相比之下，极权主义的希特勒德国对这件事却拖拖拉拉，这不能不说是这场战争中令人费解的一桩怪事。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希特勒对人民有特别的善心，而是因为他的政权本质上极其软弱，他害怕强迫人民作出牺牲会丧失民心，导致纳粹政权的垮台。特别是作为 1918 年德国 11 月人民革命的目睹者，希特勒仍然记忆犹新，宁愿谨慎从事。为了预防对战争产生不满情绪，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即德国入侵波兰那一天还庄严地向国会宣布，再不会有物资匮乏的事情发生了。后来德国在消费品供应、军人抚恤金方面所花的钱，确实要比西方民主国家为多。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希特勒迟迟不作战争总动员，还在于他过分相信德国的闪电战，总以短期战争、长期休战为其战争动员的出发点。

当希特勒在 30 年代准备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时，他拒不听从战略分析家的劝告，不肯进行“深度”武装。这一失策使他的职业军事顾问深感忧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德国过于相信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但是，希特勒无心接受这个教训，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想法，他相信通过军事手段来实行一种希特勒式的政变，或者在新武器、新战术支持下，主动选择时间、地点发动打击，就可以即刻迫使德国的牺牲者屈膝。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动用全部作战潜力打一场消耗战。

希特勒确实一度取得成功，把第三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如果他不那样固执，及时改弦更张，最大限度地动用占领区的资源，动员德国本土的力量，他也许还有能力和苏英美继续对抗。可谓羊亡补牢，犹未晚也。但历史证明他的目光是短浅的。他预期对苏战争用时很短，手头储备已经够用，甚至在 1942 年战争已显得不那么顺手时，他仍牺牲军备生产，花钱去准备看不到效益的未来建设。当他的军备部长提出削减化工长期建设投资时，他明令指出：“也许跟俄国人打的这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我还有更远大的计划……这些新工厂的建设工程必须继续进行，即使要在几年后建成也罢。”

然而到 1942 年冬，斯大林格勒的溃败就不仅表明闪电战术并不能赢得整个战争，而且希特勒毫无准备的、长期的、代价昂贵的消耗战已经到来，仅利用现有的武器已不可能再打下去。这时连元首的忠实追随者戈培尔都感到局势严重，不仅号召民众限制需求，而且要求权贵们放弃奢华享受，支持军备生产。

但就是对这本来已经姗姗来迟的总动员，希特勒仍拿不出足够的热情和勇气来支持。到头来他既没有真正同意减少民用商品产量来提高军备生产，也没有停止领导层的挥霍。为了“体面”，纳粹大员争相建造深宅大院、狩猎山庄和豪华别墅。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关心也到了疯狂的程度。希特勒本人不论走到何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修建地下避弹室。仅在夏洛腾矿泉浴场的“巨人”避弹系统，用去的水泥就超过 1944 年全德居民修建防空洞的总和。另外，由于一向不过问政治的爱娃·布劳恩的干涉，停止生产化妆品的禁令解除了。但是，对妇女的优待不仅仅表现在美容问题上，更表现在希特勒始终不肯动用德国的这“半边天”上。

### 德国女人的任务是生孩子

法国沦陷后，英国决心动员妇女，以弥补它和德国之间人数上的差别。但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一定早已用日尔曼

民族办事认真的脾气和极权主义残酷手段，把它的妇女套上战争的大车。然而事实表明，希特勒不仅没有先于英国动员德国妇女参与战争，而且连仿效英国的步子都没迈出。

实际上早在 1939 年 6 月，劳动部国务秘书西罗布已建议德国国防委员会，动员 550 万未参加工作的妇女到战时经济各部门工作。但没人理睬。到 1942 年，尽管动员妇女工作问题已刻不容缓，动员工作依然疲疲沓沓。在 14 到 65 岁的妇女中，只有 45% 的人在工厂上全日或半日班。相比之下，英国有 60% 的妇女投入生产，并且不分昼夜随时开赴最需要的地方。

希特勒不愿动员妇女，除了怕人心不稳外，还有他的特殊考虑——比别人站得“高”得多的种族优生方面的考虑。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指出：“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保持其纯洁……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换句话说，国家的任务是保种，即保证大日尔曼族后继有人，而且必须是纯洁和健康的人。

那么，生儿育女的具体任务要由谁来担当呢？女人！在这里，崇拜尼采的希特勒肯定想到了他的这个老师的狂言大语：“男子应受战争的训练，女子应受创造战士的训练。其他一切都是愚蠢的行为。”所不同的是他的老师主张用鞭子对待女人，而他则要给这些“保种机器”良好的环境。

正因为从如此大处着眼，希特勒不愿看到工厂劳动损害德国妇女的“精神与感情生活”，更担心工厂劳动有使妇女面临伤风败俗的危险。不仅工厂劳动，他甚至认为家务劳动也有损健康，要予以解决。他授权他的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通知各邦邦长：“为了显著地减轻德国家庭主妇、尤其是多子女母亲的负担，并不致进而危害她们的健康，元首责成我从东方各地区挑选四、五十万个强健的姑娘运到德国来。”到 1943 年 6 月，英国女佣人数已减少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可德国直到战争结束仍有 140 万。另外，运到德国的 50 万乌克兰姑娘有许多成为腐化不堪的党的干部的佣工。这一切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军备开支更加吃紧了。

### 只有日尔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

在当代历史上，最大的征服者莫过于希特勒了。他用不到 3 年的时间就把他的帝国扩张成一个疆域辽阔，拥有 2 亿 5 千万人口的大帝国。然而历史又证明，希特勒只是个思想平庸、鼠目寸光的征服者。他不肯把征服土地上的盟友、臣民当人看待，以争取他们的合作，而是把他们逼上与他为敌、背水一战的境地。这个同样出于他那嗜血成性的野蛮性格的政策连同其他错误，使他没能像那些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元勋那样，在自己去世后还使国家延续数百年之久，而是在它登峰造极仅两年半后倾刻瓦解，不仅丢掉了新夺得的土地，而且丢掉了自己原有的土地和国家。

拿破仑走过看上去同希特勒很相似的征服道路，虽然他从未获得希特勒所拥有的恺撒般的权力。但是，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 1940 年 6 月使法国沦陷后的那副牌，那他兴许会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的失败。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是他们成为独裁者的那个国家的子民，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

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 17、18 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非法兰西臣民的征服者、剥削者，又是给他们带去西方文明和管理经验的文化传播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伟大的解放者。正是由于这一点，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大之歌》中把拿破仑视为神明，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则作为拿破仑最忠实的走狗公开站起来，向自己的同胞真诚地鼓吹，捍卫拿破仑的事业就是捍卫他们自己的民族事业。

希特勒则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认为取得权力而不尝尝鲜血的滋味就不过瘾，骑在非日耳曼民族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就难以满足。

如果希特勒有拿破仑那般道德和心胸，如果他不放弃德国最初侵略周边国家时招降纳叛的策略，约束自己享受“狡兔死，走狗烹”的乐趣，他也许也能赢得那位法国人的业绩，也会有自己的许许多多具有号召力的忠实走狗。

别的不说，德国军队进入苏联之初，确曾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被俄国占领不久的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未停止的乌克兰，被不少人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当时柏林曾有人相信，如果希特勒采取怀柔政策，答应这些地区建立自治政府，是有可能把那里的居民争取过来的。但是，就像希特勒不曾劝说，也不曾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样，他已打好把那里的人民像一切非日耳曼人一样当作牲畜供日耳曼人驱使的主意。他要统治远至乌拉尔的俄国领土。在这一大片土地上将一如既往，“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

由于希特勒采取了不仁不义的极端措施，大批可能的同盟者被赶到敌人一边。纳粹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政治司副司长在一份报告中不无惋惜地写道：“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天之所以无比英勇地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但是，纳粹中的这位明智者可能忘记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并非是他心血来潮的一时之举，而是早在他那本发行了 600 多万册的“吃人者圣经”——《我的奋斗》中就已经写明的。

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旨，就是要用种族主义和夺取生存空间论锻造巨型剪刀，剪贴大德意志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新秩序”：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最终仅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是日耳曼主宰民族的奴隶，而其中的“不受欢迎分子”——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斯拉夫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必须灭绝。如果必要，也许可以留下部分斯拉夫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为其开矿和拉犁。

理论上的荒诞不仅仅带来了实践上的残暴。在捷克和波兰，杀人比赛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早已开始。有一次，当波兰总督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 7 名捷克大学生时，立刻高声叫着对一个德国记者说：“如果我要每枪毙 7 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然而斯拉夫人的被屠杀和犹太人的命运比起来则只不过是小事见大巫。1942 年夏秋，希特勒发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命令。纳粹法西斯设立的 30 多个灭绝营和死亡工厂开始超负荷运转。现代科技武装下建起的毒气室在《快乐的寡夫》的轻松曲调中，有条不紊地断送着那些可怜人的性命。共有



600 万犹太人成为希特勒的屈死鬼。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希特勒的屠杀政策把他奴役下和受到他奴役威胁的民族引向了抵抗的道路，他们不愿俯首贴耳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或引颈受戮，而宁愿忍受和冲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团结起来把那个使他们咬牙切齿的人送入地狱。

1945 年 5 月 8 日午夜，欧洲连天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 1939 年 9 月 1 日以来在这块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宁静。在这 5 年 8 个月零 7 天中，在 100 个战场上，在 1000 个被轰炸的城镇中，在村庄边，在纳粹的毒气室里，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屠杀。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征服野心在人类文明史上造成的结果。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唱着《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的冲锋队的“咔、咔……”长筒靴声了，再也没有元首那富有煽动力的从扩音器里发出的歇斯底里尖叫声了。经过 12 年 4 个月零 8 天之后，希特勒连同他的“千秋帝国”都被彻底埋葬在饱含愤怒的瓦砾堆中。当代人类的那颗曾发出过耀眼死光的煞星殒灭了。人类得救了。

罗云力

多行不义必自毙

## ——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暴尸广场

国王们被推翻，很少有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的。

——拿破仑

1945年4月29日，在米兰洛列托广场上，陈列着15具法西斯党魁的尸体。愤怒的意大利人纷纷前来报仇雪恨。一个男子冲到一具男尸前，朝他的脑袋狠狠踢了一脚；接着一个老妇人又向那个尸体连开5枪，为她的5个儿子报了仇。前来报仇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将死尸倒挂在一个加油站的顶棚上，以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法西斯鼻祖，二次世界大战三元凶之一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下场。

当人们将墨索里尼暴尸广场，以各自最解恨的方式惩罚和诅咒这个人类灾星的时候，历史也正在翻开新的一页。然而，墨索里尼惊心动魄的覆灭场面和种种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直到今天，仍使人们记忆犹新。

### 死有余辜

墨索里尼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战争一开始就给自己脖子上套上了灭亡的绞索。然而真正拉紧绞索的是1942年11月打响的阿拉曼战役，战役使德意法西斯军队遭到致命打击，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末日的开始。

战场上的失利，加深了意大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罢工和反战浪潮猛烈冲击着墨索里尼独裁政治的基础。包括国王在内的政界、军界的许多重要人物企图推翻墨索里尼的密谋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1943年7月19日与希特勒会晤时墨索里尼呆若木鸡、唯唯诺诺的态度使墨索里尼的高级军事将领们彻底失望，于是，以法西斯党元老、前外交部长狄诺·格兰弟为首的一些人斗胆抗上，拼死相争，于7月24日召开了国家法西斯党最高领导中心——大议会会议，以19票赞成、7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推翻了墨索里尼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接着，国王又宣布由巴多格里奥元帅接替墨索里尼的政府总理职位。这时，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又来个落井下石，将墨索里尼逮捕起来，囚禁在一个兵营里。就这样，这个统治意大利21年的“伟大领袖”，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惨淡经营几十年的权位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铁窗生活使墨索里尼极度痛苦、绝望，他曾割断手腕的血管，企图一死了之。

墨索里尼身陷囹圄，希特勒如丧考妣，他组织了108人的营救突袭队，分乘12架滑翔机，并绑架意大利安全司令作人质，将墨索里尼救出。感激涕零的墨索里尼于9月23日回到家乡弗利市，宣布成立了法西斯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并于10月7日将政府办公地点迁到萨洛市，继续将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

1945年上半年，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墨索里尼四面楚歌，朝不保夕。在他提出有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意大利游击队的全国解放委员会拒绝后，墨索里尼害怕落入英美军队手中，遂于1945年4月26日带着情妇贝塔西和一小队人马向瑞士逃去。这时，跟随墨索里尼负责“保卫”工作的德国党卫军军官基斯纳特接到德国主子命令：“阻止墨索里尼逃往瑞士，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

4月27日清晨，在科莫湖源头一个叫东戈的地方，墨索里尼一行被意大利游击队截住，经过一番盘查，装扮成德国士兵的墨索里尼被捕，其他法西斯要犯也同时落入法网。

为防止夜长梦多，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司令部派瓦莱里奥上校率一支15人的小分队对墨索里尼等人执行枪决。

瓦莱里奥走到墨索里尼等人面前，以胜利者的口吻讲明了他的来意：“本人奉自由志愿军总司令的命令，要为意大利人民申张正义！”，他拿起俘虏名单，宣布：“本尼托·墨索里尼，死刑！克拉拉·贝塔西，死刑！”贝塔西大叫大闹：“不行，你们不能就这样把我们杀掉！”瓦莱里奥扳动自动步枪扳机，枪没响，他又用手枪，也卡了壳，他向当地游击队的一位政委要来冲锋枪，这时墨索里尼突然想到要死得“壮烈些”，便一把扯开衣领，叫道：“往胸脯上打。”克拉拉上前夺枪，被瓦莱里奥一枪击中心脏，应声倒下。随后瓦莱里奥向墨索里尼射去两排子弹，墨索里尼身中9弹，这个十恶不赦的法西斯头子，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墨索里尼的垮台，是其长时期对外扩张侵略、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结果。

### 罪不容诛的法西斯统治

墨索里尼从小就是有名的好斗顽童，经常打架斗殴，动辄刀斧相见，无法无天。长大后更是崇尚暴力。当一名美国记者问他笔和剑哪个威力大时，他立即回答，“剑，因为剑能刺人，结果人的性命”。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暴力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纠集一帮乌合之众，于1919年组织了“法西斯战斗团”，1921年，又网罗一批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反动军人，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墨索里尼等人为他们的党制定的党徽的标志是，一捆棍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意思是，人民要绝对服从他们勇武的领袖，这也是“法西斯”这一名词的原意。墨索里尼，以此创造了以恐怖、镇压、屠杀为特征的摧残人性的法西斯统治方式。由于得到了当时政府的利用和扶持，法西斯运动组织发展很快，到1921年底，已拥有834个战斗队，249036个成员，在意大利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1922年10月，乘政府危机更加严重之机，墨索里尼决心破釜沉舟，倚仗他的法西斯武装力量，他公然向政府发出挑战：“要么使法西斯合法得到权力，要么使法西斯被迫发动暴动。”10月28日，他的法西斯小分队开始向罗马进军，在声势浩大的武力的威逼下，国王一退再退，准备改组内阁以吸收墨索里尼入阁缓和局势，而墨索里尼得寸进尺，毫不妥协。最后，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向国王递交了他拟定的内阁名单，要国王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国王只好照办了。

在当时意大利的危机局势下，墨索里尼正在被社会各层人士（特别是出于反共防共的需要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希望所承认和接受，1922年11月25日，众议院授予墨索里尼新政府“执政全权”。

墨索里尼上台后，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基础不牢，为了巩固统治，他加紧了对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他知道自己不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于是就用法西斯棍棒来压服、制服。1923年1月，墨索里尼颁布了成立国家安全志愿民

团的法令：将王室卫队、法西斯小分队、民族主义者的“时刻准备队”等所有非正规军事部队全部纳入国家安全志愿民团，并禁止成立任何其他民间军事组织，国家安全志愿民团必须绝对服从政府首脑即墨索里尼本人的指挥，这样，他把意大利所有的武装力量都抓到他个人手里。有了这一强暴有力的工具，他就对意大利人民为所欲为，施展淫威了。在议会中，有3名反对派议员遭法西斯党徒杀害，约50名议员遭到毒打。据报纸报道，法西斯统治的第一年中平均每天发生5起暴行。法西斯统治的最典型的例子是1924年大选。

1924年4月，墨索里尼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但这次选举完全是在法西斯党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不准自由选举，不准拉选票，法西斯党事先拟定了一个“大名单”。墨索里尼懂得，要想得到胜利必须使用暴力。所以他指示地方政府干涉反对派的竞选会议。那段时间，法西斯党徒的公开袭击活动骤然大增，法西斯党徒无法无天，造成很多严重的暴力事件：反对派阿芒杜拉要召开会议受到阻拦；社会党领袖马太奥蒂遭到非人的残酷折磨。一名社会党候选人遇害，其他许多候选人退出了选举，成百人受伤或被杀。在选举日，个别法西斯头领还有计划地在那些不太可靠的地区制造恐怖。而警察对此类暴行却很少干预，几名外国记者加以报道反遭鞭打和驱逐出境。选举之后墨索里尼又命令惩戒小分队，哪儿的反对派得势，就在哪儿采取行动。就是在这样恐吓和压制下，法西斯党及其支持者取得2/3议席。

这次大选的作弊和法西斯党徒的暴力行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在1924年5月30日的议会会议上，勇敢的反对派人士马太奥蒂挺身而出，公开揭露这一事实。墨索里尼哪里容许一名议员这样与他作对，他对手下人说：“教训他一下。”“干掉他！”“像马太奥蒂这样的对手就得拔出手枪对付。”果然，10天后，马太奥蒂被法西斯分子暗杀。暗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墨索里尼决定取消新闻自由，命令严禁反政府报刊的出版发行，并加紧了对革命党和进步人士的迫害。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发表恐吓演说，把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当人们不再相信的时候，可以用武力迫使他们相信”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意大利要求和平，要求平静，要求起码的安稳。假如可能的话，我们要给予它爱；假如必要的话，我们要施以暴力。在本人讲话后的48小时内，全国的形势将会明朗化。”这次讲话宣布了意大利民主政治的结束。

这种强暴的压制不可能完全使人屈服。1925年11月—1926年10月间，连续发生过4起谋杀墨索里尼的事件，而这些行刺事件又成了墨索里尼进一步强化法西斯政权的最好借口。1926年10月，颁布了取缔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法令；除法西斯党团外，所有政治团体均属被禁之列，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投入狱中或流放到遥远的岛屿，还严格搜查反对派的报社。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正如斯大林所说：“德国、日本、意大利在侵犯盟国之前，已经把本国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在本国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至此，意大利已经全面地、公开地法西斯化了。

墨索里尼以武力威逼而上台，又以恐吓、镇压、屠杀而执政，完全是用法西斯棍棒来奠定和维持他的专制统治的。任何残暴的专制统治都不可能完全使反对者屈服，任何只靠暴力手段来维持的统治都不可能长久。所以，墨索里尼被推翻是必然的。

玩火自焚

墨索里尼妄图称霸世界，建立一个疆域包括多瑙河、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新罗马帝国”。经过十几年的积蓄力量，终于在1935年10月向埃塞俄比亚（当时称“阿比西尼亚”）发起了进攻。从此，这个乱世奸雄就开始越出意大利国界，涂炭他国人民了。

为了建立“新罗马帝国”，意大利需要有一个欧洲朋友，由于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意大利与英法的利益冲突严重，而这时，妄图吞并奥地利、掀起欧洲战争的希特勒，急于组成纳粹法西斯联盟，正要在欧洲找到一个伙伴支持他，就加紧拉拢意大利。墨索里尼虽然在奥地利问题上与德国有矛盾，但他又害怕英法和解对自己不利，最后还是倒向了德国。1936年10月，双方签订了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11月，踌躇满志的墨索里尼宣布“从柏林到罗马的这一条直线不是区分线，而是一个轴心”。自此以后，德意越靠越近。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勾结，对于法西斯政权乃至他本人的生命进程，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轴心国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对世界的政治秩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1939年4月，意军进攻阿尔巴尼亚，10月占领该国，这一“胜利”使墨索里尼得意忘形。在他的催促下，1939年5月，德意外长在柏林又签署了“钢铁盟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墨索里尼把自己和希特勒紧紧地拴在一条绳子上了。急于称霸世界的希特勒决定进攻波兰了，这时，意大利法西斯内部大多数人虽然同意进攻波兰，但不同意马上动手，因为他们知道，打波兰将引起欧洲战争，而意大利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一旦参战只能导致失败。意大利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工业原料及燃料严重依赖进口，经济实力也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薄弱。侵埃战争、西班牙战争和阿尔巴尼亚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军事上的损失尚未恢复，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不足，能够打仗的只有10个师，其他60个师不是装备不足，就是装备落后。鉴于这种状况，墨索里尼本人也希望希特勒把战争推迟3年，然而希特勒的战争冒险决心已定，他对意大利的这种希望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墨索里尼骑虎难下。战争打响后，墨索里尼陷入重重矛盾，按其好战的秉性及扩张的野心，恨不得立即投入战争，无奈国内实力不足，参战必定失败，所以他希望仗打不起来，等3年后他准备好了再打；同时他又希望仗能打起来，欧洲几个大国互相残杀，特别是希望法国在战争中被削弱，意大利能取得对科西嘉岛和突尼斯的主权。经过半年的观望、徘徊，禁不起希特勒欧洲战果的诱惑，墨索里尼终于按捺不住，在希特勒的催促下，于1940年6月正式向英法宣战。墨索里尼陷入了世界大战的深渊，加速了法西斯政权的覆灭。

德意结成了钢铁军事同盟，而双方却各有自己的扩张计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互利用，不免三心二意，貌合神离。在希特勒眼里，墨索里尼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而是一个副手。齐亚诺日记写道：“最终我感到，德国人之所以与我们结盟，只是因为我们可以牵制若干敌军，减少对德国战线的压力。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对于我们的命运，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知道，决定战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而到战争结束时，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不过是残羹冷饭。”墨索里尼意识到这一点，心里很恼火，当他得知希特勒背着于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感到自己受骗上当，被希特勒拖入了一场不确知的冒险中，他怒不可遏地大骂希特勒。而且，他在暗中希望希特勒在赢得最后胜利之前遭到几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1940年底和1941年初，意军在希腊和北非连连失败，墨索里尼一筹莫展，又只好向希特勒求援，在实力强大的德军的介入下，他们又收复了希腊。墨索里尼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他还有赖于希特勒。至此，他的命运与希特勒拴得更紧了。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墨索里尼唯恐再次坐失参战良机，决心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下一笔大赌注，以待胜利后分享战果时能与希特勒平起平坐。所以他不顾意大利国内经济一团糟、部队军备严重不足、士气低落，当天就向苏联宣战，并于6月26日派兵到侵苏前线。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所提供的假战果、编造的地图和数据所鼓舞。抱着必胜的信念，还要求将意军在俄国战争的兵力增加一倍。这纯属愚蠢荒谬之举，因为实际上增派部队所需的装备当时根本无法解决。

墨索里尼不顾国内实际情况，一心投靠德国、大举参战的举动，越来越把意大利引向灾难。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德意法西斯遭到严重打击，意大利内部军心动摇。据墨索里尼自己承认，在1943年初，面对已定的败局，他本人曾想设法退出这场战争，不管德国人是否同意。但由于他的懦弱屈从、惧怕希特勒，几次想好都没敢提出。1943年7月，两个独裁者再次会晤，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墨索里尼一声不响，由于坚持不要翻译，他听不懂希特勒那口若悬河的德语，加之身体虚弱，他下定的决心在希特勒面前又化为乌有了，并且在希特勒的高谈阔论、盲目吹嘘下，对胜利的希望又死灰复燃了。就在这时，消息传来：罗马首次遭到空袭。意大利人感到再也不能让希特勒牵着鼻子走了，而要摆脱希特勒，就必须干掉墨索里尼，于是，出现了1943年7月24日国家法西斯党大议会的不信任案。

### 庸人恶人亡命徒

每一个政权都拥有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每一个政治领袖都拥有自己的干将和追随者。分掌国家各部门各层次领导权的基层掌权者的素质、品质和能力，关系着这个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追随者们的形象，也是政治领袖成败沉浮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集结在墨索里尼法西斯大旗之下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招集了150多人组成了法西斯战斗团，其成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富农、反动的大学生、军官和思想堕落分子。为了广泛招揽党徒，墨索里尼进行了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一些好战分子、退伍军人、暴徒、解职军官以及阿尔地特手榴弹大刀队，都纷纷加入了。意大利的阿尔地特队前身是意大利各市的义勇队，作战英勇顽强，天不怕、地不怕，手拿炸弹、口含短刀。后来这支部队为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西斯运动产生前几个月，意大利退伍士兵曾组织了“黑衫党”，该组织活动类似海盗，因所有的法西斯党徒都着黑色制服而得名。

法西斯党徒常以滋扰闹事为乐趣。他们性格粗野，杀气腾腾，在大街上常常听见他们“杀！杀！杀！”的狂吠声。法西斯党的战斗小分队四处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恐吓、抢劫、勒索和骚扰。在大街上和田野中，每天都有血案发生，星期日、假日和任何集会的时间，流血事件更加频繁。他们还自立刑法、私设法庭，疯狂虐杀进步人士，有时剃人的须发，有时灌人以蓖麻子油。

法西斯领导阶层多是一些昏庸无道的家伙，这一点连墨索里尼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们都是些坏透了的家伙。”只有两个大臣能力中上，但多数根本不够格。有的若是在其他国家甚至是该坐牢的罪犯。墨索里尼选择内阁大臣宁要低能儿，也不要精明人。他乐于委任一些缺少才智的二流货，甚至干脆选用地痞无赖。

法西斯领导阶层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不受法律条款的约束，大量公共钱财被任意挥霍，且无帐可查。地方法西斯头目更是无法无天，他们左右法庭和警察，甚至利用武装匪徒保卫他们的特权地位。尤其是后期，法西斯党已经成了一个庞大、懒散、压抑的官僚主义机构，它沉重地压在意大利头上，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死气沉沉，充满了镇压、恐怖的警察国家。后期的法西斯领导层，几乎全是无能之辈，经常索贿受贿，他们的职位使他们享有豁免权，未经党的书记批准不受逮捕。墨索里尼本人也声名狼藉。公众舆论干脆将法西斯领导人与窃贼或更坏的名词划等

这就是墨索里尼的追随者，正是他们构成了法西斯政权的组织基础。这样一个暴徒横行的社会；这样一个恶人、庸人的政权，其最后被推翻，并不让人觉得奇怪。

### 超级独裁

在墨索里尼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军队、警察、议员、行政官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下级严格服从上级，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站在权力顶峰的国家首脑，通过这种等级结构进行统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国家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都是这一模式。墨索里尼上台后，组织了内阁政府，下设若干部长，部长要向内阁总理负责，他自任内阁总理兼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到 1929 年夏，他一人担任内阁中 2/3 的大臣职务，13 个部的 8 个部长，此外法西斯大议会、社团全国理事会以及内阁会议均由他主持，后来还挂任三军大元帅。墨索里尼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通过向各部大臣及军队将领下达指示、发布命令。内阁召开一次会议可以通过许多法令，有时全部法令均由墨索里尼一人以兼任的各部大臣的不同身份提出。这样的集权，使处在塔尖之下的权力阶梯上的各部大臣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感，他们有时连必要的决定都作不出来，一切都是由墨索里尼说了算。由于墨索里尼本人优柔寡断，这种情况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在很多情况下，首脑的最高权力会因其下属对他的不服从而受到损失，而首脑权力的丧失，正是其权力结构逐步松动、瓦解、崩溃的结果。

墨索里尼强调集权，妄图控制一切，结果什么也控制不了。这种缺乏检查监督和制衡的集权，其结果是造成后期抗命的现象日益严重。据警察总监说，几乎人人都欺骗他，拒不服从他的命令。尤其是后期，意大利高级官员中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已经对他的独裁失去信心，产生不服从的心理。据记载，在希腊战争失败后，意大利只有少数人支持他，内部离心倾向日益增强，他的意志已不再被下级绝对地服从了，就连法西斯统治集团内的某些最亲密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也开始反对他了。他们在暗中策划驱逐他下台。只是由于对墨索里尼个人的畏惧感太根深蒂固了，外表上并没有叛乱发生。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反叛已经形成。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与希特



勒会晤，新任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要求他明确提出意大利要退出战争，可墨索里尼不敢向希特勒提出，当回国后又提及此事时，安布罗西奥当场顶撞了他，墨索里尼哑口无言。

事实说明，墨索里尼的金字塔正是由于其自身的机制而日益失去威力，最终土崩瓦解了。

### 怪僻孤傲 反复无常

墨索里尼是举世罕见的怪人、狂人，他那病态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弱点，也是构成他灭亡的重要因素。

墨索里尼是个狂热、容易冲动的人。他常常整日心神不安，处于兴奋状态。他对执行一项长期策略缺乏耐心和恒心，基本上靠一时的冲动行事。他常诡秘地说，只要行动，就有好处，“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有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要干什么就单凭直觉和本能作出决定。有时挑选大臣他只是顺着候选人名单往下看，一旦想起一张熟悉的面孔或者碰到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拍板定案。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捉摸不透、性情暴躁”，“能干出头脑发胀的事来……有一股着了魔似的固执劲儿”，而他自己认为这是创造性天才的一种表现。比如，多年来法西斯所奢谈的“闪电战”就完全是以墨索里尼的错误直觉为前提的，从来也没有让总参谋部充分讨论过，结果从战争一开始，就使用了错误的武器和采取了错误的战略。

墨索里尼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他的一个叫切萨雷·罗西的亲密伙伴描述他时说：“他能熟练地接连扮演几个完全相反或矛盾的角色。……今天说这是白的，明天又说这是黑的，但每次都让人深信不疑。”墨索里尼本人也直言不讳，他对思想和看法是否前后一致不太在乎，他知道应该如何有效地变换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据情况，时而反动，时而革命”。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时可以下达前后不一的命令。特别是与德国签约后，由于情绪时高时低，反反复复，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主意，有时一天之内竟变动多次。欧战打响后，墨索里尼每天都在改变计划；按他的想法，进攻无需多少思索或准备，每时每刻都可发动。这就给将军们造成很大困难，他爱好用突然改变计划的办法让参谋长们大吃一惊，丝毫不考虑这会起多少复杂的情况。1940年6月底，他命令陆军在利比亚的部署由防御转入进攻，而7月初，又决定集中力量对付南斯拉夫。

墨索里尼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个性，就是自负、孤傲、怪僻。他的孤来源于他的傲，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别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墨索里尼年轻时的确有一些优点，特别是早期他的缺点尚未暴露时，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令人们惊讶不已；他智力过人、记忆力强，还有铁一般的意志，严格的时间观念，等等，由于有了这个资本，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与世隔绝、高高在上、不受外界影响的超人。他自命一贯正确，不需听别人的劝告，也很少感到有必要与他人讨论政策，只需要仆人来执行他的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征询别人意见，也只是为了让别人回答来证实他的正确。他很得意地自我吹嘘说：“我常常希望是我错了，但至今这种事还从未有过。所有发生的事都在我预料之中。”这种自命不凡的傲气使他在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时带着一种排外心理。他喜好只身独处，从学生时就未交过朋友，自此一直有意不与人来往，他也很少请客人来家，他说：“一个领袖不可有与他平起平坐的对手，不可有朋友，对谁都不能讲知心话。”

当一个人担任国家领导后，他在品质和性格上的优缺点，不仅为他周围的人们和最高掌权层所熟悉，而且也将为全国的民众所了解。领导职位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把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加以放大。掌握着巨大权力的领导人，他的每一项决定，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普通人的优缺点，通常不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个掌权者，他在品质和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特别是这个人品质和性格上的缺陷，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利或有害的影响。墨索里尼的自负、怪僻、凭直觉行事、反复无常等缺点，对意大利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也成了他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

### 领袖崇拜使他失去客观

墨索里尼上台没几年，意大利就出现了领袖崇拜的社会风气。这不仅满足了他贪图虚荣、喜好吹捧的私欲，更重要的是，成了他巩固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允许和鼓励领袖崇拜，人为地制造一种服从心理，使他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权力“合法化”，造成“社会的认可”，通过领袖崇拜，强化他的领袖权。他认为：群众不必使知之，只需使信之，迫其就范；群众既然无法自己作主，他们就乐于受命于人。所以墨索里尼有意不让意大利人知道事实真相。为了使人们相信他在国外受到普遍赞扬，他有时不惜篡改国外报刊。他在自传中谎称：外国人都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在这种虚假的基础上，法西斯官员们大肆推行领袖崇拜，他们说墨索里尼“才智超群，历史上无与伦比”，“墨索里尼永远正确”就成了人人皆知的口头禅了，所有公共建筑物上都挂起了墨索里尼的画像。

侵埃战争后，又出现了墨索里尼狂热崇拜的新高潮，几乎成了一种制度。内阁大臣在他面前要立正，一站就好几个小时；谒见者必须跑步到领袖的办公桌前，谒见后跑步出来、敬礼；电影中有墨索里尼的镜头，观众要起立致敬；就连妇女用的游泳衣上也印有他的头像。还出现了许多盲目崇拜领袖的荒谬事件。如有一名男子，因墨索里尼拥抱和亲吻过他，高兴得发了疯，自此再不刮脸修面。

领袖崇拜愈演愈甚，教皇讨好地宣称墨索里尼是“受上帝派遣拯救意大利的使者”。法西斯高级传教士们也称他为“圣明的恺撒”，“精神之父”，这又使墨索里尼的专权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墨索里尼自己也神乎其神地说，他是在加里波的逝世后不久出生的，这是上帝有意派他来接任加里波的做意大利的统帅的。按照党的命令，称墨索里尼的代名词必须和称上帝的代词一样大写。于是，许多愚昧无知的人把他视为神灵，求他保佑，农民在田野里向他下跪，妇女举起孩子请他祝福，一个老农民跋涉两个多月，赶到罗马，将一小桶“圣水”献给他。

领袖崇拜使墨索里尼完全与外世隔绝，生活在举手欢呼的人群和为他歌功颂德的奉承者之中。大臣和下级官员的地位和权力最终都来源于领袖。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或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即使不是出自内心，也竭力奉行领袖崇拜。法西斯官员们都把墨索里尼视为个人前途的靠山。结果，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马屁精、伪君子 and 钻营者。他越来越深居简出，置身于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的小人之中，爱听赞扬顺耳之言，欣赏奴颜婢膝之徒。他的下级为证明领袖凭空臆想所做的决定一贯正确，从

来报喜不报忧，例如，在参加二战前意大利作战物质准备极不充分，但仍有人投其所好，掩盖真相，一位空军将领当着墨索里尼的面说：意大利空军是“如此之多，以致飞起来可以遮天蔽日”，也恰恰是这位将军因他的部队装备不足而几次要求辞职。领袖崇拜使墨索里尼不能客观地认识和处理问题，他爱听奉承话以及由此造成的谄媚讨好之风，不能不说是导致他毁灭的一个主要因素。

刘晓敏

战争中崛起 战火中毁灭

## ——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

安危在是非，不在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

——韩非子东条英机是日本前内阁首相，甲级战犯，日军侵华的罪魁。1931年，他参与策划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后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率东条兵团侵入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所到之处，烧杀虏掠，无恶不作。战争使东条发迹，战争又使他灭亡。

### 用战争解决问题

东条英机认为，战争是日本摆脱危机，扩大实力，征服亚洲、控制太平洋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手段。所以，当东条英机就任陆相以后，积极鼓吹日军南下。由于担心美国出兵，日本舆论并不一致，内阁成员意见分歧也较大。当时的首相近卫主张争取与美国谈判。东条估计到美国不会轻易让步，认为希望美国在东南亚问题上让步只是幻想，因而，东条极力攫取日军对美作战的指挥权。

事情的确如东条英机所预料的，美国不但没有在东南亚问题上让步，反而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撤军。近卫考虑到日本国力和国民的情绪不宜与美国开战，主张在外交上向美国妥协，同时积极争取侵华日军的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东条英机对近卫的这一主张不以为然，他认为近卫太软弱，缺乏果断精神。

在近卫内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为了贯彻他的指导思想，终于向近卫内阁发起了挑战，迫使近卫内阁辞职，然后由他担任首相，同时兼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

东条一上台便向国内外发表了一个好战的政府声明，叫嚷要征服中国，“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 玩弄外交权术

东条一就任首相，便开始进行南进的准备。他一开始并不想同美国谈判，但在外相的劝说下，采取了与美国玩弄外交权术的把戏，一边谈判，一边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着手实施以“Z”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此时的日本军方上层握有实权的人物极力赞成东条的侵略政策，显得更加迫不及待。10月23日的军方联合会议上，海军军令总长永野大将及参谋总长杉山将军一致要求立即作出作战决定，不宜再拖。

然而，东条认为还要继续与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术，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同时将谈判期限定在12月1日。

日本为了在美国方面讨得一点回旋的余地，派出了一个谈判代表团。就在罗斯福总统接见日本大使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讲话，并在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指出，谈判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应“对日本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取消封锁，全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

由于美国已破译日本政府与日驻美使馆的来往密电，并得知日本谈判是

假，已决心对美发动战争，所以美国政府除在军事方面进行准备外，在外交上力争主动。经罗斯福批准，通过了《美日协定基础概略》，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和政权；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粉碎了日本的政治阴谋，使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大难临头！”随后，他要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

## 发动太平洋战争

11月5日，山本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概括了敌对行动开始后的第一阶段内海军的战略。它不但包括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还包括对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许多地方的同时袭击，山本把所有飞行队长集中在它的旗舰上，把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告诉了它们。在24小时内，这位舰队司令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把敌对行动计划初步确定为12月8日。从此，日本海军和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

在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东条于1941年11月6日召开了第七十七次临时议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所谓“铁石般的斥敌壮语”，强烈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为一亿国民齐上阵大声疾呼。东条说，“百议不如一行”。他要大家拿出实际行动。他不顾国民反对，在9分钟之内，强令国会通过了追加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的预算案。他强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求全体军民为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为称霸世界作出贡献。

在12月1日御前会议上，东条恳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说：“日本帝国之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就这样，天皇裕仁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文件上盖了御玺。

就在天皇批准开战3小时后，山本用新密语向进攻珍珠港的日军发出了一份稍长的电报“登斯高山208”意即按原计划在12月8日发起进攻。

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日本联合舰队按东条大本营的命令，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夺取西南太平洋扫除障碍，在12月8日这一天，同时对东南亚发动了进攻。

从1941年12月8日至1943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地区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岛屿与城市。日本侵略军所向披靡，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占了3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达1亿5千万，创造了日本在东方侵略的“奇迹”。

面对日本法西斯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东条英机如醉若狂，大声疾呼要迅速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加强对殖民区的统治。1942年1月，他在议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声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日方管理和控制”，并提出“战争即建设，建设即战争”的法西斯口号。1942年11月1日，东条内阁专门成立了一个部级机构，名曰“大东亚省”，负责着手建立所谓“大

东亚共荣圈”的活动。

形式上，日本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实质上从此导致了东条内阁背离国际公法原则，并走向与世界全面对立的一边，同德意法西斯勾结更紧，遭致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其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 在内外交困中下台

1942年6月，日本军队进攻中途岛受挫，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折。1943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因座机被美军击中而丧命。日本在太平洋战役中一连串的失败使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形势日趋对日本不利。

马里亚纳海战中，日本又遭失败，东条认为，日本海军的战斗力的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制止盟军进攻和一举改变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决战。

随着形势的吃紧，日本海陆两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大将认为，同敌人的关键性的战役还是应在海上打。已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参谋总长杉山提出异议，表示反对。

东条的好友兼顾问佐藤主动向东条建议。“我们应该后撤，在菲律宾与美决一雌雄，然后展开和平攻势……”

东条打断他的话说：“别再提和平攻势了，如果你我一提和平，整个部队的士气就垮了。”

佐藤的建议引起了东条的重视，尤其是在关键时刻陆军、海军意见相左，杉山有意展开和平攻势，佐藤对自己的建议，十有八九来自参谋总部。当晚，东条建议杉山总长辞职，东条解释说，在此严重的局势下，最好由他本人兼陆相和总长。

“这是违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的。”杉山抗议说，“不应由一人既作出政治决定，又作出军事决定。”

“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要干。”

杉山按捺气愤地争辩道：“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部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东条咄咄逼人，毫不示弱，“如果有人反对，我就立刻撤换他！”

第二天，即2月21日，东条解除了杉山总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这样，他就把首相、内相、陆相和参谋总长4个要职集于一身。

东条巩固权力的专断行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不安。重臣们认为，日本的困境全是东条领导的结果。他们都主张解除东条的首相职务，其中近卫和冈田最积极。特别是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又拿下塞班岛，并打垮了日本舰队的空军之后，日本朝野惊恐万状。国内舆论对于东条内阁开始了强烈抨击。

1944年7月，连一向被人们认为对东条内阁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议会，此时也议论纷纷。7月6日下午2时，召开了“翼赞政治会国会议员会议”。会上，由于时局的关系，议员们普通关心的前途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议员们呼吁应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国会，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推翻东条内阁。

就连一向是“东条内阁的积极拥护者”的“翼赞政治会”总裁、重臣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也被这一气氛卷了进去。有人问他对此看法，他含糊其词：

“我认为诸位均言之有理，我极表赞同。”国会议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东条内阁不汲取多方面意见，应引咎辞职。与此同时，东条严格控制下的军令部，一部分军官也展开了另一种反对东条的斗争。在昏暗的防空军事掩体中，以高木将军为首，伏下、矢部、天川4个军人以及松前通信院工务局长又聚在了一起。松前根据他掌握的东条新的战略计划，坚持自己一贯主张，必须让东条下台。他们一起议论道：战局越来越坏，可是东条却毫无办法。有人提出了干掉东条的极端办法。在这样广泛的不满情绪面前，东条寄希望于一直支持他的宫内大臣木户。然而，东条从木户的态度中，已感到天皇对他失去了信任。回到官邸，他沮丧地对佐滕说：“我准备放弃再组阁的想法，我要辞职。”

“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怎么谈得上辞职！”佐滕劝道：“战争是你发动的，你不能中途甩手不管。”

这正中东条下怀，东条以为内阁也会如此。为了重新组阁，东条召见了遭海军反对的海军大臣岛田，要他辞去海相职务，并召米内入阁代替岛田，遭拒绝。其时，米内正与其他重臣密谋倒阁。

东条尽管几乎失去信心，但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感到日本目前还没有人能替代他。他决定通过辞职，要挟反对他的人。7月18日上午，东条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用懊丧的语调对内阁说，由于塞班失陷，他决定辞职。接着他又声明，日本战败的责任必须由“重臣”和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他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众内阁成员的挽留，此时，他才真正感到大势已去，他的双肩垂了下去，然后愤愤地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

内阁会议结束后，他便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天皇办公室走去，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拜谒天皇。

历时2年又10个月的东条内阁终于垮台了。就任新首相的小矶国昭，仍然坚持将侵略战争进行下去。

## 战争狂的末日

1945年7月，美英中苏在德国波茨坦一致通过了敦促日本投降的四国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

日本政府对此置若罔闻，采取极不认真的态度，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中国和苏联对口发起了全面反攻，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告战败，并以天皇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年8月底，盟军成立远东委员会，并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列为甲级战犯第一名。

9月12日，东条在寓所安顿完妻儿，听见房外人声鼎沸，预感末日来临，朝自己胸脯开了一枪，此时是下午4时17分。与此同时，执行逮捕东条英机的美军少校保罗·克劳斯带领美军宪兵冲了进去。

经过医院抢救，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经过3年多的审理，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绞刑。同年12月23日零时35分，东条英机与其他6名甲级战犯被施以绞刑。战争狂罪有应得。



谭克丽 徐力 张宁一

政坛恶魔民心丧尽 发动侵略自取灭亡

## ——阿明总统罪大恶极被人民推翻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

1989年1月3日，一架银灰色容机平稳降落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恩吉利机场。乘客纷纷走出机舱，人头攒动。这时，一个满脸横肉、身高1.93米的男子引起了机场工作人员的注意，经检查，这个在沙特阿拉伯登机乘客的护照是假的，他的真名叫伊迪·阿明·达达，是10年前被推翻的乌干达总统、臭名昭著的暴君。扎伊尔当局将其幽禁起来。12日他被驱逐出境，送上去塞内加尔的飞机，到达喀尔换乘去沙特阿拉伯的飞机，无奈沙特对阿明早已厌烦，不准他入境，只得从原路返回扎伊尔。阿明向非洲数国提出避难要求均遭拒绝，乌干达政府要求将他引渡回国，接受人民的审判。蒙博托总统不愿阿明久留扎伊尔，遂请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出面说情，法赫德国王碍于情面，勉强同意接纳他。18日阿明回到吉达，继续过孤单寂寞的流亡生活。昔日颐指气使、一手遮天的终身总统，何以被人唾弃？

### 八年暴政 民不聊生

阿明，卡夸族人，信伊斯兰教。1971年1月25日乘奥博特总统外出参加英联邦会议之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任总统。1976年6月通过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任命自己为终身总统。1977年初指定11岁的儿子姆旺加为自己的继承人，妄图世袭总统职位。

阿明掌权后，处心积虑保权位、谋霸权。政变上台后为稳定局势，他许愿即将在全国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早日恢复文官统治；精心安排从英国运回前布干达王国国王、乌干达首任总统穆特萨的遗体，按照布干达传统葬于王陵以笼络占全国人口1/4的巴干达人；释放包括部长、军队司令在内长期被拘押的50多名犯人，表现出民主、宽容与和解的姿态，人民欢欣鼓舞，开始憧憬美好的未来。殊不知阿明正在有计划地建立以卡夸族穆斯林为主的军事独裁政权，伴随着乌干达人民的将是恐怖和贫困。

阿明戎行出身，政变上台，深知巩固政权离不开军队，必须确保军人忠诚于他，遂成批杀害支持奥博特的兰戈族、阿乔利族官兵，有时干脆用炸药炸毁囚禁这些官兵的营房，仅1971年就有一千多人遇害。阿明还下令，凡在军队、警察、监狱部门服役的兰戈、阿乔利族官兵格杀勿论。部队清洗殃及百姓，阿明倒台前夕，许多兰戈人、阿乔利人居住的村庄几乎找不到一个成年男子。清洗的同时大量扩军，军队编制迅速突破2万，新征的1.6万名新兵几乎都来自阿明的家乡西尼罗河地区和苏丹南部，他们担任各级指挥，牢牢地掌握了兵权。不顾国力大量添置装备、增加军饷；为军人开设特价商店（以优惠价格出售免税奢侈品、市场上紧缺的基本日用品）。军人倍受宠幸，飞扬跋扈，他们有任意捕人和就地处决的特权，谁敢冒犯（抱怨也不行）他们就会招来杀身大祸。他们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阿明缺德少才（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小学），野心却不小，自视高人一等，理应受到世人尊敬。他信奉“尊重全因害怕，侵略全凭实力”。他成倍扩充军警宪特，组织10个暗杀队，亲自掌管特务机关国家调查局（总部与阿明别墅有地道相通），兼任警察理事会主席、监狱理事会主席，实行法西

斯独裁统治。便衣、宪特混迹于人民中间，横行在大街小巷，肆无忌惮地捕人，恐怖笼罩着乌干达，人们不敢说话，互不往来，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能否活着看到明天。关押犯人的囚室酷似地牢，没有光线和厕所，犯人被捆绑着手脚，每天只能得到一片土豆，半杯水。军警常踩在犯人的手腕上用犀牛皮鞭子抽打他们，往指甲里钉钉子，逼迫他们在尖利的石头上爬行、剜眼、电刑……许多人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乌干达没有长期囚犯，他们未经司法机关审判即被杀害：勒死、烧死、活埋、活刷、肢解、油炸（从受害人身上割下肉油炸后逼其吃下，任其慢慢流血死去）。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无辜的百姓，只是抱怨了包括列兵、下士在内的在职者，或因个人恩怨、妒忌被扣上反阿明的帽子惨遭毒手。许多政界、军界、宗教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人、名人遇害则直接受命于阿明。阿明杀人不眨眼，早在英国皇家非洲步枪队当兵时就惯用手帕闷死肯尼亚茅茅战士，博取英国主子的赏识。上台后大开杀戒，经常编造坦桑尼亚、卢旺达、英国，甚至中国入侵的谎言，几十、几百的成批杀害无辜，让人们对他“畏而敬之”。破获未遂政变后更是杀人如麻，尸体来不及清理就扔进尼罗河喂鳄鱼。据大赦国际估计，他执政8年大约杀了三、四十万人，连他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人们在一辆汽车车尾的行李箱内发现他的妻子卡伊被肢解的尸体，另一个妻子马利亚姆几经周折才躲过杀手的肆扰，逃到伦敦避难。

阿明凶残成性，吃人肉，喝人血。人们在他的司令部里发现他吃剩下来的遇害外长翁多加的肝脏；大规模杀人时，他用葫芦盛装鲜血供己随时饮用。他多次饶有兴味地对他的私人秘书兼卫生部长谈论食人肉的事儿，并用肯定的语气说：“人肉是咸的。”毫无忏悔之意，真是人面兽心，天地难容。

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政治上昏天黑地，经济上连年赤字，生产下降，商品奇缺，通货膨胀，国库空虚。1972年8月阿明发动的经济战严重扰乱了经济，约8万名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的工商业者、种植园主被驱逐，致使工商业衰落，农产品收购渠道不畅！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空缺，使许多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阿明的亲贵大受其益，他们中饱从被驱逐者手中没收的资产和他们的住宅、汽车，成了百万富翁、暴发户（坎帕拉等地的商店、零售业分给了士兵，换取他们的支持），他们不会，也没有心思经营企业，只图牟利聚财，甚至把政府发给他们购置进口器材的外汇存入外国银行吃息。咖啡是乌干达经济的支柱，占外汇收入的80~90%。1976年和1977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上涨，为阿明政府挣回了10亿美元，但这些钱全用于军费开支（一般占预算的65%），为军警官员进口奢侈品。政府不守信用，不按时、按价（有时根本不付钱款）收购农产品，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咖啡、茶叶、蔗糖等主要出口农作物的产量下降。民穷财尽，财政赤字连年超过26亿乌干达先令（官价约8先令换1美元）。食品、药品、火柴、汽油等生活必需品奇缺，黑市猖獗，物价飞涨，2磅一袋的糖由阿明上台时的14美分涨到15美元。最低月工资34美元只能买10个面包，一个劳力一天挣1.37英镑，买不起一瓶啤酒（实际上啤酒是特供士兵饮用的，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 众叛亲离 咎由自取

1974年3月4日，卢格巴拉族参谋长阿鲁贝对阿明倚重伊斯兰教信徒不

满，发动政变未遂身亡，5百多人被打断双腿后活活烧死或被捆住手脚扔进河里喂鳄鱼，绝大多数是卢格巴拉族人。该族是西尼罗河地区最大的部族，曾经是阿明扩军和物色幕僚的主要对象，历史上阿拉伯奴隶贩子的骚扰使他们厌恶伊斯兰教，多数信奉基督教。1972年初为获得援助，阿明转向阿拉伯国家，在国内加紧推行伊斯兰化，卢格巴拉族人逐渐失去宠信。1972年6月卢格巴拉族人阿达米上尉被暗杀，在该族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要报仇，甚或推翻阿明政府，正在摩洛哥开会的阿明闻讯匆匆回国，平息了这场风波。1973年后许多卢格巴拉族官兵“失踪”（被暗杀的代名词）或被囚禁，阿明苦心经营的军队出现了裂痕。

阿明玩弄权术，不时撤换军政官员，杀戮异己，以维护自己的总统职位和独裁统治。执政8年多，内阁改组19次，总参谋长八易其人。截至1977年上半年，6名内阁部长、3名高级军官遭残害，15名部长、8名相当于副部长的常任秘书逃亡国外躲灾避难。阿明惧怕军政官员尤其是军官久居其位，尾大不掉，危及其统治，遂采用在他们立足未稳就易人的招数，保证自己掌握的军政大权不旁落。刚愎自用，容不得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亦是他频繁更换各级官员的重要原因，至亲好友也不例外。1979年初，阿明仅存的两个亲贵，他的侄子，人称“第一号杀手”的作战、训练部长马里亚蒙古准将和阿明的亲密战友、参谋长戈翁少将因斥责其部下怂恿入侵坦桑尼亚的士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反被勒令呆在营房“休假”。阿明偷袭坦桑尼亚成功得意忘形，又命令两人率3000努比亚人再次进击坦桑。两人分析了战场形势的新变化，列举乌军武器装备、汽油、粮食都不足，坦桑方面已有准备，作了大规模动员而且装备比较先进，加上阿明想争取肯尼亚总统莫伊的支持和合作很难如愿，劝阿明放弃这次军事行动。阿明一意孤行，下令进攻坦桑，大败而归。回到坎帕拉，阿明恼羞成怒，硬说戈翁、马里亚蒙古与坦桑勾结，命令他们“无限期离任”，数名军警官员被捕，抗命不进攻坦桑的士兵遭枪杀。阿明统治后期感到形势不妙，玩起了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拿自己的亲信开刀，大规模清洗军警宪特：镇压国内动乱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马萨卡地区的“专制军阀”——马萨卡机械化革命敢死团团团长纳苏尔中校被撤职；经常以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判处反政府人士死刑的财政部长摩西·阿里准将也被免职并开除军籍；阿明的侄儿，负责防务的国务部长兼参谋长卢马戈少将被捕；保安警察和秘密行刑队的头头也身陷囹圄或出逃他国。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阿明几乎每天都在调换他的指挥官……这种每天的抢座位游戏是他存在的唯一办法。”

阿明妄图用滥捕乱杀，清除异己等暴举威慑国人，进而获得尊重，达到他永久统治乌干达的目的。不料“物极必反”，矛盾激化，政局不稳。士兵哗变、军官谋反，行刺、暗杀总统的事件屡见叠出。1976年6月阿明从坎帕拉警察总局出来，一颗手榴弹击中他的卧车，司机丧命，37名路人受伤，阿明幸免。第二年，阿明最信任的空军少校和他的兄弟（陆军少尉）等人策划推翻阿明，建立文官政权。6月18日凌晨，一些军人隐藏在恩德培总统宅邸周围的灌木丛中伺机枪杀阿明，被人告密失败，身穿防弹服的阿明在混战中受伤，未及要害。1978年10月10日阿明出席麦克雷雷大学的毕业典礼，回归时有意换乘一辆没有标记的汽车，不走正式车队行驶的路线，躲过了一次预先安排的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的袭击。1979年年初，半个月发生了两起谋划暗杀阿明的事件。戈翁少将、马里亚蒙古准将和宪兵司令易卜拉欣中校

策划，等出访沙特阿拉伯的阿明专机飞回恩德培机场时干掉他，阿明闻风改在金贾机场降落。粗略统计，阿明统治 8 年期间，暗杀他的活动和未遂政变计有 30 多起。阿明当政后非常重视保卫工作，在个人安全方面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严格挑选警卫人员。以色列支持并帮助阿明政变成功，赢得阿明的信赖并负责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后，改从西尼罗河地区各族，尤其是卡夸族军人中挑选忠诚可靠的人担任保卫工作，同时安排国家安全局的特务、秘密警察监视他们的言行，掌握他们的可靠程度。阿明统治后期重用从苏丹南部、扎伊尔东北部招募的卡夸族雇佣兵，军队中出现了矛盾，乌军中卡夸族士兵也分成支持阿明和支持副总统兼国防、内政部长穆斯塔法的两派，对卡夸族士兵也不相信的总统选用巴勒斯坦人做他的警卫人员。人说狡兔三窟，阿明在坎帕拉、恩德培的官邸、别墅有 30 多处，形势紧张时半夜三更乘直升飞机更换住处，躲避刺客。自 1977 年起深居简出，外出须有装备重武器的护卫队保驾，行动诡秘，行动计划和日程安排皆保密；他还多次“失踪”，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以至 1977 年 6 月总统府发表声明寻找阿明；复出后谎称与某个妻子“度蜜月”去了，或称“补度蜜月”（按照伊斯兰教规定，阿明可娶 4 个妻子，他喜新厌旧，常因另有新欢而与原先的妻子离婚）。当年耀武扬威，企望称霸一方的终身总统，今日东躲西藏，惊魂不定，实在难于统治下去了。

### 日暮途穷 狼狈逃亡

危机四伏，政局动荡是阿明统治后期的真实写照。十多万逃亡国外的难民在坦桑尼亚、肯尼亚、赞比亚、英国、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几十个反阿明组织，它们和国内的反政府地下组织都在为推翻阿明的独裁统治而斗争。阿明苦心经营军队，企望赖以巩固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兵变迭起，军人反戈，动摇了他的根基，促使其早日垮台，成了他的掘墓人。

1977 年是阿明政权的多事之秋。新年伊始，阿明逮捕 35 名要求改组政府的下级军官，宣布破获一起军人打算在他执政 6 周年时暗杀他的阴谋。接着在全国进行大清洗。据统计，半年内仅逃往肯尼亚的难民就达 3 千多人，许多人带有枪伤。2 月 19 日坎帕拉以西 100 英里穆本德的一个陆军营哗变，不久阿明声称破获一起得到美、英和以色列支持的政变阴谋，指责坦桑尼亚向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下令消灭在陆军、空军、警察和监狱服役的兰戈族和阿乔利族人。3 月，地下反政府组织乌干达民主联盟致函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抨击乌干达“经济越来越军事化，基本生活必需品现在只有军方贵族享受”，要求苏联停止给阿明军事援助。6 月上旬，一个自称乌干达民族阵线的地下组织向阿明发出最后通牒，要他在 6 月 17 日以前“下台”，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阿明下台后立即成立由乌干达首席法官领导的看守政府，60 天内举行自由选举。活跃在乌干达邻国和英、美的反阿明组织都在积聚力量，准备打回乌干达，阿明的统治受到了挑战。阿明不到黄河心不死，4 月初他公开责难军政要员盗用公款、参与走私，并把杀人的责任全都推给他们，洗刷自己，扬言要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讯。此后，马萨卡机械化革命敢死团团团长纳苏尔中校，财政部长摩西·阿里，阿明的挚友、负责警察部队训练和作战的阿里·图韦利，交通运输部长埃蒂昂等相继被撤职；参谋长卢马戈少将，以海关税收调查员身份出现的秘密警察局头头德拉

尼等被捕或被软禁。阿明的连襟、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穆斯塔法深入士兵，得到广泛支持，在军队中很有威信，阿明如鲠在喉，非除之不可。4月19日穆斯塔法乘坐的小汽车在坎帕拉郊区与一迎面驶来的卡车相撞，副总统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他的警卫开枪射击卡车上国家调查局的秘密警察，双方交火。用交通事故除掉对手是阿明近年来多次使用的一着。穆斯塔法在开罗治疗期间，受到4名秘密警察的监护。4月25日乌干达电台宣布，阿明兼任国防、内政部长，12月28日阿明免去穆斯塔法兼任的国防、内政部长职务，削弱他的兵权。清洗的同时，阿明多次改组政府，亲自掌管警察和监狱、外交部、新闻部。清洗高层官员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阿明与财长摩西·阿里在财经问题上发生争执，各自拔出手枪要火拚，被劝阻，阿明的威信下降。7月，乌干达一些重要城市出现要阿明下台、卢马戈取而代之的印刷品。

朝秦暮楚，有军援便是爹；恩将仇报，言行轻率怪诞，这使阿明在国际上日益孤立。1978年4月加拿大政府宣布：阿明在埃德蒙顿联邦运动会上是不受欢迎的。7月，美国参议院决定，禁止与乌干达的一切贸易，不再从乌干达进口咖啡，这对濒于崩溃的乌干达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8月，阿明在肯雅塔葬礼上受到查尔斯亲王的冷落。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乌干达的贸易禁令。阿明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承认乌干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没人慷慨解囊，政府又拿不出进口生活必需品，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渡过经济难关。1979年3月末，唯一全力支持阿明侵略坦桑尼亚的卡扎菲，在阿明作最后拚搏的关键时刻撤走利比亚军队，无异于釜底抽薪，剩下几百名乌干达士兵又有何用！

穆斯塔法大难不死，阿明决定剪除其羽翼，许多支持副总统的军人被捕被杀，他们的家属被遣送回西尼罗河地区老家。军队中支持总统和支持副总统的卡夸族士兵火并；来自苏丹、扎伊尔的卡夸族雇佣兵与乌干达卡夸族军人也有矛盾，冲突迭起。1978年10月初驻守姆巴拉拉的乌军哗变，支持穆斯塔法，多次击退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击落一架米格喷气机，击溃并消灭前来镇压的机械化团，阿明政权风雨飘摇，政局动荡不定。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0月31日阿明谎称坦桑尼亚入侵，对坦桑发动“闪电式进攻”，坦方猝不及防，丢失卡盖拉河以北18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阿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宣布并吞这片土地，以卡盖拉河为两国新国界。11月16日扬言要著书立说，记述这次在创世界记录的25分钟内攻占大片土地的“辉煌战果”，留芳百世。

初战告捷，阿明忘乎所以，不听参谋长戈翁和作战、训练部长马里亚蒙古等将领的忠告，执意进一步侵入坦桑扩大战果，严厉镇压抗拒进攻令的官兵，促使戈翁、马里亚蒙古和宪兵司令易卜拉欣谋划在机场干掉出访沙特归来的阿明，闻讯改变飞行航线、生还首都的阿明立即召集最高级军事领导会议，斥责3人搞政变，3人反唇相讥，指责阿明使国家陷入恐怖、贫困和混乱。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会场外面，各自带来的军人剑拔弩张，严阵以待，气氛相当紧张。会后阿明改组国防委员会，戈翁、马里亚蒙古均被排除在外，国防委员会剩下“空壳”，阿明一人说了算。侵略坦桑尼亚本为缓解国内矛盾，实现扩张、称霸一方的野心，殊不知反引火烧身。国内反政府组织活动频繁，首都坎帕拉时间爆炸声、枪炮声。发电机、抽水机、燃料库相继被炸，水电供应困难，广播一度中断。法国一家公司的一个25万升油罐

被炸弹击中，大火烧了2个小时。“拯救乌干达运动”在坎帕拉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打死暴君阿明，为受害者报仇。1979年阿明庆祝执政8周年没有检阅军队，还在坎帕拉周围筑起了路障。1月下旬，坦桑军队和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进军乌干达，讨伐阿明，迎战的主要是从苏丹、扎伊尔招募的雇佣兵和二、三千名利比亚、巴勒斯坦援军。2月25日，乌军的中坚力量，驻守马萨卡重镇的机械化敢死团哗变，他们通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新闻机构宣布：“我们放弃了忠于阿明的誓言，已经同人民群众一起为推翻他的法西斯政权而战斗”，并说他们是在前总统奥博特最近发出的推翻阿明的呼吁鼓舞下作出决定的。声明说，“阿明和他雇佣的刽子手对乌干达人民犯下了日益严重的罪行”，乌干达人被拖进一场同邻国坦桑尼亚“不必要的灾难性战争”，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声明敦促其他部队参加兵变，推翻阿明。马萨卡失守，危及边防要塞姆巴拉拉的安全，战场形势急转直下。26日，姆巴拉拉受到坦克、大炮的袭击，陷入一片火海之中，阿明精心培育的狮子营官兵，拒绝与由兵变军人、国内外反阿明组织的武装力量和坦桑军队组成的联合部队作战。3月7日乌干达军方宣布，阿明兼任三军总参谋长，亲自指挥作战。3月22日坎帕拉的“门户”——姆皮吉镇失守，首都郊区和恩德培军用、民用机场都处在联合部队口径122毫米的大炮射程内，乌军退至离坎帕拉32公里的卡滕代镇、恩桑古镇构筑最后防线。国防委员会宣布，坎帕拉自25日起实行宵禁和灯火管制，关闭国际机场。另据外电26日报道，国防部长蒙多准将发动政变，准备与乌干达反政府组织进行和平谈判。阿明在蒙多军队坦克的威胁下，逃离位于恩德培机场附近的总统官邸。与此同时，流亡在非洲、欧美的20多个反阿明组织在坦桑北部莫希开会，成立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组建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加强对坎帕拉的攻势。4月10日晚，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和坦桑军队攻进坎帕拉，第二无清晨宣告阿明已垮台，不再掌权。首都居民涌向街头迎接联合部队，向他们献花和香蕉，不少市民不顾宵禁令，欢庆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麦克雷雷大学内数百人整夜喝酒，唱歌，“到处是节日气氛”。4月22日联合部队攻进东部战略要地金贾，饱受溃败乌军抢、偷、杀人和奸淫妇女之害、闭门躲灾的市民冲出家门，用传统仪式——鲜花抛在军人脚下，绿色树枝放在车轮前面，用鲜花装饰汽车——欢迎他们，人们在街上伴着节奏明快的鼓声翩翩起舞，欢呼“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

阿明早在联合部队攻进坎帕拉之前东逃金贾，虽然4月6日他乘直升飞机在坎帕拉上空宣告，“我决不会从首都逃跑，”后又发誓要在金贾进行最后抵抗。然而大势已去，连唯一大力支持阿明的穆斯林兄弟卡扎菲，在损兵折将、国内反对愈益强烈的情况下，向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缴了2000万美元“买路费”后撤兵了。一直与阿明保持盟友关系的苏联，允许举着“打倒阿明！打倒卡扎菲！”“利比亚，不要干涉乌干达”标语牌的乌干达留学生在利比亚驻苏联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游行学生还将一张画着许多的阿明漫画像扔在地上踩踏成碎片。内外交困的孤家寡人阿明，在金贾忙于联系出国避难事宜，遭到一些非洲国家、苏联和欧洲国家拒绝。金贾陷落前，他在雇佣军保护下跑回西尼罗河地区老家，仍称自己是乌干达共和国总统。不久无法在国内立足的阿明，躲进卡扎菲家中，开始了流亡生活。阿明垮台前，曾制订了一个毁灭乌干达的四点计划：炸掉乌干达主要的电力资源——欧文瀑布水坝；破坏帕夸奇的铁路和公路桥；在主要城镇的水源中下毒；毒死尼罗河



里的鱼。凶狠歹毒，令人发指，只因阿明没有料到会兵败如山倒，来不及执行了。流亡利比亚后，他还想东山再起，4月末打电话给乌干达驻苏联大使，命令他将在苏联学习的约2百名军校学生送到利比亚。4个月后他又表示“希望返回”乌干达，继续做他的“终身总统”美梦。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黄锡芬

#### 第四编 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恩格斯

民族矛盾招来杀身之祸

## ——英迪拉·甘地总理被锡克人杀害

厄运能给人留下全方位思索的广阔空间：悲哀、绝望、经验、教训、奋进、毁灭……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

——信子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首任总理，印度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尼赫鲁的独生女。她自幼立志随父从政，1964年，尼赫鲁逝世后接任国大党主席，随后出任总理，是印度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但谁也没有想到，她竟然死在她的两个卫士的黑枪之下。

### 英·甘地倒在血泊中

印度总理英·甘地1984年10月31日上午，当地时间9点半左右从她的住宅步行到邻近的办公室去，两名谋杀者突然用左轮手枪和自动步枪向她射击，英·甘地中弹8发，子弹打中了她的腹部、胸部和腿部，伤势严重，大量失血，被立即送进全印医学研究所，包括心脏专家和神经外科专家在内的十几名医生对她进行手术，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20分逝世，终年67岁。

英·甘地遇刺的那天，她的长子拉·甘地立即从加尔各答飞回，驱车直往其母亲治疗的医院。正在国外访问的印度总统宰尔·辛格也从北也门飞回新德里。印度国防部长恰范中断了对莫斯科的访问返回印度。同一天，拉·甘地受命继任印度总理。

全世界对她的遇刺感到震惊和悲痛。各国领导人发出唁电、唁函或发表声明、公报对她的遇刺逝世表示悼念。

印度政界和宗教界领导人纷纷谴责这一暗杀行动。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暗杀英·甘地总理。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很多商店、住宅、车辆和寺庙被火焚烧，仅11月1日—2日两天内，全国各地至少有500人丧生，大约1000人受伤。为此印度新总理拉·甘地和15个反对党领导人联合呼吁全国人民停止一切暴力行为。10多万人前往安放英·甘地遗体的三一大厦，吊唁已故总理，三一大厦外面的人群唱着圣歌，缓缓地走进大厦，其中有些人泣不成声。

### 隆重的葬礼

11月3日，印度隆重举行了英·甘地总理的葬礼。当日中午英·甘地的遗体开始从三一大厦运往贾穆纳河畔火化地点。送葬队伍由载着武装部队士兵的军车开路。英·甘地的遗体用印度三角国旗覆盖着，放在一辆用鲜花装饰的炮车上。拉·甘地总理和印度三军司令在灵车旁护送。一百多万悲痛的居民站在从三一大厦通往火化地点的长达12公里的道路两旁，等候着灵车通过，以便向英·甘地遗体告别。

火化地点在贾穆纳河畔尚蒂瓦纳附近，在10英尺高的三层平台的中央，用檀香木搭起了支架。英·甘地的遗体从炮车上移至檀香木支架上。拉·甘地把用黄油浸泡的檀香木“火球”放在英·甘地的口里。英·甘地身穿红色和金黄色的莎丽服，在点燃以前，一位印度教僧侣用恒河的圣水喷洒在英·甘

地的遗体上，然后，拉·甘地先围着他母亲的遗体绕了7圈，在一片圣歌声中点燃了柴堆。根据英·甘地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中。

印度总统、副总统、内阁部长、高级官员等参加了葬礼。中国政府特使、副总理姚依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个国家代表团参加了葬礼。这些代表团中包括50多位总统和总理。为英·甘地举行的传统的印度教葬礼的实况由电视台向全印度并用卫星向世界许多国家进行了转播。

### 刺客是英·甘地的警卫员

行刺英·甘地总理的是两名锡克人，他们都是英·甘地身边的警卫员。一名叫本特·辛格，刚刚调来3个月，在行刺时被突击警卫当场打死。另一名叫萨特万特·辛格的受重伤，被送进医院。在印度军队、警察中锡克人很多，印度领导人也喜欢用锡克人当警卫，因为锡克人勇敢、不怕死。杀害英·甘地总理是由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精心策划的。在她遇刺前5天，本特·辛格已将其家属送到不知去向的地方。他还借口私人有事换了班以后才干行刺那天上午到达现场。在萨特万特·辛格用半自动步枪向英·甘地总理开火的同时，本特·辛格也用他的左轮手枪向她开了火。萨特万特·辛格在他的供词中说，他们杀害英·甘地总理是对她6月派兵制造“金庙事件”的报复。为此，他们曾在新德里的一座锡克教庙宇里密谋刺杀英·甘地总理。此外，他们还想谋杀印度总统宰尔·辛格（锡克族人）和拉·甘地。他们原打算在10月13日刺害英·甘地总理，但由于刺客本特·辛格“未能投出他携带的手榴弹”而未能得逞。

### 金庙事件

金庙事件是杀害英·甘地总理的导火线。金庙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北400公里处。它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是印度锡克教徒最神圣的殿堂，也是北印度名胜之一，每年游客川流不息。这座总面积约10公顷的庙宇，是锡克教第五代祖师于1589年开始建造，1601年完工的，它反映了锡克族人民的智慧和才华，整个建筑为长方形，呈乳白色，有大小19个贴金大圆顶，故有“金庙”之雅称。庙址完全镶嵌在苍翠高大的菩提树、榕树丛中，远眺酷似一座绿色山庄。金庙具有城堡的格式，四周围墙高4米，宽6米，四角有贴金的圆顶，可作瞭望台之用。这座庙分成12个区，设有神殿、香客休息室、诵经堂、法师起居室、膳厅、储藏室等。当时建造这座金庙是为了反抗莫卧儿王朝统治的需要。现在金庙不仅仅是一座宗教祈祷场所，而且是锡克教政治、军事中心。

居住在旁遮普邦的锡克人从17世纪起就曾向莫卧儿王朝要求自治。19世纪时，锡克人为了维护民族权利，英勇抗击英国殖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巴分治之后，他们因为要求在印度各邦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和中央政府发生矛盾。进入80年代后，这种要求和矛盾日益增强，导致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冲突，许多人在冲突中丧生。与此同时，暗杀事件频频发生，烧毁火车站和邮政局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英·甘地总理于1983年10月宣布解散该邦政府，实行总统治理，并调集20个营的中央后

备警察进驻旁遮普邦。但这些强硬措施并没有使局势出现任何好转。反政府活动仍不断升级。1985年5月，锡克教的阿卡利党激进分子宣布从6月3日起开展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制止粮食外运”。他们还据守在阿姆利则地区的金庙里，向前来维持秩序的保安部队展开激烈的枪战。这一形势必然会对印度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对英·甘地总理要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胜利十分不利，迫使她决定采取过去想采取而一直不敢采取的行动，即派兵攻入金庙的“兰星行动”。

1984年6月2日，英·甘地总理宣布出兵旁遮普邦，对锡克教的金庙和其他40多个庙宇采取军事行动。金庙是锡克教激进分子的总部所在地。6月6日印度军队用机枪和火箭对据守在金庙内的锡克教徒发动了攻击，并占领了金庙大院。锡克教激进分子领袖宾德拉瓦尔被打死。锡克教的阿卡利党主席隆瓦尔负伤后被捕。在这4天的武装冲突中，有576人丧生（政府军84人，锡克教徒492人），348人受伤，1471人被捕。

这就是震惊印度国内外的金庙事件。

印度军队的这一行动并没有平息旁遮普邦的动乱，相反激起了锡克人的强烈不满。据说，宾德拉瓦尔被打死的当天，新德里和旁遮普邦首府昌迪加尔等城市出现了更大的骚乱。许多锡克人举行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金庙事件严重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感情，引起了锡克人的仇恨和报复行动。时隔4个月，英·甘地总理遭到了锡克教狂热分子的暗算，不幸遇刺身亡。

## 复杂的背景

发生金庙事件既有深刻的宗教、阶级等原因，又有政治、经济的因素。锡克人约有1400万，主要聚居地是旁遮普邦。该邦地处印度西北部，是印度最富足的一个邦。该邦多数居民是锡克人，信奉锡克教，其次是印度教。从宗教方面来说，锡克教的教义是建筑在印度教虔诚的基础上的，摄取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神秘主义因素，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崇拜偶像、烦琐祭仪、苦行和消极遁世态度。认为世上任何现象都是神力的最高表现，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种姓分立和歧视妇女违背神意，个人灵魂只有和神结合才能解脱。锡克人具有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国外侨民多。他们的传统是尚武、好斗。锡克兵骁勇善战。锡克人对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非常忠诚。一个虔诚的锡克教徒，当他为信仰而战时，即使碎尸万段也在所不惜。锡克教徒历来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印度教则认为它是自己的一个分支。在印度，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享有适合本教习惯的婚姻法和财产继承法，锡克教只能按印度教的习惯办。这引起了锡克教徒强烈的不满。从阶级关系方面来说，在旁遮普邦的城市中，印度教徒控制着主要工商业。锡克人看到很多钱被印度教徒商人挣走，感到很不舒服。同时，随着“绿色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兴锡克人农场主也不满足于仅仅经营农业，也想向工商业投资，这也引起了印度教商人的不安。双方都想借助宗教势力打击对方，两者关系较紧张。此外，新兴锡克人农场主是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他们为了扩大再生产，面临着许多矛盾：电力供应不足，得不到足够的水来灌溉，生活日用品以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政府对粮食收购不及时等等，这些自然导致了他们对国大党（英）政府的不满，而想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捧上台。这些人对旁遮普邦的动乱起了重要作用。在经济上，旁遮普邦是印度

60年代“绿色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印度的粮仓，它生产的粮食约占印度全国的一半。在“绿色革命”的推动下，该邦的工、农、商、交通运输业等随之繁荣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锡克人不但控制着旁遮普邦的交通运输业，而且经营着几乎是印度北部的全部交通运输业。随着旁遮普邦的日益繁荣，其他许多邦的贫苦农民来旁遮普邦寻找工作，慢慢定居下来。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由于外来人不断流入，再加上锡克人去外国谋生的人日益增多，这就使该邦人口发生很多变化。印度教徒在旁遮普邦的不断增加引起了锡克人的不安，因为他们感到减少了锡克人就业的机会，同时感到自己有被印度教徒吞没的危险，因而增加了对印度教徒的仇视。在政治上，随着旁遮普邦经济的发展，锡克人要求印度政府给予该邦更大的自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锡克教徒的激进分子则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锡克人国家，即“卡利斯坦国”，从印度独立出去。此外，锡克人最大的政党阿卡利党也要求在宗教上享有独立地位，要求修改宪法，给予锡克人以更大的自治，并领导锡克人开展运动。

上述这些原因和因素导致锡克教徒同印度中央政府以及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终于在旁遮普邦发生日益剧烈的动乱。为了平息动乱，英·甘地政府曾同意就旁遮普邦问题同锡克教领导人进行谈判，并在宗教问题上满足锡克人提出的若干要求，但坚决不同意锡克人获得更大的自治权。谈判多次搁浅，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该邦的局势更加恶化，最后酿成金庙事件，导致英·甘地的死亡。

王培南

善心在复仇主义烈火中泯灭



## ——拉吉夫·甘地成了献花女的刀下鬼

生使一切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死使  
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

——萧伯纳拉吉夫·甘地是英迪拉·甘地的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外孙。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后，继母亲出任印度总理，他雄心勃勃，是印度政坛上一颗光芒闪烁的新星。遗憾的是，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登上政治舞台只有10年时间的后起之秀，竟被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复仇主义烈火毁灭了。

### 亡命于献花女的敬礼中

1991年5月21日晚，拉吉夫·甘地被炸身亡。他的死结束了尼赫鲁家族40多年来主宰印度的历史。悲剧发生在印度正进行第10次大选的时候，自印度总统3月中旬宣布大选以来，作为国大党主席的拉吉夫·甘地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决心在这次大选中东山再起，重新执政。5月20日，拉吉夫·甘地同夫人索尼娅在自己的选区愉快地投了票。第二天就风尘仆仆地到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去拉选票。当天晚上8点30分又飞抵马德拉斯机场，比原定计划晚了将近90分钟。当地高级警官劝他放弃立即前往28英里远的斯里佩隆布杜尔镇的旅行，因为时间太晚了。他们还警告说，已查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已渗透这个地区。但是，拉吉夫·甘地坚持要去。因为他总结了1989年11月大选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脱离群众所致。于是在这次竞选中，他一反常态，脱去了自从政以来就一直不离身的防弹背心，尽可能创造机会接近群众，力争树立一个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形象。5月初，他在比哈尔邦进行竞选活动时，竟从保镖手中拿走汽车钥匙，以便甩开他们，自己到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同群众热情握手，接受鲜花。他说，“这次，我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能再受别人的摆布。”

当他到达斯里佩隆布杜尔镇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镇上仍聚集了一万多人欢迎他。集会的会场是一块开阔的草地，周围种着一圈棕榈树。可是，那里治安力量薄弱，警察寥寥无几。拉吉夫·甘地走下汽车踏上红地毯，向讲台走去。蜂涌的人群冲倒了用来阻挡他们的栅栏，给拉吉夫·甘地脖子上套上了花环和围巾。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橘黄和绿色相间的衣服的妇女也向前挤来献花环。当她弯腰鞠躬，好像是在向拉吉夫·甘地致礼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浓烟突起。在场的欢迎群众一时被惊呆了，紧接着连推带挤，夺路而逃，会场顿时乱成一团。几秒钟前还高呼“拉吉夫·甘地万岁”的人群突然发出凄惨的哭喊：“领袖在哪里？”“我们的拉吉夫在哪儿？”

当局接到报告不久，各个情报和执法机构的调查人员纷纷奔赴出事地点，试图弄清真相。地上没有表明爆炸位置的弹坑，而且炸弹的爆炸力半径只有几英尺。这表明爆炸装置是专门为此目的精心设计的。地上横七竖八躺着18具尸体，到处是残肢断臂。但只有两人似乎承受了最大的冲击，一个是拉吉夫·甘地，另一个是一位不明身份的妇女。她的背承受了爆炸的全部力量，头被炸飞了，落在4米远的地方，但她的脸是完整的。她的背上还留有爆炸的痕迹。身旁还残留有半截皮带、引爆装置和金属丝等。因此，调查人员普遍认为是这名妇女将炸弹绑在腰部，当她向拉吉夫·甘地致敬时引爆的炸弹。化学家根据残余物鉴定出这是一种军用炸药，以前在印度从未见过。

在所有受害者尸体上都找到有直径不到一毫米的小钢珠。一切迹象表明，炸弹同子母弹捆在一起，以增加它的杀伤力。拉吉夫·甘地被炸得血肉模糊，尸不完体，头被炸掉了一大半，一条腿也被炸断了。这位曾风云印度政坛的杰出政治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一惨案不仅震撼印度，推迟了印度第十届大选，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极大的关注。

## 举国哀悼

5月24日，拉吉夫·甘地的国葬礼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数十万群众冒着41℃的高温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边向他们的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告别。

当天下午当地时间1时许多覆盖着印度国旗的拉吉夫·甘地的遗体被搬到一辆炮车的拖车上。前面的卡车上坐着三军参谋长。27年前这辆炮车曾拉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遗体。7年前，它又拉过英迪拉·甘地的遗体。今天它又拉着拉吉夫·甘地的遗体，缓缓驶向贾穆纳河畔的一块草地，他的遗体将在那里火化。

印度政府派出6万名警察维持秩序。灵车由六七辆载有士兵的卡车和数辆警车开道，穿过新德里的主要街道，行程10多公里，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左右到达目的地。灵车行驶到市中心的印度门时，一架直升机从空中撒下花瓣，向这位印度前总理致哀。

葬礼按照印度传统的火化仪式举行，僧侣念经，拉吉夫·甘地的遗体用白布缠绕安放在焚尸的柴堆上，浇酥油，绕遗体转圈，摔瓦盆……等。他的遗孀、穿着白纱丽的索尼娅·甘地、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里扬卡站在旁边默哀。接着，索尼娅和普里扬卡在拉吉夫·甘地遗体旁添加木柴。乐队奏完哀乐后，拉胡尔在诵经声中手持火把，绕柴堆一周，然后将柴堆点燃。5月27日，拉吉夫·甘地的部分骨灰由其妻子以及两个子女护送，乘专列抵达阿拉哈巴德，放在尼赫鲁的父亲修建的欢喜宫里。第二天中午把骨灰送到恒河和贾穆纳河的神圣的交汇处。按照印度教的说法，把骨灰撒在这里可以进入天国。

印度总统文卡特拉曼和总理谢卡尔出席了拉吉夫·甘地的葬礼。

中国特使、副总理吴学谦也出席了葬礼。出席葬礼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观看了这一隆重的葬礼。

## 谁是凶手

据印度中央调查局初步调查，杀害拉吉夫·甘地的有3人：1男2女。男的是主谋，名叫西瓦拉钱，他是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也是该组织的情报头子。游击队称他为炸弹专家，能制造和组装多种先进炸弹。他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搞过多次爆炸，为此他还送掉了一只眼睛。一名妇女是身缠炸弹炸死拉吉夫·甘地的凶手，是斯里兰卡泰米尔妇女，真名为佳雅特丽。猛虎组织游击队称她为塔努。她本是一般平民。1987年印度政府派军队去斯里兰卡时，她被印军强奸。这使她一直怀恨在心。另一名妇女叫苏帕，已婚。她是塔努的替补杀手。塔努行刺时，她也身缠炸弹，隐藏在会场附近，以便一旦塔努行凶失败，由她接着干。苏帕也曾被印军强奸过。这两名妇女都是猛虎组织游击队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利用了她们对印军的仇恨，充当凶

手。

### 暗杀行动是周密策划的

据印度报刊说，早在去年9月以泰米尔猛虎组织普拉巴卡兰为首的一伙斯里兰卡人在斯里兰卡丛林地区秘密指挥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就开始策划谋杀拉吉夫·甘地。普拉巴卡兰指定西瓦拉钱具体策划这一暗杀行动，并组织了一个4人行动小组，为谋杀活动作准备。由于西瓦拉钱长期潜伏在泰米尔纳德邦，对当地情况了解，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还利用当地不少泰米尔人同情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心理，网罗了一班人马，建立掩护网。他在马德拉斯市设立活动据点，挑选人员，观察地形，制造炸弹，而且还进行了两次谋杀拉吉夫·甘地的实地演习，并拍成录像，带回斯里兰卡，让普拉巴卡兰审查。第一次实地演习是在1991年4月18日，拉吉夫·甘地在泰米尔纳德首府马德拉斯市的马里纳海滩参加一次集会，4名猛虎组织的泰米尔人混杂在人群中，试图靠近拉吉夫·甘地。但是为了避免印度保安人员的注意，他们没有强行接近拉吉夫·甘地。

为了提高谋杀行动的成功率，西瓦拉钱等人于5月12日再次进行了实地演习。这一天，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和泰米尔纳德首席部长鲁纳尼迪同拉吉夫·甘地一起出席一次集会，西瓦拉钱命令塔努尽量靠近拉吉夫·甘地。塔努接令后设法靠近，最后贴近了拉吉夫·甘地。这次演习取得了成功。

5月21日的谋杀行动基本上是按照12日的演习进行的。当拉吉夫·甘地到达斯里伊佩隆布杜尔镇时，塔努混杂在欢迎的人群中。她手捧花环，根据以往实地演习的经验，一步一步向拉吉夫·甘地靠近，最后终于挤到了拉吉夫·甘地面前。献完花之后，她即跪下来吻拉吉夫·甘地的脚，以示敬意，同时借此机会引爆了捆在腰间炸弹，把拉吉夫·甘地炸死。

### 谋杀背后

为了什么泰米尔猛虎组织要杀害拉吉夫·甘地呢？其主要原因是，拉吉夫·甘地在他当印度总理期间曾派印度军队到斯里兰卡去平息泰米尔猛虎组织反对当地政府的武装活动，从而引起了该组织的不满，结下了仇恨。为此，猛虎组织决心报仇，谋害拉吉夫·甘地。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部。斯里兰卡的东北部与印度南部隔海相望，从海峡一端到另一端只有廿五英里。传统上，斯里兰卡东北部和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关系甚为密切。由于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都是印度泰米尔人的后裔，来自该邦，所以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游击队员一直把泰米尔纳德邦作为他们的庇护所，穿梭于海峡之间，不少游击队员在斯里兰卡呆不下去，就跑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去躲避。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多集中在该国的东北部，泰米尔猛虎组织游击队在这一带的森林地带进行活动。

泰米尔猛虎组织游击队自1983年以来一直开展反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武装斗争，要求成立独立的“泰米尔国”。在人口为1600万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只有300万人，与僧伽罗人相比属于少数民族。这些泰米尔人认为，他们只是“二等公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再加上斯里兰卡经济不景气等等原因促使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武装活动愈演愈烈。英迪拉·甘地母子过去都曾支持这个组织，并在泰米尔纳德邦建立过训练营。但1987年拉吉

夫·甘地改变了立场，出兵帮助斯里兰卡政府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游击队发起进攻，随后印度军队又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泰米尔人聚居地，进行了长达3年的军事行动，致使泰米尔人的家园遭到破坏，不少居民流离失所。在印度军队出兵斯里兰卡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把印度军队看作是他们的保卫者。印度军队出兵斯里兰卡后，印度军队成了他们的死敌，拉吉夫·甘地自然成了斯里兰卡猛虎组织谋害的目标。猛虎组织决心要进行报复，早在1990年9月就蓄意谋害拉吉夫·甘地，但我不到合适的机会，最后该组织头目普拉巴卡兰选定在印度大选期间动手，终于酿成了这次大悲剧。

拉吉夫·甘地总理遇害后，国大党（英）工作委员会曾一致推举其遗孀印度籍意大利人索妮亚接任国大党（英）新主席，但她拒绝参政。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里扬卡年纪尚轻，还在读书，难以担当治理印度的重任。因此可以说，尼赫鲁家族接班人后继乏人。在这种情况下，5月29日国大党（英）工作委员会又一致选举非尼赫鲁家族的成员纳拉辛哈·拉奥担任党的主席，后又出任印度总理。这标志着印度政坛上尼赫鲁时代的结束。

王培南

狗咬主人必遭烹

## ——诺列加成为美国的阶下囚

正因为梦境是熟睡者的幻想，所以幻想仅是清醒人的美梦。

——布莱特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 1983 年至 1989 年担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在这 6 年多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巴拿马的最有实权的人物和独裁者。诺列加在国内行使铁腕统治，贩毒、嫖娼，丑行累累。他所以能飞黄腾达与美国的扶持是分不开的。后来，美国又把诺列加搞下台并抓到美国监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美国人又是用什么办法把他抓走的呢？

### 宁肯投降美国也不愿被本国百姓抓获

1989 年 12 月 20 日，隶属于美军南方司令部的 1.3 万名官兵同时向巴拿马城及其周围目标发起突然袭击，很快就占领了巴拿马城中心及郊外的托里霍斯国际机场等战略要地。布什宣布美军开进巴拿马有 4 个目标：保护美国公民生命安全，帮助恢复民主，维护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完整以及对诺列加绳之以法。在巴拿马国防军抗击入侵美军时，身为国防军司令的诺列加却不知去向。只是在当晚 8 时左右，电台广播中传出他不到一分钟的简短讲话：“这里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我向国防军全体人民致敬！我们绝不后退一步，必须抵抗，前进，直到胜利……”，“我们现在在战壕里”。事实上他并没有在战壕里，他也没有在国防军总部指挥战斗，却一直同他的情妇呆在一起。12 月 19 日，在部下告诉他美军正在加紧准备入侵时，他却认为这是美国虚张声势，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随手拿起电话，找他的情妇塞诺里塔·维基·阿马多。随后他开车在巴拿马市转了好几个小时后，在他以后几天里轮换居住至少 5 幢房子中的第一幢房子门口停了下来，这些房子大都是他秘书、亲戚家的。在四天内，诺列加未同国防军的任何成员联系过，因为怕被人出卖。当时美军方已悬赏百万美元捉拿他。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上将下令美军挨家挨户搜寻他的下落。12 月 24 日，诺列加差一点被美军抓住。美 82 空降师的 4 个士兵接到密报说，诺列加正在他的情妇的母亲家里。他们赶紧去捉拿。但在路上遇到了当地居民设置的路障，于是决定请求上级支援。美军立即派 25 名士兵增援。但他们到达那幢房子时诺列加已乘直升机逃走了。

这些天，诺列加一直坐卧不安，一方面不断变换住处，一方面又在为自己考虑一条出路。23 日，他同古巴驻巴拿马使馆取得联系，要求政治避难。古巴使馆官员说，古巴很愿意他前往避难，但使馆已被美军团团包围，即使他来也一定被抓住。同日，诺列加的战友、奇里基省国防军司令路易斯·德尔锡德中校向美军投降后，他的最后一步退路也就没有了。因为以前曾有人提出过，万一不行就到奇里基山上打游击，诺列加当时以健康理由拒绝了此项建议。在万般无奈情况之下，24 日，诺列加给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何塞·塞瓦斯蒂安·拉沃亚打电话求助。拉沃亚大使事后回忆说，诺列加当时给大使馆 15 分钟的考虑时间，要么同意他进入梵蒂冈大使馆政治避难，要么他就立即前往奇里基省打游击，并威胁要进行一场大屠杀。拉沃亚立即向罗马教廷请示，但时间显然不够，大使只能先作主同意诺列加进入使馆避难。下午 3 时，诺列加带着保镖，坐小轿车来到梵蒂冈大使馆。当时使馆门前没有美国兵。前几天只传说诺列加要到尼加拉瓜或古巴大使馆避难，因此，美

军在这两个使馆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诺列加进入梵蒂冈使馆后，拉沃亚大使将这件事通知了美军南方司令部。同时要求美方不要公布此事。但美方得信后立即派部队包围梵蒂冈使馆，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诺列加虽跨进了梵蒂冈使馆的大门，但在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住的是一间又闷又热的房间，里面有空调，但他为了表示对梵蒂冈大使馆劝说他自愿走出使馆的抗议，关掉了空调。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有一架电视机也是坏的。大使下令不准使馆工作人员与诺列加谈话。他的信息来源一是美军在使馆周围架设的高音喇叭。头三天里美军开展心理战，通过高音喇叭不断播放摇滚乐和抨击他的新闻，如他在国外银行帐户被冻结、他的助手被抓等等；二是拉沃亚大使每天向他解释他目前的处境，今后可能出现的几种前途，劝说他走出使馆时顺便告诉他。诺列加不得随便与使馆人员接触。一天三次，他打开房门接过放在盘子里的饭菜，然后又把自己夫起来。他唯一一次同使馆工作人员接触是圣诞节前夜，梵蒂冈大使给每个人送上一份干面食，诺列加边吃边说，厨师做的干面食很好吃。

诺列加在房间里可以听到美军坦克在附近来往和直升飞机掠过头顶并在附近频频起落的声音。他可以从窗口看到使馆外面设置的蛇腹形铁丝网。但他可能不知道，美军在周围埋伏了几十名狙击手，装有红外线瞄准器的自动步枪枪口瞄准了使馆所有的窗口。美军还清理了使馆周围所有能作为屏障的东西，并打灭了使馆大院内的所有路灯。

在诺列加进入梵蒂冈使馆后，美政府官员在巴拿马和梵蒂冈城频频同梵蒂冈官员接触。美方一直坚持要把诺列加送上美国法庭进行审判。梵蒂冈则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它不愿违背国际法，将诺列加交给美国，另一方面它又不愿被美、巴公众舆论认为它支持诺列加。12月27日，梵蒂冈发言人措词强硬地宣布，根据国际法罗马教廷驻巴拿马大使馆不会将诺列加交给美国之后，不到几小时，4辆民用小轿车开到使馆门口，7名同诺列加一起避难的巴拿马人走出使馆，被带往美国在巴拿马的霍华德空军基地，然后送往美国。巴拿马方面则坚持要梵蒂冈使馆将诺列加交还巴拿马。巴总统恩达拉说，梵蒂冈使馆应该劝说诺列加离开使馆，但又说诺列加不准离开巴拿马。12月31日，巴拿马总检察长宣布，巴准备以谋杀罪和贩毒罪对诺列加进行起诉，要求梵蒂冈将诺列加交给巴拿马政府。其谋杀罪指的是，1989年10月3日企图推翻诺列加的兵变失败后，领导和参与兵变的10个军官被折磨后处死一事。

诺列加走出梵蒂冈使馆束手就擒是各方面施加压力的结果。曾在该使馆避难的诺列加的卫队长埃列塞尔·盖坦上尉及其他助手是施加压力最多的。1990年1月3日诺列加离开使馆前，成千上万的巴拿马人在使馆门前示威要求把诺列加交给他们。拉沃亚大使对诺列加说：“将军，人民要抓住你的这种完全神经质的愿望是存在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你的结局将会像墨索里尼那样，是极悲惨和有失体面的。但决定要由你来做。”拉沃亚大使还说：“我永远不会要求你离开这里，罗马教廷也不会这样做。如果你要出去，必须是自愿的。我认为，为了你的幸福，投降是一条出路，对你有利，对曾给你好处的罗马教廷也有利。”“向搜捕（诺列加）多年的美国法庭投降，而不是向侵略者投降。如果你是正义的，就会出庭。美国法庭是可以信任的。另外，你也不会受到拷打。”诺列加回答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您说的我完全理解。”随后两人就一起去做弥撒。1月2日，梵蒂冈特使蒙

西纳·贾钊托·贝洛科飞抵巴拿马城。他要求美国方面给一天的时间让他说服诺列加离开使馆。3日，梵蒂冈使馆下了最后通牒，要求诺列加必须在4日中午之前离开使馆，否则使馆将请巴拿马政府派人将他带走。同日，恩达拉总统撤换了亲诺列加的最高法官，提出研究将诺列加引渡给美国的可能性。他认为现在由巴拿马对诺列加进行公正的审判还有困难，希望梵蒂冈不要将诺列加交给巴拿马。诺列加是在梵蒂冈下了最后通牒和获悉效忠于巴拿马新政府的保安部队要进入使馆逮捕他之后，下决心向美军自首的。自首前，诺列加要求美国答应3个条件：允许他穿军服投降；允许他先打几个电话；他自首的决定一直保密到他被捕的时刻。美国答应了这3个条件，并且还答应不会根据允许判处贩毒头目死刑的联邦新法律判处他死刑。1月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梵蒂冈特使通知美国驻巴拿马军事当局，诺列加同意当日晚离开使馆。晚8时50分，在梵蒂冈特使和驻巴拿马大使陪同下，诺列加走出了梵蒂冈大使馆，他随即被守候在使馆门口的美军士兵扣留，押上停在使馆门口的直升机，送往美国在巴拿马的霍华德空军基地。然后由美国缉毒署官员正式将诺列加逮捕，乘坐美国空军C—130运输机，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至此，美国入侵巴拿马的4个目标都已实现。

### 双料间谍诺

列加60年代在秘鲁乔里勒军事学院学习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收为情报员，曾因搜集左倾嫌疑分子材料有功而获学院奖学金。1960年夏，诺列加因殴打和强奸当地一名妓女被关进拘留所，经过美国幕后文涉而获自由。诺列加被视为是为美国情报机关长期效劳的有用人才，而且代价低廉，当时诺列加的津贴是每月50—100美元。美国人对诺列加给予格外重点培养，让他在一系列进修学校进修“军官与军事情报”。诺列加最感兴趣的是心理战。他学会了利用新闻媒介的控制来制服对手，进一步完善了警察技能。在他担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司令部军事情报处长的13年（1970—1982）内，除在国内控制了军事情报、刑事侦察、海关、警察以及移民大权，网罗一批党羽外，还向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古巴活动的情报以及巴拿马国内的政府情报。巴领导人托里霍斯1971年任命诺列加为巴美之间的联络官。美国每年向诺列加支付8至11万美元的“联络费”。既然诺列加与美国关系这样紧密，美国为什么要搞掉他，抓住他呢？

### 犯上作乱 违抗主子旨意

与中美洲国家的一些军事独裁者不同的是诺列加在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从来都是按照“互相利用”的原则行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资料档案中这样写道：“此人对巴拿马运河只肯出租，但不出售。”他是中美洲地区唯一同各种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要人。1985年5月，数千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涌入洪都拉斯境内，尼洪边境形势紧张，两国政府都乐于邀请诺列加居间调停。他一方面允许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设立监测中南美洲的情报监听站，允许美国利用运河区作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训练和补给基地，并帮助尼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另一方面，他又协助古巴和尼加拉瓜破坏美国对它们的贸易禁运，卖武器给尼加拉瓜政府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游击队，甚至暗中向古巴通报美国的秘



密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诺列加的上述做法是了解的。但又不愿放弃这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早在 1976 年 12 月，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就曾和诺列加见面。布什要托里霍斯和诺列加放弃“挑衅”。诺列加则竭力说明对他和托里霍斯的指责是无稽之谈。诺列加一方面从中央情报局领取高额津贴，另一方面又从美国特工人员手中收买情报。美国情报站窃听了美巴就运河问题进行谈判的巴代表团情况。诺列加发现了美国人的窃听活动并没有声张出去，而是把其中几盘录音带收买下来送给了托里霍斯。1985 年美国会一议员要求停止向巴拿马提供援助，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务院四处游说，要求撤回此项法案。1986 年，美国几名参议员指控诺列加贩毒到美国、向古巴出售武器。国会责成中央情报局调查，但该局只交了份简短的报告替诺列加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中央情报局甚至把美国会内最强烈反对诺列加的两名参议员的私人问题和政治观点等机密情报告诉了诺列加。

根据 1977 年卡特和托里霍斯签订的运河条约，美国在 2000 年前把运河控制权交回巴拿马，而巴拿马则同时实行民主过渡。里根上台后，认为交还巴拿马的全部主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利，因此曾多次传话给诺列加，希望延长美军驻守运河区时间，但诺列加漠然置之，他声明巴拿马国防军守卫运河只是为巴拿马的利益服务，不再为大国服务。因此美国下决心换马。1987 年 6 月，诺列加操纵大选，排斥异己，参与国际毒品走私等问题揭发出来以后，激起巴拿马国内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掀起要求诺列加辞职，争取民主的浪潮。里根政府则利用巴拿马的内部矛盾，推波助澜，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压力逼诺列加下台。1988 年 2 月 5 日，美国迈阿密联邦大陪审团对诺列加正式起诉，指控他参与贩毒走私活动。在强硬措施未能使诺列加屈服的情况下，美国又派人同他进行秘密谈判，以撤销起诉为条件，要求其下台。诺列加曾一度有引退之意。但随着美国压力的升级，诺列加反倒愈加强硬，不再谈“主动引退”。他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不能放弃我的职责、我的命运。”他强调他的去留需听从总统和国防军司令部的安排。“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将是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我将在战斗中倒下”。

1989 年布什入主白宫，美巴关系进入对美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首先因为按照 1977 年签署的新运河条约，从 1990 年起，运河的共管权将从以美国为主转为以巴拿马为主。运河管理委员会主任将由巴拿马人担任。运河主权交接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次，1989 年是巴拿马大选年，下届新政府能否保证美国在运河的利益至关重要。布什政府调整了对拉美的政策，将巴拿马问题置于首位；采取比里根时期更加激烈、强硬的干涉政策逼诺列加下台。在当年 5 月的大选中，美国支持反对派，公开声明不承认“任何由诺列加操纵的选举结果”。下令美军南方司令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当诺列加宣布大选无效后，布什公开呼吁巴拿马军民推翻诺列加；召回美大使；向巴拿马增兵 2000 人。在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危地马拉组织代表团去巴拿马斡旋过程中，美不断施加压力，要诺列加下台，扬言“不排除捉住诺列加到美国受审的可能”。美军并在巴拿马多次举行演习。9 月 1 日，巴拿马进行了一次不合法的政权更选，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被任命为总统。美国拒绝承认“诺列加安排的政府”，并宣布新的制裁措施。10 月 3 日，巴拿马平息了一次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11 月，诺列加任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

协调员。为此，布什政府不惜花费 300 万美元筹划新的推翻诺列加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除禁止暗杀诺列加外“没有其他限制”。这实际是为军事入侵巴拿马开了绿灯。

### 贩毒走私招人恶

1971 年 5、6 月间，美国扫毒部门称，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托里霍斯和他的秘密警察首脑诺列加正通过远东和美国的使、领馆、机场及海关大肆走私毒品。当时白宫要求毒品管理总署负责人制订一项在世界范围内的秘密执法计划，同时讨论了“谋杀及如何对付托里霍斯和诺列加的其他办法”。然而，“水门事件”使白宫的尼克松总统无暇再顾及毒品问题。1977 年，美国会就巴拿马问题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谈到了巴拿马官方的贩毒活动，而诺列加是中心人物。1979 年 1 月，诺列加又同一起涉嫌军火走私案有牵连。当时，美国达德县及当地联邦法院获悉诺列加因出访将飞经迈阿密，为此曾设下圈套，准备在他一踏上美国领土就逮捕他。对此事，美国务院以危害美巴关系为由进行了干预，因而诺列加推迟了此次过境访问。否则，他可能等不到 1989 年，就被美国人抓住了。

季仰舒

## 第五编 金钱美女令人醉糖弹杀人人难逃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

——契诃夫

不爱江山爱美人

## ——英王爱德华八世为爱情逊位

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培根

“ 快来听呀，听报信的天使歌唱：

辛普森太太偷走了我们的国王！”

这首童谣所唱的决不是无案可稽的神话，而是 1936 年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英王爱德华八世为同美国平民女子沃利斯结婚，遭到朝野上下强烈反对，被迫逊位，留下了本世纪最罗曼蒂克的一桩政治公案。

### 逊位：惊煞天下

1936 年 12 月 10 日，英国白金汉宫在阴湿的寒风中显得那样苍老、凄凉，昔日的豪华和威严，由于年轻的国位面临灭顶之灾而荡然无存。

“ 签字吧，陛下！” 内阁首相鲍德温声音冷漠而严厉。他那命令式的乞求，把爱德华八世逼到了桌前，国王用颤抖的手签署了《退位诏书》：

大不列颠，爱尔兰及海外诸自治领国王，印度国之皇帝爱德华八世诏示天下。朕意已决，拒不即位称王，后嗣亦将如此。此退位文表明朕之旨意，并立即生效。数小时候后，当那些口口声声“效忠国王”、“吾王万岁”的内阁重臣和宗教领袖弹冠相庆时，爱德华八世这个刚过“不惑之年”，即位只有 325 天 13 小时 57 分，还没来得及正式加冕的国王，就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英国和全世界发表了退位讲话。他说：

臣民们，你们知道我不得不退位的原因。……如果没有我所钟爱的女人的帮助和支持，我将不可能承担此一责任重担，因而辞去国王之职。我希望你们知道，这是我作出的决定……绝大多数关心此事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劝说我不如此行事。我之所以作出我生平最严肃的决定，唯一的原因是它对各方有利。国王的语调平缓、自信，他似乎辞掉的不是令人折腰的王权，而是压在心头的难以承受的负担，获得了解放和新生。讲毕，他颇具大将风度地对身边的官员们说，“还成功吧？”

然而，了解内情的人不难看出，此刻，他的心在滴血。而更惨的则是他的情人、未婚妻沃利斯。此刻，沃利斯正逃难在法国戛纳，当她从收音机里听到国王退位的讲话后，如五雷轰顶，泣不成声，万念俱灭。国王正是为她，一个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无门第，又无家财，且梅开二度的美国女人而舍弃王位的。她绝望、伤心、内疚、羞愧、愤懑。近日来，她为了保住国王的王位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即使是一死也在所不惜，可令她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她无法承受这一打击，柔肠寸断，痛不欲生，昏倒在沙发上。

在英国这个热爱国王的国度里，国王退位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许多人感到困惑、愤怒，她们怨恨沃利斯这个美国女人“心术不正”、“谋图不轨”，用花言巧语和廉价的爱情“迷惑”、“勾引”了他们的国王，使国王误入歧途。更有一些热烈火爆的“爱国者”给沃利斯写信或打电话，直接对她质问，甚至奚落、谩骂、恫吓。

“听着！国王的一切厄运将由你负责！”

“自作多情的美国女人，还是先在镜子里照照自己的模样，再考虑和国王结婚吧！”

“我们要炸掉你的房子！”

最使沃利斯惊恐不安的是，有一封信笺十分讲究的短信：“如果你生活在 200 年前，那就意味着把你驱逐出境，但现在似乎无人具有这种勇气命令你回到你那个把结婚视为儿戏的美国去。因此，落在我这个爱国者身上的义务就是杀了你。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我说到做到！”

支持沃利斯的也不乏其人，尤其在美国。美国人认为，沃利斯离过两次婚算不了什么缺点，反而更加成熟、可爱。他们认为沃利斯当皇后将是美国人的骄傲，而且对“两个讲英语的大国的国家关系大有好处”。他们发起了一个支持沃利斯当皇后的运动。

在英国，也有一些爱情至上主义者，藐视封建礼教、心地善良的开明人士，支持国王的婚事。萧伯纳、丘吉尔等人就认为，“国王和他心爱的尤物结婚有何不可？”

国王退位那天，伦敦有上千人游行示威，他们的大标语上写着：

“上帝从鲍德温手中救出国王！”

“你们不能让他下台！”

“我们要爱德华，打倒政客！”

然而不幸的是，支持国王的人很少，且多是平民百姓，轻官寒士，他们顶不住来自王室、内阁、自治领、教会的巨大压力。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国王的婚姻呢？尽管王公贵族、高官显宦们转弯抹角，闪烁其辞，但主要理由似乎只有一个——

### 礼不下庶人

本世纪 20~30 年代，英国曾经是统治着世界上 4 亿多臣民的“日不落大帝国”，它权倾天下，威震四海，尽管这一切正在变为海市蜃楼。

是辉煌的国家造就了伟大的臣民，还是伟大的臣民造就了辉煌的国家，英国人似乎并不深究，但他们对一个结过婚的平民女子分享王权却无法容忍。

“沃利斯当皇后？岂非荒谬绝伦！”作家沃波尔的愤愤不平代表了许多英国人的思想感情。

是啊，国王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是伟大而神圣的。“国王不是人，是神，是四海之内万众归心的人物。”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当时国王已不是英国的最高主宰。但 1931 年的英国议会的决定仍使国王成为大英帝国联合的象征。英国人决不许任何人玷污国王的声誉，而沃利斯登上皇后宝座，就是一种玷污。国王应同公主或名门望族的黄花姑娘结婚，而沃利斯算什么呢？

英国国教反对离婚。在亨利八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曾明令禁止离婚。教会的信条里，你铺的床铺，你就得睡下，夫妻是否相爱，上帝不再过问。1923 年的新婚姻法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离婚，但在许多人尤其是基督徒心目中，不管因为什么，离婚总不是件光彩的事。沃利斯曾两次离婚，她和国王——基督教的保护人结婚，是对教徒的极大亵渎，是对国民的羞辱。

母后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坚决反对离婚，当然不同意儿子的婚事。

老王乔治五世亦然，他在去世前表示了担忧，“我死后，用不了一年时间，我儿就会毁掉自己。”事态的发展，被父王不幸言中了。

从法律上说，国王可以同任何他所喜欢的女人结婚，只要不是天主教徒就行。但是4年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英国圣公会不为任何离异的、配偶还活着的人主持婚礼，这也为国王的婚事增加了麻烦。大主教戈登·兰认为，国王和沃利斯结婚是藐视宗教，是失去了神力和希望的“明智指引”，是对教会的“亵渎和动摇”，他决定不为国王主持婚礼，而国王的婚礼没有大主教主持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完备的文字宪法，治理国家靠的是约定俗成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不少没有文字规定，而是按传统办事，这些传统不是由王室，而是由内阁掌握。加之国王是英帝国联合的象征，因而各自治领也有权对国王的婚事作出反应，王室必须对这些反应认真加以考虑。这些都给国王同沃利斯的结婚制造了障碍。

王室、教会、内阁、自治领，像张张严密而结实的网，横在国王和沃利斯之间，要实现秦晋之好，就得闹它个网破鱼死。

1936年10月，沃利斯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以后，企图扼杀这对有情人的网也开始收缩、拉紧。

首先发难的是国王的秘书哈丁。1936年11月12日，他给国王写了一份奏折，说国内新闻界将不再为国王的爱情事件保密，不几天就会风雨满城，造成灾难。内阁将辞职，国王任命新内阁不会得到下院的支持，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必将使国家陷入混乱，因为国王的行为已损害了帝国生存的基础，唯一的办法是毫不迟疑地请沃利斯离开英国。国王看了奏折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挑战，他准备找内阁首相鲍德温谈谈，然后再相机行事。

鲍德温，70多岁，一个胖敦敦的约翰牛，一个无色无味，以“有问题，就不干”为政治信条的保守人物，本来就要退休，但似乎上希特意把他留下来为本世纪最大的罗曼曲大敲边鼓。

“我准备同辛普森夫人结婚。如果政府反对，我打算出走。”11月16日，国王召见鲍德温，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陛下，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今天我恐怕不能对此表示任何意见。”鲍德温用不置可否的言辞表达了他坚决反对的态度。

两个小时以后，国王和母后、姐姐相向而坐，重复了他对鲍德温讲过的内容。

母后感到震惊，她一向认为君主制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同意沃利斯进入王室。

“我认为你根本没认识到你采取的态度给皇族和国家利益形成的冲击。对于那些在战火中牺牲的人来说，他们看到你作为一个君主，竟不愿做出哪怕是极小的牺牲，是难以理解的。”像妈妈训斥顽童一样，母后指责了国王。

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特利直言不讳：“我不愿让辛普森夫人为后。”各自治领也大都明确表态，不同意国王的选择。

网子越拉越小，鱼儿在劫难逃。

这时，国王的一位谋士前来献策，他让国王实行“庶贵联姻”，即可以和沃利斯结婚，但婚后沃利斯及其后嗣不享受王室待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王接受了这胯下之辱，但就是这样的方案也遭到了议院的否决。

山穷水尽，英雄末路。

然而，国王初衷未改。“三十六计，走为上”。在极度的悲愤和怅茫中，国王登上了离开英国的轮船。在浓稠厚重的夜幕中，国王伫立在“愤怒号”甲板上，看着消失在一片朦胧中的祖国，心潮难以平静：

此时我才知道，这完全是自作自受。吊桥在我身后吊起，千头万绪，只有一事可以肯定：我魂牵梦绕的爱情获得了新生。

### 孤家寡人的烦恼

当探寻国王退位的原因时，我们发现，除了“礼不下庶人”以外，它还与国王的处境、性格以及沃利斯的某些特点有关系。

爱德华八世出生于 1894 年，父母给他取名爱德华·阿伯特，教名帕特里克·戴维，其祖父威尔士亲王就是后来即位的爱德华七世。1910 年爱德华七世驾崩，戴维的父亲即位，称乔治五世，不久，戴维被封为威尔士亲王。1936 年 1 月，乔治五世去世，戴维即位，称爱德华八世。

戴维的显赫家族和令人生畏的地位，并没有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幸福，而是使他成为道地的孤家寡人。

戴维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冷漠、苛刻、缺乏慈爱和宽容精神的女人。她没有为自己生下了王子而自豪，反而认为自己是为丈夫传宗接代而忍受痛苦。母亲一味寻欢作乐，不关心戴维。父亲对儿子也冷若冰霜，十分严厉。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戴维本已不幸，却又碰上一个神经质的保姆，常在暗地里对戴维进行虐待，使戴维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伤害。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戴维，性格扭曲、神经过敏。他胆小而暴躁、羞涩而爱动，常带一幅愁思忧郁的面容。他身高 1.68 米，一张娃娃脸，声音尖细，有暗地里刺线绣花的爱好，在化妆舞会上曾男扮女装。他给人的印象是，少几分男人的阳刚之气，多几分女人的柔弱之态。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造成的。

“孩提时代，日子是非常难过的”。戴维这样总结儿时的生活。

富人的孩子成年迟。18 岁的戴维，仍然没有从父亲的威严和管教中解放出来。有一次，他不小心弄破了台球案上的绿布，除被父亲训斥一顿外，还罚他一年时间不得玩家中的台球。在父王和母后的眼里，戴维永远都是一个必须严加管束的孩子。

为了有效地统治人民，王室需要使自身罩上一道神秘的光环，使臣民们在等级森严、浑浑噩噩之中，对国王顶礼膜拜，愚忠愚孝。这种情况给戴维的影响是，他同热气腾腾的社会生活之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他渴望友谊、理解的人性被他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假面具破坏了。他和臣民百姓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主仆对立的关系，人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对他诚惶诚恐，敬而远之。

1934 年 11 月 29 日，戴维最喜欢的弟弟乔治和希腊公主玛丽娜结婚并被封为堪特公爵，从此走出了戴维的生活圈子，使戴维更加孤独。

所谓孤独，并非离群索居，而是没有知音。

成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官样交际，无休无尽的公事酬酢，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戴维每时每刻都被一大堆公事和一大群希望得到恩惠的人包围着，这使他孤独中夹着烦恼。然而，王室的教养和礼貌使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随意发火渲泄。他只能忍着。他常常想发疯。干涸的土地亟需春风甘雨，孤独的



心期待着爱情和友谊。就在这种情况下，戴维结识了沃利斯，一个精明强干且温柔多情的“蜜罐子”。

## 花不迷人人自迷

作为威尔士亲王的戴维，一个权力显赫，江山万里的王室成员，一个年轻的单身汉，不知有多少年轻美貌的女子痴情追逐，泪洒香枕。戴维虽是亲王，但毕竟凡胎肉体，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王室礼教，并没有堵死他通向闺房、一度春宵的暗道。在戴维接触过的许多女人当中，尽管不乏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但几度云雨并没有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更没有把他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她们像过眼烟云，人走形灭。只有沃利斯与众不同，短短的几次接触，便使他缠绵悱恻，神魂颠倒。

沃利斯比戴维小两岁，1896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母亲是一个重爱情不重理智的人，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一个早已病入膏肓的男人，婚后不到7个月，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6个月的沃利斯。孤女寡母，度日如年。16岁那年，母亲再嫁，沃利斯跟随叔叔生活长大。

在爱情上，沃利斯继承了母亲的禀赋，她喜欢男孩子胜过喜欢书本，16岁就开始谈情说爱，她少年时代的生活信条是：一切都为了爱情。

成年的沃利斯，亭亭玉立，风流万般不可挡，常招来一群多情种子像苍蝇围着蜂蜜一样嗡嗡乱叫。不过，沃利斯确实算不上国色天香。她个头不低，身高1.62米，但体形没有曲线，缺乏健美姑娘的丰满，她眉毛较长，但过于浓密：下颌方方，颧骨高凸，有男人的棱角，缺女人的柔媚。她不戴发饰，一把不疏不密的褐发从头中央一分为二，在头后面盘起两卷，显示出生活上的成熟、利落和性格上的无畏倔强。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笑谈如窃窃私语，撩人心魄，一双蓝眼睛顾盼流萤，变幻莫测，闪射着青春少女无限的柔情与渴求。

人的魅力不一定都来自外貌，内在的美往往更沉重而持久地打动异性的心。沃利斯就是这样。

沃利斯认识戴维之前，曾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嫁给一个美国军人，随丈夫走遍天涯海角，甚至到过中国，这使她见多识广，具备了一般女人所没有的理解力和包容性。1927年婚姻破裂，次年嫁给英籍美国商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并随丈夫到英国生活。幼年失去父母，成年后颠沛流离。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使沃利斯善于利用女性的优势，投人所好，攀龙附凤。她举止不俗，独立求实，善解人意，温存体贴。而这些，正是戴维缺少的，需要的。

“他对我发生兴趣的唯一理由，可能是我这种美国式的独立精神，爽直的性格，还有我的幽默感和乐观态度，以及我对他和他的任何事情的特殊关心。也许我这种自然的态度最初使他惊奇，到后来又使他觉得有趣。再则他感到非常孤独，我是第一个看透他那孤寂心情的人。除此之外，我再也不想不出其他理由了，再也没有什么摸得着，看得到的东西，足以使他羡慕了。”

沃利斯对国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对戴维使用的经常的、主要的策略是，事先注意观察和了解他，然后投其所好，送其所要。戴维缺乏自信，沃利斯就鼓励他说，“亲爱的，你不笨，你做得很好，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戴维缺乏母爱，沃利斯就常以慈母的口吻对他关照，“亲爱的，今天天气冷，

你得多穿件衣服”。“你应该戒烟”。“不要贪杯，醉酒伤人”。戴维寂寞时，她常伴随左右，柔情似水。戴维生活能力较差，沃利斯则趁机大显身手，从家具陈设，到酒会请柬，甚至菜单食谱，沃利斯都给戴维提出建议，戴维也对此言听计从，佩服之至。

戴维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特点，使他一直希望有自己安谧而充实的私生活，以便使自己变幻不定的感情凝聚在一点上，以抚平心灵深处的空虚和缺憾造成的创伤。他终于找到了感情寄托的意中人沃利斯。她是他心中的太阳，她在他面前扮演着情人、慈母、朋友、谋士的多重角色。怪不得当有人劝说戴维不要因沃利斯而丧失王位时，戴维说“我现在考虑的是我配不配作沃利斯的丈夫”。274

就沃利斯而言，她对戴维的爱也有独特的角度。“他对我有无比的吸引力。他好像是一种走向另一个新奇世界的通行证，使我感到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兴奋。在他那单纯、自然、憎恶分明的态度下，另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庄严、权威的派头。他一个微不足道的意念，就会变成惊世之举：火车等候，轮船待发，飞机听命，最豪华的宾馆开门迎客，最尊严的座位虚席以待。一般人难以想象，不敢奢望的东西，对于他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轻而易举。这一切都吸引着我，诱惑着我，使我无法挣脱。”沃利斯这样说。

少女时代的沃利斯，就对当时已是威尔士亲王的戴维十分崇拜，她把他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夹在日记本里，作为理想的白马王子。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1930年秋，沃利斯通过戴维的情人西尔玛，在一次酒会上和戴维相识，撒下了戴维日后逊位的祸种。

不久，西尔玛大意失荆州，她在短时间离开英国时，怕戴维寂寞，托沃利斯关照他。爱情上火辣辣咄咄逼人的沃利斯乘虚而入，取而代之，等西尔玛回到伦敦时，一对新情人已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情场如战场。沃利斯不会把亲王再还给西尔玛，西尔玛无可奈何，只怪自己“择友不慎”，从此在亲王的私生活中销声匿迹。

沃利斯和戴维的关系发展很快。在不久后的航海旅游中，两人俨然以一对情人公开相处，阳光、海滩、鲜花、美酒，热恋中的爱侣形影不离。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自迷，在爱神的驱使下，他们超越了封建礼教筑起的死亡线。

1936年，老王驾崩，戴维即位。他想尽快和沃利斯结婚。一个单身汉作国王是不妥当的。然而，国王的想法遭到举国上下许多人的反对。

爱情给人力量，爱情也使人愚蠢。热昏的情人最可能冒险。尽管戴维在许多事情上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但此刻他却胆大妄为。

“你们不同意我结婚，我就退位。”国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几分威胁，几分乞求。

“你的弟弟会比你干得更好！”母后玛丽把他堵了回去。于是，爱德华八世逊位给弟弟。

### 国王是一头骡子

1464年，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爱上了英王爱德华四世，但她很明智，对国王说，“我知道，我不配当你的王后，但是我完全可以当你的情人。”

沃利斯不同，她不甘情人的地位，她要当皇后，她错了。

1573年，英王亨利八世要和情人安妮·博林结婚，遭到教皇克莱门特和

朝野上下反对，国王新封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断绝了同罗马的关系，自任国教最高首脑，力挽狂澜，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爱德华八世不同，他既无魄力，又无权力，又要和沃利斯结婚，他也错了。

当 1936 年 10 月 27 日法庭“有条件判准”沃利斯离婚案后，国王同反对者的矛盾已趋白热化，如果国王善于妥协，也许事情会有转机。

“我要按着我的意思解决这件事。”犟脾气使国王寸步不让。

沃利斯原以为国王无所不能，现在看到戴维的王位危若累卵，痛心之余，离开英国，赴法国避难。谁知事情并没有“一走了之”。因为国王并没有放弃和沃利斯的关系。为了舍车保帅，沃利斯于 12 月 7 日发表了同国王脱离关系的公开声明：

“辛普森夫人在数星期中曾尽力避免任何足以危害英王陛下及英国王位的行动与计划。今天，她的态度仍无变化，并欲永远退出此种不愉快及难处的地位，如此种行为有助于解决此次危机的话。”

沃利斯曾想彻底断了戴维结婚的念头，去某个地方隐居起来，但就在这时，她得到了国王退位的消息。

在这之前，国王曾设想让丘吉尔组织新政党并在鲍德温政府辞职时组织新政府的方案，但他很快又变卦了。因为他认为这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混乱，从而导致英帝国的分裂，并最终影响到他和沃利斯的婚姻。

在江山和情人的天平上，国王不断加重后者的砝码，失败已是不可避免了。国王当时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对国王的悲剧评价说：

“如果国王投入全部力量保持王位，在适当的时候再考虑结婚，同时发动一场宣传运动，打倒鲍德温，就可能胜利。但他却专心致力于其他事情，主要是不惜任何代价，任何牺牲，保护辛普森夫人，使她不受恶意宣传之辱，这就铸成了失败。”

## 时势轮回

1937 年 6 月 3 日，退位的国王戴维和沃利斯结了婚。婚后戴维被称为“温莎公爵殿下”，沃利斯按王室的规定不能称“殿下”，只能称“夫人”。

王室的歧视和世人的冷遇，使戴维和沃利斯的爱情显得更加坚贞而伟大。他们相依为命，风雨共济，在异国他乡共同生活了 35 年。1972 年，温莎公爵在弥留之际紧紧拉住沃利斯的手，说他有这样的妻子而自豪，对他失去王位终生不悔。14 年以后，沃利斯也离开人世，一曲爱情悲剧，降下了帷幕。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世界历史的日历翻到 90 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王室成员与庶民百姓结婚已不再遭受非议，干涉婚姻自由已为世人难容，就连英国王室也在星转斗移中将昔日的怒气冰雪消融。1965 年，温莎公爵回伦敦治病，伊丽莎白女王亲赴看望，1972 年公爵去世，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沃利斯去世后，英国女王偕王室全体成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但沃利斯的墓志铭仍是“温莎公爵夫人”，还没有把“夫人”改为“殿下”。

是“夫人”还是“殿下”，今天的世界百姓对此似乎不大关心，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历史上那些严守礼教、舍生取义、玉碎瓦全的君王，而是戴维忠于爱情，无私奉献的美德，是沃利斯勇敢进取的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品格。

当年戴维的两句情话，不知激发多少热恋中的男女鱼水相依，一日三秋：  
我的朋友，和你终日厮守，我觉得，更胜这王冠、王杖和王位的拥有。  
凌风

权力金钱美女 英雄难过三关

##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政坛失足

邪恶穿行充满欲望的路径，引诱许多人跟着它走。

——贝多芬 1972 年 7 月，54 岁的田中角荣以其没有高等学历的“庶民”资历登上了首相宝座。他以“改变潮流”、“实行新政”为口号，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列岛改造论”为旗帜，以“决断和实行”为行动方针，上台后仅两个多月就实现了恢复日中邦交的大业，显示了其特有的“带计算机的推土机”的能力和魄力。他所描绘的通过“列岛改造”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的蓝图使人们产生了希望和憧憬，这使他的威望空前提高。1972 年 8 月，在《朝日新闻》所作舆论调查中，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 62%（一说为 68%），为战后最高纪录。田中的上台给日本统治集团带来了打破自民党在大选中得票率长期低于半数之衰落局面的希望，田中本人也以“保守中兴，非我莫属”而自诩。当时，许多人都预料这位“庶民宰相”能在首相官邸多住一段时间，孰料仅在两年零五个月之后就被迫卷起了铺盖，其亲手振兴自民党的美梦也随之化为泡影。

### 政策受挫

如前所述，田中是打着“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列岛改造论”两面旗帜上台的。上台后实践的结果，前者的确获得了成功，后者却使田中跌了大跟头。

所谓“列岛改造论”，就是以改变工业布局、修建高速铁路、公路和建设新地方工业城市为核心，同时解决人口、资源分布疏密不匀问题的国土开发构想。这是田中角荣的一贯主张。早在 1967 年他任自民党城市政策调查会会长时，就组织人马拟定了与其内容类似的《城市政策大纲》。1972 年他准备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又在《大纲》基础上写成《列岛改造论》，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当年日本的畅销书。此书虽非政府的政策文件，但田中上台后很快就在政府内设立了“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并将该书提出的政策主张付诸实践。

更准确地说，田中在他上台之前就已开始着手实施“列岛改造”构想了。1971 年 7 月田中改任主管工商业的通产大臣以后，就组织班子起草了旨在改造工业布局的《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并于第二年 6 月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法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协商划出若干“促迁地区”（工业过度密集地区）和“诱导地区”（工业不发达地区），并用政策性手段促使工业企业从“促迁地区”迁往“诱导地区”，即向“诱导地区”发放用于吸引设厂的政策性补贴，向不肯从“促迁地区”迁走的企业征收“驱赶税”。此法在国会通过后不到一个月，田中就当上了内阁首相，于是便将其作为实施“列岛改造论”的重要环节大力推行，结果遇到了很大阻力。各地都为争取被指定为“诱导地区”或不被指定为“促迁地区”而大肆活动，使最后被指定的“促迁地区”比原计划减少了 50%， “诱导地区”则增加了 15%。不仅如此，被指定为“促迁地区”的企业及其下属承包工厂的业主和工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驱赶税”的运动，并且动员了他们的代理人在国会内部遥相呼应，终于迫使田中表示考虑取消“驱赶税”，从而使《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失去了原有的实际意义。

田中年阁推行“列岛改造论”的另一重要手段是扩大公共投资。田中上台以后，立即将1972年的财政预算追加了6511亿日元，相当于原预算的5.7%；并且还3次追加了被称为“第二预算”的财政投资贷款，总额达8008亿日元，相当于原计划的14.2%。到1973年，又将一般会计财政预算比上年度增加了24.6%，将财政投资贷款增加22.9%，企图以扩大公共投资为动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9%的目标。这实际上是池田勇人执政时期高速经济增长路线的继续。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时至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增长的极限”已被作为现实问题提了出来，资本主义世界已开始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已成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美国更因陷入越南战争等原因而元气大伤，并于1971年放弃了按固定比价用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金元帝国”地位，从而产生了所谓“尼克松冲击”。就日本来说，不仅同样面临着资源短缺、公害严重等问题，还因佐藤年阁在“尼克松冲击”时采取了错误对策而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当时，因用美元不能自由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美元的贬值已不可避免，佐藤内阁却幻想着维持美元与日元的固定汇率，在其他欧美国家纷纷关闭外汇市场之时，却用增印纸币等办法购进了大批美元，后来又为减弱日元升值的影响而过分采取了降低利率、放松银根进行刺激的措施，使社会上流动资金过多，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

在这急需抑制经济增长，大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物价等问题的时刻，田中内阁却提出了通过扩大公共投资进行“列岛改造”并谋求高速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人为扩大的需求超过了经济供给能力，使社会上的流动资金进一步增加，使原已潜伏着的通货膨胀危机一举爆发。在田中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即1972年9月，全国批发物价就比8月上漲了0.9%，到年底，批发物价已比上一年同期上漲了8.5%，田中年阁制定了1973年度的超大规模预算之后，到1973年5月，全国的零售物价已比上年同期上漲9.4%，东京都更达11.6%。特别应予指出的是，由于“列岛改造论”在许多地区煽起了可望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幻想，土地投机风靡一时，社会上的大批流动资金涌入土地市场，使土地价格如断线风筝一样直线上升。到1973年4月1日，全国的平均地价已比上年同期上漲了30%。严峻的现实击碎了人们企盼通过“列岛改造”享受高速增长之惠的梦想，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随之直线下降。到1973年4月，舆论调查中的田中内阁支持率已从1972年8月的62%降至27%。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期而至的石油危机又给田中的“列岛改造”计划以致命的一击。众所周知，日本60年代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廉价石油取得的，因而日本又被称为“用石油泡出来的发达国家”，而其国内又基本上不产石油，所需石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宣布大幅度削减石油产量并将油价提高约3倍时，对日本来说不啻是一场灭顶之灾。油价的大幅度上漲使日本原已存在的通货膨胀越演越烈，1973年12月比上月上漲7.1%，比上年同期上漲29%。社会上民怨沸腾，动荡不安，出现抢购手纸、洗衣粉等物资的风潮。至此，一直坚持推行“列岛改造论”的田中不得不放弃初衷，改任一直反对“列岛改造论”、主张低速增长的宿敌——福田赳夫为大藏大臣，让其全权掌管经济政策。福田一上任，就宣称“现在不是搞列岛改造的时候”，将上年度曾增加32%的公共投资改为只增0.7%，并且大幅度减少

了财政投资贷款。田中本人也不得不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岛改造论》只是我个人的论文”，实质上是宣布放弃“列岛改造论”，即宣告了“田中政治”的失败。

经济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上的挫折。由于田中内阁推行“列岛改造论”引起通货膨胀遭到国民普遍反对，使自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连遭败绩。在1972年11月举行的众议员选举中，田中曾打算利用因成功地恢复日中邦交而形成的“田中热”壮大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孰知此时“田中热”早已因物价上涨等原因而开始降温，结果自民党在众议院的议席非但未能增加，反而减少了许多，而与自民党对抗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席则有较大增加。这使自民党要员们产生了危机感。于是，田中又使出了他力图使自民党“中兴”的第二招——修改众议员选举制度，即改原来的中选区（每区选出议员3~5人）为小选区（每区选出1人），以避免出现自民党的候选人在同一选区内自相残杀的局面，使自民党更有把握地获得稳定多数席位。这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一贯主张，并曾向国会提出过议案，但因遭到在野党的坚决抵抗而未能通过。在野党不仅将其视为对自己生存的巨大威胁，还将其视作自民党为掌握国会2/3以上议席以实现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之图谋的重要步骤，因而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田中内阁这次提出修改选举制度方案后，同样遭到各在野党的强烈反对。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等在野党之间本不很团结，但在反对自民党提出的小选区方案问题上却一致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以拒绝参加国会审议等手段相对抗。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们虽多次表示过支持小选区制，但当改革选区的方案提上具体议事日程，却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调整选区后，一些自民党议员将不得不放弃其苦心经营多年的社会关系网，这对他们是极大的损失，因而他们也不赞成立即修改，并且动员了许多自民党上层人物出面阻拦，最后连由自民党资深议员出任的众参两院议长及自民党副总裁甚至包括田中的盟友太平正芳都出来劝阻，田中虽曾一度坚持以政府名义提出议案，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党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使田中寄予厚望的改革方案未及交付国会审议便胎死腹中。这样，田中作为使自民党“中兴”的致胜法宝而打出的两张王牌——“列岛改造论”和“小选区制”全部受挫，大大动摇了田中政权的根基。

### 误踩虎尾

日本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后，长期处于美国之“小兄弟”的地位。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在法律上获得了独立地位，但美军仍驻扎在日本领土，日本仍处在美国“核伞”的保护之下。在外交上一直忠实地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而美国则不很尊重日本的主权地位。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大幅度改变对华政策并于当年2月宣布访华，事先竟未向一直坚决地追随美国反华的日本政府打招呼，给当时执政的佐藤政权当头一闷棍，使其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尴尬地位，并成为促使佐藤尽早下台的原因之一。而田中上台时高喊“改变潮流”、“实行新政”，自然也包括在外交上改变日本的仆从国形象之意在内。田中上台后，果然摆出了开展自主独立外交的姿态，并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与中国正式建交，在对华关系上走到了美国的前面。此举固然不会使美国人高兴，但因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并未作出不悦的表示。但当田中后来大力开展“资源外交”时，则使美国大老板大为光火，从而给田中政权的生存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如前所述，日本是依靠大量消耗石油等能源来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所用石油绝大部分来自中东，而中东石油当时多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因而日本对美国石油资本的依赖很大。在发电用的核能源方面，日本更是完全依赖美国公司提供，因而核燃料又被称作是日本托庇于美国的“第二个核保护伞”。田中上台之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立即大力谋求资源、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力图摆脱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他本并不十分擅长外交，但上台后却频频出访了中国、苏联、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印尼等许多产油国家。他支持日本企业向印尼等国石油业投资和日苏联合开发苏联秋明油田的计划。在英国，他提出要参加开发北海油田。在西德，他与其政府首脑探讨日本参加西德核能综合开发项目的可能性。在法国，他提出要与其共同开发铀矿，并表明了从法国引进“气体扩散方式”生产核能的意向等等。从谋求经济稳定增长这一日本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田中的上述行动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因触犯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田中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日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矛盾已演化为外交问题，达到了空前激化的程度。

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引起的。当时，阿拉伯国家采用了“石油战略”，宣布石油减产并大幅度提价，并且停止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供应石油。因日本曾一直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其国名自然也被列入将断绝石油供应的国家名单之中。面对此项抉择，田中内阁毅然改变了一贯立场，宣布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要求以色列从其占领地区撤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主权利。紧接着，田中还置美国的严重警告于不顾，派遣副首相三木武夫出访阿拉伯各国，并且带去了经济援助等丰厚的礼物，从而获得了作为“友好国家”可得到充足石油供应的待遇。田中内阁此举立即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务卿基辛格公开指责日本“只考虑本国利益”，是“对盟国的背叛”。不久，美国又单方面宣布取消了已酝酿很久、迟迟未能成行的日本天皇访美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日本的计划。后来，田中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时受到了当地示威群众的围攻，不得不在军警保护下乘直升飞机逃离现场，许多有影响的人士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此事。后来，田中使身陷囹圄并最终失去再次上台执政之望的“洛克希德案件”最先发端于美国国会，其个中奥妙也颇令人深思。

其实，日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从田中首相任内三次访美所受礼遇中也可窥知一二。田中上台后于1972年9月初首次访美时，为表示日美地位平等，特地选中了位于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夏威夷作为谈判地点。但当时尼克松总统对此并不很介意，并为欢迎田中准备了由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他本人还破例亲赴飞机舷梯旁恭候迎接。为了宴请田中，尼克松还专门从华盛顿著名饭店带去了厨师。而当1973年7月末田中再次访美时，上述热情欢迎场面已全然不见，接待规格比以往历届日本首相访美时都低。待到1974年9月田中第三次访美时，等待田中的已是福特总统的冷嘲热讽和基辛格国务卿的借题发难了。

总之，田中执政时期可以说是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空前冷淡的时期。美国虽不会也不可能直接下令免去田中的首相职务，但也肯定不会希望田中这个不听话的“庶民宰相”长期在扶桑之国执掌权柄。而日本的统治集团则在为日美关系的空前紧张而焦虑不安。对他们来说，通过“换马”来改善日美关系则会是个聪明的选择。因此，完全可以说田中在日美关系上遇到的波折是

导致他下台的一个原因。实际上，田中刚下台不久，颇负盛名的日本记者田原总一郎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田中下台是因为他“踩了美国这只老虎的尾巴”。

### 祸起萧墙

日本是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执掌行政大权的内阁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由于执政的自民党一直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因此，只要自民党内部不分裂，其总裁就有了稳居首相宝座的保证，但是，自民党又是一个派系联合体，各派之间经常为争夺总裁、阁僚、议员等职位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田中上台，就是他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三派联合起来与福田赳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角福战争”的结果。当时，在最终决定自民党总裁人选的选举中，田中得了 282 票，而得到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等人支持的福田为 190 票，也就是说，自民党内支持田中上台的势力即“主流派”约占 3/5，而支持田中之对手的“反主流派”则占 2/5，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人因田中上台后“分赃”不匀而转到了“反主流派”一边，所以田中政权的党内基础可以说并不是十分牢固的。这些“反主流派”平时尚可与田中政权合作，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成为田中政权的掘墓人。

田中上台伊始，福田派就采取了与之对抗的姿态。当时，田中组阁时采用了“论功行赏”的作法，让支持自己上台的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等“主流派”占居大多数党政要职，仅将少数次要职位让与“反主流派”。福田派则针锋相对，拒不派员充任田中分给的两个阁僚职位，使田中一上台就处于难堪境地，不得不自己将该职位兼了起来。后来，福田派虽作出妥协并派员入阁，但对推行田中提出的政策则不予积极合作，有时甚至从中作梗。如前所述，对于田中作为“拳头产品”大力推销的“列岛改造论”，福田一直公开大唱反调。对于田中竭力推行的“小选区制”，福田本人虽未出面反对，但其后台老板岸信介等人则在关键时出阵牵制，不肯让田中把实现自民党多年追求实行“小选区制”这一愿望的头功抢到手。在田中内阁准备与中国签订《日中航空协定》时，福田派的别动队——青岚会更是一马当先，极力阻挠，使田中内阁为此大伤脑筋。

青岚会是个由自民党内年轻的鹰派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原来就是福田派的骨干成员或支持者，另一些人如中川一郎等人在“角福战争”时曾站在田中一边，因田中上台后未能满足他们要求入阁的愿望，只让他们担任了相当于副部长级的政务次官，于是他们便转过来与福田派一起反对田中。这个集团以反共产主义为主要特征，在中国问题上反华亲台，在朝鲜问题上“反北亲南”。中日签订航空协定本是两国建交时约好了的事项，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可是以青岚会为急先锋的自民党鹰派却从中作梗，在党内多次发难，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日台航线，反对田中内阁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使日中航线在两国建交两年后才得以通航，使田中内阁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田中内阁准备与北朝鲜改善关系和对南朝鲜情报官员在东京绑架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一事持谴责态度时，青岚会也跳出来对田中内阁施加压力，使其不能充分实施自己的政策主张。青岚会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反映了福田赳夫的意志。可以说，“角福战争”在田中上台后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两军一直处在对峙状态，酝酿着另一场更大的冲突。

如果说福田赳夫是田中角荣的“宿敌”，三木武夫则在田中上台后与之

结下了“新怨”。三木本是自民党内鸽派的代表人物，在恢复日中邦交等问题上与田中政见相同，曾支持田中上台执政。田中上台后，一直让三木担任内阁中唯一的副总理职务，但三木与田中之间的关系却是江河日下，以至于三木后来竟成了田中政权的主要掘墓人之一。原因何在呢？

让我们还是从这个“副总理”说起吧！按照日本的法律，副总理本非必设职位，迄今出现过的几位副总理都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鉴于当时人事安排或处理政务上的需要而随机任命的。田中上台组阁时，三木向他要求给本派3个阁僚职位，田中却只给了2个，理由就是让三木任副总理，说是副总理一职可相当于两个一般阁僚职位。可实际上副总理一职只是个虚职，特别是三木当时就任的只是作为“无任所大臣”（即不管部长）的副总理，不直接管辖任何实际业务部门。三木就任后要求依照惯例到首相官邸内的办公室工作，也被田中拒绝。因此，可以说三木担任的只是个荣誉性的职务，并没有什么实权。后来发生“石油危机”时三木倒是露了一下脸，代表日本历访中东各国，开展“资源外交”，为日本克服“石油危机”作出了贡献。可是，这次出访实际上是要到处赔礼道歉，修复原来很紧张的国家关系，可以说是件田中很不愿干的棘手的工作。这样，三木怎么会真心拥戴田中呢？三木与田中之间的矛盾到1974年举行参议员选举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次选举中，三木的故乡德岛县只有一个议员名额，自民党亦只能推荐一名候选人，而自民党方面准备参加竞选的却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三木的心腹、现任参议员久次米健太郎；另一个是田中的心腹后藤田正晴。于是，在久次米与后藤田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自民党推荐资格和国会议员席位的“三角代理战争”。一般说来，在竞选时得到自民党的推荐是比较有利的，因为那样不仅可以从党本部拿到竞选经费，还可以借助于本党在国民中的声望和党组织的帮助。在这方面，自民党内向来有“现任优先”的惯例，因而人们事先都预料自民党会推荐久次米为候选人。谁知田中扩大本派势力心切，竟利用手中权力出人意料地确定后藤田为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并且通过中央党政部门向德岛县的党政部门施加影响，要求他们协助推选后藤田。这还不算，田中在竞选期间还先后三次亲赴德岛声援后藤田。作为上司的田中如此不讲义气，身居下属地位的三木更是怒火难平，他竭力支持久次米作为无党派候选人参加竞选，并把手下干将都派到德岛去声援，还向舆论界公开指责田中所为“使日本回到了东条内阁那样的黑暗时代”。与此同时，三木迅速向反对田中的福田派靠拢，福田也不失时机地赶快向三木伸出橄榄枝，派出要员“代表福田”到德岛去声援久次米。选举结果，虽然久次米健太郎当选为参议员，三木仍然余怒未息，对此次选举中田中所为耿耿于怀。他与福田密切合作，抓住田中及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搞“金权选举”却又遭到惨败并受到舆论严厉抨击这一良机，发动了一次“倒阁行动”：三木在选举结束几天后就宣布辞去内阁副总理和环境厅长官职务，随后，福田和他的主要助手保利茂也分别宣布辞去地位非常重要的大藏大臣和行政管理厅长官职务，企图一举迫使田中内阁垮台。此举虽因田中善耍政治手腕等原因而未完全奏效，但已使本已摇摇欲坠的田中政权更加弱不禁风。后来，福田和三木两派配合更加密切，频频在公开场合批评田中，并扬言如田中拒不下台，他们将不借退出自民党另组新党，给日本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此举又与报刊上揭露田中非法敛财和私生活方面的艳闻造成的冲击遥相呼应，终于迫使田中从政坛巅峰上跌了下来。其实，日本舆论界还有人指出最终直接导致田中下台

的那些揭露文章就是福田等人指使人搞的，此说虽至今未得到最后证实，但也足可使我们闻到“角福战争”中的浓烈火药味儿。

## 丑闻点火

政策受挫、国内外党内外诸种矛盾的激化等打击虽使田中政权伤痕累累、危在旦夕，但最后使其结束政治生命的则是那两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是那文章中揭露出的金钱女色问题引燃的政争烈火。

在日本，田中早已被视为善于搞“金权政治”的代表人物。他善于用金钱来攫取和维持权力，善于使用权力攫取金钱，搞权钱交易。这是田中的多年政治生涯给人们留下的难以抹掉的印象。

田中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马贩子家庭，16岁时只身一人到首都东京闯荡，依靠半工半读为生。后因娶房东家的女儿——一个比田中大8岁、离过婚并带有一个孩子但却有巨额财产的女人——花子为妻，遂利用姜家的财产发迹为名声显赫的建筑业资本家。1947年，他凭着自己的资产步入政界，当选为众议员，第二年又被破格提拔为法务省政务次官。可是，就在这一年，即在田中刚开始掌握一些权力的时候，他就被控告在国会审议将私营煤矿收归国家管理法案问题上收受资本家巨额贿赂，并经国会批准被警方逮捕，1950年被一审判决拘役6个月。虽然后来二审又改判田中无罪，但此事已在田中历史上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

然而，田中本人却丝毫不以这次被捕事件为戒。随着他在自民党内地位的提高，其玩弄金权政治的手腕反而日益纯熟起来。特别是他先后几次出任自民党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干事长期间，利用执掌党内财政、人事大权的有利条件，一面想方设法为自民党筹集“政治资金”，一面“活用”金钱武器，使自民党在多次国政选举中获得胜利，因而被称作“选举之神”。与此同时，田中也借机在党内外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在1972年田中与福田争夺总裁职位时，田中也为争取选票花了大笔金钱。据日本报界揭露，田中为了得到当时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中间派——中曾根派的支持，曾一次交给中曾根康弘7亿日元。按照福田的说法则是：在这次总裁选举中，福田仅花了1亿日元，而田中则花了100亿日元，田中当选就是大笔花钱的结果。当然，田中搞金权政治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66年田中任干事长期间，他手下的党政要员搞诈骗、逃税，倒卖国有资产从中渔利等一系列丑闻相继被揭露，形成了著名的“黑雾事件”，田中不得不引咎辞去干事长职务。在担任首相期间，田中在1974年举行的参议员选举中又因搞金权政治跌了一个大跟头。

如前所述，田中上台以后，因在众议员选举、推行“列岛改造论”、改行“小选区制”等重大问题上接连受挫，其内阁支持率已持续下降，政权基础已很不稳固。于是，定于1974年7月7日举行的参议员选举便成了对田中内阁的严峻考验。当时，自民党与在野党在参议院的势力对比已悬殊不大。如果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失败，失去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那么，自民党政府提出的议案将因在参议院不能通过而无法实施，从而对田中年阁甚至自民党政权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因此，田中不遗余力地投入了这次选举，企图再现其作为“选举之神”的威力。首先，他为这次选举投入了大量金钱，据说总数达1000亿日元之多。这也大大抬高了参议员的“价码儿”。当时，日本有“十当七落”、“五当三落”之说，意即：在参议院全国选区候选人需

花 10 亿日元才能当选，只花 7 亿日元则要落选，而实际上有的候选人竟花了 15 亿日元；在地方选区，候选人也要花 5 亿日元才能当选，仅花 3 亿日元则会落选。不仅如此，田中还与财界密切配合，让各企业主动动员本企业职工支持自民党候选人，出现了欧美国家少见的“企业整体选举”的局面。田中本人也披挂上阵，以每天 200 万日无的价格包租了两架直升飞机，在竞选期间每天乘直升飞机到全国各地巡回发表演说，声援自民党特别是田中派的候选人。据说，田中在这次选举期间共发表演说达 147 次之多。然而，事与愿违，田中如此大张旗鼓地搞金权选举，特别是其明目张胆地与资本家携手大搞“企业整体选举”的作法受到了舆论的严厉谴责，遭到了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结果，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又遭惨败，得票率低于 40%，所得议席比选举前减少 8 个，从而使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低于半数，选举后赶忙将以无党派身份当选者拉入自民党、才算勉强超过半数。这一结果给日本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自民党内其他派系均对本派席位减少而唯独田中派席位增加深为不满，指责田中利用职权优先将本党竞选资金分给了田中派候选人；福田、三木则趁党内外均对田中不满之机激烈地批判田中搞金权政治，并于选举结束几天后就相继辞去阁僚职务，企图一举迫使田中下台。自民党的后台老板——财界也因自民党花去大笔金钱却不仅未能获胜反而导致怨声载道而十分不满。素有“财界总理”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于选举结束后不久宣布：经团联今后将不再像以往那样统一为自民党筹措政治资金。一直是出钱大户的九大电力公司和其他一些企业也宣布不再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日本统治阶层的上述举动给田中政权以严重打击，使其内外交困，犹如坐在火药桶上一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颇有影响的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于 1974 年 10 月发表了新派记者立花隆撰写的题为《田中角荣研究——金脉与人脉》的文章，揭露了田中及其亲友利用设立“幽灵公司”偷漏税、钻政策空子倒卖土地等手段攫取大笔金钱的行为。同期杂志还刊载了儿玉隆也写的揭发田中与其后援会负责人佐藤昭女士之暧昧关系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好似点燃了田中身下火药桶上的导火索一样，使田中一下子斯文扫地。社会党等在野党闻风而动，立即组成了调查田中上述问题的专门班子，并扬言要在国会加以追究。福田派干部则在自民党的干部会上追究田中的责任，福田、三木两人还公开暗示不惜以另立新党之分裂行动与田中对抗。一些外国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就上述报道向田中发问，更把田中搞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翌日，西方国家各大报又将此事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使之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这些报道又返回日本国内，真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进一步掀起了声讨田中的声浪。在野党还提出要在国会传唤田中的亲信和情妇到国会作证，如此议付诸实施，将使田中更加身败名裂。同时，舆论调查田中内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到 11 月已降至 12%，为战后历史上最低水平。在此重重打击之下，田中的身心已到了忍耐的极限。据说，当时田中的血压、血糖升高，口眼歪斜，已动弹不得。自民党内的元老甚至盟友这时也都出面劝他先保存实力以图来日东山再起。于是，争强好胜的田中这时也只好叫人起草了辞职声明，于 11 月 26 日分别请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和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在自民党干部会和内阁会议上代读，凄凄惨惨地从权势之巅峰跌了下来。然而，事情并没就此结束。

1976 年 2 月 5 日，从美国传来消息，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为推销“三

星”飞机向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赠送了巨额金钱。日本哗然。7月27日，东京地方检查厅以违犯外汇法嫌疑逮捕田中，田中不服，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开始了。

1983年10月12日，东京地方法庭一审判决认定田中受贿5亿日元，判处其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

日本实行三级终审制。一审判决后，田中提出上诉。1987年7月29日，田中二审败诉，继续上告，三审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1989年10月14日，田中角荣通过其女婿宣布他在本届众议院议员任满后引退。洛克希德案是否能赢，还是个问号，但田中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划上了句号。

韩铁英

## 金钱政治危机四伏“里库路特”首相翻车

## ——竹下登下台始末

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普鲁塔克

1989年4月25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地位报道了一条重要消息，日本内阁首相竹下登于上午11时半在首相官邸会见记者，郑重宣读了他决心引退的声明，“当前正在发展的由里库路特问题发端的对政治的深刻的不信任，给我议会制民主主义带来极重大的危机。我作为政府的最高责任者及自民党总裁，痛感招致如此事态的责任。尤其因我身边的问题加深了政治的不信任感，向各位日本国民深表歉意。为了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我决心引退”。就在3月初，竹下登还表示“要靠一个‘忍’字渡过难关”，时隔仅一个半月，竹下便“忍”不下去了，而要引退辞职，其中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这是自民党金钱腐败政治的结果，是竹下无视民意、一意孤行的必然后果。

### 强行征税 陷入困境

竹下登是日本内阁制度建立以来的第46位内阁首相，竹下内阁是第74届内阁。1987年10月，中曾根康弘的内阁首相任期行将届满，竹下登同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3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都想要接替中曾根康弘，出任这个梦寐以求的职务。由于竹下登领导着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得到了自民党内的“首相制造商”田中角荣的支持，又与中曾根达成某种默契，故在20日由中曾根指定竹下为接班人。31日自民党大会选举竹下为第12任总裁，11月6日，国会指定竹下登为内阁首相。竹下登夙愿以偿，自然春风得意一番。

竹下登在首相位一年有半，若全面评价之，在外交、内政方面均有政绩可述。尤其在对外交往中，竹下上台伊始便出访马尼拉参加东盟首脑会议，此后又不辞劳累，相继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南朝鲜、意大利、梵蒂冈、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昭和天皇裕仁的葬礼期间，竹下还接待了许多国家的元首和主要领导人。通过这些国际交往，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周边关系得到进一步缓和。其内在因素是，日本的经济实力在80年代后期迅速提高，美国要借重日本的技术，欧洲要防范日本的商品冲击，亚洲需要日本的资金援助，竹下上台赶上了对日本有利的国际大气候。

所以，竹下任期中的前一年，其内阁支持率始终维持在41%以上（内阁刚组成时支持率最高为48%）。但在1988年12月，内阁支持率急转直下，骤然降至29%，急速下降的趋势此后有增无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竹下身为首相而无视民意，依仗自民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于1988年11月和12月强行在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税制改革的六项法案。

税制改革问题，是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此前，日本的税制还是在美国占领时期根据“肖普建议”建立起来的。后来，日本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税制已不适应社会现实，更难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为了弥补国家财政赤字，税制改革势在必行，问题在于按照谁的利益来改革。1979年大平正芳



首相就曾因计划增设一般消费税，而引起群众不安，造成选举受挫。最后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束之高阁。1987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了新的税改方案，雄心勃勃地企图在自己的任期内一举解决税改问题。尽管他可以提出许多理由为自己的税改方案辩护，其根本目的在于将部分储蓄引向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发展，借以缓和由于大量出超引起的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矛盾。但税制改革毕竟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一般说来，减税不会有人反对，增税却非常困难。中曾根的税改方案用减少所得税和法人税的办法刺激需求和投资，这样做主要有利于垄断资本和大企业，同时又增设5%的销售税，把相应的负担转嫁给广大的消费者，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将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曾根的税改方案遭到广大国民的反对是必然的。1986年5月，中曾根内阁的支持率曾高达53%，在税改方案提出后的1987年3月急剧降至24%。在全国民意和在各在野党的联合反对下，中曾根的税改方案成为废案，希望化作了泡影。

竹下登上台后，在注重外交的同时，内政方面也想在税制改革上有所建树。他提出了新的税改方案，这个方案同中曾根的方案相比，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将5%的销售税改为3%的消费税，仍是要从广大的日本国民身上征收更多的税金。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但外表温文尔雅、含而不露的竹下登却行事刚愎果断，明知众意难违而一意孤行，先是在众议院税制特别委员会上自民党单独表决强行通过税改方案，而后又依仗多数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这六项法案。在参议院审议这六项法案时，自民党同在野党的对抗更加激烈。12月21日，在参议院税制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上，自民党不顾在野党的一片怒吼百强行表决通过，23日下午4时许，参议院会议开始审议税改法案。社会党、共产党议员采取了投票时互相之间拉大距离、缓步前进的“牛步战术”同自民党对抗，公明党、民社党也投票反对，在野党还提出其他动者耗费投票表决时间。连续的投票表决进行了整整一天，直至24日下午6时，自民党才以多数票通过了税改六项法案。1989年4月1日开始征收消费税。人们在商店购买商品或进行其他消费活动时，除按价格付款外，还要按价格的3%付出消费税，原来100日元的面包，在施行消费税之后需用103日元才能买到手。对于广大日本国民来说，这种直接税就等同于涨价。竹下登以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地解决了自民党面临的棘手问题，却造成了他自己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对许多日本国民来说，提起竹下登，就想到消费税，竹下登就等于消费税，竹下登的形象再也难以恢复了。

### 变相受贿 雪上加霜

因为强行推行税制改革，竹下内阁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又由于行贿受贿的政界丑闻里库路特事件被揭发出来，竹下内阁的处境如同雪上加霜，陷入朝夕难保、岌岌可危的地步。

所谓里库路特事件，指80年代中后期里库路特公司为了获得额外利益、加强同政界的联系而向为数众多的政界要人变相行贿的事件。“里库路特”，英语意为“新兵”。又有人根据“里库路特”的读音，诠释为日文的“利狂人”，即为追求利润而发狂的人。里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即日本经济界的“新兵”，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利狂人”。70年代，他在最高学府东

京大学读书时，就在《东大新闻》上搞广告，后来与一伙同窗创办了“大学新闻广告社”，出版《里库路特之书》、《求职信息》等杂志，进入80年代又热衷于不动产买卖，获取暴利，其宇宙子公司从事公寓交易额已在同行业中升至第二位。里库路特公司属于新形势下产生的暴发户，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它在行贿拉拢、搞不正当手段方面更为前人所不及。据《朝日新闻》等机构的调查，截止到里库路特事件被披露报端的1988年，里库路特集团以政治捐款、提供后援会费、购买酒会入场券等方式向政界送出的资金，仅已查清的部分就达13.3亿日元（包括出让未上市股票得到的7.3亿日元），接受该集团资金的国会议员，在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四大党中就有44人。

里库路特使用这种直接或变相的行贿手段得到了政界的关照，事业发展很快。但是，纸包不住火，它的行贿问题终于被揭露出来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事态的逐步扩大导致了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事情的经过是，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一件政界丑闻，其内容是1984年里库路特子公司宇宙不动产公司为了争得神奈川县川崎市计划建设的“川崎技术广场地区”的有利项目，向专门负责批准申请企业的川崎市政府助理小松秀熙提供未上市股票，使小松在出卖这些股票时获利1亿多日元。因为法律规定各企业公司不得提供未上市股票，否则视为变相行贿。但小松秀熙毕竟是个小人物，这件事尚未引起社会的注意。然而，在1周后的25日，《朝日新闻》又报道了一条更重要的消息，原文部相、自民党重要成员森喜郎从江副浩正手中买过宇宙公司未上市股票，所用资金又是从与里库路特有关的金融公司第一金融借贷的，股票出让后同样获得了大额利益。30日，又发现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前农林水产相加藤六月、原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民社党委员长塚本三郎4人以本人或家属、秘书的名义接受了里库路特的股票。7月6日，股票受贿范围在政界首脑中进一步扩大，其中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副总理兼藏相宫泽喜一，此3人均以本人或秘书名义进行了里库路特未上市股票的交易。翌日，《朝日新闻》报道现任竹下登首相的秘书青木伊平也曾进行了里库路特未上市股票的买卖。政府的最高首脑终于也被牵连进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里库路特宇宙公司的重要干部松原弘在8月份两次到国会议员社民联的榑崎弥之助的议员宿舍，亲手向榑崎递交了500万日元现金行贿，“希望帮助里库路特”，没想到第二次行贿时被暗中录像，并于9月初公开放映。各大报纸也登出了双方递接现金的照片。里库路特公司行贿的证据确凿，舆论立刻大哗。8日，榑崎向东京地方检察院告发江副浩正、松前弘和宇宙公司池田友之社长3人犯有行贿罪，里库路特问题开始涉及法律。

此后，事件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尽管江副浩正坚决拒绝提供受贿者的全部名单，但有关机构对于事件的调查仍在不断深入。因为被揭发出受贿行为而先后辞去公职的有：社会党议员上田卓三，副总理兼藏相宫泽喜一，日本电话电话会社会长真藤恒，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郎，秩父水泥会长诸井虔，日本电话电话会社董事式场英，法相长谷川峻，经济企画厅长官原田宪，民社党委员长塚本三郎等。从1989年2月13日开始，东京地方检察机关先后逮捕了已辞职的里库路特会长江副浩正，第一金融副社长小林宏，日本电话电话会社董事式场英、长谷川寿彦，里库路特常务理事间宫舜二郎，宇宙会

社董事馆冈精一，原劳动省职业安定局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里库路特经营企画室部长小野敏广，前日本电信电话会社会长真藤恒及其秘书村田幸藏，原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原里库路特事业部长辰已雅郎，原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南等人，并将真藤恒和加藤孝二人向法院起诉。据有关机关调查的结果，里库路特事件牵涉的主要人物有四五十个。

里库路特公司行贿拉拢的对象主要是自民党中央领导层。由于自民党领导层内的主要成员、各派首领均牵涉其中，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自民党中央无好人”的印象，各在野党利用这个机会向自民党政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要他坦自在担任首相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从里库路特牟取厚利的事实。2月16日，社会党要求中曾根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交待事实真相。这一要求得到其他在野党的支持。27日，中曾根向记者发表谈话，否认同里库路特的关系，拒绝出席作证。各在野党因此拒绝审议新的年度预算，使国会陷入停顿，对竹下政权构成重要威胁，竹下因中曾根有恩于己，当初曾得到中曾根的指定方才登上首相宝座，当然他会尽力维持中曾根的声誉，拒绝同意让中曾根到国会作证。这个问题久拖不决，不仅使竹下登的声望越来越低，自民党内反对意见也日益强烈。事态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直到5月25日，中曾根才到国会作证。这个问题对促成竹下内阁垮台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事态的深入发展，在野党从3月末开始进一步将矛头直接对准竹下首相。3月30日，报刊揭露出竹下在1987年让里库路特购买了2000万日元酒会入场券的事实，在野党立刻在国会追究此事。至4月11日，已查明里库路特共向竹下提供资金达一亿五千一百万日元。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质询。在野党议员最后问竹下能否保证已经全部说清楚了，竹下又发挥了他的“语言明确、语义含糊”的本事答辩说：“我不是神仙，很难说今后会出什么事，我自己完全不能预言。”“我相信今后不会再出现了吧，不能回答假设的问题。”但刚刚过了10天，在22日又查出了竹下以秘书青木伊平的名义向江副浩正“借款”5000万日元的事实。这样一来，作为政府首相的竹下登，他说的话已完全不能让人相信，他已经无法再领导政府工作。除了极少数支持自民党的铁杆分子外，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对竹下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据4月22日《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竹下内阁的支持率已降至8%，不支持率为82.5%。支持者的最主要理由是竹下内阁是自民党内阁，不支持者的主要理由有税制改革不合理、政治伦理不正当、经济政策不合理等（另据共同社4月13日调查结果，竹下内阁支持率仅为3.9%，自民党支持率为24%，均为自民党执政史中的最低点）。在四面楚歌声中，竹下登大势已去，不得不于4月25日表示将在新预算通过后辞去首相职务。本想“顽强忍耐”的竹下登硬是被广大日本国民拉下了马。翌日，竹下的秘书青木伊平在自己家中割腕自缢身亡。青木自杀，也许因为他感到愧对主子竹下，也许是为了掩盖其他尚未被发觉的事实，难下结论。

正如人们所说，里库路特事件虽然已被调查近1年时间，牵扯到了许多政界要人，中曾根康弘因此到国会作证，并在5月28日脱离了自民党，竹下登因此辞职，但整个里库路特事件仍然是一个谜。揭发出来的事实也许只有全部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更多的事实也许永远搞不清楚。日本的法律制度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何况它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可钻呢。

竹下登既然已经宣布将要辞职，再无所顾忌，不必再照顾在野党的情绪，

4月27日自民党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为了排除在野党议员的干扰，取消了已经准备好的10人的质询，只用了2分钟时间就强行通过了1989年度预算。翌日审议预算的众议院大会更出现了日本百年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在在野党议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自民党议员单独投票表决强行通过了预算。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此后，预算虽未经参议院通过，但根据日本有关法律，5月28日预算自然成立。6月2日，竹下内阁总辞职。

### 金钱政治病入膏肓

应该看到，像竹下登这样作为政府首相而因经济受贿丑闻辞职，在日本政治史中并不是希罕事。日本被称为“一流经济、三流政治”的国家，其政治腐败集中表现在金钱政治上。自民党执政以来，约过10年就发生一次牵涉重要人物多、涉及面广、影响巨大的政治丑闻，例如50年代中期发生的造船行贿案，60年代中期发生的“黑雾事件”，70年代中期发生的洛克希德事件和道格拉斯·古拉曼事件，以及80年代中期发生的里库路特事件，这类“10年一次”的丑闻无不与金钱有关，且使得为数不少的首相或政治家辞职。金钱是资产阶级民主运作的推进剂与润滑剂，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金钱是自民党维持政权的重要武器，也是自民党政治家争夺权位的资本。当前，一位自民党议员在大选中竞选连任需花费2亿日元，新出马竞选者则需花费3亿日元，甚至有“五当四落”的说法（即花费5亿日元能当选，花费4亿日元可能落选），超出了法律规定选举费用最高限额的十几倍。这些钱主要用来拉拢选民，收买选票。据日本警视厅调查，在被揭发出来的违反选举法事件中，收买一张选票的平均价格，统一地方选举1979年为3433日元，1987年升至7820日元，国政选举1980年为1953日元，1986年升至7167日元。除选举时期外，政治家们的日常开销也非同小可。

日本的政治家们本身就是大资本家的很少，他们所需的巨额政治资金都是靠大企业、大资本家的捐款（占政治家本人筹集资金的50%以上）、举办酒会（大批量出售高价酒会票）、进行股票投机交易、倒买倒卖土地、名画等手段筹集的。大企业、大资本家将这些捐款看作“维护自由经济体制的保险金”，当前通过国民政治协会向自民党捐款最多的是金融业、建筑业和不动产业，同时各大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还独自向自民党内的有关“族议员”捐款，以使自民党实行于己有利的政策。自民党的政治家们拿了大企业、大资本家的钱而从根本利益上为它们服务，这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的金钱政治已经发展到十分腐败的程度，因而日本政治已病入膏肓。这就是竹下登因里库路特事件而下台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来看里库路特事件，就有其必然性，竹下下台不足为怪。自民党执政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以求维护自民党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维持自民党政权。但多年来干打雷、不下雨或下小雨，致使政治腐败日甚一日，政治伦理江河日下。竹下登上台仅半年，里库路特事件开始被揭露出来。竹下登在此后的1年时间里，为了摆脱困境，变被动为主动，也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帜。他甚至把1989年称作“政治改革元年”，以表示政治改革的决心。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发展所造成的日本政治的腐败状况，岂是竹下的一个“决心”就改变得了的。自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伦理就是如此，没有金钱就没有政治，也就没有自民党。所以，竹下尽管如是说，

却拿不出像样的具体改革方案来。他被里库路特丑闻搞得焦头烂额，“政治改革”的口号当不了他的救命稻草。就连始终支持自民党的财界大亨也看到了这一点。经济同友会的代表干事石原俊在4月21日会见记者说，“因为里库路特事件被揭发出来，政治改革应该由手上干净的人来搞，不能依靠现在的竹下内阁，而要让新的力量打起政治改革旗帜，以求自民党的再生。”财界已经放弃了竹下，竹下也不得不放弃了政权。政治改革仍然作为最大的课题遗留下来，金钱政治还在继续发展，总有一天会引起日本政治的“大地震”。自民党内许多人预见到了这一点，却又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大地震”的到来，这就叫作“在劫难逃”吧。

### 处心积虑 择马选将

竹下登在1989年4月25日表示将辞去首相职务，但直到6月2日才宣布辞职。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内，竹下登及自民党中央部的活动也是值得略加记述的饶有兴味的一笔。

竹下登在表明辞职意向后迟迟未辞职，表面上看是为了在国会通过1989年度国家预算案，实际上，他是为了解决好一个更主要的问题而不得不拖延时日，这个问题就是选择谁来接替他自己出任内阁首相。

如前所述，自民党中央部的主要领导人均牵涉到里库路特事件之中，他们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自民党的处境也异常困难。现在，已不是自民党内各派系势力争抢首相宝座，而是互相推诿，对于如何摆脱困境哪一派都心中无数。因此，竹下登和自民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为择马选将而处心积虑，最后实在无计可施，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推选宇野宗佑担当了首相重任。

起初，自民党内从元老到少壮派都把视线集中在总务会长伊东正义身上。总务会长与干事长、政调会长并列为自民党的3个重要职务。伊东现年75岁，他既未接受里库路特的未上市股票，也没有要它的政治捐款，他反对以不正当手段聚敛钱财，是自民党政治家罕有的清廉人物。在东京他家的屋顶还是用马口铁皮葺就的，仿佛还停留在50年代。据说在他的故乡福岛县会津，他的家中甚至不具备洗澡设备，还要到邻居家去借浴。这样的人，对于急于在国民中恢复形象的自民党来说，不啻“救世主”再世。何况他曾担任过太平正芳内阁的官房长官，具有处理道格拉斯·古拉曼事件的经验。然而，无论竹下劝他“只有你才能背上这个十字架（当首相）”，还是原首相福田赳夫、铃木善幸劝他出山，伊东一概坚决拒绝。他先是主张“以毒攻毒”，由原副总理金丸信接替竹下，后来又主张起用年轻人打开局面。5月7日，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与伊东会谈，伊东毫不含糊地提出，自民党派系应解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自民党三要职及与里库路特事件有关的派系首脑应辞去议员职务，以此向国民谢过。8日，自民党将挑选首相全权一度委托给安倍。9日，安倍召集原首相及各派系会长开会，一致推举伊东接班。但伊东会见记者说“自民党为什么丧失了国民的信赖？不搞真正的意识革命不行。不能换汤不换药”。11日，竹下再次恳切劝他出山，伊东继续坚持上述主张，竹下表示自己可以辞去议员职务，也能劝说安倍这样做，但对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渡边美智雄是否同意这样做没有把握。伊东于是不客气地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来接班，就成了你们的傀儡，国民就会说‘伊东同他们是一路货色’。”12日，伊东向安倍表示正式拒绝出任首相。自民

党内同时出现了反对意见，认为伊东毫无筹集资金的能力，伊东若上台，将会使自民党丧失活动能力。渡边美智雄还说起了风凉话：“如果仅仅清廉就能干政治家，干脆让科学家和宗教家来干政治好啦！”

推举伊东正义不成，自民党又一次陷入混乱。各种议论纷纷出笼，原首相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与里库路特无关的派系首脑河本敏夫、清廉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后藤田正晴、代理干事长桥本龙太郎及务实派宇野宗佑外相、村山达雄藏相等老、中、青人物都成为候选的对象，旋即又多因各种理由被否决。竹下首相的意志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他选择了宇野宗佑外相接班。宇野 66 岁，10 次当选众议员，历任防卫厅、科学技术厅、行政管理厅长官、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通产相、外相，竹下认为他与里库路特事件无关，有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能力，具备当经济大国日本的首相的条件。原首相福田赳夫、铃木善幸表里不一，说自己不想再度出山，又给竹下设置障碍，主张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实际上反对拥立中曾根派的宇野。在听到最后决定拥立宇野的消息后，福田悻悻地说“要保留政治行动的自由”，铃木则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说“如果在参院选举中失败就追究他的责任”。

不仅如此，推举宇野还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曾根派内，宇野和渡边美智雄的关系十分紧张，好比“狗与猴”，见面就吵架。经过反复的说服工作，渡边在 26 日才打电话给竹下，同意竹下的主张。另外，如果宇野作为中曾根派的成员出山组阁，这对严重牵涉到里库路特事件之中的中曾根康弘非常不利。因为中曾根如果赞同竹下的主张，自己就需脱离中曾根派，脱离自民党，以表示中曾根派已同中曾根康弘划清了界线；如果反对竹下的主张，就会引起党内的混乱。明眼人知道竹下推举宇野对中曾根是“将军抽车”。但中曾根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决定脱离自民党。

就在大局已定的时候，以自由革新联盟成员为核心的自民党少壮派议员开始造反，宣称“拥立前首相中曾根的直系分子宇野，与国民感情有悖，坚决不能容忍”。他们先推举椎名素夫，后推举石原慎太郎，但二人均不响应，最后推出了与竹下对立的田中角荣的亲信、原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他们虽然未能实现目的，却也让竹下急出一身冷汗。

6 月 2 日，自民党国会议员大会选举宇野为新总裁，宇野出任内阁首相。宇野在当晚组阁时首先要问清将要入阁的成员是否与里库路特有关。宇野还给竹下打电话，想起用海部俊树当官房长官，竹下说海部曾将 270 万日元酒会券“卖给”里库路特。海部有此“前科”，宇野只好作罢。但因与里库路特无瓜葛的“完人”实在难找，宇野不得不任命与里库路特事件有关的梶山静六为通产相，野田毅为建设相，堀内光雄为劳动相，盐川正十郎为官房长官，桥本龙太郎任自民党干事长。宇野上任伊始，一再声称自己的内阁是“清新、强有力”的内阁，不会是短命内阁。然而竹下登顾此失彼，选择宇野时只注意到他与里库路特有无关系，却未注意到其他方面。宇野上台刚 4 天，便有一家周刊揭发关于宇野的“女性丑闻”，立刻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本已不高的支持率很快降至 1 位数。再加上 7 月 23 日参议院改选后自民党席位降至半数以下，自民党保持多年的国会优势丧失了一半。宇野宗佑不得不于 8 月 9 日引咎辞职，在位仅 69 天。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竹下登意料之外。但竹下只有自责而无回天之计。海部俊树接仕首相后亦无良策妙方阻挡自民党一党政权的崩溃之势。恰在这时，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海部利用这个天赐

良机，以“要自由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口号拉拢民心，才在 1990 年 2 月的大选中维持住了自民党在众议院的稳定多数席位，自民党政权因此得以暂时摆脱了里库路特事件以来的严重危机，但这些已是后话了。

蒋立峰

## 第六编 不识时务 江山难保

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

——李筌



不顾国情 到处树敌

## ——贝娜齐尔·布托总理为什么被解职

真理的蜡烛常常会烧伤那些举烛人的手。

——布埃斯特

贝娜齐尔·布托，是巴基斯坦前总统、人民党终身主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女儿。在其父亲被绞死差不多 10 年之后，她出任巴基斯坦总理，使布托家族东山再起。然而不到两年，贝·布托又被总统解职，留下了又一个政坛悲剧。

### 执政只有 20 个月

1990 年 8 月 6 日晚，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表情严肃地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和贝·布托内阁；任命联合反对党主席贾托伊为看守政府总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新的国民议会选举将于 10 月 24 日举行。就这样，执政只有 20 个月的一颗政坛新星陨落了。

总统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讲话刚一结束，巴基斯坦陆军立即接管了电台和电视台，控制了首都与外界联系的电话总台。伊斯兰堡街头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巡逻，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和其他重要目标都由军队把守。遵照贝格将军的命令，驻扎在信德省的陆军第二军已开进动乱的卡拉奇和海德拉巴两市，以恢复正常秩序。与此同时，在伊沙克·汗总统的主持下，贾托伊宣誓就职。

### 再次竞选

贝·布托被解职后，激烈抨击总统的决定是“不合乎法律的专断行为”，并号召人民党的党员保持镇静，坚持斗争，并声称，大选如能按期举行，人民党一定能重返政坛。她担心总统和军方“会以种种借口无限期推迟大选”。人民党和其支持者们谴责和抗议总统的行动“违反宪法”，是非法和别有用心。贝·布托认为军方对她的解职在幕后起了作用，并表示要上诉最高法院。

反对党及其追随者对总统的决定则表示热烈欢迎，有些地方的年轻党员还欢呼雀跃。巴基斯坦的党派敌对情绪又明显深化了。

以联合反对党主席贾托伊为首的看守政府主要任务是以种种措施防止人民党东山再起。目前，贾托伊已令警方逮捕了 10 余名与“贝·布托家族腐败现象”有牵连的人，要求特别法院公开审判。8 月 12 日，军队、总统和贾托伊三方经过磋商后，又改变了不准贝·布托家族出境的决定，条件是：贝·布托从此永远同政治生涯告别。军方认为，一旦贝·布托移居国外，人民党便群龙无首，成不了气候。而贝·布托向新闻界表示，她将顶住包括家庭在内的各方压力，不移居国外，她要领导人民党“为实现民主化而继续战斗”。

依照宪法规定，汗总统宣布 10 月 24 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主要是以看守政府内阁总理贾托伊、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纳瓦兹·谢里夫为代表的伊斯兰民主联盟同以贝·布托的人民党为主的人民民主联盟之间的竞争。选举的结果是：伊斯兰民主联盟在 217 个议席的国民议会中获 105 席，虽未过半数，但已经胜券在握。而人民民主联盟则从上次的 93 席下降到 45 席，遭到惨重失败。尽管贝·布托指责看守内阁“操纵大选”和“无耻舞弊”，但由亚非

欧 17 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观察员小组认为，大选虽“有一点问题”，但“总的来说是开明的、有秩序的”。大选结果合法，应该让伊斯兰民主联盟执政。

贝·布托彻底失败了。

这位年轻的女总理为什么仅仅执政 20 个月，就被总统解职，而后在大选中又被选民抛弃了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 实力不足

1988 年 11 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人民党取得了胜利，获得的议席最多，但是并没有超过半数。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共有议席 237 席，通常大选举 217 席，另外留给妇女的 20 个议席由当选议员推选。人民党在国民议会只取得 114 个席位，只是微弱多数的党联合了“全国移民运动”的 14 席，才勉强超过半数。所以，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力量不占绝对优势，而在参议院则处于劣势。也有人认为，伊沙克·汗当时对贝·布托的任命，是迫于选举结果，出于无奈才同意让她组阁的。在 1988 年 11 月的省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 184 席，仅比伊斯兰民主联盟多 39 席，而且，除信德省外，其他三省都居伊斯兰民主联盟之后。可见，人民党虽然上台执政了，却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党的挑战和威胁，这为它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人民党在地方议会的选举中，结果不很乐观，这使它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受到牵制。在 1988 年 11 月的选举中，人民党只在信德省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而在西北边境省是与其他小党联合执政，在旁遮普省和俾路支省，则失败了，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力量发展不平衡，不利于执政党在全国开展工作，人民党的这个缺陷尤其突出。全国共有四个省，它只控制一个，有两个大省在反对党手里。这两个省在巴基斯坦举足轻重，旁遮普省的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的 60%，俾路支省矿产资源丰富。人民党对这两省的事务无力控制。旁遮普省的首席部长、反对党的主力伊斯兰民主联盟领导人谢里夫，公开与联邦政府分庭抗礼，要贝·布托下台，甚至发动工人拦截火车，逮捕该省执行公务的联邦调查局官员。难怪巴基斯坦政界历来流行一种看法：任何政治家，如果不能控制旁遮普省，最终难免倒台。

## 险胜过关

贝·布托上台后，在国内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在军队任免问题上与总统有分歧，同印度缓和关系引起一些人不满，等等。反对党抓住这些问题，处处发难，最终引发了一场危机。

1989 年 10 月 26 日，联合反对党提出了对贝·布托总理的“不信任提案”，其实 9 月中旬反对党就酝酿对贝·布托提出“不信任案”，消息泄露后表面上说放弃了计划，实际上是在悄悄地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10 月下旬，参加人民党联合政府的“全国移民运动”以人民党未履行在信德省维护移民利益的协议为由，宣布退出政府，转而加入反对党行列，使反对党在议会的力量猛增 14 席，联合反对党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发起了进攻。

为了挫败反对党的不信任案，贝·布托取消了出国访问，委派其母亲代她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大年会，她自己则坐镇国内指挥。她把人民党党员集中起来，进行动员，讲明利害关系，坚定他们的信心。她还命令暂

停部长们出国访问，在国外的也及时召回，以确保表决时有足够的力量。结果，表决时人民党议员不但出席率高，而且团结一致，而反对党则显得准备不足。

11月1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就“不信任案”进行表决，在237个议员中（5人未出席）支持该提案的议员为107人，不足半数（119人），不信任案未获通过。据观察家分析，反对党中谢里夫虽然反对现政府态度坚决，但只是旁遮普省的首席部长，而不是国民议会议员，贾托伊又在议会中缺少威望，因前两次竞选均落选，后来才在补选中在别人让出的一席位上当选。此外，一些议员，特别是独立议员，不愿耗费巨资参加新的选举，他们倾向于让贝·布托继续执政。正是这些原因，才使人民党在这次较量中以13票的多数闯过一关。但刚刚执政11个月，就杀出一个“不信任案”，无疑暴露了这个政府的根基虚弱。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党没有服输，又在准备新的进攻。这次危机后，贝·布托立即宣布改组内阁，吸收一些“温和的”、“冷静的”反对派加入政府，以示她与反对派和解的态度。可是，这并没能改变她下台的命运。

### 得罪了总统 惹怒了将军

巴基斯坦总统和军队的根基，是由前军人政权打下的，而前军人政权与人民党格格不入，这就在总统、军队和人民党三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一时无法消除的隔阂。贝·布托上台后，与总统和军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据说，贝·布托上台前曾与军方达成5点协议，包括不得干预军队事务、不得削减军费、在处理阿富汗问题和印巴关系上须同军队协调行动，等等。同时，布托也与总统汗达成协议，表示在处理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上与总统相互配合。可是，上台20个月来，贝·布托不断对总统的权力提出挑战，惹得总统不悦，她还想驾驭一直在巴基斯坦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军队，结果失去了总统的合作和军方的支持。如：在立法上，与总统相争不下；在信德省的治安问题上，不向军队交权；1990年5月，军队提出在卡拉奇和海得拉巴两市设立军事法庭，将审判、司法、监督、行政管理等合为一体，遭布托拒绝，军方大为不满。在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上也与军队有摩擦；在阿富汗问题上，不顾总统和军方的反对，坚持遣返难民等等。伊沙克·汗总统在巴基斯坦历届政权中均任过要职，是几朝元老，他从政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在哈克之后的政坛上没人能与他相比。他性情温和，处事谨慎，较易为各方所接受。可是，面对贝·布托的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这位老人也不能容忍了。哪一个总统愿意保留和自己作对的总理，哪一个主人会喜欢不听指挥的总管呢？贝·布托的不妥当的政治行为终于使伊沙克·汗忍无可忍，采取了解除贝·布托职务的断然措施。分析家们认为，与总统和军方的长期不和，是贝·布托下台的主要原因。

### 反对“伊斯兰化”

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有96%的人口是穆斯林。齐亚·哈克将军深明这一点，他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哈克曾在巴基斯坦推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这种伊斯兰化政策，缺乏宗教容忍精神，使少数教派人士受到

排挤和压制。此外，这一政策还侵犯妇女人权。比如，1983年2月，伊斯兰法院宣布，女人作证只等于男人的一半。为此，拉合尔的职业妇女联合游行抗议，结果被镇压下去。1984年，哈克的议会还是通过了包括这项内容在内的《作证法》。伊斯兰化政策为哈克的高压政策提供了保护伞，使他的统治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人民党执政后，竭力反对沙里亚法（伊斯兰法）的通过。该法案旨在实现国家的全面伊斯兰化，一旦通过，伊斯兰法庭将具有干涉国家所有事务的权力。全面伊斯兰化是和哈克的军法统治连在一起的，这是贝·布托最痛恨的；国家的全面伊斯兰化，无疑是历史的倒退，会使国家陷入黑暗的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在西方受过教育、接受了现代文明并以实现巴基斯坦民主为己任的贝·布托所不能接受的。她认为，该法案与“现代国家”和“民主进程”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在巴基斯坦，她受到了指责，人们要求通过沙里亚法的呼声很高。96%的人口是穆斯林——这是巴基斯坦的国情，是不可超越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要考虑到这个前提，贝·布托恰恰是忽略了这个前提。在巴基斯坦不可能实现美国那样宪法至上的民主。贝·布托失败了，这是一个不精通现实政治的读书人的失败；是一个悲剧。

### 像个反对党

过去人民党长期受压，一旦上台又缺乏治国经验，尽管执政，却未完全摆脱在野党的党派观点，树敌过多，没能广泛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从而孤立了自己。执政10个月，人民党的合作伙伴“全国移民运动”就退出了联合政府，转而加入反对党的行列，人民党损失巨大。反对党在议会内外处处发难，致使人民党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挑战，朝野对抗日益严重，1989年10月达到顶峰，反对党提出不信任案，虽然以人民党险胜暂告平息，但双方的斗争从此更加公开化，更加不择手段。执政党全力应付党派斗争，无暇顾及朝政，其执政还有什么意义？它已把自己降为在野党了。

### 人民失望

伊沙克·汗在关于解除贝·布托职务的讲话中指出：国民议会已失去人民的信任，贝·布托内阁已经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藐视宪法、中央与地方对峙和腐败现象等是他解散议会的根本原因。

巴基斯坦人民对贝·布托政府寄予太多的希望。因为遭受了11年的军法管制，他们受到的压迫太深，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结束军人统治后第一个上台的民选政府，人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可是，20个月的执政实践表明，人民党无力解决广大群众，特别是底层群众渴望解决的问题。人民党的处境实在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宪法规定，重要法案的通过须拥有议会2/3的多数票，而人民党连半数都没有，尤其是“全国移民运动”退出后，就更是根本不可能了。这样虚弱的政治实力，限制了人民党的行动，使它不可能给巴基斯坦带来大的改观。老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政府宣布的旨在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项目无法实现。人民得不到实惠，大失所望，他们感觉人民党并不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好，认为人民党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不满情绪很快蔓延开来。

## 腐败不得人心

伊沙克·汗总统和反对党都曾指责贝·布托任人唯亲，保护贪污腐败。有人认为布托的亲戚动用“过多的公款”修缮官邸和专机，结果是上行下效，各部长和许多官员也纷纷损公肥私。人民党内部的确存在腐败现象，就像过去历届政府普遍存在腐败现象一样，这已成了人们痛恨而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了。人民党多年受压上台执政后，有些人经受不住诱惑，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贾托伊就任总理后，立即下令对贝·布托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限制包括贝·布托及其丈夫扎尔达里在内的 33 名政治家和企业家出境。这些人被怀疑涉嫌“贪污、索贿受贿和策动暴力犯罪”。贝·布托的丈夫也因涉嫌参与一起绑架案而被捕，她本人也受到特别法庭的多次传讯。这些作法使布托和人民党的声望大大下降。

另外，总统伊沙克·汗是穆斯林联盟成员，看守政府总理贾托伊是联合反对党领袖，在 1990 年的大选中，看守内阁采取的各种措施，难免要有利于伊斯兰民主联盟，这也是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的一个因素。

总之，贝·布托的下台虽有些突然，但却不偶然，它是巴基斯坦两年来各种政治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试想，一个仅获微弱多数而联合执政的党派，在重要的两省议会都失去主权，在由军人统治了建国以来大部分时间的国家里，与军方作对，与总统不和；在 96% 的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反对通过伊斯兰化法案；面对强大的反对党处处发难、横加指责；对热切希望变革求新，提高生活水平，曾对人民党寄予厚望的老百姓口惠而实不至，等等，这样的政府，能不失败吗？

刘晓敏

激进措施引起动乱 军事政变带来祸殃

## ——阿连德总统在兵变中捐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莎士比亚

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是智利前总统。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在当时的智利推行社会主义改革，遭到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时，军队放弃“中立”立场，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酿成了智利政坛上的一场大悲剧，并导致智利随后开始的长时期的军人政权。

### 向社会主义过渡困难重重

1970年9月4日，智利大选揭晓。由社会党、共产党等6个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得36%的选票；代表中间阶层的基督教民主党（以下简称“基民党”）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克获得28%的选票；代表右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势力的国民党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得35%的选票，与阿连德不相上下。根据智利宪法，新总统将由国会两院在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两人中选出。

由于左右两翼力量对比均衡，争取中间派基民党人的支持便成为左右两翼斗争的焦点。极右的国民党人为了阻止阿连德执政，铤而走险，阴谋策动军人发动政变，实施极权统治。根据政变计划，阿连德将被暗杀，以原陆军总司令维奥为首的军人集团将掌握政权。这个计划遭到了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的反对。他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我的敌人是人民的敌人，是人民意愿的敌人。”极右势力仍不罢休，为了恐吓基民党人，他们派人暗杀了施奈德将军。处在十字路口的基民党人认识到，若在议会选举时支持国民党，将会失去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政权的机会。因此，基民党与人民团结阵线迅速接近，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基民党人表示将支持阿连德，条件是阿连德政府要接受《宪法保障条例》。该条例的主要内容是：新政府执政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度，不得建立同国家军警相平行的武装组织。这一文件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使得行政权和立法、司法机关分离从而形成双重政权，并以脱离政府控制的军队作为双方斗争的监督和保证。无意之中，人民团结阵线下出了一着缓棋，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实利，但在双方斗争的布局阶段就失去了战斗的主动权。

10月24日，智利国会举行投票选举。由于基民党人的支持，阿连德以总票数3/4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智利新总统。11月4日，阿连德在拉莫内达宫宣誓就任智利新总统。新内阁没有吸收基民党人参加，各部部长全部是人民团结阵线各党派人士。省长、郡长、大使、公使及各重要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都由左翼联盟中的适当人选来担任。换句话说，人民团结阵线掌握了智利的行政大权。

正如阿连德及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所指出的，人民并未完全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立法、司法大权。1970年9月，智利议会上下两院的力量对比分别是：上院共有50个席位，执政党及其支持党拥有23席，在野党27席；下院共有150个席位，执政党及其支持党拥有57席，在野党



93 席。显然，人民团结阵线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最高法院及各地方法院也都由反对派控制。在舆论宣传方面，反对派的力量也大大超过政府控制的宣传力量。反对派控制了全国广播网的 2/3 和 1/2 的电视网，其报刊的发行量是以政府为主的左翼力量的 2.5 倍。这样，阿连德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反对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上，改革步伐自然缓慢。

自信的阿连德宣布要把智利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样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上任伊始，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土改运动。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来自反对派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1972 年 2 月，智利参议院通过了由基民党参议员胡安·阿米尔顿和雷内·弗恩特亚尔瓦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该议案明确规定，对任何私人企业转为国营和合营企业，必须由议会通过明确的法律才能进行；职工有权拥有企业的股票和分享盈利；国营企业可以有条件地租给私人等。显然，议会企图夺取由政府掌握的进行经济改革的领导权。阿连德否决了该议案。但反对派则叫嚣要举行公民投票对此事进行表决。政府力图把纠纷限制在法制范围内，要求由前政府建立的宪法法庭进行裁决。双方争执不下，事态逐步升级。3 月底，阿连德命令议会休会。反对派则以此为借口攻击阿连德，并在 4 月中旬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政府被迫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果。7 月，参众两院相继拒绝智利总统对宪法修正案的否决，并要求总统颁布该法案，遭到阿连德的拒绝。这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一直未有结果，1973 年 8 月，反对派加紧了对外国的攻势。他们借口阿连德拒绝宣布经过修改的经济所有制法案，通过指控阿连德“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决议，宣布政府为非法，并要阿连德下台。显然，这场关系到智利社会主义命运的权力斗争严重地削弱了阿连德政府的权威。

由于人民团结阵线在议会中的少数派地位，阿连德政府的内阁部长、省长经常受到议会反对派的弹劾。在两年又 10 个月的时间里，内阁部长、省长一共被弹劾 21 次，阿连德在任职期间先后 7 次组阁，明显地反映出政府在斗争中处于劣势。反对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阿连德的很多重大改革措施都表示反对，以致于政府无法执行。例如，政府为弥补赤字而提出的几个对穷人增加税收的法案，议会讨论了三年也没有结果。政府提出的打击黑市活动的《惩治经济罪法》，议会争论了一年多也未通过。阿连德颁布的一些国有化方案和土改措施也由于反对派的极力阻挠而中途废止。智利社会主义的航船如同逆水行舟，随时都有下沉的危险。

### 激进改革引起普遍不满

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他的竞选纲领中指出，智利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原政府所推行的“改良主义”和“开发主义”的药方并未给智利带来任何重大变化。因此，智利“真正人民的、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帝国主义者、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并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在该纲领的指导下，阿连德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试验运动。

在国有化方面，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控制了矿业、金融业、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的 507 家企业，初步确定了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所有制的经济体制。1971 年 7 月，国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对全部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随后，阿连德总统宣布接管控

制了智利经济命脉的塞罗、安那康达、肯奈科特三家外资铜矿公司。这一行动被认为是智利的“第二次独立”。为加强对国有化企业的控制，政府向这些企业派驻了政治代表和政工人员，增添了许多非技术人员。这些人缺乏专业知识，不善企业管理。而外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主则暗中抽走资金，工程技术人员也大批外流。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造成生产秩序混乱，经济效益低下。1972年智利铜产量由世界第三位下降到第五位，而铜产品的出口值由于国际市场铜价下跌，从1971年的6.5亿美元降到1972年的4亿美元。智利的工业产量到1973年已经下降了50%，只及1970年的一半。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加深、加快了前任政府就已实施的土地改革。阿连德把征收土地的最高限额从原政府规定的80公顷压到40公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征收了1100多个大庄园，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国营或集体农场。智利总统在1971年的拉美农民会议上自豪地宣称，1972年智利将不存在一个大地主。到1973年，政府共征收了4287个庄园的822万公顷土地，使国营集体农场所占的土地比例上升到40%强。由于土改扩大化倾向严重，许多中小农场主对土改的对抗态度增强。分到土地的农民因为缺乏资金、农具和种籽而无法耕种，不满情绪也日益严重。1970年12月到1971年1月，智利的中小农场主在号称粮仓的科金波省挑起了农民骚乱。合作社农场也因经营管理不善致使生产连年下降。1972年农业产值下降3.6%，1973年则达到16%。粮食紧缺始终是一个令阿连德头痛的问题，政府被迫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1970年花去1.68亿美元，1971年上升为3.13亿美元，1972年花费了4亿美元，1973年计划要花费6.19亿美元。这对外债累累的智利政府来说，显然是一大负担。由于反对派的暗中破坏，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也成了问题。在智利的一些大城市中，每天都能见到排起长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白糖、牛肉、猪肉的供应逐渐减少。阿连德呼吁他的人民要有信心渡过难关。社会党的妇女委员会甚至号召该党所有妇女停止吃牛肉以节省外汇。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为了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现象，大量推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其他福利措施。1971年初规定，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50%，职工薪金提高30%；实行免费医疗；免费供应300万儿童和孕妇每天半公升牛奶；大量吸收工人就业，就业率达到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住房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建房面积1971年是1970年的20倍。这些措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这种改善是以压缩生产投资为代价、靠举债和通货膨胀进行再分配的。市场繁荣只是一时的现象。这种超越国家财力限度的作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1971到1973年，智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占财政支出的34%、40%和53%。为弥补赤字，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致使通货膨胀率从1972年6月的42%上升到1973年6月的283%，到8、9月份甚至猛增到508.1%。物价不断上升，市场商品匮乏，劳动者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趋严重。民以食为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庭主妇们在反对派的暗中唆使下纷纷敲着空锅上街游行，表达她们对政府改革的不满。这些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的作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把人民阵线政府置于一个相当被动的地位。

### 派别争斗 自相削弱

人民团结阵线是建立在使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智利总书记科尔巴兰说，聚集在人民团结里面的是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之中的民主力量：共产党、社会党、前基民党、激进党、统一人民行动和独立人民行动。尽管这些出身不同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人民力量赢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它们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理解不同，对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不一致，随着深入改革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逐渐显露出来并影响着政府改革前进的步伐。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是人民阵线的基础，但这两个党之间却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社会党提出劳动者阵线政策，主张利用工人和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工人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反对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或联合。共产党则主张人民阵线政策，认为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反对派中的进步力量，从而孤立和打击寡头势力，全力支持政府进行革命建设。这两种政策的对立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如何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二是政府应在前进中巩固，还是在巩固中前进。以共产党、激进党和独立人民行动为稳健派，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统一人民行动力激进派，两派围绕以上问题的争论造成了政局混乱，导致政府内阁辞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反对派的忙。

1972年4月初，当政府和议会之间关于宪法修正案的斗争尖锐化时，左派激进党人因与政府所持立场相左而宣布退出政府和人民团结阵线，担任司法和矿业部长的两名左派激进党人宣布辞职。人民团结阵线在国会中的地位削弱。反对派则趁机举行示威、游行，煽动工人罢工，企图置政府于死地。5月上旬，基民党、国民党等反政府派在康塞普西翁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民团结阵线各党决定亦同时举行对抗性的示威游行以支持政府。就在示威游行的当天，智共中央通知当地共产党组织不参加游行，强调不能同反对派进行“自杀性对抗”，并指示当地共产党人设法阻止这次游行。当时任康塞普西翁省长的共产党人戴维斯派出大批警察部队一方面保护反政府游行队伍，同时又袭击支持政府的游行队伍。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一名学生被打死，十几人受伤，舆论大哗。社会党要求阿连德撤换该省省长，而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则赶到康塞普西翁表示支持戴维斯。5月底，人民联盟举行政治会议。科尔巴兰发表谈话指出，人民联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智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他的谈话，政府内部的分歧愈加公开化。9月12日，由于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与失误，政府内阁部长全体辞职，阿连德不得不谋求重新组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极左派政党左派革命运动的影响。该组织尖锐地主张要在智利实行激进的改革，包括国家立即没收大中小型企业，以一院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代替议会等。针对反对派的猖狂进攻，左派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进行报复。比如该组织的成员曾多次占领工厂、银行、食品店，美其名曰“征用”。1972年4月，该组织在康塞普西翁召开“人民大会”，试图取代议会。由于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平息了这些活动，左派革命运动就指责政府“压迫群众运动”，“没有能力解决工人和人民的要求”，要求“工人和人民加强自己的组织以保卫本阶级的利益”。1973年7月，左派革命运动在军队中进行分化活动，呼吁士兵要求与军官相等的工资。同时他们还在首都各地张贴宣传画，上面画着一名手持卡宾枪的士兵，题字是：“士兵们，

不要为老板卖命。活着同人民一起战斗。”8月，该组织在瓦尔帕莱索策动海军部分官兵起义，但遭到镇压。这些活动一方面增大了政府控制政局的难度，另一方面又给反对派提供了肆意攻击人民团结阵线的借口，阿连德政府处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夹攻之中，处境极为艰难。

1973年3月议会选举后，人民阵线内部危机更加严重。有的党主张采取更加剧烈的措施，共产党人则主张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斗争的结果是社会党人阿兰西维亚辞去经济部副部长一职。这场斗争还使得统一人民行动党发生分裂。激进党、独立人民行动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阿连德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这些斗争，他呼吁召开人民团结阵线联合党代表大会以加强团结。尽管暂时取得了成功，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团结阵线内部对于军人应否入阁、应否同基民党对话等关键问题仍有不少分歧，从而影响着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接连不断的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力量，使其不能有效地反击右翼势力的进攻。

### 反对派推涛作浪 社会生活陷入混乱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智利作为中南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与美国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古巴革命成功之后，肯尼迪政府抛出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加紧了对拉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阿连德政府的成立打破了美国统治阶级独霸拉美的梦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早在智利大选前夕，尼克松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利用一切机会除掉阿连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美驻智利大使戈利等秘密制订了阻止阿连德上台的计划。他们设想了两种途径：其一是促使智利反对派力量制造政治和经济混乱，推动军人政变；其二是全力支持亚历山德里上台，随后以弗雷取而代之。这两手都落空后，美国人采取了新的对策。

考虑到智利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依附性严重，尼克松欲进先退，承认阿连德政府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合法性政府。这位熟谙外交艺术的美国总统却没有向阿连德发贺电，只派泛美委员会主席转达他的祝贺。随着智利改革越来越触及到美在智公司的利益，尼克松公开表示，“若智利在国内或国外采取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那么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1971年7月，美国总统下令开展对智利的经济战。随即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就制订了对智利经济战的计划并马上付诸实践。8月，美国政府以智利的国有化危及美国利益为借口，断绝了与智利的经济贸易关系，并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刚一成立，美国政府就开始削减美银行组织对智利的贷款。1971年，美进出口银行停止对智利的贷款。泛美开发银行削减了44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截止到1972年，智利共获得0.26亿美元的美资贷款，刚刚超过1970年美国给弗雷政府贷款的1/10。这样，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每年有两亿多美元的贷款不能拿到手，而这个政府每年还要负责偿还两亿多美元的外债（主要是由前政府遗留下来的），智利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及其垄断组织还利用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对智利贷款或进行经贸往来。美国的铜矿公司一方面唆使一些国家不从智利进口铜，另一方面又把国际市场上的铜矿价格由68美分压到

48 美分,使得智利在两年内的损失达 2.4 亿美元。由于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截止到 1972 年底,智利 30%的城市私人公共汽车, 21%的私人出租车, 33%的国营公共汽车以及全国最大铜矿的 1/3 的内燃机卡车因缺少零部件、轮胎等备件而不能正常运营。美驻智利大使戈利指示:哪怕是一个螺丝钉也不能运给阿连德。对于这一切,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自然有清醒的认识。1972 年 12 月 4 日,阿连德总统在第 27 届联大上发表演说指出,“智利一直面对着大规模的外部压力和财政、经济上的封锁,这给智利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阿连德这次大胆的讲话被拉丁社评为 1972 年拉美十大新闻之一。

美国人开展经济战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混乱制造政治动乱从而把智利推向内战的边缘,为推翻阿连德政府培植土壤。为此,中央情报局在三年内向智利的反对派提供了近 800 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并派遣了两千多名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配合行动。依仗美国佬这个后台,智利的右翼势力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1971 年 12 月,智利极右翼组织“祖国和自由”企图发动叛乱以推翻政府,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此后,右翼势力亦未能使政府在法制范围内的活动陷入瘫痪。从 1972 年 8 月开始,反对派又展开了广泛的进攻。10 月,反动势力以阿连德宣布卡车国有化政策为借口,策动卡车司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者每天都能得到美国人提供的 30~50 美元的报酬,诱惑力是相当大的),随后公共汽车司机、国营航空公司飞行员、摊贩、技师、医师、银行职员等纷纷响应,罢工浪潮遍及全国,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势。阿连德万般无奈,只好邀请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参加内阁,在全国 20 个省实施紧急状态,并对圣地亚哥等 5 省实行军管和宵禁。尽管如此,阿连德也在心急如焚中染上重病,卧床不起近半个月。11 月初,政府宣布取消卡车国有化政策,罢工平息。处于危急之中的阿连德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并如期开始了他的出访活动。但是,这场持续了 36 天的罢工风浪使智利损失了一亿多美元,请军人入阁这一作法也为以后的军人政变留下了隐患。

1973 年 3 月,智利举行议会选举。反对派企图借此机会取得议会 2/3 的多数以达到迫使阿连德下台的目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人民阵线各党共获得 44%的选票,大大超过 1970 年 36%的选票。反对派“合法政变”的图谋成为一个泡影。被激怒的智利国内外反动势力迅速改变了策略,开始实施由中央情报局制订的“半人半马”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通过怠工和破坏的途径使经济瘫痪,借助于恐怖和破坏性宣传造成政治动乱,为军事政变创造条件。这样,右翼势力反政府的活动逐步升级,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步入了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阶段。

从 1973 年 4 月份开始,反对派一方面煽动学生闹事,扩大工人罢工浪潮,大造反政府舆论,制造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还出动暴徒打手进行袭击骚扰,制造流血事件。4 月 26 日,反对党借口反对政府提出的“全国统一学校”,煽动全国约 40 万学生罢课、游行。混入学生队伍的法西斯暴徒则乘机捣乱,把和平游行变成了激烈的巷战。暴徒们袭击了一些政府部门、执政党总部、亲政府的报社、商店等,许多设施被破坏。他们还用石块、燃烧弹袭击了总统府,砸碎 36 块玻璃,这在智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随即,受反对派的策动,智利最大的特尼恩特铜矿工人举行了长达两个半月的大罢工,部分罢工工人及其家属于 6 月中旬向首都进军,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在圣地亚哥街头修筑了工事,举行示威游行,冲击总统府等要害部门。阿连德不

得不亲自出面同工人代表会谈，表示答应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然而，阿连德此举并未获得执政党的支持，从而日益显露出其在政府中的孤立地位。7月底，全国4万名卡车主再次发动罢工，国营、私营的汽车司机纷纷响应：大中小学生因不满政府一再推迟开学日期也上街游行。由于通货膨胀严重，食品缺乏，黑市猖獗，普通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趋严重。9月初，工人、农民、商人、医护人员等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罢市。而与此同时，恐怖活动有增无减。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的成员暗杀政界要人，炸毁电厂、铁路，袭击不参加罢工的工人或农民，全力进行恐怖活动。罢工、罢市、罢课与恐怖活动的结合，使得智利全国各地陷入一片混乱，政府的处境极端艰难。

### 军队卷入政治

“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

阿连德执政期间，军队有61000人，其中陆军38000人，海军15000人，空军8000人；警察有23000人，后备役军队近30万人。这支力量沿袭了30多年来形成的军队不问政治的传统。当阿连德合法地当选为智利总统时，军队、警察宣誓效忠宪法和政府。事实上，军警的中立（指其不介入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是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前提。经济制裁与反对派的猖狂进攻并未搞垮阿连德政权，只有军队是唯一能够打破这种僵局的力量。

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是微妙的。尽管阿连德总统是法定的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有权任命军队高级官员，但根据人民团结阵线的《基本施政纲领》及其与基民党人达成的《宪法保障条例》，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确立了军队自主性的原则。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指出，“军队的职业教育是在五角大楼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但也不能因此把它看成是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军事机构需要改革，但不能强制，要从军人中间，从他们自己的信念出发进行改革。”这反映了智利政府对军队既利用又担心的矛盾心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一方面提高了军警的薪金，另一方面又宣布继续保持智美两国的密切的军事关系。这一点正中美国人的下怀。因为美国人早已认识到，军队将是左右智利政局的主导力量。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继承了四五十年代智美两国签署的多个军事协定，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军事关系。1971年5月，智利政府向美国申请一笔信用贷款以购买军事设施，同时表示它欢迎由15名美军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继续租借美海军的8艘军舰，不退出全美洲国防会议。同年9月，美国政府同意提供500万美元的军事贷款。这是阿连德执政一年多来美国人首次向智利提供贷款。此后，在美国宣布对智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两国间的军事代表团互访频繁，美对智的军备销售额有所增加。

由于智美两国长期的军事关系，智利军官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思想以及“意识形态边疆”思想。他们把阿连德看成是外来异端思想（指马克思主义）在智利的再现，因此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从阶级利益上，军队与政府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军队效忠政府仅仅是建立在其职业传统的基础上。实际上，由于高级军官与右翼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队内部的分化就愈来愈明显了。1972年9月，极右派组织“祖国与自由”的成员伙同军队中的一批军人一起企图以武力推翻阿连德而代之一个由在押犯、

前陆军领导人维奥为首的军政府。人民团结阵线联合左翼力量，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政变阴谋流产。智利陆军总司令普拉茨上将在9月26日“军人节”的集会上强调，“不管外来压力有多大，军人必须忠于职守，必须忠于宪法”。然而，极右势力则暗中派人向一些军官家中扔玉米、鸡蛋，大骂他们是软包。随后，反对派发动新的攻势，阿连德不得不借助于军队的力量来控制局势。1973年3月议会选举结束后，军人部长们辞职，以避免人们对军队介入政治的攻击。但很明显，军队作为智利各派中最有势力的一支力量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1973年4~6月，智利局势继续恶化。6月29日，陆军中校罗伯托·索佩尔策动第二装甲团发动叛乱，极右势力“祖国和自由运动”分子积极参与了这次兵变。叛军出动4辆坦克和一些卡车包围了总统府，和总统府卫队激烈交火。护宪派陆军司令普拉茨率领首都实力最强的4个团包围了叛军并迫使其投降。然而局势并未因此而缓和。反对党借口政府组织武装民兵大肆攻击政府，指责政府违法，并要求解除群众的武装。议会迅速通过了武器管制法，授予武装部队搜查武器的大权。随后，陆、海、空三军在全国各地进行搜查，并同工人和左翼团体成员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表明，智利反对派已经同军队结成了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下一步就是清洗军队中的护宪派力量，为政变创造条件。

从7月份开始，智利陷入了难以控制的罢工狂潮之中。“祖国和自由”组织继续搞恐怖活动，月底其成员暗杀了智总统海军侍从武官阿图罗·阿拉亚上校。基民党人趁卡车主罢工之机提出要同政府对话。阿连德在社会党、共产党都反对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同基民党主席举行了会谈，但未取得任何成果。8月上旬，阿连德邀请陆、海、空三军司令参加内阁，分管内政、矿业及交通三部，号称“国家安全内阁”。空军司令、交通部长鲁伊斯因与政府意见不合，处理罢工事宜不利，宣布辞去部长职务而保留空军司令一职。总统阿连德则坚持他的部长必须是三军司令。围绕鲁伊斯辞职一事空军险些发动兵变。较为保守的空军参谋长古斯塔沃·利取代鲁伊斯担任了空军首脑与交通部长一职。陆军总司令、内政部长普拉茨的日子也不好过。6月底他平息那场兵变后，军内就有人起来反对他。早已策划好的侮辱普拉茨形象的阴谋迅速展开。8月23日，陆军的将军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普拉茨辞职的决议。尽管阿连德极力挽留，普拉茨辞意坚决，“国家安全内阁”宣布总辞职。陆、空两军司令的辞职表明，阿连德已经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进入8月份，智利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食品缺乏，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这一切又促使政治危机深化。反对党在全国发起了一个要求总统辞职的签名运动，由反对派控制的行会也发表声明要总统辞职。9月6日，来自10个省的妇女代表要求议会在一周内剥夺总统的权力，否则她们就要敲兵营的大门（即请军人出来掌权）。

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一位高级军官表示，“一旦政党人士办法用尽，军队将发挥它的力量”。在海军中，将军委员会通过决定，要求海军司令劳尔·蒙特罗辞职而代之以极右的海军第一军区司令何塞·梅里诺。海军还向最高法院控诉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统一人民行动总书记加雷顿煽动海军部分官兵造反，要求剥夺他们的参、众议员的权利。海军还清洗了与左翼党派联系密切的官兵，伺机发动兵变。普拉茨辞职后，阿连德任命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这位新任军事首脑极其推

崇法西斯德国的军事理论家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理论，在他写的教科书中大谈所谓“生存空间”。皮诺切特掌握陆军意味着军事政变即将来临。

反政府的政界头面人物频繁地与高级军官接触，他们秘密地制订了推翻政府的军事政变计划。美国大使在政变前两天飞回华盛顿，得到白宫的指示后又迅速返回圣地亚哥。一个由军队高级专家组成的小组仔细研究了政变的代价，认为军队掌权后完全可以依靠武力控制局势。政变领导人遂把攻打拉莫内达宫的日期定在9月11日。在政变前两天，军队迅速向圣地亚哥集结。关于军队即将接管政权的传单、流言不断传来。美国军舰以例行演习为借口游弋在梅利沿海。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即将开始。随着智利军队露出其“大猩猩”的真面目（“大猩猩”系对中南美各国反动军队的总称），阿连德进入了他一生中——也是智利历史上——最为悲壮的阶段。

### 以身殉国

1973年9月11日，悬在智利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

早上6点20分，阿连德总统在他的私人寓所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位智利的领航人得知瓦尔帕来索的海军已经发动兵变，接管了该市的权力与舆论宣传机关。他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莱特列尔通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加强首都的警备力量。然而莱特列尔一直没有找到皮诺切特。此时阿连德仍然很自信，他相信军队的大多数是支持他的。就在前几天，三军司令还同他一起研究了如何防止与反对政变的问题。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智利总统带着他的私人卫队（由27人组成，装备有23支自动步枪、两挺机关枪、三门火箭筒）乘坐四辆汽车于7时30分抵达总统府——拉莫内达宫。阿连德的主要阁员、私人朋友及亲属迎接了他。阿连德给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形势是严峻的，但并不绝望。虽然海军背叛了，但我相信仍有足够忠诚的部队来控制局势。”

10分钟后，阿连德就海军叛乱问题作了第一次广播讲话。他敦促人们保持平静，并提醒他们采取各种必要手段保卫工厂、商店和农场。8时15分。阿连德又通过电台重申了上述要求。他刚刚离开麦克风，身边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话筒里传来总统空军侍从武官的声音：“我奉命通知您，总统先生，由三军司令和警察局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要求您辞职。空军参谋长冯·朔文将军已经为您准备了一架可以飞往任何国家的飞机。”阿连德身体猛地一颤，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他对着暗红色的话筒喊道：“你去转告冯·朔文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

8时30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公告，勒令阿连德立即辞去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军警当局。几分钟内，政变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迅速包围了拉莫内达宫。经过简短的准备，阿连德向全国发表第三次广播讲话，表明他对军事政变的立场。他说：“公民们，我对智利和它的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将会克服叛变带来的阴暗和痛苦。你们知道，很快将会开出一条道路，自由的人将通过它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劳动者万岁！”阿连德总统坚决地宣布：“我决心用一切能用的手段进行抵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留下一个教训，使那些只使用武力而没有道理的人遗臭万年！”讲话结束后他就投入了保卫总统府的战斗准备工作。

9时40分，头戴钢盔、身穿便装、右手提着一挺轻机枪——不久前菲德



尔·卡斯特罗访智时赠给他的礼物——的阿连德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对决定留下来保卫总统的人说：“拉莫内达宫的保卫战仅仅是开端，历史的第二页应当由智利人民和所有拉美人来书写。”他敦促没有战斗经历和妇女们离开总统府，“反法西斯的战斗不需要无谓的牺牲，外面将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正当阿连德和他的部属就去留问题争执不下时，外面的战斗打响了。政变部队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了20分钟的扫射。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他坚决地回答说：“我不投降。这是给你们这些叛徒的回答。”利用停战的间息，阿连德把一批妇女——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送出了总统府。

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立即投降，就轰炸拉莫内达宫。”中午12点整，两架霍克一猎人式飞机开始轰炸，火箭和炸弹像雨点般落在拉莫内达宫这座古老的殖民地大楼上，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烟雾和毒气。总统府变成了一片火海。阿连德命令他的战士戴好防毒面具，并尽可能地收集武器弹药。

面对法西斯陆空军的猖狂进攻，阿连德毫不畏惧，他一面奔跑在各个战斗岗位之间指挥战斗，同时又亲自扛起火箭筒向叛军的坦克射击。在总统私人卫队的猛烈狙击下，叛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下午1点钟左右，军政府呼吁同阿连德进行谈判。他派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同叛军交涉但并无结果。皮诺切特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答应给他和保卫者离开总统府和去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以方便。阿连德断然加以拒绝，表示要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1点30分，许多保卫总统府的战士已经牺牲，原来40多人的战斗队伍只剩下十几人了。阿连德迅速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战斗队派往二、三层楼进行还击。1时45分，叛军攻占总统府的一楼，并向二楼进攻。叛军军官高喊要阿连德在10分钟内投降。当10分钟快要到的时候，阿连德命令他的战士们“放下武器，向军队投降”。他平静地说：“我最后一个出去。”当叛军士兵冲上二楼时，他们听到几声清晰的枪声：阿连德总统用手枪击中自己的前额，壮烈殉国了。这位智利的总统身佩总统绶带，端坐在办公椅上，至死也未离开他的战斗岗位。

智利事变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悼念阿连德总统，声讨智利法西斯的罪行。1973年9月28日，古巴近百万人在哈瓦那举行了悼念阿连德的大会。卡斯特罗高度赞扬了阿连德及其战友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说：“40个人在7小时内抗击了炮兵主力、坦克、飞机和法西斯步兵。历史上很少写过这样的英雄主义的篇章。”“阿连德总统集中体现了智利人民的爱国主义、勇敢精神和战斗性的精华。”

左进波

## 第七编 粗心大意疏漏乾坤

掉入仕途陷阱的，大都是些莽撞草率的鲁汉。  
——大卫

一招不慎 全盘皆输

## ——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

对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在乎死亡的威胁，作为首相在瑞典能像平民一样地生活，我只感到高兴。

——帕尔梅

瑞典是位于欧洲北翼的一个面积为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850 万的小国。在世人眼里，瑞典不像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那么强大，也没有像中国和古希腊那么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然而，瑞典却以其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国家的富裕发达、人民的安居乐业以及近 200 年的和平史而闻名于世。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祥和的国度里，在代表人类现代文明和进步的诺贝尔的故乡，1986 年 2 月的最后一天却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政府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遇刺身亡。噩耗传开，人们无不为此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国际名流的悲惨遭遇感到悲痛，纷纷谴责诅咒恐怖分子的暴虐行径。

### “我并不在乎死亡的威胁”

瑞典自从 1792 年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在一次化妆舞会上被政治敌对分子刺杀之后，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暗杀的事件。长期自由和平的生活环境使瑞典人感到自豪。作为一国首相的帕尔梅也主张把瑞典建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的、和平的“人民之家”，因而帕尔梅对严密的警卫制度很反感，愿意像平民百姓一样地生活。他曾对法国的一位记者说，“我真可怜密特朗总统，他没有一点个人自由，他每走一步路都要有 25 名警卫跟随保护。而我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然而美好的愿望并未感动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寻机行刺的恐怖分子。同世界上许多著名国务活动家一样，帕尔梅自步入政坛以后，尤其是出任政府首相后，曾多次因其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死亡的威胁。据统计，在瑞典历代政治家中，帕尔梅收到的恐吓信和电话为数最多，其中：

1971 年，帕尔梅严厉谴责杀害南斯拉夫驻瑞典大使的恐怖行径。此后不久，克罗地亚的一个恐怖组织威胁要处死他。

1972 年，一名自称是台湾人被驱逐出瑞典后，有人声称要暗杀帕尔梅。

1972 年，两名利比亚人企图绑架帕尔梅，以他作为人质交换西德贩毒集团头目卡尔·保克斯。

1976 年，在马德里一名阿根廷极端分子企图对帕尔梅行刺，幸亏被西班牙警察及时发现，帕尔梅才幸免于难。

1979 年，智利右翼极端分子企图策划暗杀帕尔梅，后因其阴谋被揭露出来，而未酿成后果。

1985 年，瑞典警方揭露 8 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为恐怖分子，并拒绝给其领导人阿布杜拉·厄卡朗发入境签证后，该组织扬言要以杀死帕尔梅作为报复。

1985 年，英国情报机构曾向瑞典情报机关通报，帕尔梅首相已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但是瑞典情报机关总以为近二百年来瑞典从未发生过重大暗杀事件而忽视了英国提供的情报，竟将此情报束之高阁，既不提醒首相本人也未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以致后来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面对死亡的威胁，帕尔梅曾这样说，“我有一个弱点，即在肉体上我是无所畏惧的，而我所担心的是我的家庭。对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在乎死亡的威胁，作为首相在瑞典能像平民一样地生活，我只感到高兴。”所以除正式出访或特别重要的国务活动外，帕尔梅到国外参加会议、访问、视察和进行私人活动时，很少带随身保卫人员。当有人问及他死后在自己的墓碑上希望写上什么时，帕尔梅的回答是，“我从来设想过，也不想在我停止呼吸之前去想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活着时去想自己的后事，那他就会变得胆怯，就不敢做事，就会失去动力。”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帕尔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辛勤地耕耘，忘我地奋斗着。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无所畏惧的激情和“和平国度”的自豪感，使帕尔梅最终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下。

### 平凡而震惊世界的一天

奥洛夫·帕尔梅生于1927年1月30日，青年时曾投身学生运动，致力于争取学生权益、反对种族主义、声援战后流亡学生的斗争。1953年，帕尔梅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徒。1957年，他作为社民党的代表进入瑞典议会，成为当时瑞典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帕尔梅在1963年至1969年间，曾先后担任内阁不管大臣、交通大臣、教会与教育大臣，1969年10月起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和政府首相，他还于1976年起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一职。

1986年2月28日帕尔梅像往常一样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这天是星期五，也是瑞典法定5天工作周的最后一天。

清晨，帕尔梅照老习惯同他20多年的老球友、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舍因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网球馆打了一个小时的网球，之后舍因有急事先行一步，帕尔梅则与两名保卫人员一起去洗桑拿浴。

大约在10点45分帕尔梅进入首相府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当他得知到下个星期一之前没有什么重大外事活动后，便让两名贴身警卫回家度周末去了。在审阅完一些文件后，帕尔梅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参加星期一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欧理事会准备发言稿，接下来给瑞典保守党主席阿道尔松写了一封信，同他就计算机保密问题进行了探讨，之后又复信耐尔舍地区的一个小男孩，答复他自己心目中的冰球崇拜者是谁。上午的最后一项工作是签署一项瑞典将同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五大洲六国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呼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议之前暂停进行地下核试验，声明最后说，“你们对我们的共同生存负有重大责任。世界人民将支持你们为使地球逐步摆脱一场核战争的威胁而采取的每一步骤。”在同政府成员共进午餐之后，帕尔梅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下午，帕尔梅接受了瑞典《国营雇员报》主编英瓦尔·伊格曼的采访。帕尔梅同他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当谈及国际形势时，帕尔梅满怀信心地说，“1986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让我们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在采访结束前，摄影师约翰·瓦尔贝伊请帕尔梅站在窗前拍几张照片，帕尔梅望了望窗外，半开玩笑地说：“老天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结果摄影师只好满足于让帕尔梅坐在沙发上拍了几张照。记者走后帕尔梅又拿起电话与财政大臣费尔特讨论了瑞典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民意测验及如何

提高社民党在选民中的威信等问题。

傍晚6点，帕尔梅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独自一人朝家走去。这时天已经黑了，帕尔梅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理发了，小风忽上忽下地吹着他额头上的那缕头发，此时他显得特别轻松愉快，因为照往常每到周末是他最繁忙的两天，不是出访做报告，就是参加党内各种集会。帕尔梅曾开玩笑对别人说，“星期一是我的星期五，在过完繁忙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之后，我真希望星期一的到来，开始正常的工作周。”而这个周末却是不同寻常地空闲，他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

帕尔梅的三个儿子中只有小儿子马蒂斯同他们住在一起，而此时正值学校放寒假，马蒂斯应邀与几个同学一起到国外旅游去了。吃晚饭时，帕尔梅同夫人丽丝贝商量是否去看场电影。对丽丝贝来说能同丈夫一起看场电影真是难得，她欣然同意了。帕尔梅问夫人是看塞格尔影院放映的《我的生活像狗一样》还是到宏大影院看《莫扎特兄弟》。因为《莫扎特兄弟》在瑞典刚刚上映一周，受到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所以最后他们决定看这部片子，并与二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约好在影院门口见面。之后，帕尔梅又与社会民主党总书记托尔逊通了电话，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临走前帕尔梅又拿起电话寻问党的前总书记斯文·阿斯皮林的身体状况。寒暄几句之后，帕尔梅说，“好了，请你多保重，咱们就谈到这儿吧，丽丝贝已经穿好大衣在等着我呢。”

帕尔梅同夫人手挽着手离开斯德哥尔摩老城西长街31号自己的家时，已是晚上9点过几分。此时天空黑沉沉的，地面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雪，气温是零下6度，而在人口密集的老城给人的感觉却并不很冷。帕尔梅夫妇乘地铁来到坐落在斯维亚大街北段西侧的宏大电影院，儿子莫尔顿和女友早已等候在门口。帕尔梅买了两张电影票随着人流进入放映大厅。没过多久瑞典职员工会主席比扬·罗森格伦和夫人阿妮塔也兴致勃勃地走进宏大电影院。当他们来到自己的座位上时，见前排一个人正仰着身子半躺在座位上，坐在旁边的妻子还不时地往他嘴里送好吃的。原来这对恩爱的夫妻正是帕尔梅和丽丝贝。相互问候之后，帕尔梅与罗森格伦又谈论起有关工作的事。坐在一旁的丽丝贝阻止他们不要在这种场合谈工作上的事，并毫不客气地说，“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谈工作的。”帕尔梅和罗森格伦互相看了看，尔后嫣然一笑不再说什么了。

剧场里的灯熄灭了。由苏珊·奥斯腾导演的《莫扎特兄弟》历时1小时49分钟，观众自始至终被莫扎特的音乐所陶醉。23点15分电影结束，场下发出零星的掌声。帕尔梅夫妇从影院里出来，在门口同罗森格伦夫妇和儿子莫尔顿及女友道别后，顶着每秒4米的寒风，踏着覆盖着冰雪的路面，小心翼翼地沿着斯维亚大街的左侧人行道由北朝南朝地铁站走去。斯维亚大街是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贯通南北的一条宽阔而繁华的街道，街上霓虹灯五光十色，商店橱窗里的展品琳琅满目。街道两旁还坐落着社会民主党党部、社会民主党第一位领袖和政府首相亚尔玛·布兰亭下葬的阿道尔夫·弗雷德里克教堂以及离街道只有数十米之隔的每年颁发诺贝尔奖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等重要建筑。当帕尔梅夫妇走过几个街口、距地铁站入口只有不足10米远时，突然从旁边黑暗的小巷里窜出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人，在距离他们几米的地方，朝他们连开了两枪，帕尔梅和丽丝贝应声倒在血泊里，凶手见已达目的，立刻转身消失在斯维亚大街东侧漆黑的吐纳尔街道里。此时是深夜23点21

分。

帕尔梅夫人丽丝贝趴在丈夫怀里，失声痛哭，连声呼救。听到枪声，正从这里驶过的一辆出租汽车猛地停住了，司机达尔斯博恩跳下车，跑到出事现场，发现倒在地上的帕尔梅夫妇，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白雪。于是，达尔斯博恩立即通过车上的报话器，向警察局报了案，并向附近医院要了救护车。另一辆过路车上的一名女护士，听到枪声也急忙跳下车，看到遇害者呼吸微弱时，就给他按摩心脏。几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帕尔梅夫妇被送进离出事地点最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帕尔梅的胸部和下腹部两处中弹，丽丝贝被子弹擦破背部，皮肤受了轻伤。半个多小时后，帕尔梅因一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心脏边上的一根主动脉，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于3月1日零时零6分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 举国悲恸

“瑞典通讯社斯德哥尔摩1986年3月1日讯：奥洛夫·帕尔梅首相去世，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斯维亚大街与吐纳尔街的交叉路口处遇刺身亡。他是在被送进萨巴茨贝里医院后不久与世长辞的。”无线电波把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迅速传遍瑞典全国，传向全世界……

《帕尔梅被暗杀》、《奥洛夫·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被枪杀》、《帕尔梅昨夜遇刺》、《帕尔梅在首都的大街上遇刺身亡》、《帕尔梅在市中心惨遭枪杀》……，一份份以头版特大字号标题报道首相遇害的报纸如同雪片一样铺天盖地而来。

“喂，奥洛夫遇害了。”“喂，你知道吗，帕尔梅被打死了。”“首相遇刺了。”……一阵阵电话铃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人们相互传递着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

“不，这不是真的！”“这怎么能呢？”“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是不可能的！”“瑞典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人们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在一遍遍地听过广播，仔细地看过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之后，人们沉默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瑞典人民开始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清晨，天还没亮首相府门前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他们排着长队，缓缓进入吊唁大厅，表达深切的哀思。在帕尔梅遇害的现场一位小姑娘把一支红玫瑰放在血迹未干的地上，紧接着人们便川流不息地跟着献上了一束束象征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玫瑰花。短短几天内，由鲜花堆成的花墙竟高达两米，现场地面下陷15厘米。在瑞典全国各地，人们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方式和传统，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帕尔梅生前经常讲演和活动的地方举行火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瑞典各政党和人民团体及其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高度赞扬帕尔梅生前为瑞典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与裁军作出的贡献，一致认为帕尔梅的去世不仅对瑞典而且对世界进步运动是一重大损失。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执委会的声明指出，帕尔梅的去世是瑞典社民党和国际民主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帕尔梅生前一直在为公正、和平与自由而努力，他精明强干、意志坚强，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作为党主席，他领导了改革的进程，使瑞典的阶级差别缩小，发展了经济民主，使瑞典的福利社会得到继续发展。帕尔梅是当代伟大的国际领导人之一，他努力提高弱小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和平和各民族的自由作出了贡献。瑞典总工会

主席玛尔姆称赞帕尔梅的巨大贡献在于他能够把社民党和工会这两支工运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正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七大的瑞典左翼党(即共产党)主席维尔纳得知帕尔梅遇害后,当即返回瑞典,他称帕尔梅是工人运动的代表,是位伟大的政治家,随着他的离去,瑞典的政治生活将变得贫瘠。瑞典自由党主席维斯特贝里称瑞典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与帕尔梅相比,帕尔梅死后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在感情上的共鸣,说明他是位非凡的伟人。瑞典保守党领袖阿道尔松认为,帕尔梅被谋杀是民主理想的一个悲剧,帕尔梅对民主的追求像火一样炽热,他的名字将永远同争取世界和平的不懈努力连在一起。瑞典社民党中央还决定成立帕尔梅纪念基金,以表彰那些为和平事业而作出贡献的人们。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把吐纳尔街改称为“奥洛夫·帕尔梅街”。帕尔梅之死在瑞典各界群众中引起如此之大的感情上的共鸣,这在瑞典历史上是空前的。悼念活动一连持续了半个月,到3月15日的葬礼达到了高潮。

瑞典没有举行国葬的传统,帕尔梅生前也曾表示希望死后能按照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为他举行民间葬礼,为此整个葬礼由瑞典社民党组织安排,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被选作举行帕尔梅葬礼的地点。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建于1923年,采用城堡的建筑形式和用手制红砖做建筑材料,体现了瑞典严肃和质朴的民族风格,它现在已成为水上城市斯德哥尔摩及其历史的象征,里面的蓝色大厅形似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每年为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的宴会都在这里进行。1986年3月15日,大约1500名瑞典各界人士和外国来宾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聚集在这里悼念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帕尔梅。帕尔梅的白色灵柩安放在大厅前面的鲜花之中,数以百计的玫瑰花束、花圈、社民党党徽摆满了这座高大的蓝色大厅,外面的过厅两侧树立着代表瑞典社民党280个区委的红色党旗。在帕尔梅的送葬车队要经过的大街两侧,成千上万的群众提前几小时就等候在那里。在市政厅外面,瑞典海军的一艘舰艇守卫着大厅临海的一侧,警方的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警戒。葬礼开始之前几小时,瑞典蓝黄两色国旗在送葬队伍要经过的路上和首都各处的主要建筑物上都降下了半旗。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破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演讲。他说,随着帕尔梅的去世“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帕尔梅的继承人英瓦尔·卡尔松在悼词中称赞帕尔梅是“保卫和平的战士”,是个“从不违背良心的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以及帕尔梅生前挚友、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和印度总理拉·甘地也都发表了讲话。全世界1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隆重的葬礼,其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西德总理科尔、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以及美国副总统布什等23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在灵柩移往距帕尔梅遇刺地点只有百米之遥的阿道尔夫·弗雷德里克教堂的墓地时,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数十万市民。人们冒着严寒、眼含热泪,自动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葬。直到深夜,成千上万的市民还穿着黑色丧服,手持蜡烛或鲜花来到墓地,默默地站在体现帕尔梅生前自然、潇洒风格的墓碑前,向这位已故首相致以最后的哀悼。帕尔梅的墓占地不足四平方米,墓碑是一块取自波罗的海果特兰岛上的自然形状的花岗石,上面没有留下死者的功业,只镌刻着他的手迹“奥洛夫·帕尔梅”。

世人哀悼



帕尔梅遇刺身亡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或以各种不同形式对帕尔梅不幸遇难深表震惊、悲痛和哀悼。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和拉美八国外长会议均联名向瑞典政府或国王发唁电或通过决议，对帕尔梅遇刺表示痛惜和哀悼。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帕尔梅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他称赞帕尔梅是和平战士的典范，是联合国宪章最高理想的化身。美国总统里根指责这次暗杀事件是一次“愚蠢的行动”，他赞扬帕尔梅“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领导人之一”。苏联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名义向瑞典发了唁电，称赞帕尔梅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在苏共二十七次3月1日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全体肃立，向帕尔梅致哀一分钟。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唁电中称帕尔梅首相“为世界和平和中瑞友好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与此同时，印度、阿根廷、斯里兰卡还分别宣布为帕尔梅哀悼一天，尼加拉瓜和越南哀悼三天，坦桑尼亚哀悼七天。此外，为纪念帕尔梅，苏联、法国、尼加拉瓜、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巴基斯坦等18个国家还以帕尔梅的名字命名了本国的一些街道、广场、会议中心、医院、文化中心、体育场馆、住宅区、学校、公园和桥梁。苏联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帕尔梅纪念邮票。

### 凶手是谁

在瑞典这个和平、中立之邦竟然会发生如此震惊世界的谋杀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凶手是谁呢？在对现场仔细勘查之后，警方判定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刺杀，刺客很可能是一个老练的职业杀手，整个作案过程仅用了几十秒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唯一的罪证是两颗直径为9毫米的穿甲子弹弹头。据帕尔梅夫人丽丝贝后来回忆，当她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还以为小孩在放炮，等她回头看时，帕尔梅已经倒在地上，接着又响了第二枪。在慌乱中她似乎感到在哪儿见过那个人，但又想不起来了。出租汽车司机达尔斯博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刚送完乘客，准备把车停在路旁，计算一天的帐目，突然听到两声枪响，然后看见一男一女倒在地上，另一个飞快地逃跑了，同时他还看见几百米外停着一辆大众牌“帕萨特”型小轿车，车上似乎还坐着人，枪响后车子便立即开走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刺杀事件，便立即报了警。另外两名听到枪声的姑娘说，她们看见逃跑的那个人身高约1.8米，年龄有30岁，身上穿着一件深色的长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带沿的帽子。但她们没看清那人的面容。为帕尔梅做心脏按摩的那位女护士说，当时她坐在男朋友的汽车里，正巧从这里驶过。她从车窗里看见人行道上有个男子躺在地上，旁边那个人一边哭喊一边搀扶他。于是她让男友停车，自己单独下车跑了过去。

在所有目击者中提供情况最详尽的是一位青年女画家。出事那天晚上，她正沿着离出事地点不远的一条小巷朝斯维亚大街方向走，突然看见一个约摸30多岁、满头黑发、身穿黑大衣的男子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几乎与她撞个满怀，由于天黑她没看清那人的面孔，只见那人后来上了一辆汽车飞速离去。女画家后来根据自己的追忆画下一张那个人的头像，经警方特别测定后于3月6日公布于众。从这个模拟头像看，此人长脸型、黑头发、高鼻梁、黑眼珠、深眼窝，年龄大约在32至33岁之间，样子像是中东人或拉丁人。

帕尔梅被谋杀的当天晚上，一个未透露姓名的人给瑞典《快报》打电话，说谋杀事件是一个叫“PNK”的组织干的，同时瑞典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接到电话说，“我们是赤军派，我们已经杀死了帕尔梅”。3月1日，一个匿名者打电话给驻伦敦的一家外国通讯社，声称一个叫霍尔格·梅因斯突击队的组织打死了帕尔梅。这个打电话的男子讲的是带有瑞典口音的英语，他还说，“你们可以从历史书上查到进行这次袭击的理由，我不准备通过电话告诉你”，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不久，瑞典通讯社也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已于2月28日成功地处死了帕尔梅，下一个该轮到维利·勃兰特了。”还说这一决定是头年9月在希特勒当年的活动据点西德的贝希特勒加登举行的一次年会上作出的。信的落款是，“希尔·希特勒，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领导人”。

国内外一些著名反恐怖专家分析推测的结论有四：其一，暗杀帕尔梅是恐怖分子所为，想象中的凶手很可能是阿布·尼达尔及其同伙，此人是世界上已被通缉的最凶狠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制造过一百多起暗杀事件并使250多人丧生的暗杀集团的头子。其二，帕尔梅是被南非、以色列、伊朗或美国雇用的职业杀手所害。帕尔梅任首相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他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他领导的瑞典在世界上率先对南非实行制裁，他出面调解两伊战争使以色列怀恨在心；他拒绝瑞典最大的军工企业“鲍福斯”向伊朗提供防空导弹和火炮，致使伊朗决定对他进行报复；帕尔梅对美国一向没有好感，由于担心帕尔梅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对美不利，因而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帕尔梅谋杀案。其三，秘密武器犯罪组织结束了帕尔梅的生命。帕尔梅生前作为“帕尔梅委员会”的主席为建立无核区和削减核武器四处奔走，因而他成为破坏军事工业生存的致命的威胁，很有可能是某个军工企业雇用杀手结束了他的生命。其四，帕尔梅死于极右分子手下。“世界反共联盟”是个极端反共的组织，也十分憎恨帕尔梅领导下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帕尔梅是共产主义延伸到瑞典的一只胳膊，是瑞典乃至西欧的掘墓人。

有人还认为，也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杀人狂一时心血来潮把枪口对向了帕尔梅。……

### 破案难

随着帕尔梅的离去，瑞典警方便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侦破工作。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是这次破案工作的总指挥。在案发后几小时，警方便封锁了出事现场周围的一些主要街区，控制了机场、车站、码头等进出口岸，严格盘查过往旅客。警方还从全国调集了300余名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警探，根据已得到的线索夜以继日地进行追查搜捕，对所有可疑分子挨个审查，并同国际刑警组织及有关国家密切配合，严密监视各种恐怖组织的行踪。警方还把通过电脑分析绘制而成的模拟凶犯的肖像向世界各国广为散发，并使用计算机数据系统搜索凶犯，查找线索。瑞典警方为破获本国历史上这桩最大的谋杀案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前所未有的：举报凶手的悬赏从最初的8.5万美元逐步提高到850万美元，立案分析的线索近2万个，提取了1万余名证人的证词，侦察记录多达3万余份，整个活动耗资高达2000万美元。然而，时至今日这桩牵动着千百万人心的谋杀案仍旧是迷

雾重重，茫无头绪，侦破工作无重大进展。

帕尔梅遇刺身亡已经过去 5 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最初对抓获凶手所抱有希望渐渐地淡薄了，但是瑞典警方却一直没有放松缉获凶手的努力……

刘国来

善心待奸雄 大意失荆州

## ——西哈努克亲王在政变中被罢黜

选择朋友一定要谨慎！地道的自私自利会戴上友谊的假面具，却又设好陷阱来坑害你。

——克雷洛夫

1970年3月18日下午，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启程前往北京。他是5天前由法国来莫斯科进行政治性访问的。

汽车驶出莫斯科市区，快速向机场奔驰。车内气氛有些异样。亲王的随行人员个个神情紧张，似乎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看着尊敬的亲王，他们噤若寒蝉，唯恐破坏了他访问成功的欢乐情绪。

西哈努克这时倒是轻松自如，满面春风。此次之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两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还同意给予柬埔寨以军事及其它方面的物质援助。路上，他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丝毫没有觉察到车内异乎寻常的沉闷和压抑气氛。

车已接近机场。苏联总理柯西金憋不住了，他首先打破沉默，转身看着旁边的西哈努克，礼貌而婉转地问：“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

西哈努克闻之大惊，愤怒地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经被罢黜了。”如果不是在汽车里，亲王定会拍案而起。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进行反击！”西哈努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原来，苏联领导人和西哈努克的随行人员，早已经从当日上午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勇气，也不知该如何对西哈努克说。飞机轰鸣着直刺青空，向北京飞去。西哈努克这位被黜国君从此漂徙异国，有家难归。他究竟是为什么被罢黜了呢？

### 相煎太急

推翻西哈努克的阴谋，几乎从亲王1941年4月25日继位之日起，就始终像幽灵一样，在王宫里游荡。1941年4月24日，柬埔寨国王西索瓦·莫尼旺逝世。依照惯例，他的长子西索瓦·莫尼勒亲王是王位继承人。可当时的柬埔寨还是法国的保护国。法国政府为了巩固在柬埔寨的统治地位，亟需解决西索瓦和诺罗敦两大王族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为此，他们看中了18岁的中学生诺罗敦·西哈努克，授意柬王位最高委员会选西哈努克亲王为王位继承人。因为，西哈努克的父亲是诺罗敦家族，母亲是西索瓦家族，他继位，便于缓和两大王族间的冲突。而且，亲王从小接受法国教育，又年轻幼稚，更利于法国政府控制。于是，人们看到，新国王不是前国王的长子，而是他的外孙。也正是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西哈努克的初衷——当一名教员或艺术家，把他抛进了充满激流暗礁的政治漩涡中。

诺罗敦家族和西索瓦家族都是古老而显赫的王族。由于柬埔寨允许国王一夫多妻，所以历代国王后嗣繁多，造成各家族之间关系盘根错节，矛盾重重，争斗不休。乳臭未干，又名不正、言不顺的国王——西哈努克自然遭到其他亲王的嫉恨与诋毁。所有的男性后嗣，内心都怀有强烈的不满：“为什

么不让我当国王？”原本水火难容，相互拆台的各家族集团反倒联合起来，攻击西哈努克，企图取而代之。其中，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尤德旺亲王的民主党，西哈努克的两个叔叔诺罗敦·诺林德亲王的自由党和诺罗敦·蒙达那亲王的进步党，力量较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将柬埔寨转让给了日本。在此期间，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大战结束后，法国人返回，力图恢复柬埔寨以前的“保护国”地位，但受到西哈努克的坚决反对。法国政府见亲王并不那么顺从，就欲另寻代理人。他们以实行民主为名，要求西哈努克授权，允许在柬埔寨成立各种党派。于是，王族中有实力的亲王纷纷出场，紧锣密鼓，举竿竖旗，组建了民主党、自由党、进步党等众多政党。这些政党借“恢复民族独立”，“组成为人民的政府”之名，竭力要把西哈努克从王位上排挤下去。

1947年，在法国政府的干预下，柬埔寨进行了普选，结果尤德旺的民主党获得了胜利。王国政府的领导权实际上就由尤德旺等人操纵，西哈努克成了空有其名的傀儡君主。民主党的胜利引起各党派新的分化。自由党、进步党反过头来攻击民主党，揭露他们在竞选中作弊等丑闻。一时间，以3个亲王为代表的3个政党相互攻讦，相互指斥，争斗愈演愈烈，成为一场王族间有组织地、合法地反对国王的运动。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几乎把柬埔寨搞得四分五裂，严重削弱了西哈努克的王权基础。

### 腹背受敌

1953年11月9日，统治了柬埔寨多年的法国政府，终于同意给柬埔寨以完全独立。在1954年7月20日的日内瓦会议上，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保证。从此，柬埔寨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西哈努克为此欢欣鼓舞。对他来说，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

然而不久，西哈努克就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各党派非但没有同心同德与他并肩而行，反而为夺权变本加厉地对他群起而攻之。不仅如此，新兴党派林立，范围已不再限于王族内。其中有柬埔寨共产党前身“人民派”，有温长顺的国家社会党，有施里玛达的革新党，有朗诺的复兴党，以及山玉成为首的自由高棉组织。这些政党组织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围攻西哈努克。王公贵族因为亲王的继位不合惯例，一直不承认他是合法国王，为争夺王位攻击西哈努克。一些左派政党、社会进步力量和山玉成集团，都以推翻封建君主制为由，反对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四面受敌，几乎失去了控制政局的能力。他越来越清楚：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王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效力，日益成为自己的枷锁和供别人攻击的靶子。要想在政治上站住脚，与各种反对派较量抗衡，只有放弃王位，组建自己的政党，直接进入政治舞台。此外，别无它途。

1955年3月2日，西哈努克毅然宣布放弃王位。这一决定，令王族、政府、民间、国际社会许多人异常惊诧，谁也猜不透亲王的真实用意。他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后来继承了王位。

一个多月以后，西哈努克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他任该党主席。人民社会同盟把民族团结视为维护国家独立与和平的重要保证。随即，

1955年9月11日，在国际委员会监督下，柬埔寨第一次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举行了大选。选举结果，人民社会同盟获得总票数的83%，占据了国民议会的全部席位。尤德旺的民主党获票数13%，人民派得票3%，其他党派得票总共不足1%。西哈努克终于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成为柬埔寨政府首相。

人民社会同盟获得重大胜利之后，西哈努克本着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独立的宗旨，请求各政党、派别埋葬分歧，求同存异，参加新政府。他摒弃前嫌，不结宿怨，吸收了民主党、山玉成分子及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工作，任命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部长、国务秘书、大使等要职。如民主党有宋云西、宋双等人，红色高棉的胡荣、符宁、乔森潘等。不仅如此，西哈努克还允许别的党派成员加入自己的政党。他要把政府各部的职务“公正”地分配给各个势力派别。但事与愿违。这些党派、个人加入了政府或人民社会同盟后，并没有为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柬埔寨同心协力，而是想方设法利用民社同盟来发展自己的势力或个人野心。政府中，有亲南越的山玉成自由高棉组织，也有亲共产主义的红色高棉；有亲法的尤德旺，也有亲美的施里玛达。总之，鱼龙混杂，左的、右的、进步的、反动的各种势力都在西哈努克的联合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展开了权力与利益的生死角斗。

独立的柬埔寨，对外奉行中立政策，确立“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或意识形态的盟约”，以保证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受干涉。对内实行君主制，视国王为“全国团结的最高象征”。为此，西哈努克既抵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避免受控于美国，又反对在国内搞共产主义，防止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大。他认为，在不妨碍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只要是对柬埔寨的发展有好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也好，社会主义国家也罢，都与之保持友好往来。在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在东西方严重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西哈努克清醒地保持中立态度，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了左右皆相好的立场，可谓明智之举。这种中立主义使得柬埔寨这样一个弱小国家一直未被战火吞没，保持着和平的绿洲。

可是，西哈努克奉行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制度遭到各反对派的攻击，包括已担任国民政府要职和已加入民社同盟的原反对派。王公贵族由于历史原因，和法国保持着“情感”联系，主张接近西方，放弃中立政策，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以求美国庇护。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和共产党的红色高棉虽然都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反对柬埔寨的现行制度——君主制，谴责民社同盟代表君主制度和王公贵族利益，但这两个高棉组织的目的迥然不同。自由高棉要投靠美国和南越集团，企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红色高棉要依靠越南北方共产党，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以取代君主政体。

西哈努克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反对派的夹缝中求生存。他既要在国际上求得平衡，又要竭力维护国内的稳定，因而只得一再将权力分给各个派别。而各个派别掌握的权力越多，对西哈努克的箝制就越大，西哈努克政权的稳定性也越差。

### 得罪了美国

在柬埔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同时，美国出于侵越战争的需要，也加紧摧毁柬埔寨的和平与中立，妄图使柬埔寨成为他们侵略越南、老挝的根据地。1955年4月在曼谷召集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会议，要求柬

埔寨加入该条约组织，使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刚刚摆脱了“保护国”地位而独立的柬埔寨，对“保护”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西哈努克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明确表示，柬埔寨不需要这种“保护”，不同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西哈努克不仅拒绝躲进美国的“保护伞”下，而且大力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社会主义及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西哈努克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威胁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对此，美国政府大为不满。于是，他们伙同柬埔寨右翼势力，制造事端，企图推翻或除掉西哈努克，“达琼政变”和“漆盒爆炸事件”就是一系列预谋中最典型的两件事情。

1959年年初，驻守在柬埔寨暹粒省和磅同省的武装部队司令达琼将军，把他的部队悄悄地调往这两省的要害地区，集结待命，并且在从金边到退粒省的所有公路沿线上都设置了岗哨网。他还利用各种关系，把一些亲信安插到首都金边的王宫内。

暹粒省是柬埔寨的旅游胜地。这里有著名的吴哥古寺。每年大批的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前来观赏奇妙、辉煌的古代建筑。这年2月份，一些游览此地的客人行踪诡秘，他们的兴趣不在古迹上，而是忙不迭地去“拜访”达琼将军。这些客人大都很有身份和来头。他们是：西贡驻金边的总领事吴同友、海军上将哈里·费尔特、劳顿·柯林斯将军、美国中央情报局爱德华·兰兹戴尔上将，以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霍姆·伍德将军。另外，还有两位自称是“建华电影公司”的黄种人，也扛着几大箱器械来看望达琼将军。一时间，曾比较清静的达琼寓所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这些人的秘密行踪很快被国家情报机关得知。中国和法国大使馆也向西哈努克发出警惕的信号。西哈努克遂下令，逮捕达琼将军。

1959年2月21日，达琼在别墅的花园里，边散步边思考：几个月来筹谋的计划即将开始，有美国人和南越集团的支持与武器装备，自己也已经控制了两省军队，此时举事，定会马到成功。搞掉西哈努克，夺取国家政权，自己就是一国之主。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想，政府军如天兵天将，突然降落在他的别墅。待达琼发现，欲抵抗为时已晚，被政府军打伤活捉，后在关押期间，被朗

诺击毙。

达琼政变阴谋被粉碎，使美国政府推翻西哈努克、成立亲美政权的愿望落空。美国不甘心就此罢休，又参与制造了一起漆盒爆炸事件。

1959年8月31日上午，金边王宫内送来了一批邮件，其中有一包是专门送给西哈努克母亲的。以往邮件来后，总是国王、国后和西哈努克一同亲自拆看。这天，由于宋双首相即将率领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临行前，特来向西哈努克的父母辞别。为节省时间，亲王的母亲吩咐他人将这些邮件拿到前厅，由典礼局长拆看。他们马上会见宋双。宋双进入御座大厅，还没坐稳，人们就听到从前厅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典礼局长倒毙于地，同时被炸死的还有国王的贴身男仆。前厅厚厚的混凝土地面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这颗爆炸力极强的炸弹，就隐藏在送给亲王母亲的那包礼物中的一个精巧的漆盒内。

这件事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原本是要谋害西哈努克及其家人，却因为偶然事件，使得局长和仆人当了替死鬼。据事后调查，这件特殊的“礼物”是



从南越的一个美军基地寄出的。

漆盒爆炸事件吓坏了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他因此病倒，7个多月后离开了人世。国王死后，西哈努克即被国民议会选为国家元首，解决了宪法危机，又一次避免了国内政治动荡。

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大批作战军队在南越登陆。但是，柬埔寨的中立政策对美国的侵越战争形成极大的阻碍，达琼政变和漆盒爆炸事件，不但没有推翻西哈努克，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保护国家独立、和平的决心，并促使他的中立政策向左偏：他明确表示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毅然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建立起外交关系，坚决抵制把柬埔寨作为反对越南、老挝、泰国游击队的军事基地的图谋。

西哈努克的这一变化，使美国政府气急败坏，他们决定对这个弱小国家施加更大压力，使其就范。

柬埔寨刚刚独立时，美国曾表示，愿意向柬埔寨提供大量经济、文化及军事援助。西哈努克十分感激。然而，时隔不久，西哈努克就发现，美国的“慷慨”并非是无私的，而是以要求柬埔寨放弃中立立场、加入反共联盟为条件的。这一要求一再遭到西哈努克义正辞严的拒绝后，美国就露出了真面目，撤销了对柬埔寨的许多援助。

美国政府的态度使西哈努克更认清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和平，亲王决心切断那些把他们束缚于那种软弱无能和蒙受耻辱境地的联系。1963年11月30日，在西哈努克的倡议下，人民社会同盟国民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终止美国给予的一切援助。亲王这个大胆的决定，使美国 and 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弱小国家，要求它在当时世界两大社会阵营的激烈冲突中，保持绝对中立是困难的。拒绝了美援的西哈努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抗议美国的侵略战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运动，西哈努克默许越南游击队在柬埔寨边界地区，特别是西宁丛林一带活动。这些地区实际上成为游击队的后方根据地，给侵越美军造成极大威胁。美军经常开炮或出动飞机轰击柬埔寨。亲王义愤填膺，1964年10月27日，他郑重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地面部队、空军或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任何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亲王的警告，一意孤行。1965年5月1日，美国飞机又一次侵入柬埔寨，轰炸了鸚鵡嘴地区，造成数十名边民伤亡。1965年5月3日，亲王宣布，柬埔寨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西哈努克大胆果敢的行为更加激怒了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加快了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活动。

### 阴谋在亲王出国时得逞

在如何推翻西哈努克的问题上，欲从外部逼迫西哈努克改变立场的计划落空。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希望寄托于柬埔寨内部。他们选中了3个人：山玉成、朗诺、施里玛达。

山玉成是来自湄公河三角洲的下高棉人，他始终是西哈努克的死对头。二次大战中日本人侵占柬埔寨时，他曾投靠过日本人。大战结束后，法国人

以卖国罪判处他死刑，是西哈努克宽恕了他。柬埔寨独立以后，山玉成借反对君主制度，大肆抨击亲王的中立政策。后来他流亡国外，领导自由高棉组织进行推翻西哈努克的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山玉成提供大量经费，供其组建、训练军队。很快，山玉成建立起一支头戴绿色贝雷帽的雇佣军。这支军队完全听命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施里玛达是西哈努克的表兄。由于本该是他叔父西索瓦·莫尼勒继承的王位，后来让西哈努克继承了。所以，施里玛达从童年时代起，就对西哈努克心怀仇恨。成年后，他组织起自己的革新党，加入到推翻亲王的党争之中。

朗诺是西哈努克的亲信。早在法国人统治时期，他就同西哈努克一道为争取柬埔寨的独立而战。多年的情谊，使亲王一直视他为得力助手，委任以总参谋长和总理。可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朗诺也觊觎大权。他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效忠，暗地图谋的作法，致使西哈努克始终被蒙在鼓里，对朗诺仍深信不疑。1966年10月22日，在柬埔寨第一次“完全普选”（没经国民议会圈定候选人）中，朗诺当选首相。可见，朗诺的假相不仅欺骗了亲王，也欺骗了国内许多人。

这三股力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开始了秘密行动。

1969年1月至9月，以泰国为基地的山玉成自由高棉军队中，大批士兵开小差，越过边界，向柬埔寨投诚。这些士兵，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他们表示不愿意再为卖国贼干事，悔过自新。朗诺将此事汇报给西哈努克：“我已经说服那些突击队投降了。他们已经翻悔，承认是受了美国人的利用，并表示愿意为柬埔寨的中立而战，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接着，他又谨慎地问亲王：“我们可以收留他们吗？”

西哈努克听说有这么多士兵投诚，不加思索地回答：“收留他们。”并为因此扩大了政府军而自得其乐。殊不知自己已被暗箭射中。这些士兵根本就不是柬埔寨人，而是伪装的越南人和泰国人。他们以假投诚的办法，集结于柬埔寨西部乃至金边市里，统归朗诺、施里玛达指挥，以策应政变。

1967年4月30日，朗诺辞去首相职务，宾努亲王随即接任首相。1969年8月1日，宾努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之职。12日，朗诺再次任首相，他要求西哈努克赋予他全权，领导政府。亲王不知其奸，竟欣然同意了朗诺的要求，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给了朗诺和施里玛达。朗诺、施里玛达大权在握，就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策划政变阴谋。

1969年9月，西哈努克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朗诺乘机秘密同山玉成取得了联系。双方就如何推翻西哈努克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这之后，朗诺以车祸受伤为由，去法国治疗，政府工作由副首相施里玛达主持。

施里玛达执掌政权后，实行消息封锁，企图在政治上孤立西哈努克。他通知各位大臣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禁止呈送任何文件给西哈努克，所有文件都须先送首相办公室审阅，经他挑选后，再呈送亲王。由于西哈努克不能亲自理政，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得听任施里玛达摆布。

这时，朗诺正在巴黎郊区一家美国开办的医院接受肩伤治疗。在他周围，经常有许多“病友”陪伴，他们大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政变顾问”。朗诺将他们的密谋，每天通过“热线”电话，转告金边的施里玛达及同谋者，原来这所医院是策划这次政变行动的总部。

同一时间，金边王宫内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施里玛达不断对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架空了的西哈努克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他心衰力竭，想先休息

一下，然后去苏联、中国等国谋求援助。亲王对朗诺、施里玛达的阴谋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认为他们会发动政变，而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不满意自己的政策，欲表现一下他们的治国才能。西哈努克天真地想：

“就让施里玛达和他的支持者们放手去干，让他看看，通过废除我的政策，他们能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怎样。那对他们将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携同妻子莫尼克公主、宾努夫妇和一些随行人员启程，前往法国格腊斯疗养。他通常每两年总要去那休息一次，接受临床和营养治疗。

西哈努克离开柬埔寨，参与政变的人们欣喜若狂，加紧了政变的准备。

2月8日，朗诺带着既定计划返回金边，立即会见了山玉成，要求山玉成成为他提供政变所需的物质援助。山玉成一口应允，并保证在越南的自由高棉部队和“特种部队”将会帮助朗诺。朗诺仍不放心，亲自秘密视察了柬埔寨边境地区的部队，确信万无一失，遂决定推翻西哈努克。

尔后，十几名柬埔寨陆军军官和若干美国特务被派往山玉成的司令部，他们互通了情报，答应彼此支持。接着，朗诺、施里玛达等人在金边召开了一系列高级秘密会议，策划政变具体事宜。为避人耳目，这些会议，有的是在朗诺或施里玛达家里开的，有的是在行驶的小汽车中举行的。

他们先是筹划组织反对越南共产党的游行，按照先柴桢省、后金边市的步骤进行，然后举行反对西哈努克的大游行，同时召开国民大会，迫使西哈努克下台。

3月9日，柴桢省举行了反对越南人的示威游行。3月11日，金边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化装成游行群众的朗诺军队洗劫了驻金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大使馆。显然，这些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旨在破坏西哈努克的声誉，使他威信扫地。

3月16日，反对西哈努克的大游行，由于人民和学生的反对而告失败。当月，国民议会大厦内，议员们心情极其复杂，他们既不敢得罪朗诺、施里玛达，拒绝废黜西哈努克；又不敢鲜明地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政变。会议最终在混乱中宣告休会，没有出现政变者们期望的决定性胜利。

白天的失败给政变者不小的打击。当晚，他们在施里玛达家里又一次举行了会议，分析时局与处境，决定孤注一掷。

首先，他们逮捕和扣押了效忠于西哈努克的重要的军界首脑。他们是：翁·马诺林上校、金边警察局局长布奥少校、国王陆军参谋部的彭潘伊上校、伞兵司令顾桑拉上校等15名高级军官。

其次，鉴于16日的教训，政变者撕下了伪善的面纱，动用军队控制局面。为使他们的行动带有合理性，他们仍要借助国民议会的形式。

3月18日上午，金边机场已被封锁，从机场到金边的公路两旁布满了铁丝网，各主要街口设置了机枪阵地，坦克、装甲车横行街头。政变者在军队接管了金边政府和坦克包围了议会大厦之后，才宣布举行议会投票。

此时，国民议会大厅内外，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国民大会就在这一派恐怖的气氛中召开。

眼见大厅内外的情形，国会议员和王国议会议员惊恐不已。他们都清楚，此时发表任何不同意见，都是飞蛾扑火，而且无论投什么样的票，都会被宣布为“一致通过”。何不做个“识时务”者。于是，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投票，其结果不言而喻。

此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当他得知政变的消息后，事态已无法挽回。亲王长期任用朗诺、施里玛达这样一些阴谋分子，特别是在政变活动紧锣密鼓之时，出国疗养访问，给政变者以可乘之机，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但是，政变并没有使西哈努克亲王消沉下去。在此后 20 多年里，他一直为柬埔寨的主权、统一、独立、和平、民主与自由东奔西走，并且不断取得胜利。

田英

人无害虎意 虎有伤人心

## ——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叛兵打死

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香愈烈，所以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

——培根

### 阅兵场上的枪声

1981年10月6日是埃以十月战争纪念日，萨达特总统身着崭新军装，佩戴显示总统权威的绿色肩带，为了避免臃肿，他脱下了防弹背心，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阅兵台上。阅兵台搭在埃及开罗金字塔无名战士墓碑的正对面，为使阅兵观礼活动更好地进行，萨达特将卫队留在场外，并让侍卫官离他远一点儿。

阅兵式开始后，国家武装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阅兵台前走过，接受总统检阅。萨达特心情极好，满面春风，不时挥手致意。

中午12时40分，6架海市蜃楼喷气战斗机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空，开始了精彩的空中飞行表演。一时间，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天空。谁也没想到，震惊全世界的悲剧发生了。受阅的炮兵车队中的一辆牵引反坦克炮的卡车滑出了预定受阅路线，径直驶向观礼台，在离观礼台4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了。人们以为这车发生了故障，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4名军人跳下车，他们由一个叫哈利德·文哈迈特·沙基耶勒·伊斯兰布的炮兵中尉指挥，一边呼叫着：“光荣属于埃及。”一边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向阅兵台发起进攻。萨达特身中数弹，抬到医院时，大量鲜血从嘴里喷出，一个多小时后停止呼吸。这位在197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以和平方式改变中东局势的世界风云人物，成了政敌的牺牲品。

萨达特总统的葬礼安排在10月10日举行，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出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总理贝京。这位缔造埃以和平的阿拉伯领袖的墓志铭写着：

以普慈特慈安拉之名，别以为那种刺杀是为了安拉，他虽死犹生，与全能的主在一起。虔诚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卒于1981年10月6日。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了他的原则而牺牲。

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被刺绝不是偶然的，这中间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有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诸方面的因素。这还得从1973年的埃以战争说起。

#### 祸根

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事实上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的一个缩影。

1973年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222架超音速飞机从埃及几个机场同时起飞，呼啸越过苏伊士运河，扑向预定的军事目标。仅20多分钟，埃叙军队就摧毁了以色列在西奈的军事指挥部、空军指挥部和雷达中心、导弹基地、炮台等，使以色列不仅失去了最初决定性的24小时，而且在此后5天中连连受挫。飞机轰炸之后，便是毁灭性的排炮轰击，成千艘的快速小橡皮艇载着埃及士兵强渡运河，占领了以色列阵地。工兵用从德国买来的高压水枪，冲开了以色列沿运河修筑的14米高的沙堤。埃及坦克沿新开的缺口向西奈半岛挺进。夜幕降临时，被以色列夸耀的巴列夫防线，一个个要塞落在了埃及突进的5个装甲师手中。埃及的旗帜

又一次飘扬在运河东岸。

萨达特总统身着戎装，亲临前线，指挥了这场战争。

战争进行到第3天，以色列就损失了1/3以上的空军。第4天，前总统梅厄夫人向美国发出了“拯救以色列”的呼救，美国即开始由间接插手中东这场战争转为直接军事干预。

1973年10月19日夜，萨达特经过仔细分析，反复权衡，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去了决定停火的电报，他指出：“我不怕对抗以色列，但是拒绝同美国对抗，我绝不允许埃及军队再一次被毁灭。我准备着在我的人民面前，在阿拉伯民族面前为这一决定承担后果。”

这一决定尽管为不少阿拉伯国家所接受，但一些阿拉伯人以为乘胜打击下去，可以彻底毁灭以色列。国际国内激进派表现出了无法接受的态度，强烈抨击萨达特的这一决定。不过，由于这次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恢复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对萨达特的不满暂时被这一胜利掩盖了，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暂时的团结局面。

### 裂痕增大了

十月战争以后，经过萨达特和阿萨德两位总统的共同努力，阿拉伯世界又一次联合了起来。1973年11月，来自16个国家的阿拉伯酋长聚集到阿尔及尔，共同探讨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中东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仅仅是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是可能的。

但是，萨达特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美国的作用，于是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倒向美国。同时试图说服阿拉伯世界接受美国可以使以色列让步的见解。可是，这在阿拉伯世界里，尤其在激进派眼中，指望美国说服以色列，简直如同天方夜谭。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世界一直视美国为共同的敌人。

萨达特没有顾及这些反对情绪，继续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是抱有幻想依靠埃及来恢复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反对力量，帮助巴勒斯坦人重建家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逐渐地同萨达特疏远了。

萨达特在与白宫发展关系中，彻底地与苏联决裂。这一作法，使萨达特又失去了与自己曾在十月战争中共同对付以色列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阿萨德总统还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

### 一个新的里程碑

十月战争为埃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也使萨达特认识到和平比战争更重要，埃及要建立强大的国家需要和平。他从世界局势的发展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却不为其它一些阿拉伯国家所理解。

1977年11月，埃及人民议会新的一届会议上，萨达特总统在开幕词中发表了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讲话，他宣布为了和平，他准备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天涯海角的任何地方去。他的这番讲话使一直毫不犹豫地视以色列为敌人的阿拉伯同胞认为他在说胡话，一直把埃及视为敌人的以色列人也目瞪口呆。但是，贝京政府很快明白过来，抓住这个讯号，及时向萨达特发出邀

请。

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从运河西岸的艾卜·索维尔机场起飞。这一举动把尽管生活得很近但又很遥远的对立世界连在了一起。飞行不到40分钟，萨达特抵达以色列拉德机场。这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作为总统级别的访问，以色列军政各方既吃惊又兴奋。卡齐尔总统、贝京总理、达扬外长，以及前总理梅厄夫人等都到机场迎接。迎接萨达特的以色列军政要员中不乏对他的来访持怀疑态度的。以色列总参谋长穆尔·依哈达·古尔在萨达特宣布到以色列访问时，就曾警告人们，这是埃及玩弄的政治阴谋。但事实却让他的这种估计破灭。萨达特一见到古尔就说：“我决不玩弄道德上的诡计。”

萨达特在第二天下午在以色列国会上发表了阐明自己主张的演说：“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甘冒一切风险。”

接着，萨达特坦率地指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交换，以色列的安全应该得到保证。”

萨达特用充满感情的一声“祝你们和平”结束了演说，议员们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经过长达1年4个月的谈判，埃以达成了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长期敌对状况。“让我们携手工作”，萨达特以“化干戈为玉帛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呼唤着埃及新的里程。

萨达特完成了埃及人民梦寐以求的埃以和平。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萨达特以色列之行虽然对于埃及来说，以及对中东问题的解决都有新的昭示。然而，阿拉伯世界并不能容忍他这样干，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实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正如昔日萨达特的政治盟友、新闻顾问、前《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所说：“耶路撒冷之行，使萨达特赢得了世界的支持，可是作为埃及总统，他却失去了他天然的支持者——阿拉伯世界。”

萨达特对于阿拉伯世界对他以色列之行的指责没有采取沉默。他曾讥讽约旦国王侯赛因是阿卜杜拉国王之孙，是无足轻重的“小人”。侯赛因国王有礼貌地予以了驳斥：“萨达特本人同以色列单独签订了媾和条约。因此，对于萨达特来说，他要来谴责我祖父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传闻中的接触，是有点难以启齿。”

### 萨达特被刺的国内原因

萨达特总统单独与以色列签约，失去了阿拉伯世界，也可以说是在宗教问题上伤害了不少穆斯林。同时，萨达特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是他被刺的重要因素。

1971年5月，“权力中心”人物被解职后，接管总统府的官员把在那里搜到的现金和黄金统统运到吉萨的总统官邸，请示如何处理，萨达特要他们全部交与秘书法齐·阿卜杜拉·哈菲兹。萨达特还指示今后安排阿拉伯难民的开支应从情报预算的主要部分支取，这就是说，总统从此每年可以自行自由支配一百万英镑。

萨达特尽管在某些方面自己尚能节俭，但是对于总统的排场还是比较讲



究的，这使他脱离了自己的人民。他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有“空军一号”专机，于是，自己也渴望有，但埃及的财力一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要求。后来，沙特花费 1200 万美元，赠送他一架与尼克松“空军一号”一样的波音飞机。

如果说这一切并不足为奇，但作为埃及总统允许了国内政治的腐化和不正之风，这是不少国内政敌时常攻击他的要害问题。当时埃及有一家最大的承包公司——是由一个曾为萨达特廉价装修过宫邸的建筑承包商奥斯曼·艾哈迈德·奥斯曼创办的。正因为奥斯曼廉价为萨达特装修了宫邸，萨达特才为他的公司大开绿灯，使这家公司畸型发展，以致于在埃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是谁缔造了奥斯曼帝国？”回答说：“是奥斯曼·艾哈迈特·奥斯曼。”

这一切都引起了埃及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不满，国内形势一度紧张。

然而最刺痛埃及国内亲霍梅尼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信徒的是：为被霍梅尼驱赶走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提供避难所。同时，允许美国以埃及作为跳板，武装援救被霍梅尼扣押的美国人质，使埃及国内一直崇拜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信徒更加憎恶萨达特。

### 导火线

1981 年，埃及国内局势恶化，人们对贪污腐化怨声载道。萨达特认为这中间有不少是国内政治反对派挑拨离间的结果，很早就想清除一下国内反对势力。6 月，埃及发生了一场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间的两大教派的严重冲突，萨达特严厉处置了这起事件。

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新华夫脱党人等政治反对势力借机举行示威游行。9 月 3 日，萨达特访美回来一周，便下令逮捕了包括学生、原教旨主义者、新华夫脱党人和其他一些政治反对力量在内的许多人。

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一些政治反对势力开始了紧张的刺杀萨达特总统的筹备活动，国外的一些机构与组织对这种活动给予了秘密的支持。

促使士兵哈利德·文哈迈特·沙基那勒·伊斯兰布在阅兵式上动手的原因，除了其背后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网络外，还由于哈利德是一个虔诚的原教旨主义信徒，他的哥哥在 9 月 3 日这场大搜捕中也被捕了。因此，他在有组织筹划之下，铤而走险，杀死了萨达特。

萨达特倒下了，不论如何评价他的政治功绩，但他总归给中东和世界以一定的影响，完成了许多埃及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徐力谭克

一颗子弹打出无数“？”

##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谜

祸常发生于疏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方孝儒

### 总统倒在黑枪下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以其风流放荡而闻名于世。他的突遭暗杀，更使这位风流总统的一生带上了传奇与神秘色彩。

肯尼迪是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的。他是美国历史上第 4 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11 月 22 日中午，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乘坐“林肯”牌高级防弹旅游轿车，应邀前往交易中心赴午餐。

达拉斯市晴空万里，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将近 25 万人站在人行道上对总统欢呼。肯尼迪不喜欢闷在车里，下令把车顶去掉。他面带微笑，从容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汽车行至一批小学生面前时，肯尼迪吩咐停车，向孩子们伸出手去。原来，这群小学生们头上举着一幅标语：“总统先生，请停一下，与我们握握手！”看到肯尼迪这一谦恭的举动，人群中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一名暗杀总统的凶手已巧妙地避开层层密布的警卫网，携带装有望远镜瞄准器的狙击用来福枪，潜入达拉斯市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 6 层里。从这里可以俯瞰总统车队必经的埃尔姆大街。

大约 12 时 30 分，总统车队经休斯顿街进入埃尔姆大街，随从车队上的一位保安人员用报话机通知贸易中心，总统车队 5 分钟后到达。

电影摄影爱好看亚伯拉罕·扎普鲁德这时正站在埃尔姆街上，距教科书仓库约 70 米的一个易于拍摄的地方，总统轿车一出现，他马上拿起摄影机拍了起来。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他将成为一份珍贵史料的作者，因为他拍下的几乎是暗杀合众国总统的全过程。

这时，枪声响了，肯尼迪头部血流如注。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转过头来，惊恐地高声叫喊：“不！不！”第二枪又响了。接着是第三枪，肯尼迪挣扎着倒在夫人膝上，同车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也负了重伤。

车队后面的副总统约翰逊被他的保卫人员一把按倒，机警的特工人员扑在副总统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做掩护。

经验丰富的司机格里尔加快油门，警笛尖叫着向医院开去，4 分钟后到达帕克德医院。

医生竭尽全力想挽救肯尼迪的生命，但没有成功，子弹穿过大脑，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肯尼迪面部毫无痛苦表情，似乎还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头。枪响之后，警卫人员立即包围了教科书仓库大楼。凶手已跑掉了，警卫人员只搜出了一支 MC6.5 毫米步枪，枪上有这座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奥斯华尔德的指纹。奥斯华德开枪后就逃跑了。途中，他遇到蒂皮特警官的盘查，他以为自己的行为败露，开枪打死了这位警官，然后，跑进得克萨斯戏院躲了起来。十几分钟后，戏院被警察包围。当时戏院里正在演出，警察逐个盘查戏院的观众，盘查到奥斯华德时，他心中有鬼，与警察搏斗一番后就擒。安全勤务局、联邦调查局和警察的调查都认为奥斯华德毫无疑问就是凶手。但奥斯华德却矢口否认。11 月 24 日，当警察准备把奥斯华德

从局总部转移到县监狱中时，一位叫杰克·鲁比的夜总会老板，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拿起手枪对着奥斯华尔德就是一枪，奥斯华尔德当场死去。杰克被捕。但他声称：此举完全是为总统报仇。总统被刺，被认为是凶手的人又被枪杀，一连串的怪事，使美国社会晕头转向。

## 谁是谋杀者

肯尼迪被刺后，约翰逊副总统在装运总统遗体的机舱里宣誓继任总统。接着，他任命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人称“沃伦委员会”）负责调查总统被害真相。沃伦委员会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收集了上千份证明文件，听取了552个证人的证词，于1964年10月发表报告，说奥斯华尔德是个信仰共产主义、想在历史中占一席之地的暴力分子。他枪杀肯尼迪完全是个人行动，没有阴谋。然而，这个总统授权的权威委员会的结论却未得到美国公众的认可。根据肯尼迪枪伤检验报告，这位遇难总统至少倒在两个枪手枪口之下；另外，肯尼迪和康纳利州长被击中的时间间隔不到2秒钟，这是用来福枪射击办不到的。因而，如果奥斯华尔德是凶手，那么至少还有一个凶手。刺杀肯尼迪完全是个阴谋。如果认定奥斯华尔德是凶手，那么，他行凶的起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他受命于苏联，和克格勃有关。理由是1959年，他跑到苏联当了三年工人，娶了一位苏联老婆，并曾公开宣称加入苏联国籍。但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于1962年返回美国。

有证人说，奥斯华尔德返回美国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工作时，曾同一些亲卡斯特罗的组织有来往。因而有人推测这桩刺杀案与古巴人有关。

调查过程中，还有个证人提到，奥斯华尔德受雇于联邦调查局，每月领取200美金，情报代号S-172（或S-179）。

肯尼迪家族是美国一个新兴的大家族。它和某些家族积怨较深。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政策对这些家族的发展是严重威胁，故有人认为，肯尼迪之死属于财阀之争。

还有人认为，肯尼迪被刺和美国黑社会有关。在美国南方有一个叫马塞洛的黑手党人，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当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驱逐出境，1962年又偷渡回国。1963年，肯尼迪政府又重新提出马塞洛被逐之事。马塞洛因此雇佣了奥斯华尔德。

另有人分析说，肯尼迪之死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反古巴的保守势力有关。1963年，肯尼迪曾声明要从越南撤军，当年9月份又在极端保密情况下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秘密接触，很有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就同中央情报局中支持古巴流亡者的人们发生冲突。曾有人证明奥斯华尔德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有联系，但后来他又否认了。不久，这位证人遭到枪击。

是否美国政府中的权力之争导致了肯尼迪的不幸？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加里森曾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将会证实这一点。一旦政变成功，发动政变的势力将会成为左右国家局势的一股势力。我们的一个部冠以‘司法’之称，这一事实完全不意味着政变后的这个部会立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像所有政府机构一样，司法部的官员们服从的不是现在躺在棺材中的死人，而是眼下业已掌权的活人。”

以上种种说法，似乎都非空穴来风。然而，调查结果，或因缺乏实据，或因线索中断，最后都不了了之。迨至今日，有关肯尼迪被刺案的原因，仍无定论。

### 艳事余波

肯尼迪一向风流多情，喜欢拈花惹草。在他长期的罗曼史中，玛丽·平肖·迈耶可以说是最后一位。玛丽既是华盛顿的社会名流，又是一位艺术家。就在肯尼迪总统惨遭暗杀 11 个月后，玛丽亦遭暗杀。玛丽死后不久，她生前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把她和肯尼迪之间的一切公布于众，两人的韵事就此曝光。

玛丽和肯尼迪早在大学时代就彼此相识，当她 1956 年与科德·迈耶离婚后，两人又重叙前情。肯尼迪当时 39 岁，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玛丽比他小 3 岁，经常出入肯尼迪和布雷德利举行的小型晚会。但布雷德利发誓他并未觉察到两人的风流韵事在这个时期正在发展。当时玛丽的最亲密的朋友是安·特鲁伊特及其丈夫吉姆·特鲁伊特，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副总裁。显然，玛丽把她与肯尼迪的私情告诉了特鲁伊特夫妇。在肯尼迪被暗杀后不久，吉姆·特鲁伊特把这些事情公开了，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认为它可能与肯尼迪遇刺有关。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他们两人的私通关系已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关系。只要肯尼迪一下班，玛丽就去白宫拜访他，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而且玛丽把他们每次会面都记在她自己的私人日记上。

1963 年 11 月 22 日，肯尼迪遇刺身亡。玛丽和肯尼迪的那些朋友和崇拜者们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1964 年 10 月 13 日，当地沿着古运河的船道散步时，不幸遭枪击，身中两弹，一枪击中头部、一枪击中胸部，但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犯罪动机。警察逮捕了一名 25 岁的工人雷蒙德·克兰普，有目击者说看到她正在同玛丽小姐搏斗。但是，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克兰普是凶手。经过审讯之后，克兰普被宣告无罪而释放。警察一直没能找到杀人凶器。

玛丽家中的一个人解开了这一奇特事件之谜。这个人给本·布雷德利打电话，告诉他玛丽保存有一本日记，她在凶杀案发生之前曾想把日记烧毁。布雷德利夫妇和玛丽的姐姐托尼搜遍了玛丽的工作室，但没有发现任何玛丽的私人记录。几个月之后，托尼找到了这本日记。据说这本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肯尼迪的事情，使人们得以确信这对情人曾有过何等美妙的风流时光。布雷德利夫妇将这本日记给了他们的一位朋友詹姆斯·安格尔顿，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处头头，也是玛丽的一位朋友。这本日记可能是被安格尔顿谨慎地处理掉了，也可能是像詹姆斯·特鲁伊特所说的那样，被安格尔顿送到中央情报局总部销毁了。

### 与黑手党女郎的神秘恋情

1975 年，肯尼迪与一位名叫朱迪·坎贝尔的黑头发、蓝眼睛的美人长达两年之久的秘密艳史被披露，使人们对肯尼迪的突遭暗杀又产生了种种猜测。

1975 年，以参议员弗兰克林·丘奇为主席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在调

查国家机关秘密活动时石见了坎贝尔，据悉她与芝加哥黑手党头目萨姆·贾恩卡纳及其同党约翰尼·罗塞利有密切关系，而这两人又多多少少与中央情报局密谋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牵连。委员会本来只是想弄清楚坎贝尔对中央情报局的密谋知道多少，结果他们显然有了意外收获。在秘密谈话中，坎贝尔声称她与肯尼迪总统有亲密关系，她说她在与肯尼迪打得火热的时候，她曾多次见过贾恩卡纳。以丘奇为首的委员会曾传唤过他，可在出庭作证前两天，贾恩卡纳却神奇地被人暗杀。朱迪·坎贝尔后来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故事》，此书更多地记载了她的私生活，特别是她与这位前总统私通的细节。她是1960年2月在拉斯韦加斯的一次宴会上被歌唱家弗兰克·西纳特拉介绍给约翰·肯尼迪的，当时肯尼迪还只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坎贝尔说，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特德·肯尼迪也迷上了她。他跟她约会，她不理他。她与肯尼迪总统在美国的许多地方约会过，华盛顿、棕榈滩、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他们的感情在1961年夏达到高潮，到第二年春天就枯竭了。坎贝尔说他们分手时都没感到痛苦，他们感到彼此的恋情都已消退，加之外界的压力太大，再继续下去要冒很大风险。联邦调查局局长丁·埃得加·胡佛正同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一道致力于从严打击黑手党活动，正是他向肯尼迪总统通报了坎贝尔同贾恩卡纳和罗塞利的关系。胡佛私下提醒总统再与她继续私通会最终毁掉他的大业。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声称在54个星期的时间里坎贝尔和总统共通过70次电话，她的电话有些是直接从贾恩卡纳的房间里打出来的。虽然坎贝尔一直否认这一点。

### 梦露之死与肯尼迪谋杀案

1962年8月4日，一个周末的夜晚，当时红得发紫的好莱坞影星玛丽莲·梦露，在她的年华、容貌、才能正在熠熠发光的鼎盛时期，突然死在她的寓所里。一星期后发表的检察机关的报告，断定玛丽莲·梦露是在几秒钟内服下了47粒安眠药丸之后自杀的。

很多证据证明她没有理由自杀。然而，谁能证明她不是自杀呢？私人侦探米洛在对梦露死因的调查中，发现梦露的艳史同政治搅到了一起，特别是同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头号人物——总统肯尼迪和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了暧昧关系。梦露之死的扑朔迷离以及不知来自何方的干预和遮掩，她与肯尼迪兄弟关系的真相，如同后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市被人暗杀一样，始终是个谜，也许是个永远揭不开的谜。此后不久，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几年后，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在竞选活动中遇刺身亡。三个当事人，一女两男，相继突然地离去，更使这些人物的神秘成为谜中之谜。米洛经过十年调查了400个线索，其中能提供关键性证据的有15人。阅读了上吨的书面材料后，米洛得出了最终结论：梦露是被谋害致死，有可能是政治谋杀。梦露的直接死因是吞服大量安眠药，但尸体解剖报告却说梦露的胃内没有水，也没有安眠药丸的残留物。米洛为此专门请教了纽约的医药主管温伯格博士，得到的回答是：“吞服如此过量的安眠药丸而在胃部却没有发现残留物是不可能的。”

胃部空白而血液中有如此高的药物量，只能是血管注射的结果。温伯格博士完全赞同这一判断。

在梦露与肯尼迪兄弟交往密切的时日，梦露有一条私人电话专用于直通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在她们关系破裂后，这条密线就被掐断了。米洛在调查

中曾努力寻找梦露当时的电话费单据，却发现这些单据都失踪了。

罗伯特·肯尼迪毫不留情地切断同梦露的私情，还有一个因素。美国作家瑟默斯此前不久出版的纪实性著作《美人》，透露了较为详细的内情。瑟默斯认为：玛莉莲·梦露是宣称要消灭黑手党的那位司法部长和地下黑社会之间一场较量的牺牲品。

梦露曾筹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她死前两天，她曾告诉别人，她准备在招待会上披露肯尼迪兄弟的真相，作为对自己被抛弃的报复和反击，这一切都记载在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里。梦露的记者招待会计划未能如愿，因为肯尼迪兄弟不会让她自由行事。他们懂得这一“爆炸”的冲力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权位和执政。美国特种部队接受了不准“梦露事件”发生的任务。米洛调查出了一个绑架梦露的替代方案。如果梦露不死，这个方案就将实施，梦露将被绑架，从洛杉矶到弗吉尼亚，并将不定期地拘留在那里，以“精神错乱”的名义度过余生。

策划这一绑架方案的又是谁呢？

米洛的分析是：“我不相信肯尼迪兄弟直接插手其中。我的看法是，策划这一阴谋的是为肯尼迪兄弟利益行事的人，更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伙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仅仅是推测。”

1980年，根据美国的一个情报法，米洛向联邦调查局申请阅读有关梦露死亡的档案。在查阅时，米洛发现相当多的材料已被销毁或转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的一项命令下执行的，其理由是这些材料危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梦露掌握总统级人物机密的红色封面日记本，在梦露死后存入验尸官办公室的第二天便不翼而飞。这使得肯尼迪总统的死因尚未查清之前，梦露之死与肯尼迪总统的一枪毙命之间，有了一缕不可忽视的关系。

不过，最近又有人传说梦露还没有死，而是被洗脑后送到了国外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土著人，过起了埋名隐姓的生活。这一消息在许多地方引发了人们对肯尼迪死因的新议论，但这股风很快就过去了。还有人说肯尼迪是由一个装扮成美国人的苏联特工人员杀死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对肯尼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迫使他让步十分恼火。当然这又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说法。肯尼迪究竟为什么被人杀害，仍然像个大“？”，挂在美国，挂在世界许多人的心头。

唐桂荣

## 第八编 大势已去主动让贤

无论用什么方法获得的名誉，如果没有品格来扶持，名誉终必消灭。  
——华盛顿



让新的领导去应付新的问题

## ——尼雷尔总统在经济持续恶化时让贤

我已经工作了 23 年，这足够了。过去 30 年我没有做到的，在另一个 30 年里我也做不到。

——尼雷尔

尼雷尔是坦桑尼亚前总统，革命党主席，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非洲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者，国际社会颇具声望的政治家。1985 年 10 月，他在继续享有崇高威望，年纪只有 63 岁的情况下，鉴于坦桑经济形势的日益严重以及他本人对政治道德的理解，断然辞去总统职务，并竭诚支持新的领导人为扭转局面而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使坦桑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

历史已证明，尼雷尔主动让贤，不仅为坦桑和整个动荡多事的非洲政坛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使他自己更加受人爱戴。

尼雷尔的辞职决定，是由坦桑尼亚独立后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后果引起的。

### 陷入窘境

尼雷尔在坦桑尼亚主政近 30 年，成绩巨大。他对外奉行独立、不结盟和睦邻友好政策，坚持反帝反殖，支持国际社会的一切正义事业，使坦桑成为非洲有影响的国家，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一定荣誉。尼雷尔对内一向重视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强调不同种族、宗教、不同地位的人一律平等，推行统一的民族语言——斯瓦西里语和统一的民族习惯法，维系了 130 多个部族和 3 大宗教之间的团结，并妥善处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中不断滋生的矛盾，保持了政治和社会长期的基本稳定。他在发展民族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农村，削弱了部落酋长的统治势力，限制了土地向私人手中集中；乡村的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在非洲是屈指可数的。在城市，关注居民的生活，努力缩小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限制中高级党政官员以权谋私和巧取豪夺。他重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特别是致力于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等措施，缓和了各种矛盾，维护了社会安定，从而使坦桑成为非洲少有的政局长期稳定的国家之一。

独立后，坦桑尼亚的民族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存在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以致政府的经济政策失当，推行了一些偏激、偏急的措施，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刚独立时，坦桑是以小农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生产方式原始，生产力低下。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沿袭了独立前的生产方式，政策较温和，比较注意发挥国内各种经济成份的作用，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干预较少，生产效率提高较快，外贸顺差，物价基本稳定，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由独立前的 4% 提高到 1964 至 1966 年间年均增长率 7.75%。1966 年，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1%。粮食自给有余，经济作物年均增长率在 7% 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大量涌入城市；农村相对发展缓慢，农村中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教育制度忽视普及文化工作；经济建设产生依赖外援的倾向。基于上述情况，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原

坦桑大陆地区执政党，革命党的前身之一）于 1967 年 2 月发表了《阿鲁沙宣言》，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政策，旨在“消灭剥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接着，政府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改革。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实行国有化，这无疑是一个想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脉的新独立国家必不可少和进步的决策。但是，由于急于求成，在国有化过程中步子迈得太快，它不仅没收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金融机构、大工矿企业、大农场，也打击了中、小企业甚至小商。1965 年，私营部门在固定资本中占 60%，公共部门占 40%，1967 年前者占 37%，后者占 63%；到 1973 年前者降到 22%，后者占 78%。这说明私人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且导致外资抽逃，人才外流，35000 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离开了坦桑。政府虽耗资 2 亿多美元接管了外资企业，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管理人员，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因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如剑麻生产，独立初期产量迅速提高，1964 年达到 23 万吨，自从大剑麻园被国有化后，产量一蹶不振，1979 年产量仅有 8 万吨。

在农村，政府大力推行“乌贾马”（意即“社会主义”）村运动，其主旨是想把散居农户从四面八方集中在一起成立“乌贾马”村，然后通过有组织的“共同劳动”，逐步增加坦桑农村的“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实现农业集体化，建立起坦桑尼亚式的“社会主义”村。迄至 1980 年 6 月政府宣布，全国建成村子 8299 个。由于在“乌贾马”村运动中违反了自愿的原则，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措施，且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村庄化虽对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加强乡村政权建设，克服部族主义残余诸方面有积极因素，但因急于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适与愿违，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连遭旱灾影响，农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84 年，坦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非洲 24 个最缺粮的国家之一。同时，由于政府的经济历来仰赖经济作物出口换汇维持（独立时对外贸易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8%），由于“乌贾马”村运动打乱了原有农业生产格局，有些经济作物无法照管，产量急剧减少，造成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换汇减少，国家无力进口设备、零配件甚至部分原材料，导致工厂的开工率不足 1/3，生产下降，企业的亏损日益增多。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3% 下降到 1982 年的 7%，这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恶性循环。坦桑尼亚的经济困难始于 70 年代，进入 80 年代经济持续恶化，工农业生产不断衰退，物资匮乏，物价上涨，外汇奇缺，债务累累，财政赤字惊人，是世界上第 14 个最穷的国家。按 1976 年不变价格计算，1961 至 1986 年坦桑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4 倍，但同期人口增长 1.3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6 年间仅增长了 2.6%。连尼雷尔总统也常说，坦桑实际上比独立时更穷了。究其原因有：连年的水、旱灾（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国际贸易条件恶化（1985 年国际贸易条件比 1976 年恶化了 43%）；东非共同体的破裂（1977 年）；坦乌战争（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等接踵而来的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无疑给坦桑经济带来不可低估的困难和影响，但问题主要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失误，以致经济的应变能力甚差，面对经济窘境无能为力。

## 承认错误

1985年6月，尼雷尔在接见一广播公司记者时说，“我可以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不管什么样的工厂企业都实行了国有化”。他还说，“把这些工厂企业交给能够经营的私营公司并不坏，那些没有实行国有化的企业比实行国有化的企业干得要好多，虽然他们是在同样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经营”。对此，尼雷尔曾于1984年10月在姆特瓦拉省视察时向地方领导人指示，要纠正“乌贾马”村运动期间所犯的的错误。他说，“在执行‘乌贾马’运动计划期间，一些农民从原来的住所搬迁到远离耕地的地方，以致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庄稼。要求他们把农民重新安置在便于耕种的地区，使农民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他还说，“应该纠正这种错误和其他错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说，“尽管我们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为时已晚，但总比永远不纠正错误要好”。

## 辞 职

由于坦桑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加。面对现实，尼雷尔有自知之明，他在1985年大选前说，“我已经工作了23年，这足够了。过去30年我没有做到的，在另一个30年里我也做不到”。他还说，“也许我已对国家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现在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让新的领导去应付新的问题吧！”因此，在1985年10月，尼雷尔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让位于阿里·哈桑·姆维尼副总统。当时，尼雷尔年方63岁，作为非洲独立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他的年事并不算高，且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他主动让贤之举，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他认为，“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存在不少弊端，不能适应现代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他还说，“国家需要的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领导班子，而在这当中，是党而非任何领导者个人至高无上，党将永存，而领导人必须有进有出”。当姆维尼当选总统后，为保证政权顺利移交和支持新任总统的工作。尼雷尔辞去总统职位后，他专任执政党—革命党主席职务。他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为我的责任之一是保证新任总统名副其实”。这充分体现了尼雷尔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度。

### 支持新领导形势好转

姆维尼总统主政以来，他坚持务实的方针，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调整改革和稳定国内局势上。在贯彻党通过的1986至1989年3年经济恢复计划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贷款协议，采取了一些调整改革措施：

1. 调整经济结构，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大力扶持小农经济；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允许农民从“乌贾马”村搬回祖居地；把经营不善的国营或集体种植园转为私营；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 整顿国营企业。压缩新建项目；重点扶持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和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取消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补贴，促使其自负盈亏；对长期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私营化；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3. 调整汇率。从1986年开始定期调整汇率，到1988年中确立“均衡汇率”。

4.调整物价政策。物价控制已大大放宽，由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已由1985年的100多种减至12种。

5.放宽贸易限制。允许企业的产品自行出口，且收入外汇留成50%，用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允许私商自行进口“必需的消费品”以供出售，搞活市场。

由于采取了上述调整改革措施，加上近几年来年景较好，农业连续获得好收成，坦桑经济的恢复已初见成效。1986年姆维尼执政时，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0.6%，通货膨胀率达30%。1988至1989年度，坦桑国内生产总值为4.4%，是进入80年代以来连续超过人口增长率3.2%的第3年，通货膨胀率已降至15~20%。工业增长5.4%，是连续7年减产后的第2年正增长。农业连续3年增长超过4.7%，粮食做到自给有余，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高级经济学家丹·恩戈维说，“要是你四、五年来这里，你会发现商店里什么也没有。我认为政府扭转了局势，做了件了不起的工作”。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1年10月刊登弗兰克·福格勒的文章报道，坦桑尼亚在过去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4%，高于黑非洲国家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受到世界银行的赞许，并让坦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1年在泰国召开的年会上代表40多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发表讲话。目前，坦桑经济仍有很大的困难，但人民的基本生活尚有保障。姆维尼的调整改革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由于经济形势有好转，对维护政局的稳定是有利的。

### 解甲归田

1990年5月29日，尼雷尔宣布，他将于本年8月提前（注：1992年10月届满）辞去党主席职务退休。同年8月，革命党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尼雷尔主席辞职的请求；选举产生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根据尼雷尔的推荐，大会选举了国家总统、党的副主席姆维尼为主席。尼雷尔主动提出并亲自实践了政权依法和平交替，主要目的是废除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免今后坦桑政局因领导人的仓促更迭而出现不稳和动乱。

尼雷尔还在这次党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告别演说，对党和国家寄予期望；对人民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关怀。他说，“刚刚过去的5年是非常成功的。由于姆维尼总统在过去5年高超的、实际的领导，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现在这种好形势。非常感谢姆维尼总统”。他接着说，“我虽从党主席职务上退下来，但我仍相信，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革命党，我们的国家将风雨飘摇。我希望我们的党继续根据人民的认可保持领导地位，即使以后搞多党民主亦然。”他表示，“虽然，我不再担任党主席职务，但仍然是一个革命党党员，一个积极的党员，像其他优秀党员一样，如果国家机构来征求我意见，我当然随时恭候。”

最后，尼雷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必须继续利用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各种计划来保证那些不平等不致达到危及国家的团结和安定的程度，特别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且要捍卫这一切。我们的目标仍应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教育和卫生服务。如果少数人生活十分豪华奢侈，而多数人连基本必需品都没有，我们就无法维持和平与安宁。我们党及其政府经常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990年8月17日，坦桑尼亚人民的国父——尼雷尔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卸甲归田，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马腊省布蒂亚玛村，过田园式的乡村生活，与家乡的父老兄弟在一起欢度晚年。

李社输

识时务者为俊杰

## ——戴高乐总统在失去多数时立即辞职

即使我失败了，胜利还是属于我的，因为在历史面前，我唯一关心的是历史……

——戴高乐

在戴高乐于 1958 年 6 月重新执政后的十年间，法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科学技术得到了大发展。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戴高乐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它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戴高乐怎么也没有想到，1968 年竟会发生震撼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社会运动，即“五月风暴”。这使戴高乐受到沉重打击，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 顾此失彼

戴高乐梦寐以求的理想是要恢复法国多少世纪以来的大国地位。他说：“努力的目标、恢复经济繁荣的目的不是在于使这些或那些法国人生活得更舒服，而在于把法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强盛、伟大的国家。”为此，戴高乐重新上台后对国家政体进行了改革，制定了加强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及其它殖民地问题，稳定了国内政局，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对法国独立自主的威胁，戴高乐在保持同美国联盟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殖民地范围、军事特别是建立独立防卫等各个领域广泛开展活动，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竭力争取法国同美国获得平起平坐的独立地位。终于，戴高乐的目标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他的民族主义感情也获得了不小的满足。但是，戴高乐稳定和发展经济首先考虑的是法国的伟大形象，他的一句名言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把法国的发展首先看作是推行对外政策的条件，并一直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对国内一些重要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经济社会改革没有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多少实惠，老百姓的生活被忽略了，失业率上升，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的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从而使戴高乐在国内的威望受到影响。60 年代，青年问题已成为法国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战后迅速增长起来，到 1968 年，法国 20 岁以下的人已占总人口的 34%，随着年轻人的增加，便产生了教育方面的问题。1968 年，巴黎大学的学生差不多是 1955 年的两倍半。1963 年法国总统府技术顾问雅克·纳博纳就曾写信给戴高乐，谈到法国的教育问题。后来，他不断向教育部长提出进行教育改革的建议，但是没有被采纳。第五共和国政府同学生团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很紧张，随着青年人各种新问题的出现，终于引发了 1968 年 5 月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运动波及到全国各个行业，并形成了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

### 风暴骤起

1968 年 3 月 18 日，巴黎的大、中学生举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游行，袭击了美国在巴黎的一些建筑物。法国当局逮捕了若干人，其中有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一名学生。3 月 22 日傍晚，该校以科恩·邦迪为首的一些左翼激进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会后，百余名学生占领了办公大楼，



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左翼学生成立了“三·二二运动”团体，并建议3月29日召开反帝宣讲大会。3月28日，农泰尔学院当局宣布停课。4月1日复课后，巴黎一些大学继续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并要求教育改革。5月2日，农泰尔学院决定无限期停课，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通知参加占领行动的8名学生去巴黎拉丁区索邦本部接受审查。翌日，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学生谴责关闭农泰尔学院，反对审讯科恩·邦迪等人，部分学生在校园内修筑防御工事。警察开进索邦校园抓人，因此学生同他们发生了冲突。警察用警棍、水炮和催泪瓦斯对付学生，而学生则用铺路石块进行还击。结果，几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校方宣布关闭索邦学院。这激起了大学生们的极大义愤，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5月6日，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抗议校方和警察的镇压行为，一致要求重新开学，从学生区撤出警察，释放被捕学生。学生和警察再次发生冲突，受伤者达六、七百人，400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学潮迅速波及到其他地区，外省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巴黎学生。在巴黎80%的人同情和支持学生。

戴高乐对学生采取强硬态度，他声称“决不允许大学里有反对派存身之处，也不允许在街上搞暴力行动”，认为这“决不是建立对话的方式”。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虽答应近期内开放其它学院，但对索邦学院继续关闭，并拒绝警察撤离该校。于是，5月10日夜间爆发了近百年来的首次街垒战，300多人受伤，约500人被拘捕，100多辆汽车被烧毁。

5月11日，法国民主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全国教育联合会、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干部总联合会等工会组织联合号召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总罢工，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大学生总联合会及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继续罢课。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阿富汗后回到巴黎。他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事态已从大学扩展到了工厂，工人马上要举行总罢工，因此，决定采取安抚政策。他回国后仅3个小时就召见了有关部门，接着与戴高乐总统磋商后，就宣布命令警察撤出学生区，索邦学院重新开放，释放被捕学生。学生最初提出的三项要求全部得到实现。

但是，13日的总罢工已经决定。这一天是导致戴高乐重新执政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十周年纪念日。不过，戴高乐是在孤独和忧郁中度过这一天的。几百万工人和学生涌上街头，示威者提出“十年太长了”、“戴高乐辞职”、“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去”等口号，矛头直指戴高乐。

按预定计划，5月14日戴高乐出访罗马尼亚。在此之前几天，戴高乐曾征求深得其信任的法军高级将领、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的意见，鉴于目前法国政局，他是否去访问罗马尼亚，阿兰竭力鼓动他访问罗马尼亚。13日大罢工后总理蓬皮杜也建议他出国，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法国人民以为这次事件没有完”。于是，戴高乐按原订计划出访。巴黎的局势继续恶化。南特飞机工厂的工人和雷诺汽车厂工人先后开展占领工厂的罢工斗争，钢铁、造船、化工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响应，他们接管工厂，建立行动委员会。运动遍及全国各个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和知识界，连一些政府雇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医生、作家、新闻记者、播音员乃至警察，都卷入了运动，全国陷入了瘫痪状态，戴高乐不得不提前于18日回到巴黎。

戴高乐一筹莫展，拿不出扭转局面的解决办法。24日，他发表电视讲话，

呼吁人民重返工作岗位，恢复秩序，宣布他要着手对国家进行改革，并将提出一项法案在6月份交全民公决，最后根据人民的意见决定他的去留。但是，罢工和游行继续进行，人们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在游行队伍中收听他的讲话时，不断高喊：“十年已经够了。”“戴高乐辞职吧！”“戴高乐进博物馆去吧！”戴高乐的讲话未能像过去历次危机的关键时刻那样起作用，而是完全失灵了。

5月25至27日，总理蓬皮杜在格勒内尔街社会事务部主持资方、工会和政府三方谈判，达成了《格勒内尔协议》，决定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家庭津贴。协议遭到基层工会和工人的拒绝，混乱的局面无法扭转，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 政治危机

学潮和工潮继续发展，事态不断升级，局势愈加恶化。戴高乐关于全民公决的建议被撇在一边。政府总理蓬皮杜主持下达成的协议遭到反对。工厂、大学、企业全被占领，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普遍建立，乃至出现了苏维埃和公社。巴黎一片混乱，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

此时，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十分活跃，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两人。

密特朗能言善辩，年轻时就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活动才能。二次大战时，他创建了“全国战俘运动”，进行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1944年参加了戴高乐的抵抗运动临时政府。1946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47年，年仅31岁的密特朗入阁担任退伍军人部长，成为法国自第一帝国以来最年轻的部长，1965年他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主席，曾促进各社会主义派别和组织的联合。同年12月曾同戴高乐竞选法国总统，在第二轮投票中获44.8%的选票，虽未当选，但也曾被称为奇迹。1968年5月28日，当戴高乐政权陷入深深的危机之时，密特朗在大陆饭店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真是意味深长！因为10年前戴高乐将要再度出山时曾在这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现在密特朗在这里发表声明，称“现政府无力解决它所挑起的危机，它已穷途末路”，“现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建议立即组织一个“临时管理政府”。提出临时政府将由10个成员组成。如果需要，他将负起组织这个临时政府的责任。随后又提议由孟戴斯—弗朗斯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宣布他自己要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孟戴斯—弗朗斯是激进社会党人，自30年代初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便开始进入政界活动，曾多次在法国政府中任职。1954年6月，应法国总统戈蒂之邀组阁，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其任内，于1954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把法国从印度支那战争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作为左翼激进派，他的思想在法国颇有影响。在1968年5月学潮高涨期间，他是唯一不必担心自身安全而进入运动的中心——巴黎大学——的政界人士，他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人。当法国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孟戴斯—弗朗斯宣布他准备与所有联合起来的左派组成临时管理政府，表示愿意接任总理职位。

与此同时，法共建议成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和民主团结政府来接替戴高乐政权。“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党”呼吁建立救国政府。吉斯卡尔·德斯

坦要求蓬皮杜辞职，由革新派人士组织新政府。

各派政治力量对政府的不信任，要求重新组织政府，使法国陷入了深深的政治危机之中。戴高乐哀叹道：“法国人不再需要戴高乐了。”

## 反 击

戴高乐政权正走投无路。戴高乐在哀丧和疲惫中苦苦地寻觅着反击的突破口。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酝酿接管政权，终于被戴高乐发现了成千上万反对他的人的裂缝。一方面，密特朗认为“现政权已经名存实亡”，6月16日的公民投票将导致戴高乐辞职，现政府必将下台，建议“立即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并自荐为总统候选人。而他在1965年选举中与法共结成竞选联盟，法共现在也提出需要由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和民主团结政府接替戴高乐政权”。于是，巴黎便纷纷传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这正是戴高乐所需要的重型炮弹。另一方面，运动之初同情和支持学生并随之卷入运动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本来是想通过运动谋求某种改革，但当运动触及到政府，左翼党派试图要接管政权时，他们害怕、动摇。这给了戴高乐以发射炮弹的目标。戴高乐如同过去那样，紧紧抓住法国人怕乱的心境，特别是害怕在法国出现所谓“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秩序，来恢复他的权威。

戴高乐如何利用这道裂缝呢？他的高招是“沉默”。他在30多年前写的《剑锋》一书就提出这样的见解：“沉默更能提高威信。”现在他要通过沉默再加上几份神秘来赢得胜利。

戴高乐原定5月29日上午10点主持每周例行的内阁会议，但9点15分他的秘书突然打电话通知蓬皮杜：内阁会议要推迟到第二天下午3点举行，因为戴高乐将军要回到他在科龙贝的寓所去呆一天。一个小时以后，戴高乐亲自给蓬皮杜打电话，说他要独自呆着，不想会客。同时，他也需要睡点觉，因为在巴黎睡不成，所以要到科龙贝去。戴高乐叫蓬皮杜不必担心，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前途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可是，几小时以后，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惊慌失措地向蓬皮杜和部长们报告，说戴高乐根本没有回科龙贝，“将军失踪了！”这消息，使总理和部长们感到愕然。将军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他精神失常了？

不，他的神经很健康。他之所以出走，一来是怕法共29日组织的游行队伍包围总统府，二来是要找法国驻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马絮，摸摸军队的底细。

29日临近中午时分，戴高乐偕同夫人、孩子，乘直升飞机前往法国军队在联邦德国的驻地巴登巴登。他在那里与马絮进行了磋商，马絮表示军队忠于他。戴高乐心里有了底，下午便回到了科龙贝，并打电话通知蓬皮杜，30日下午的内阁会议如期召开。

30日中午，戴高乐回到巴黎，下午4点半钟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宣布：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引退，要继续履行他的职权；不更换蓬皮杜这位“值得人人尊敬”的总理；解散国民议会，推迟公民投票的日期，着手进行立法选举。他在讲话中大谈法国受到了“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专制的威胁”，声称为了维护共和国，他“将依据宪法采取全国直接投票以外的其他途径”，要“阻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颠覆活动”。当天晚上，戴高乐派组织了100多万人在协和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反击示威游行，局势大变。戴高乐

趁着有利的形势，于5月31日改组内阁，并加紧准备6月立法选举。

其实，戴高乐心里十分清楚，根本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威胁，这是一个骗局。在五月风暴前夕，法共总书记罗歇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法国不存在推翻戴高乐政权的革命形势。运动爆发以后，法共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以避免戴高乐借机反共。学潮之初，法共发表文章严厉批判农泰尔学院的学潮，斥责“极左派学生在反共方面与蓬皮杜政府如出一辙”，“企图在工人特别是青年中制造混乱、疑虑和怀疑”，这种“骚乱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的挑衅，而与广大学生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客观上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后来，学潮迅速扩展，罢工浪潮不断高涨，两股潮流汇合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法共才不得不采取行动，但也只限于“使罢工获得满足工人基本要求的结果”，在政治上“争取在合法范围内实现必要的民主变革”。与此同时，法共尽力阻止学生介入和影响工人运动，以使工人运动控制在合法斗争范围内。正因为如此，蓬皮杜建议的三方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只是由于工人和基层工会拒绝，协议才变成一纸空文。直至政府完全无法控制局势，法共才向社会党建议成立“人民和民主团结政府”，而法共本身并无意要夺权。5月29日法共组织的50万人的游行队伍也并未接近爱丽舍宫，但资产阶级却吓得心惊肉跳，以为法共要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戴高乐便利用了他们的惶恐心理，以虚构的“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欺骗群众，所以迅速扭转了局势。戴高乐趁有利的形势，于6月23日开始举行大选。经两轮投票，结果戴高乐派在议会中获得346席，将近占议席总数的75%。戴高乐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 把政治命运交给人民

戴高乐派在6月大选中以法国议会史上最大的多数重新执掌政权。戴高乐获得了选票，却失去了人心。“五月风暴”期间，总理蓬皮杜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权威越来越大，他把政府大部分主要职务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并常摆出一副既严肃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他的和解政策。戴高乐私下狠狠地责备蓬皮杜使局势失去了控制。在6月大选胜利的欢呼声中，蓬皮杜备受推崇，而戴高乐却几乎被人们忘记，此情此景使他大为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气愤。戴高乐想在当前胜利的情况下，让蓬皮杜自己提出辞职，结果戴高乐终于如愿了。而蓬皮杜却感到伤心和恼怒，因为多年来忠诚与献身的服务，到头来竟然一文不值。戴高乐最得力的助手蓬皮杜便同他分道扬镳。他们两个人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个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清楚地说明，经过“五月风暴”的巨大震荡，戴高乐的威信已大大下降。他决定就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两项议案举行公民投票，试图再次借助全民投票来挽回损失，恢复人民对他的信任。因为过去他多次碰到困难的时候，都是通过公民投票来取得人民的信任，显示自己的威信的。

1969年2月19日，内阁会议决定公民投票将于4月27日举行。戴高乐说，他把这次公民投票看作是“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信不信任的问题”。在公民投票运动开始之前，他准备发表广播演说。事先，他同电视台记者米歇尔·德鲁瓦进行了详谈。他在回答德鲁瓦的问题时说，两种改革在他的计划中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整体，因此，他要求选民们对这样具有复杂性的

改革建议只能作出简单的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他表示，如果多数选民投赞成票，对他表示信任，他会在工作中得到极大鼓舞；如果多数选民投反对票，他就立即辞职。戴高乐实际上立下了军令状。4月27日的投票将决定他的前途。

其实，在2月19日内阁会议正式决定4月27日为公民投票日之后不久，戴高乐就开始犹豫了。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和政府其他某些成员几个月来一直要戴高乐延期举行公民投票，希望他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法国人民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前总理蓬皮杜也确信戴高乐会失败。戴高乐似乎是要考虑推迟投票日期。与此同时，他又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意见，有不少人在公民投票日期公布之前虽然持反对态度，但认为现在再改变主意已经来不及了。他的一位助手劝说道：“公民投票日期正式宣布以后，你不能再退缩了。你会丧失全部威信。这比什么都糟。”于是，他又取消了推迟公民投票的考虑。他宣称：“我没有别的可选择了，要不就挑开脓疱，要不我就下台。”

改革议案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不能不对如此复杂的条文只说一个“是”或“否”表示怀疑。此时戴高乐已众叛亲离。早在1969年1月17日，前总理蓬皮杜就宣布他将成为总统候选人，这分明是要取代戴高乐。同戴高乐携手合作的独立共和党领袖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公民投票前夕也公开表示要投反对票，给了戴高乐沉重打击。同时，戴高乐在阐述其“合作”政策时明确提出要使工人分享企业的利润，参与企业的管理，这又激怒了中产阶级，结果一部分拥护戴高乐的中产阶级改变初衷，要投反对票。《费加罗报》4月24日发表的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打算投赞成票的只有47%，而53%的人都准备投反对票。这预示着大势已去，戴高乐的统治即将走到尽头。

4月27日投票的结果是：赞成票10901753张，占47.58%；反对票12007102张，占52.41%。4月28日凌晨，法新社发布了戴高乐事先写好的公告：“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他实践了最后许下的辞职引退的诺言。公民投票导致了他下台，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被否决“是1968年五月事件的自然结果”。

戴高乐本来可以任职到1972年期满，但他为什么要举行公民投票，使自己被人民公开拒绝呢？也许这就是戴高乐的性格。他在确信公民投票大势已去时曾这样说过：“我完全可以不搞公民投票，但是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或者到我七年任期结束为止毫无作为，或者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由于这次公民投票并不是在严重事件压力下举行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即使我失败了，胜利还是属于我的。因为在历史面前，我唯一关心的是历史，后人会这样说：我是在一个对国家十分必要的计划问题上被推翻的。人们往后会觉察到我是正确的。”

如果戴高乐在这次公民投票中胜利了，可能也不会任职到期满。他表示过不准备在80岁以后继续担任职务，因为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太老了。他曾打算在1969年11月22日他79岁生日那天，或者是在12月31日发表传统的新年祝词时宣布离职。他想要在死以前留出一点时间写他的回忆录。现在辞职退休，正好可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他最后的一项工作——撰写他第二次执政期间的经历《希望回忆录》。可是，原计划出三卷的回忆录，在第二卷还未写完时，他便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再过13天就是他的80岁寿辰。

陈峥

“铁娘子”泪洒唐宁街

##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保守党的团结而辞职

伟人固然由于毅力而伟大，可是也会由于灾难而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哀怨，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

——罗曼·罗兰 1990年11月28日上午。英国伦敦，首相府唐宁街10号门前。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神情激动地向守候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发表简短的告别演说，然后即驱车前往白金汉宫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递交辞呈。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英国、冲击着全世界，更冲击着撒切尔夫人本人。公众终于看到了“铁娘子”的眼泪。从此，一颗明星陨落，一个时代——撒切尔时代——悄然终结……

### 从“保守党的珍珠”到众矢之的

撒切尔夫人是位“创纪录”的人物。她是英国保守党第一位女领袖，也是英国漫长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79年5月4日，在保守党大选获胜之后，于1975年就担任了党的领袖的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从此，英国政坛的每个角落都不时闪现这位女强人的身影。她的同僚敬畏她。她的对手诅咒她。她的敌人气极败坏地说她是“铁娘子”。的确，自从1812年利物浦勋爵连续担当英国首相15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位首相的任期比她的任期更长；在英国历史上更没有任何一位首相有幸能以自己的名字联系一个时代。从1979年开始，她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英国的许多方面，她立志要扭转国运的衰落，在西欧国家中率先奉行货币主义为其国策。为此她曾经豪迈地宣称，“我改革了一切”。

在她凌厉的政治、经济攻势下，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工党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她的私有化使英国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她惯于在欧洲联邦主义者面前说“NO”，不留情面地赶走与其意见不合的左臂右膀，对罢工的煤矿工人正颜厉色、毫不让步，勇于去碰人头税、地方财政改革等难题，以特有强硬态度去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去与万里以外的阿根廷大动干戈争夺一片小小的海岛……，大约是这些“政绩”，也是由于政治对手工党的衰落，继1979年大选获胜之后，撒切尔夫人在1983、1987年两次大选中又大获全胜。正当她奋力争取“四连冠”的时候，厄运降临了。

其实，早在1981年，由于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化进程以及对福利制度的改革，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就曾出现过重大的跌落。在这段时间，民意测验不客气地把她评为“最差的首相”。然而，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拯救了她。英军的胜利使英国民族精神大振，这与其后英国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有所发展等因素合在一起，使她的政治地位大大加强了。人们开始把她的“政绩”说成是“撒切尔革命”；80年代中期前后，“撒切尔主义”一度成为英国政治辞典中最为时髦的一个词汇。但从1988年开始，情势发生了变化。这在当时或许还有失明显，而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变化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前途来说却是致命的。

首先是通货膨胀率的再度回升。“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抑制通货膨胀。这项经济战略曾经成功地使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21.9%降低到1986年的2.4%，使英国进入西方通货膨胀率水平最低的国家之列。但从1987年底以来，英国通货膨胀率又悄然回升。至1989年6月，

通货膨胀率已达 8.3%。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英国政府不得不从 1988 年 6 月起，在 15 个月内接连 13 次提高利率。尽管如此，英国在当时还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988 年仅贸易赤字就达 142.7 亿英镑。

其次，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进程，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当政府准备进一步在医疗卫生、自来水厂、发电厂等公共事业部门推行私有化时，遭到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对。

第三，保守党政府从 1979 年开始以各种手段限制工会的权力，曾使罢工数量明显降低，社会生活稳定，投资环境改善。然而从 1989 年秋季以来，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全行业全国性罢工也时有发生。工会似乎学会了利用合法手段与保守党政府限制打击工会的法律进行斗争。

第四，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教育、税收制度等方面，撒切尔夫人亦越发举步艰难。曾有民意测验表明，有 60% 以上的公民反对实行“人头税”，在 1990 年 3 月，伦敦市民甚至出于对这一税种的强烈抵制而与警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第五，政界和舆论界对“撒切尔主义”的欧洲政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感情绪，撒切尔夫人等少数持强硬立场的人士在党内变得更加孤立。首相相对欧洲共同体的经济、政治联合进程一贯持消极态度甚至反对立场。为此她与保守党内部的主张参与欧洲统一进程的“欧洲派”积怨甚深。1988 年，曾被欧洲货币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佳财政部长”的英国财政大臣、撒切尔夫人的得力助手劳森宣布辞职，便是其中一例。劳森在对欧共体的态度上与撒切尔首相有很大的分歧。撒切尔夫人欧洲政策的出发点是，参加欧共体活动的目的首先在于减少或消除英国的经济困难，但决不能因此而丧失国家的主权，更不能让“社会主义从后门进入英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动摇。她开始从巅峰下滑，逐渐从“保守党的珍珠”转变为众矢之的。不容她思考这些变化、控制事态发展，她已经在向自己的失败走去。

### “红灯警报”

历史学家将会指出，1989 年是撒切尔夫人政治上走向失败的开端。

这一年 10 月份公布的哈里斯民意测验结果令人惊讶地表明 52% 的英国选民认为撒切尔首相应该辞职。选民们坦率地认为，由于财政大臣劳森的辞职而使英国政府所深深陷入的危机，使首相已无力继续领导她的政府。此外，还有 48% 的选民认为撒切尔夫人应对国家和政府目前经济政策上的混乱局面负责。不久，1990 年 3 月 2 日所公布的另一项重要民意测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落后反对党工党 18.5%，是近 20 年以来的最低点。在这一次民意测验中，65% 的人对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表示不满。此间其他民意测验的结果还表明，1/4 的保守党议员不赞成撒切尔夫人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和政府首相的职务，并希望她在下届大选（1992 年年中）之前辞职。报界披露说，撒切尔夫人周围的人（包括首相的独生子马克）利用了她的地位、影响和关系迅速成为“新兴的百万富翁”。马克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拥有 2000 万至 4000 万英镑的巨贾，还在伦敦最好的地段购置了一栋价值 200 万英镑的别墅。新闻媒介指出，这些人无法解释得清他们收入的来源。伦敦政界都在议论，内阁中存在着“迫使撒切尔夫人下台的阴谋活动”，“首相正面临着



高层的‘宫廷政变’”。

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压力，撒切尔夫人发誓将“寸土不让”，决心第四次竞选连任英国首相。但是，豪情壮志未能帮助她挽救颓势。仅仅在她表示“寸土不让”后不到一周，保守党就在议会补缺选举中遭到惨败。

颓势还在蔓延。

1989年7月，公认的撒切尔夫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因在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上与撒切尔首相存在矛盾，被调离外交部。尽管他立即就被任命为“副首相”，但这种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把戏世人皆有目共睹。此后，豪与撒切尔夫人的矛盾继续激化，尤其是在对待欧洲共同体态度的问题上。1990年11月，恰恰是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他以“不敢恭维首相在欧洲问题上的观点”为由宣布辞去副首相的职务。杰弗里·豪在政治上追随撒切尔夫人长达15年之久，曾是首相的心腹之一，先后担任过保守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他的辞职，表明从1979年第一届撒切尔政府起就在内阁担任大臣的人士已全部离开了她。舆论尖锐地指出，这正说明撒切尔夫人本人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副首相的拂袖而去，立即触发了撒切尔夫人领导地位的危机。从此，形势急转直下，警报的红灯闪动得更加频繁了。

### 辞职：为了党的团结

在杰弗里·豪宣布辞职后不久，早在1986年初就因欧洲共同体问题和内政问题与撒切尔首相严重不和而退出内阁的赫塞尔廷，便向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领袖地位发出了挑战。

赫塞尔廷57岁，曾任撒切尔内阁国防大臣，历来以“无情和野心”著称于世。他总是在欧洲共同体的问题上与首相唱对台戏。撒切尔夫人常常气愤地说，“他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赫塞尔廷赞成欧洲统一，主张英镑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在内政问题上，他也与撒切尔夫人的观点相左。此时虽然身无要职，但这位曾经立志要在55岁就当上首相的百万富翁从来就没有失去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豪刚一辞职，他便趁机向自己的政治目标冲击——尽管他已经超过55岁两年。

赫氏的发难，连同保守党内部已经涌起的对撒切尔夫人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一起，形成了对撒切尔夫人致命的威胁。

然而此时撒切尔夫人还是没有示弱。她充满信心地认为，她仍会像从前那样经过抗争战胜对手，继续担任保守党领袖，按照英国宪法，也就是继续担任英国政府首相。她在接受《星期日时报》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说，“我总是通过斗争渡过难关。这是我的风格。这次又是一道需要进行艰苦奋斗才能渡过的难关”。

不久之后，保守党便举行了党的领袖的第一轮选举。

第一轮选举安排在1990年11月20日，这是保守党15年来第二次有人敢于向撒切尔夫人的领袖地位挑战。选举结果给了信心十足的撒切尔夫人重重一击——她未能如愿赢得其对赫塞尔廷的“全面胜利”，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击败对手。根据保守党当天晚上所公布的选举结果，撒切尔夫人得票204张，占372名投票者的55%；挑战者赫塞尔廷得票152张，占372名投票者的41%；弃权票为16张，占4%。按照保守党关于领袖选举的复杂规程，无

论他们两人中的哪一位要赢得“全面胜利”，都必须既获得合格票至少 187 张，又比其对手领先 15% 的选票，即 56 票。而在这轮选举中，撒切尔夫人得票虽超过了 187 票，但只比赫塞尔廷领先 52 票。因此，撒切尔夫人尽管在得系数目上占明显优势，但距当选票数仍差 4 票，故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4 票之差，难道最终将断送一颗政治明星的前途吗？

此时她正在巴黎参加欧安会首脑会议。得知这一结果已是 21 日清晨 6 点 30 分了。仅 7 分钟后她便出现在巴黎英国大使馆的门前。撒切尔夫人对周围的记者宣布，她将参加第二轮选举。她朗声说道，“我非常高兴在议会中赢得半数以上的选票，但令我失望的是没能赢得足以在首轮选举中保证取胜的票数。不过，我将以我的名字继续名列前茅”。她似乎感觉到人们对她的政治前途的怀疑，但仍固执地说，她要“继续战斗”，“为胜利而战斗”。为了缓和气氛，她又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了句“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

几乎与此同时，赫塞尔廷在伦敦也向报界表示了参加第二轮选举的决心。

第二轮选举被安排在下一个星期。根据保守党选举领袖的有关规则，在这一轮选举中，竞选者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就能取胜。

撒切尔夫人为了更有效地赢得选票，争取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赫塞尔廷，当机立断撤换了她第一轮选举的经纪人、前国防大臣乔治·扬格，起用了更受她器重的能源大臣约翰·威克曼全权负责第二轮选举事宜。

正当一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保守党高级领导层的态度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1 月 21 日，撒切尔夫人返回伦敦，刚刚来到位于唐宁街 10 号的首相府，保守党的元老就分批前来约见首相。他们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你输定了”。一些看到这种变化并已感觉到首相地位摇摇欲坠的保守党议员，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担忧，此时也纷纷背叛了她。在首相与大臣一对一的单独会晤中，19 位内阁大臣中竟有 12 人明确告诉她，“你是赢不了的”。此外还有 3 人以辞职相威胁。更有甚者，深得撒切尔夫人欢心的威克曼也对她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的可能表示怀疑。保守党上层几乎完全一致地催促他们的领袖尽早辞职，以便其他候选人出台与赫塞尔廷抗争。显然，保守党是要抛弃它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了，它将做某种政策调整，即使撒切尔夫人能够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她也无法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保守党议会党团；而赫塞尔廷也不理想，所以必须使撒切尔夫人走，换上合适的人通过选举击败赫氏来担任党的领袖和政府首相。此时此刻，大势已去，筋疲力竭的撒切尔夫人独自站在窗前，透过首相办公室的玻璃窗默默地凝视着远方夜雾中的闪闪灯光……

11 月 22 日凌晨，彻夜未眠的撒切尔夫人终于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再次与其内阁成员进行会晤，果断宣布，“为了促进党的团结和大选的胜利”，她将辞职。在她退出竞选之后，一旦保守党产生了新的领袖，她就离开唐宁街首相官邸。大臣们忽然看到，她的两眼充满了泪水。这一天，生活似乎开始得比以往都早。不久，约翰·梅杰——位腼腆的中年男子登上了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宝座。至于那个掀起轩然大波并导致撒切尔夫人辞职的赫塞尔廷，最终也没能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1984 年 10 月，撒切尔夫人在布赖顿保守党年会会址大难不死，无意之中躲过了一起炸弹袭击。那时针对她的是令人厌恶和恐惧的 IRA——爱尔兰共和军。6 年之后，她终于在一次有预谋的反叛行为中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前途，然而这一次针对她的却是

她的党。她的孩子曾大声疾呼：“党出卖了妈妈！”急流勇退的确不是她的风格，但她仍不失为一名明智的政治家。“撒切尔时代”虽然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但其印记似乎永远不会从英国政治历史上消失，尤其是她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保守党利益，缓和政府同社会的紧张关系的行动，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和高风亮节，使其辞职激起了人们的不尽敬意和悠悠的惋惜。

王捷

## 后 记

本书所选人物，均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绝大部分是被推翻的，只有戴高乐、尼雷尔、撒切尔夫人等少数是主动辞职的，但不是“急流勇退”，而是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回天无术的情况下离开政坛的。

本书由杨双、谭英洲主编，杨双修改定稿。周多礼、马志良、王平、赵增泉、林明扬等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2年3月，北京。

